

JOURNAL OF JIANGSU SECOND NORMAL UNIVERSITY

江蘇第二師範學院
學報

2025 / 06

第41卷 第6期 (总第235期)

编辑委员会

主任 梅景辉

副主任 王 曜

委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尹坚勤 冯保善 孙爱军

李洪天 张 莉 张 勤

姚苏平 黄光耀 蒋 波

路 明 潘 文

主编 梅景辉

副主编 王 曜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逻辑进路

..... 岳 奎(1)

供给侧视域下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路径研究

..... 胡 军(10)

“数字+”视域下城市精神文明建设机制研究

..... 陈彤彤(18)

【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

习近平文化思想中文化育人的逻辑体系及理论贡献

..... 袁 芳(25)

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美好精神生活的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径

..... 邹 慧 邹亚男(33)

【教师教育研究】

教师职业变革的核心背景、关键路径和治理路向

——以《全球教师报告》为中心的探析

..... 王 晋 贾慧莹(41)

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下乡村幼儿教师在地化教育实践困境与纾解

..... 杜春娟 张新颖(50)

校长变革型领导对教师工作投入的影响

..... 张志行 梅文倩(59)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 “思想政治教育元宇宙”三维钩深:内涵、界域及进路 胡华(66)
- 新时代地方师范院校思政工作集成创新的问题审视与推进理路 王艳 李前进(75)
-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的现状与反思
——基于生命教育维度的思考 盛雨潇 张佳琴(83)
- 非遗手工艺融入高校美育的路径研究 云彤麟(90)
-

【古代文学研究】

- 屈大均赋作中的遗民心态与处世哲学 陈为兵 安宁娅(95)
- 论《儒林外史》中的“财利破家” 李鹏 王仁静(101)
- 长向花荫课女工
——论《红楼梦》中的女工书写 麻飘飘(110)
-

【书评】

- 如何治理教育风险?
——评倪娟研究员《教育风险治理通论》 袁振国(122)
-

JOURNAL OF JIANGSU SECOND NORMAL UNIVERSITY

Vol.41 No.6(Serial No.235)

Dec.2025

Main Contents

On Socialist Spiritu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YUE Kui(1)
Paths to Rural Spiritu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from the Supply-Side Perspective	HU Jun(10)
Mechanism of Urban Spiritu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	CHEN Tongtong(18)
Logical System and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of Cultural Education in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YUAN Fang(25)
Value Implications and Practical Paths for Leading a Better Spiritual Life Based on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ZOU Hui ZOU Yanan(33)
Core Background, Key Paths and Governance Directions for Professional Transformation of Teachers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Global Report on Teachers”	WANG Jin JIA Huiying(41)
Dilemmas of and Optimization Paths to Rural Preschool Teachers’ Localized Teaching Pract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system Theory	DU Chunjuan ZHANG Xinying(50)
Impacts of Principals’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on Teachers’ Work Engagement	ZHANG Zhixing MEI Wenqian(59)
Three-Dimensional Exploration of the “Metavers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nnotations, Boundaries and Approaches	HU Hua(66)
A Review of and Promotion Approaches to Integrated Innovation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 Local Normal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WANG Yan LI Qianjin(75)
Approaches for Integrat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Handicrafts into Aesthetic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YUN Tongwei(90)
Mentality and Philosophy of Life of the Adherents of Ming Dynasty in Qu Dajun’s Poetry	CHEN Weibing AN Ningya(95)
On “the Decline of a Family Due to Material Interests” in <i>The Scholars</i>	LI Peng WANG Renjing(101)
Teaching Girls Needlework in the Shade of Flowers for a Long Time ——On the Writing of Women’s Needlework in <i>A Dream of Red Mansions</i>	MA Piaopiao(110)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逻辑进路 *

岳 奎

(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9)

[摘要]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有必要系统厘清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什么建”“建什么”和“怎么建”的问题。从必然逻辑上看,精神文明建设是实现与物质文明相协调的必然要求,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必然选择,更是凝聚现代化自主精神力量的必要保证。从历史演进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实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从初步探索、创新完善向深化推进的阶梯式跨越。在新时代新征程物质文明较为丰富的基础上,要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着眼凝心铸魂,注重以文化人,坚持城乡融合,深化改革创新,绵绵用力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

[关键词]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精神

[中图分类号] D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5)06-0001-09

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对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提出“通过推动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力量”^[1]。这一重要指示既明确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指明了其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为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伟大事业出发,系统回答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什么建设”“建设什么”“怎么建设”的问题,将为创造引领新时代新征程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贡献智慧,也有助于为进一步深化文化强国建设提供基本路径。

一、中国式现代化旨趣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然趋向逻辑

国家强盛与民族振兴离不开物质文明的积累,更需要精神文明的升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2]5}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内嵌入中国式现代化之中,是规避西方现代化弊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凝聚现代化自主精神力量的必然之选。

(一) 现代文明取向: 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必然要求

现代化是世界历史进入近代以来的时代主题,它首先在西方发端。蒸汽机引起的“工业生产的革命”使“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

* [基金项目] 华中科技大学双一流智库建设项目“新时代文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2025ZKJD03)。

[收稿日期] 2025-09-10

[作者简介] 岳 奎,男,河南南阳人,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3]36}。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世界市场的开辟，“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3]35-36}。相对于过去一切文明来说，资本主义文明是一种现代文明，具有积极进步意义。但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4]278}。由于无法遏制资本的贪婪本性，资本主义文明展现出天然的自我矛盾性：一边是物质层面的财富积累，一边是精神层面的信仰缺失、物欲横流。物质膨胀与精神贫乏的对垒，带来“商品拜物教”“金钱万能论”大行其道，“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3]34}，整个社会深深陷入资本利益关系的束缚之中。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摒弃了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老路，既要物质财富极大富裕，也要精神财富极大富足，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新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本质特征之一，是中国的现代化对西方现代化超越的重要方面，也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首先，中国式现代化将现代化的基点放在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上，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把人民生活搞上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解决当代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本要求”^[5]，并在新时代发展出“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6]——新质生产力，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其次，中国式现代化在推进物质不断丰裕的同时，也要求精神文明跟上物质文明的步伐。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党在着力使人民摆脱贫困、过上更加富裕生活的同时，也孜孜于带领人民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党的二十大报告把“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通过充分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中国式现代化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规避了西方现代化的“物质膨胀、精神贫乏”困境。最后，中国式现代化着力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相互协调发展。中国共产党既尊重物质对精神的决定作用，不做脱离物质文明空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之举；又深化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的引领认识，不因经济建设任务的压力而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推进，保持两者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协同发展。

(二) 现代人格塑造：达成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必然选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7]58}离开了人的现代化，现代化就失去了本来意义和根本动力。一部现代化史，是人不断从束缚和限制中解放出来、逐步实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历史。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工业社会的开启，将人从“人的依赖关系”转换为“物的依赖关系”，实现了“以交换价值为基础而不是以统治和奴役关系为基础的关系”^{[8]456}。但是，它并未将生产发展与人的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人们至今还没有从它同人的本质的联系，而总是仅仅从外在的有用性这种关系来理解”^{[9]192}，也就不能在社会的物质生产中找到现代化的价值追求。作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3]44}的政党，无产阶级政党能够从人的本质出发彻底解决这一矛盾，推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实现现代化的最终目标。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核心。党的初心使命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0]1}自党诞生之日起，她就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党领导人民开创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立足“更好回应人民各方面诉求和多层次需要，既增进当代人福祉，又保障子孙后代权益，促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11]2-3}。首先，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为了回应人的精神文化追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创造物质文明是为了回应人民物质方面需要。除了追求物质条件、经济指标之外,人民还要追求精神生活的充实和自我价值的实现,这就要求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为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要的过程,也是人民创造精神财富和文化成果的过程,也将带来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其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不断改造人的主观世界的工作。通过主观世界的改造,能够实现人的思想解放和观念革新,培养和造就一批又一批具有高度文明素养、道德素养、能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提升开展社会实践活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能。最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能够实现“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9]185}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12]150}。通过精神文明建设,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提高全民族的精神文化素质,实现人的本质复归和对生命意义的追求。

(三) 现代力量凝聚:自主精神迸发的必然保证

物质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基础,对精神文明起着决定作用,但精神文明也对物质文明的发展起着助推作用。与物质的力量不同,精神的力量看似不可捉摸,却总是悄无声息地融入经济、政治和社会各个方面,“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的‘黏合剂’”^{[12]149}。一个精神富有的民族,能够在物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保持强劲动力、充满生机活力,能在物质富足的时候保持务实奋斗姿态、拥有良好精神风貌。近代以来中国的沉沦既在于“器物”和制度的落后,也与文化自卑和精神被动有关。正是“以西为尊”“唯洋是从”,跟在西方发达国家后面亦步亦趋,中国近代沉沦的现实不仅没有改变,反而造就了“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13]631}。人是靠精神站立起来的。国家和民族也不例外。没有精神上的独立自

主,如果热衷于搞“去价值化”“去主流化”,必将沦为他国的注脚。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国家和民族才有未来,也才能在克服艰难险阻中奋勇向前。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决定性地改变了近代中国的历史困局,“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10]10-11}。正是坚持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党领导人民经过长期努力、艰苦奋斗,成功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伟大的事业,从来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是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需要坚定的精神力量支撑党领导人民进行持续奋斗。首先,弘扬党的伟大精神将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劲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伟大精神和光荣传统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激励我们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14]通过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将党的伟大精神融入我们党、国家和人民的血脉之中,能够激发人民把无限的创造力凝聚到中国式现代化的事业中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其次,保持文化自信自强将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精神保障。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通过“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传承中华文明”^{[15]18},不断提升人民的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能够造就精神面貌更加奋发昂扬的中华民族。这是一种文化上的自信自强,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精神保障和价值规范。最后,伟大事业也将孕育伟大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2]2}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作为其中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将不断拓展它的内容范围,释放出支撑政治、经济、社会、生态发展的强大影响力和凝聚力,从而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更大的力量。

二、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历史演进逻辑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

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15]¹⁸}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紧扣时代主题和主要任务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实现从初步探索、创新完善向深化推进的阶梯式跨越。

(一)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初步探索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中国人民从此成为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面对积贫积弱、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再加上帝国主义的封锁包围,如何调动一切积极的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重大挑战。毛泽东提出,“尽一切可能用极大力量从事人民经济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同时恢复和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16]¹⁴⁶⁶}。

从1950年冬开始,党在新解放区开展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的改革,推动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农民的文化需求也日益增加。但是封建残余观念、旧的道德风尚和风俗习惯尚未破除,仍在危害着民众生活,扰乱着社会秩序。为“扫除一切封建残余,把人民群众从剥削制度和腐朽愚昧的观念中拯救出来,进而建设平等、健康社会”^{[17]²²},新生的人民政权迅速开展扫除各种社会弊病的斗争,基本禁绝了包办婚姻、卖淫嫖娼、贩毒吸毒、聚众赌博以及会道门等旧社会的遗风恶俗,净化了社会环境。在广大农村,党组织农民利用农闲时间广泛开展“扫盲”运动,以文化教育(首先是识字)为抓手,“发起了学习文化的热潮,从而掌握了话语权和学习先进文明的可能,并形成新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促进农民对新生国家的认同”^{[18]⁸⁴}。党和政府还着力开展意识形态教育和新道德体系建设,在全社会宣扬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引导人民树立男女平等、艰苦奋斗等思想意识。通过在教育科学文化社会事业的除旧布新,人们的旧思想、旧观念、旧习惯得到改造,社会精神面貌为之一新。

1954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把中国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用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下来,为党带领人民沿着社会主义道路推进现代化提供了制度保障。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后,“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19]³⁴¹}。为了把我国尽快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党领导人民大力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随着汹涌澎湃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20]¹⁸⁷}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指引下,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如火如荼地展开,全国人民意气风发、精神昂扬,爆发出前所未有过的冲天干劲,积极投身到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展现了战天斗地的精神风貌,形成了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等一系列伟大精神,充分证明了“同困难作斗争,是物质的角力,也是精神的对垒”^[14]。正是在这种精神风貌的作用下,党领导人民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国家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

(二)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完善发展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21]¹⁸²}。为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定。党领导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使我国经济建设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得以凸显。党的十二大把“我们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确定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方针之一,明确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全党的任务,是各条战线

的共同任务”^{[22]25-27}。在党中央的部署下,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1982年,国家部委联合发出《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通知》,随后国家成立“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委员会,指导、协调和监督活动在全国范围内的开展。在这一时期,“创建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街道”等活动遍地开花,反对精神污染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也在全国思想文化领域广泛推进。这一系列活动对于抵制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文化侵蚀,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起到了积极作用,为全国人民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

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深化,精神文明建设能不能成为新形势新任务,“是一个历史性的重大考验”^{[23]1174-1175}。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4]30-31},强调“精神文明重在建设”,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方针。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更是强调把精神文明建设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个事业的大局中进行考察,常抓不懈。在这一时期,中央宣传部组织实施了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评选活动,团中央发起实施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希望工程”“春蕾计划”“救孤计划”等活动在全国展开,弘扬了扶危济困的美德。为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持续深化,中央及有关部门先后印发《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关于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的通知》《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把爱国主义教育作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工程,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推进青年学生思想道德建设,也大大改变了农民信息科技落后和文化贫乏局面。

21世纪以来,党顺应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变化,把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做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重大战略决策。2004年,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在全国范围内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推进党的思想理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战略任务,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予以强调,并明确“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25]26-27}。在这一阶段,党在全社会深入实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普及计划,广泛开展理想信念、国情和形势政策教育,着力丰富农村、偏远地区、进城务工人员精神文化生活,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建设,深入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完善社会志愿服务体系,推动全社会逐步形成知荣辱、讲正气、树新风、促和谐的文明风尚。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化创新

在2013年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5]面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将精神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战略布局,统筹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进入深化创新的新阶段。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党通过持续巩固壮大社会主流价值,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全民族精神面貌更加奋发昂扬,人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升。

201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把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任务,明确要求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落实到经济发展实践和社会治理中”,强调“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26]。党中央还高度重视公民道德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印发《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与此同时,党还着力开展群众路线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等一系列教育活动,统一了全党思想意志行动。尤其是建党一百周年等一系列庆祝活动,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作出,展现了百年来党领导人民接续奋斗的辉煌历史成就,极大振奋了民族精神。弘扬劳模精神、科学家精神等一系列精神活动也在全社会范围内广泛开展,着力培育了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推动全民族精神面貌更加奋发昂扬,社会主流价值得到巩固壮大。

为进一步加强新时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党中央在全国范围内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试点工作以全县域为整体,以县、乡镇、村三级为单元,以志愿服务为基本形式,打通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运行机制、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的工作机制、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引导机制,整合人员队伍、资金资源、平台载体、项目活动,推动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改革创新。”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进一步印发《关于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的意见》,明确“突出思想引领、道德教化、文明洗礼、文化熏陶”,强调“坚持群众主体、共建共享。……增强群众自我教育、自我提高、自我服务的意识和能力。”自试点以来,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已实现全面覆盖,有的地方还将阵地触角延伸到自然村、公园集市等“神经末

梢”,织密了基层阵地网络,打通了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不断满足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丰富了人民精神世界,提升了人民精神风貌,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三、中国式现代化引导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行动逻辑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5][17]}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更加丰富多样,需要更丰富、更精准的精神满足;国内外风险挑战形势更加严峻,迫切需要培养群众更加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等等。面对一系列新形势新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新征程,精神文明建设要有新气象新作为。”^[1]立足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持续深化,绵绵用力,才能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

(一) 着眼凝心铸魂: 巩固全社会共同的思想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定性明确了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也规定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指引。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统科学地回答了党的十八大以来的重大时代课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行动指南。坚持不懈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是新时代新征程上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首要政治任务,也是强化理想信念教育、厚植全社会思想基础的关键之举。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持不懈把传播党的创新理论做细做实做深,融入

群众需要之中,找准理论和群众实际的结合点。一是找准传播切入点。要广泛开展调查研究,梳理城乡基层群众共同关心的问题,从群众关心的问题切入进行宣讲。如针对群众最为关注的民生政策,可以通过梳理群众思想问题与民生问题的交织点,摆事实讲道理,把政策讲清,把道理讲明,把理论讲透。二是做好宣讲分众化。要坚持因人而异制定“个性套餐”,推动理论宣讲的深入。既聚焦一个主题保持一个旋律,又突出差异化,精准匹配不同群体的个性化需求,做到有的放矢,提高理论感染力,像钩子一样紧紧抓住人们的注意力,使其受到思想启迪和理论感召。三是推进宣讲融通化。要摒弃干瘪的理论说教,面向现实把宣讲融入群众日常。推动理论与群众身边故事、文艺活动和生产生活有机结合,充分展示人民群众身边真切的发展变化,推动理论在走向实践中为群众所掌握,使群众真正感受到党的创新理论的魅力,从而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团结奋斗,奋勇向前。

(二) 注重以文化人:丰富人民精神世界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着眼于人民的精神文化短板,落脚在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要。伴随着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日益突出,不断呈现出个性化、多样化、品质化和国际化的总趋势^[27],既有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衷,又有对短平快式“快餐文化”的追逐;既有着对自我实现价值的强烈渴望,又有对内在人格丰富完善的追求,等等。回应人民群众在精神领域的美好期盼,要更加注重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涵养全民族昂扬奋发的精神气质,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推进精神文明建设,需要明确以什么样的文化培育人、滋养人,才能真正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一是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顺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与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结合起来,坚决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想侵蚀,教育引导全体社会成员自觉遵纪守法、遵循公序良俗。通过不断壮大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人们的生产生活之中、转化为人们的情感所系、成为全体人民日用而不厌的行为准则。二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新的时代活力。中华民族绵延不绝,有着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这是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养料。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推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展新颜,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深厚历史文化底蕴。三是加强网络空间优秀文化供给。适应互联网快速发展趋势和网民规模日益发展壮大的时代新形势,推动网民文明用网、文明上网活动。做强网上正面宣传,坚决清除网络“黑色地带”,治理“灰色地带”,弘扬主旋律、高唱好声音、汇聚正能量,培育向上向善向好的网络文化生态,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

(三) 破除城乡隔阂: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现代化的成败。”^[28]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束缚,我国城乡之间仍有较大的发展差距。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新时代以来,党中央一直积极深化城乡二元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实现从“以城带乡、以工补农”到城乡融合发展的转变。城乡融合发展,不仅指的是物质资源等生产要素在城乡的平等流动和高效配置,也要求城乡精神层面的融合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命题,为推进城乡文化要素的双向流动提供了指引。

推动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关键是破除城乡文化要素双向流动的障碍,增强文化要素在城乡之间的联动和互促,助推城乡居民共享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实现文明素质共同

提高。一是发挥城市精神文明建设先导作用，扎实推进从创建“文明城市”向建设“城市文明”转变。要顺应城镇化快速发展趋势，树牢“人民城市”理念，加强城市道德建设，拓展城市文化空间，赓续城市历史文脉，推进文明熏陶和文明习惯养成，不断提高市民文明程度，遏制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的行为，让城市有更多的人文温度、让城市居民享受更现代的精神生活。二是大力实施文明乡风建设工程，让新风正气吹遍乡村各处。要适应乡村全面振兴目标要求，突出问题导向，积极推广信用积分制“美德银行”、精神文明“红黑榜”等做法，引导农民树立文明观念，在乡村社会不断厚植现代文明理念。持续整治人情攀比、大操大办、厚葬薄养、散埋乱葬等突出问题，加强无神论宣传教育，综合运用自治、法治与德治等手段，持续推进移风易俗，着力涵养文明乡风、淳朴民风、良好家风。三是坚持重心下移，推动城乡精神文明要素融通。以县域为枢纽推动城乡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有效结对，持续将城市优秀文化资源整合贯通，推进走向乡村、下沉到农民身边。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推动文化互联互通，补齐农村地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弱项，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四) 深化改革创新：形成社会主义精神建设的行动合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继续锲而不舍、一以贯之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前进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强大的精神力量、丰润的道德滋养。”^[29]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只是宣传思想文化领域的事，而是融入政治、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各个领域，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个进程中；它也不只是单独哪一个部门的职责，离不开党委领导下各个政府部门的协同配合、少不了全体社会成员的积极努力。作为一项滋润人心、德化人心、凝聚人心的工作，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非一时之功，需要坚持长效理念，持之以恒，形成行动合力。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深化改革创新，坚持发挥党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

用，广泛动员社会参与，形成齐抓共管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长效机制。首先，坚持党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权。各级党委要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扛在肩上，加强对重大问题的分析研判和统筹布局，做好干部配备、人才培养和资源投入等工作，动员各条战线、各个部门一起参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调动各方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其次，建立各负其责、协同推进工作机制。坚持系统观念，将党委、政府、社会组织、公民等都纳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系统之中，搭建使各个部门各负其责、人人有责协同推进的工作机制，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人人有责”的共建共治共享格局，凝聚起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合力。最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适应新时代新征程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展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供给导向，积极推进理念、制度、方法等方面创新，不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持续优化文化产品精准供给机制，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以辩证的、全面的、平衡的观点正确处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把精神文明建设贯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全过程、渗透社会生活各方面。”^[29]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既对立又统一，两者共同作用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两者的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要求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也要求精神财富的极大丰裕，更要求两者的相互促进、协调发展。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既要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实现物质积累的不断突破，又要积极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性、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保持精神塑造与物质积累的同步发展，展现新作为新气象，让广大人民群众真切感受到中国式现代化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文明新形态。这既是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西方现代化的重要表现，又为世界

现代化提供了东方智慧、开辟了人类文明新的可能性。继续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不断开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新局面。

[参 考 文 献]

- [1]习近平对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强调 推动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 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N].人民日报,2025-05-24(1).
- [2]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5]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 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 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 [N].人民日报,2013-08-21(1).
- [6]习近平.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 [J].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24(4):4-6.
- [7]习近平.论“三农”工作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0]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 [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 [11]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12]习近平.之江新语 [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 [1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4]习近平.党的伟大精神永远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 [J].理论导报,2021(9):1.
- [15]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 [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
- [1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7]李文.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1949-2019) [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9.
- [18]叶国文.土地政策的政治逻辑:农民、政权与中国现代化 [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 [20]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下)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2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 [G].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 [G].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 [2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 [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 [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 [G].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6]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27]管健.新时代国人精神文化需求的新趋向 [J].人民论坛,2024-07-31(2).
- [28]习近平.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 [J].当代党员,2019(13):4-6.
- [29]习近平在会见第四届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代表时强调 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 墾而不舍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N].人民日报,2015-03-01(1).

(责任编辑 王遐见)

供给侧视域下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路径研究^{*}

胡军

(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合肥 230601)

[摘要]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是推进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支撑。深化农村精神文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需匹配性,将助力更好满足农民的精神文化需要。在新时代新征程上,面对农民精神文化需求的新变化,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供给存在主体虚化、内容形式化、方式低配化、机制碎片化等一系列风险。防范和化解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供给风险,必须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强化党委主体责任,吸纳全社会参与;坚持以需为导向,充实农民精神生活;推进供给方式适配,保持充满生机活力;创新机制有效集成,不断深化供给质量,从而实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长效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供给侧; 有效路径

[中图分类号] D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5)06-0010-0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农村现代化,不仅物质生活要富裕,精神生活也要富足。”^[1]这一论述明确了农村现代化是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足相协调的现代化,为推进农村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农民精神文化需求发生了新变化,也对精神文化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推动供给与需求相匹配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题中应有之义。本文拟从供给侧出发,考察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存在的风险,并提出相应的治理策略,将有利于深化农村“铸魂”工作,也有助于为农村现代化提供强劲支撑。

一、供给侧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关键所在

供给与需求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两个

重要方面。作为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双方,供需之间的矛盾运动推动着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不断突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需求,供给就无从实现,新的需求可以催生新的供给;没有供给,需求就无法满足,新的供给可以创造新的需求。”^{[2]30}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始终紧扣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加强文化供给,推动农村精神文明供需平衡,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党领导人民打贏了脱贫攻坚战,如期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农村整体面貌发生历史性巨变,农民生活水平得到大跃升。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增长至23 119元。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富了口袋”的农民也期望“富脑袋”。在新发展阶段,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凸显,对科学技术、文化知识的需

* [基金项目] 华中科技大学双一流智库建设项目“新时代文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2025ZKJD03)。

[收稿日期] 2025-09-12

[作者简介] 胡军,男,安徽太湖人,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华中科技大学新时代文明实践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要越来越突出,对更加充实、更为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期待更加强烈,高品质文化享受成为新的文化追求。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离不开丰富精神食粮的提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3]6}。

与对精神文化期待更为强烈相对应的是,农民结构也在发生巨变。自改革开放以来,“数亿农民离开了耕作的土地,甚至离开了生活的村庄”,形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4]4}。到2023年,农民工数量达2.98亿人。“大量青壮年在农村社区的长期不‘在场’,构成了农村社会主体的失陷”^{[5]172},也造成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主体缺位,许多农村出现村庄空心化、农民老龄化现象。在2013年前后,“据测算,农村留守儿童已超过六千万,留守妇女达四千七百多万,留守老年人约有五千万”^{[6]680}。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农村60岁及以上人口数量为1.21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23.81%;农村留守儿童规模达到4177万人。这些留守群体成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主体,满足这些留守群体的精神文化需求,很难依靠其自主生成。在农村调研中,经常听到老人的诉求,诸如“希望政府能够多组织一些文化活动,丰富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多搞一些送戏下乡”,等等。

整体来看,我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需求在发生巨大变化,迫切需要文化供给的转变。然而,农村精神文明的产品和服务供给质量存在“跟不上”“达不到”的风险。早在201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进文化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高质量文化供给增强人们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7]257}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关键也在供给侧,需要持续深化精神文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优化文化产品和服务,提高供给质量,用改革的办法扩大和增强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更好满足广大农民的精神文化需要,解决供需不匹配的问题。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

供给“已经不是缺不缺、够不够的问题,而是好不好、精不精的问题”^{[7]256}。从调研情况看,需要从两方面着力:一是补齐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短板。在现代化的快速转型中,乡村社会的文化元素遭到挤压或挤占,而新的文化衔接体系未能有效建立,呈现出“先破而不立”的局面^{[8]241}。这导致一些农村地区存在如“人情攀比、大操大办、厚葬薄养、散埋乱葬等突出问题”^{[9]14}。为此,“要旗帜鲜明反对天价彩礼,旗帜鲜明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婚丧大操大办、抵制封建迷信作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10]254},着力推进移风易俗,增强文明风尚,弘扬真善美,抑制假恶丑,营造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氛围,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二是推进精神文明迈向“高峰”。以高质量文化供给增强农民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满足农民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从“被动满足”向“主动适配”“数量覆盖”向“质量提升”转型,实现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

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供给的风险表征

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1]591}新时代以来农民物质生活条件的快速改善,带来了精神文化需求的发展变化,使得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供给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不适应性。坚持问题导向,系统考察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供给的风险表征,将为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供需匹配提供基础。

(一) 供给主体虚化风险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首要的是解决由谁负责供给的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一工作主要由宣传工作部门承担。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强调“各级党委要负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加强对宣传思想领域重大问题的分析研判和重大战略性任务的统筹指导,不断提高领导宣传思想工作能力和水平。”^{[7]4}为推动农村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

工作,党中央做出了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重大决策,自2018年部分试点开始,如今已实现全面覆盖。根据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的意见》,县级党委承担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主体责任,县级党委书记担任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主任,乡镇党委书记担任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所长,村(社区)党组织书记担任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站长。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成为县级的“一把手”工程,职权清晰、责任明确。然而,在工作实践中,也存在一定程度的虚化风险,在一定范围内出现对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不想抓、不会抓、不敢抓的情况。

首先,存在“不想抓”问题。在个别地方干部的眼中,经济发展是硬指标,GDP才是真任务。学者周黎安用“政治锦标赛”的概念来描述地方干部的这一行为取向,“竞赛优胜者将获得晋升,而竞赛优胜的考核内容和标准则由上级政府决定,可以是GDP增长率,也可以是其他可度量的指标,如财税增长、招商引资规模、出口创收、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排名等”^[12]。在所有这些考核中,精神文明建设的比重有限,导致很多地方干部将其视为可有可无的“虚功”。此外,一些地方干部也存在“只要经济发展了,乡风自然会文明”等错误观念,体会到了物质文明对精神文明的决定作用,却没有深刻理解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的反作用,以至于出现“经济发展搞不好,哪有闲情搞精神文明建设”的论调,从而不愿投入精力抓精神文明建设。其次,存在“不会抓”问题。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是直抵人的思想和人心的工作,具有无形性、难量化的特点。作为党和国家政策执行落地的最后层级,基层长期惯于根据政策指示进行实践操作,但却对“虚功”如何实做缺乏思路。在调研中发现,很多基层干部表示精神文明建设“不知道从哪里下手”,甚至“期盼上级能出台具体的操作手册来抓”。最后,存在“不敢抓”现象。不少基层干部认为精神文明建设属于人的思想层面,怕过于干涉会引发舆情或引起矛盾。尤其是对一些民间宗教活动,有乡镇宣传干事坦言,

难以准确衡量是否非法,有的甚至将其盲目认定为法律所保护的“信仰自由”。不敢作为的背后是担心自己处置不当,引发上访、维稳等问题,最终让自己“背锅”,所以在处理过程中多是采取回避态度。这些“不想抓、不会抓、不敢抓”的问题,带来的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明确责任主体的功能虚化,从而影响了农村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

(二) 供给内容形式化风险

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重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把凝心聚力作为推进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有研究发现,新时代以前党主要偏重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科技助农惠农、文化下乡、农村教育等外在性、浅层次、器物性的精神文明建设^[13]。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14]^[33]的使命任务,明确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重点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保护和传承农村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开展移风易俗,改善农民精神风貌,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10]^[278]。在以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为抓手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中,明确其要承担起“学习实践科学理论、宣传宣讲党的政策、培育践行主流价值、丰富活跃文化生活、持续深入移风易俗”的职责。经过多年持续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不断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提升了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使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在农村有了更广的覆盖面和更高的满意度。然而,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在持续完善精神文明供给内容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形式化风险。

首先,部分地方重“硬件”轻“软件”,文化设施利用率低。目前,广大农村的公共文化设施(如农家书屋、文化活动广场等)日益完备,尤其是一些文明实践点下沉延伸到自然村落、村民活动频繁的广场或农家小店,便利了村民就近享受文化生活。但是,一些地方的文化设施硬件配套完备,却缺乏活动、没有人气,利用率低。“比如,一些地方热衷于打造华丽的文

化地标,对面向基层群众的文化服务重视不够;一些基层文化场所利用率不高,有的农家书屋处于闲置状态,有的文化站或文化中心被长期挤占挪用;一些文化服务不合群众口味,有的农村电影放映片源陈旧、观众寥寥,等等。”^{[7]257}在调研中也发现,一些地方的送电影下乡出现“无人观看”,一些文化活动广场只有特定节日有人气,大部分时间是“冷冷清清”;一些文明实践阵地建设“高大上”,甚至有些阵地布置在地理位置很好、人口密度最盛的地方,但群众进入率和使用率偏低。其次,部分地方重“输入”轻“结合”,文化活动吸引力弱。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作为开展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抓手,需要开展理论宣讲、政策解读、文艺演出、便民服务、科学普及等组合式活动。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中也提出,“针对农村群众的实际需要,结合农时季节、重要节庆等时间节点”进行活动安排。但部分地方将文化供给任务化,“上级要求什么就做什么”,满足于完成上级交代的活动任务,而没有真正考虑农民的文化需要。如在很多农村都开展“广场舞”比赛,进行“道德模范”评选,呈现出文化供给“千村一面”“万村一致”的特点。这种内容同质化的文化活动,难以形成独特的文明乡风。有的乡村在开展文化活动时,没有充分考虑农民的农忙农闲,以至于出现活动声势浩大、观众寥寥无几的现象。有基层干部苦恼:“我们搞一些文化活动,如果不给村民发点小福利,压根没人来。”有的甚至得出“村民不需要我们提供文化服务,他们需要的是手机短视频”的结论。

(三) 供给方式低配化风险

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离不开优质的文化内容,也离不开供给方式的创新。“当前,社会上思想活跃、观念碰撞,互联网等新技术新媒体日新月异,我们要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创新内容和载体,改进方式和方法,使精神文明建设始终充满生机活力。”^{[7]6}新时代以来,党始终根据时代需要和群众需求进行供给方式的优化,如在理论传播上,强调用群众的语

言、用群众接受的方式把大道理讲透彻通俗,用鲜活的故事生动诠释党的创新理论;在文明实践中嵌入融媒体中心的技术手段,推动实现“两个中心”的互融互通,达成服务供给与群众需求的匹配,等等。在不断推进农村精神文明供给方式创新的同时,也有一些地方习惯固守传统的供给方式,难以与时俱进推进方式创新,影响了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和获得感,降低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效果。

首先,偏重政府指令性供给。由于传统乡土文化元素的流失,再加上留守人员的自我精神供给能力偏弱,农村精神文化产品的主要供给责任落在政府身上。与市场或社会供给不同,政府往往将文化产品供给与意识形态和宣传思想工作紧密配合,向下以行政指令性方式进行安排,体现在“压实压紧各级党委(党组)责任,细化任务清单、责任清单,明确到具体人、具体事,层层传导压力,做到任务落实不马虎、阵地管理不懈怠、责任追究不含糊”^{[7]86}。这能够实现优质文化资源的“下达”,保证文化供给的社会效益。但是,自上而下的指令式供给,很容易产生层层向上负责的任务驱动心态,以“我认为农民需要什么”代替“农民真正需要什么”。有些地方的活动设计科学、文化内容也优质,但与农民的需求存在差距,导致活动“叫好不叫座”。供给方式上“想当然”,难免出现“上热下冷”的悬浮化现象。一位负责文明实践工作的领导坦言:“我们搞一些文化活动,总是自以为老百姓需要,结果热热闹闹的文化活动没有换来高‘点赞’呼声。但对于一些政府部门来说,是完成任务了,也不在乎‘水过地皮湿’的问题。”这种对上负责会降低农民的参与感,甚至可能引发农民对政府文化供给的抵触情绪。其次,偏重传统说教式供给。当今时代新媒体新技术日新月异,为精神文明供给方式的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是,一些地方仍然局限于传统的说教方式,尤其是在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上。以新时代文明实践的理论宣讲为例,有不少地方干部秉持着“不能讲出问题”的原则,采取对着理论读本讲、对着原典原章读的方式,就理论讲

理论,有论断无解释,既不生动也乏活力,让老百姓听得“云里雾里”,“不知道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实际上,这种说教式供给也是一种不负责任、不作为的表现,没有真正使党的创新理论进入寻常百姓头脑中。有的地方则是在为农民提供文化服务时,生搬硬套地在活动开展前进行一些政治宣传,而没有将文化服务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效结合起来,引发群众的不满;部分地方在传播文明理念上局限于传统思维,以官方主流媒体为主,不注意研究传播规律和群众的自媒体使用规律,导致群众被一些网络短视频带偏,不信新风信歪风,错把邪气当正气。

(四) 供给机制的碎片化风险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供给是一项系统工程,点多面广,必须以有效的机制予以保障。机制不完善,会带来供给的短视化和低效性。近年来,党中央统一部署统筹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将分散在各个条块中的资源有效整合,依托文明实践活动进行统一调配、一体实用和协同运作,同时采取多种形式充分调动广大农村群众自我教育、自我提高、自我服务的积极性主动性,推动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快速发展。然而,也存在个别地方供给机制空转的情况,领导重视不够、协调力度不够、动员各方协同参与的能力不足,影响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整体效能。

首先,激励机制不完善。健全的激励机制能够激发精神文明建设供给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保证供给的长效可持续。目前,各地均将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纳入农村基层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但一些地方却未将其纳入绩效考核中,导致出现“我们现在忙着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精神文明工作可以先缓一缓”的心态。一些地方在开展文明实践活动中,一开始信心满满地组建了规模庞大的志愿服务队伍,但没有制定相应的嘉奖举措,导致志愿服务成“一阵风”运动,出现“后续无人”的现象;有的地方虽然明确对志愿者进行评选表彰、积分管理等礼遇,但是没有细化规则,导致“干多干少一个样”,挫伤了志愿者的积极性。

其次,协同机制不畅通。文明实践是以县级党委作为“一线指挥部”来主导推动,实现县乡(镇)村三级人力和资源的联动。然而,部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对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的资源整合有限,也较少与单位、部门、企业或社会组织进行有效结对共建。由于缺乏统一协调,各单位的文化下乡“各自为政”,导致文化产品重复供给,形成了资源浪费;而有些结对打造的文明实践“联合体”,仅有形式上的联系,缺乏实质性的资源组合,没有达到取长补短、共同提质增效的效果。最后,支持机制不充分。调研发现,部分县级公共文化投入在财政总支出占比普遍偏低,基本维持在2%以内。尤其是在村级层面,很多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没有专门的经费支撑。阵地尚难以运转维持,为村民提供相应的文化服务就更难了。除政府财政资金外,市场社会资金进入有限,不少文化活动开展面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此外,在人才支持上,中西部广大乡村出现的“空心化”“老龄化”问题,文化人才缺乏甚至断层,而一些能够开展文化活动的本土人才又缺乏系统培训,导致文化活动开展有心无力,难以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供给的有效路径

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进一步加强新时代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实施文明乡风建设工程,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更加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践行”^[9]。这一论述明确了新时代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方向。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锚定防范和化解供给风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供给侧结构性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2][32-33]}。

(一) 强化党委主体责任,吸纳全社会参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农村的事情,关键在党。党管农村工作是我们的传统。这个传统不能丢。”^{[10][188]}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作为

助推乡村振兴、实现农村现代化的精神支撑，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要坚持党管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不动摇，积极动员全社会力量的参与，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有关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协同配合的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格局，推动统一思想、凝聚力量。

一方面，强化各级党委对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各级党委要把做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把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领导权、话语权掌握在手中，及时掌握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形势和动态。要从观念上破除“先经济、后精神”的错误观念，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推进，积极推动精神文明建设提质增效，为助力乡村振兴提供精神支撑。另一方面，增强基层党员领导干部的阵地意识，着力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宣传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人家就会去占领。”^{[7]67}要加强对农村党员干部的培训，增强其宣传思想工作领地意识，督促其对存在于乡村社会的各种错误思想敢抓敢管敢于斗争。对农民的一些错误思想倾向，要深入群众，加强正面引导，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做工作的方式帮助群众明辨是非。最后，吸纳市场和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形成多主体协同建设的良好局面。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供给上，政府、市场和社会各有其自身独特优势。要在坚持党政主抓的基础上，积极吸纳市场力量参与乡村文化产业打造，规范资本下乡，引导各类投资机构投资乡村文化项目；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农村志愿服务活动，充分发挥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把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融入农民的生产生活中，增强农民的参与感、获得感和归属感，让农民在共建共享中实现精神需求的满足。

（二）坚持以需为供导向，充实农民精神生活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说到底是为了让农民享受更好的精神文化生活。农民的需求就是供给的方向。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供给导向，“把‘硬件’建设和‘软件’建设结合起来，把‘输血’和‘造血’结合起来，完善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提高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覆盖面和适用性”^{[7]257}。既要校正农民精神追求的靶向，又要开展形式多样适应农民需要的文化活动和产品，为农民提供丰富的精神滋养，提振农民的精气神。

首先，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农民生产生活。“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7]20}要在农村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农村现代化各个方面，与农民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推动落实落细，使其“日常化、具体化、形象化、生活化，使每个人都能感知它、领悟它，内化为精神追求，外化为实际行动”^{[7]109}。其次，深挖优秀传统乡土文化，大力开展群众性传承开发活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离不开对乡土社会文化的挖掘发展和提升。要大力开展乡土文化挖掘、乡土文化展演等活动，推进优秀传统乡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打造一批地域性强、辨识度高的乡土文化品牌。充分发挥农民在传承优秀乡土文化中的主体性创造性，从乡村民间艺人、乡村文化人中选树一批乡土文化传承人，加大政策扶持和宣传报道，推动农民在传承保护中得到文化滋养。再次，持续推进移风易俗，孕育文明乡风。结合中央和省市关于推进移风易俗的政策精神，紧密结合各镇各村实际制定移风易俗规范，大力宣传移风易俗的“新做法”“新故事”，革除人情攀比、高价彩礼等陈规陋习，坚决反对各种迷信活动和非法宗教活动，传播文明理念，涵育文明风尚。最后，坚持以需为供，精准满足农民精神文化需要。采取调查走访、座谈交流及设置“微心愿”等多种形式，主动了解农民文化需求，找准需求点、建立需求清单。根据群众需求的重点、堵点、痛点、难点和断点，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精准下沉落地，真正做到“民呼我应”，形成供需的有效平衡，提高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水平。

（三）推进供给方式适配，保持充满生机活力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

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久久为功。党领导人民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已走过了百年征程,在每个阶段都始终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不断优化供给方式,使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始终充满生机活力。面对新时代新征程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供给方式上存在的低配化风险,要着力优化供给方式、改进供给方法,增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不断充实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首先,优化宣讲方法,推进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心”。适应对象化、差异化和分众化的特点,紧扣农民所思所想所期所盼,精准匹配不同群体的个性化需求,特别要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及与农民利益密切相关的政策进行讲解,运用个性化制作、可视化呈现、互动化传播的方式开展宣传,像钩子一样紧紧抓住受众的注意力,使其受到思想启迪和理论感召,自觉听党话、跟党走、感党恩。其次,强化自主供给,支持群众性精神文明活动。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从农民喜闻乐见、积极欢迎的文化活动入手,支持农民自办村晚、文化节、广场舞、地方戏曲演出等活动,给予相应的活动指导和资金支持,统筹做好精神激励和物质奖励,增强群众自我文化供给的积极性。充分发挥榜样示范带动作用,优化道德模范、榜样人物评选,着力发掘农民身边的“好人”“好事”“小事”,用身边人教育身边人,用身边事推动身边人的转变,引导农民积极向身边人学习、向身边事看齐,推动树立文明观念。最后,深化数字赋能,扩充网络服务覆盖面。数据显示,从2011到2024年,我国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从20.7%跃升为65.6%(3.13亿),在传统“面对面”的乡村社会之外再造了一个“线上社会”。在人人都是移动互联终端的时代,要着力打造形态多样、手段先进、竞争力强的新型主流媒体,锻造数字文化服务平台。尤其是乡村党政领导干部,更要“解决好‘本领恐慌’问题,真正成为运用现代传媒新手段新方法的行家里手”^{[7]66},把握数字时代运行规律,充分利用网络开展文化供给,为农民提供丰富多样、受欢迎的文化服务。

(四) 创新机制有效集成,不断深化供给质量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供给机制,不仅是保障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支撑,也是提振农民精气神、促进乡风文明的重要手段。必须克服供给机制的碎片化风险,坚持系统集成观念,结合实际创新体制机制,统筹抓好完善激励保障、推进资源联动和人才资金支持等方面工作,不断提升供给质量,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可持续发展。

首先,完善激励保障,激发参与积极性。优化县乡村干部的精神文明建设考核,按照绩效考核目标任务细化考核指标,明确考核清单,确保考核务实精准而又不额外增加负担。细化志愿服务激励举措,突出以精神奖励为主,坚持适度反馈原则,通过信用积分、星级评定、优惠公共服务等形式增强志愿者的自豪感,探索在“一老一小”上开展志愿服务“时间积分奖励”模式,形成志愿服务互助循环发展机制,确保志愿服务长效化。其次,推动资源联动,提升供给综合效能。优化县乡村三级新时代文明实践机构的职责,打造“强中心—优所—实站”的三级阵地。以县级中心为统领,推进各类资源在三级阵地有效流转,支持文明实践中心开展横向结对,调动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的优势资源参与文明实践,把结对共建做实,实现各类优质资源整合下沉到农村基层。第三,加强资金投入,确保资金使用效益。落实《中央支持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要求,推进补助资金向农村地区倾斜,优化地方的农村公共文化财政投入比重,完善财政资金利用方式。创新支持和激励机制,优化积极吸纳社会资本扶持乡村文化产业和事业的发展,保障农村文化建设资金需求。最后,优化人才支持,构建乡村文化人才队伍。创新乡村文化人才支持机制,深挖本乡本土文化人才,着力培养一批“爱农村爱农民”的本土文化人才队伍,为其开展文化活动提供相适配的政策和资源支持。落实乡村振兴文化人才支持计划,引导农民工返

乡、能人回乡、知识青年下乡、企业家入乡积极投身乡村文化振兴,形成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人才合力。

结语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15]乡村要振兴,既离不开物质富裕,又离不开精神富有。只有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乡村的发展才能更加全面协调可持续。开展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提升农村社会文明程度是实现乡村振兴、推进农村现代化的重大任务,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方面。在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必须把精神文明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通过调动亿万农民的内生动力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展现新作为新气象。

面对新时代新征程上农民精神文化需求的变化所呈现的供给风险,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势在必行的选择。但是,推进供给与需求相适应,并不意味着一味迎合农民和市场,而是要瞄准全社会文明程度提升的本质需求,用党的创新理论筑牢农村意识形态阵地,引导农民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不断提振农民的精气神,推动农民向上向善向好,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助力农民更好承担起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任。然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是一项长期性、复杂性工作,既“等不得”,也“急不得”,需要围绕农民精神文化需求的转型升级要求,不断提高供给质量。在优化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供给主体、供给内容、供给方式和供给机制的基础上,通过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将精神文明建设融入农民生产常态、生活日常之中,形成各具特色的农村精神文明新模式。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引下,通过党与人民的共同奋斗和持续努力,必将走出中国特色的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之路,为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J].中国民政,2023(6):4-10.
- [2]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3]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 [4]李培林.中国社会巨变和治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 [5]吴重庆.无主体熟人社会及社会重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 [7]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 [8]陆益龙.后乡土中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 [9]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
- [10]习近平.论“三农”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2]周黎安.晋升锦标赛:文献评述与研究展望[J].经济管理学刊,2022(1):1-34.
- [13]李任杰,龚云.乡村振兴战略下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J].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5(3):105-116.
- [14]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
- [15]不懈努力—接续奋斗—不断开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新局面[N].人民日报,2025-10-24(3).

(责任编辑 王遐见)

“数字+”视域下城市精神文明建设机制研究^{*}

陈彤彤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武汉 430074)

[摘要] 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这既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也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数字+”为城市精神文明建设机制提供了新的技术路径与价值空间。当前数字技术赋能城市精神文明建设机制面临着诸多潜在挑战,主要表现为数字技术应用浅表化明显、知行转化链条断裂、数字技术伦理约束框架缺位等问题。为此应当以融合机制为核心、以运行机制为驱动、以动员机制为基础、以监督机制为保障,构建齐抓共管、上下贯通的城市精神文明建设机制,形成同频共振、同向发力的新发展格局。通过树立正确数字政绩观、发挥场景情景效应、健全伦理约束框架,积极探索数字技术赋能城市精神文明建设机制的优化路径,进一步推动城市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从而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数字+”;城市精神文明建设

[中图分类号] D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5)06-0018-07

2025年5月24日,习近平对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1]城市精神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集中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社会进步的成果积淀与文明高度。进入数字时代,以大数据、人工智能、5G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迅猛发展,不仅成为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更为城市精神文明建设机制拓展了全新的技术路径与价值空间。因此,深入研究“数字+”视域下建立健全城市精神文明建设机制,既是推动城市精神文明建设内涵式发展的应然要求,也是把握技术伦理、防范技术风险的内在要求,彰显“新时代新征程,精神文明建设要有新气象新作为”^[1]

的必然要求。

一、“数字+”视域下城市精神文明建设机制的梗阻挑战

随着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城市精神文明建设逐渐从传统的宣传教育模式,转向以数字化平台、智能化工具和网络化传播为依托的现代模式,显著提升了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覆盖率、精准度与互动性。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任何新兴机制在其运行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伴随着风险与挑战。其主要体现在数字技术应用浅表化、知行转化链条断裂、数字技术伦理约束框架缺位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数字技术与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度融合。

(一)数字技术应用浅表化明显

当前部分地区的“数字+”城市精神文明

* [基金项目] 湖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湖北乡村文化发展研究院开放基金资助项目“农耕文化赋能乡村治理的融合路径研究”(项目编号:HBXC25B04)。

[收稿日期] 2025-09-08

[作者简介] 陈彤彤,女,广东清远人,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副研究员,华中科技大学新时代文明实践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建设呈现出显著的“重显绩轻潜绩”“重经济轻文化”的政绩观偏差,导致数字技术在城市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应用往往停留在表面层次。具体表现为:热衷于投入易量化、可视化的硬件设备建设,例如智能终端铺设、数据大屏等,而忽视对文明素养培育、文化价值传播等“软性”内涵的深度数字化开发;倾向于打造可供展示的“样板工程”,却缺乏全域覆盖、持续运营、可复制的系统性规划。此外,由于缺乏对城乡文化差异、居民数字素养不均等现实问题的充分考量,许多数字化项目在设计之初就存在“水土不服”的隐患。一些平台功能复杂、操作繁琐,老年群体和农村居民难以使用,最终导致大量数字设施“建而不用”“用而不久”,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数字技术应用浅表化现象,使得数字技术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环节,难以形成长效的推动机制。城市精神文明建设是一个循序渐进、久久为功的过程,而浅表化的数字应用却将其变成了短期的“面子工程”,不仅无法实现内涵式发展,反而可能演变为新型的“数字化秀场”,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城市精神文明建设机制的健康生态。

(二) 知行转化链条断裂

城市精神文明建设借助数字技术构建虚拟实践场景,虽然突破了时空限制,但标准化设计与现实社会的复杂性存在本质矛盾,这直接导致知行转化链条的断裂,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城市精神文明建设机制的实践效能。一方面,数字化的实践场景具有明显的程序化特征,实践活动往往停留在表层体验层面,缺乏真实社会情境的深度参与和情感投入。市民在这种场景下的参与行为大多止步于“数字围观”,如点赞、转发等低成本的线上操作,难以转化为线下的实质性文明实践活动。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关键在于将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而知行转化链条的断裂使得这一过程无法顺利实现,导致文明实践工作成效大打折扣。另一方面,过度依赖积分排名、物质奖励等外部激励手段,可能引发行为经济学中的“挤出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市民基于

公民道德自觉和内在认同的参与动机。城市精神文明建设机制需要激发市民的内生动力,形成自觉参与的良好氛围,而外部激励的过度使用不仅无法从根本上提升市民的文明素养,反而可能使市民将参与文明实践活动视为获取物质利益的手段。

(三) 数字技术伦理约束框架缺位

习近平指出:“科技是发展的利器,也可能成为风险的源头。要前瞻研判科技发展带来的规则冲突、社会风险和伦理挑战,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伦理审查规则以及监管框架。”^{[2]201}当前,我国信息安全防控制度建设存在诸多不足,隐私保护制度尚不完善,个人信息安全问题仍然突出。在城市精神文明建设推进过程中,相关法律制度仍未健全、信息安全事故的追责机制不完备,市民的隐私权、知识产权等合法权益容易受到侵犯和泄露。这不仅损害了市民的切身利益,同时也会降低市民对数字技术参与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信任度。一方面,算法黑箱问题突出,用于文明行为评价的算法模型缺乏透明度和可解释性,可能导致“数字歧视”现象发生,影响评价的公平公正;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应用的伦理规范和监管标准尚未建立,导致技术赋能缺乏必要的边界和约束,这不仅可能损害公众权益,更会侵蚀数字技术赋能的社会信任基础。

二、“数字+”视域下城市精神文明建设机制的构成要素

习近平指出:“要加强组织领导,深化改革创新,广泛动员社会参与,形成齐抓共管的精神文明建设长效机制。”^[1]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当下,城市精神文明建设不仅是提升城市形象、增强城市软实力的关键所在,更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题中应有之义。构建齐抓共管、上下贯通的城市精神文明建设机制,则是推动城市精神文明建设持续深入开展、确保文明成果落地生根、久久为功的核心支撑。因此,在“数字+”背景下,笔者从融合机制、运行机制、动员机制以及监督机制四重维度展开分析,系统阐释城市精神文明建设机制的核心构成要素。通过

这四重机制的相互配合和共同作用，城市精神文明建设将能够更加系统化、规范化，不仅可以提高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效率和精准度，同时也能够降低市民参与的门槛，激发市民的参与热情，从而有效提升城市的整体文明水平。

（一）融合机制——营造“低门槛”参与的基础环境

城市精神文明建设是推动城市全面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主要包括理想信念教育、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民道德建设和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四个方面。四者共同致力于激发全民族精神面貌奋发昂扬，进一步形成道德高尚、团结奋进、向上向善的城市精神气质与整体风貌。“数字+”背景下，市民获取信息的渠道更为多元、生活节奏更为加快。如果公民道德建设与理想信念教育脱节，便容易出现价值传播与市民需求的错位；如果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与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割裂，活动就容易流于形式，缺乏持久影响。因此，建立融合机制，就是要打破传统分割的低效状态，推动多维要素的有机结合，从而实现“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的整体联动。具体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价值+技术”融合机制

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在于“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强化理想信念教育，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更加注重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1]。传统价值传播依赖于课堂讲授、宣传阵地等方式，其影响力和渗透力相对有限。在“数字+”背景下，价值传播能够通过技术平台实现全方位、多维度的嵌入。例如，利用大数据精准推送文明实践内容，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市民日常生活场景紧密结合；借助短视频、沉浸式交互等新兴媒介，将抽象的、学理化的、高度概括的话语体系有机转化为具象化、可体验的场景。这种价值与技术的融合，使城市精神文明建设不再停留于被动灌输，而是转化为互动性更强、感染力更大的文明实践过程。

2.“线上+线下”融合机制

城市精神文明建设既需要理念传播与舆论引导，也需要行动落实与实践支撑。数字化并非对线下文明实践的替代，而是与线下活动形成互补关系。例如，在教育文化建设方面，线上智慧课堂、知识平台能够扩展知识传播的范围，而线下的文化馆、图书馆活动则提供了面对面的深度交流空间；在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方面，线上志愿服务平台可以实现人员招募与任务分配，而线下活动则是文明行为的真实呈现。通过线上与线下的融合，文明实践工作既能够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也能够保持人际互动的温度和社会纽带的强度，从而形成虚实互动的整体格局。

3.“传统+现代”融合机制

融合机制还体现在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建设之间的相互贯通。习近平指出：“城市是一个民族文化和情感记忆的载体，历史文化是城市魅力之关键。”^{[3]109}城市精神文明建设不仅着力提升市民的综合素养，更肩负着对城市历史文化资源的传承使命与创新转化。数字化手段以创新形式保存与展现历史文化，诸如通过虚拟博物馆、数字档案馆或 AR 技术生动复原历史场景，让市民在沉浸式体验中深化城市文化认同。可见，“传统+现代”融合机制在实践中进一步深化为“文化基因”与“现代功能”的有机统一。正如习近平强调，现代化人民城市应当“注重保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留中华文化基因，体现中华传统经典建筑元素，彰显地域文化特色，体现文明包容，打造城市建设的典范”^{[4]402}。

融合机制不仅仅是简单的“物理”手段叠加，而是一种通过“数字+”逻辑推动多维度要素系统化整合的过程，强调在理想信念教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群众实践三个方面形成内在统一和动态互动。通过融合机制，城市精神文明建设能够更好地发挥整体合力，不仅实现理想信念教育的渗透力提升，还能拓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广度，更显著增强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组织力与参与度，从而进一步“在全社会形成向上向善的精

神风貌”^[1]，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二）运行机制——提升市民参与的便捷性与效率

城市精神文明建设是一个复杂的、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制度安排、技术支撑与治理结构的有机协调。若缺乏有效的运行机制，城市精神文明建设极易出现碎片化推进、责任边界模糊以及目标落实偏差等问题。尤其在“数字+”背景下，城市精神文明建设已经不再是单一的宣传与教育，而是嵌入城市治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等方面的多维过程。因此，建立科学的运行机制，是确保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目标落地、实现动态高效管理的关键所在。

1. 制度运行机制

制度是城市精神文明建设运行流畅的根本保障。制度运行机制指的是通过顶层设计、政策规范与考核评价体系的建立，使城市精神文明建设在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上推进。例如，文明指数、城市文明公约、公共行为规范等，均通过制度形式明确了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方向与标准。在“数字+”情况下，制度运行还表现为规则的数字化呈现与执行，通过平台化监管和在线信用记录，使制度不再停留在纸面，而能渗透到市民的日常行为与治理过程之中。通过制度运行方式，不仅提升了制度的执行力和约束力，同时也增强了市民对制度的认同感和遵守意愿。此外，通过在线信用记录系统，可以将市民的文明行为与信用积分挂钩，形成正向激励和负面约束机制，进一步推动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纵深发展。

2. 技术运行机制

技术是城市精神文明建设运行的支撑基底。技术运行机制体现为信息基础设施、数据平台与智能化工具的支撑作用。借助“城市大脑”、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算法等，城市精神文明建设能够实现信息的快速采集、实时分析和动态反馈。例如，利用智慧屏幕与移动端推送进行文明宣传，依托数据监测评估市民参与情况，从而实现对精神文明建设的精细化、精准化管理。技术运行机制不仅提升了文明

建设的效率，更为其提供了科学决策的依据。例如，通过分析市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活动中的签到记录、服务时长、服务评价等数据，可以评估市民的参与意愿、服务质量和活动效果，为文明实践服务组织的管理和激励提供依据。同时，数据监测还可以发现市民参与文明实践活动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如参与渠道不畅、活动形式单一等，为改进文明实践活动提供数据参考。

3. 反馈运行机制

反馈机制是驱动城市精神文明建设从“有形”向“有效”转变的动力引擎，推动基于实证的数据驱动型决策优化，进而增强城市精神文明建设能力。反馈运行机制强调在建设过程中，建立“数据采集—动态分析—及时反馈—纠偏改进”的良好循环。其一，信息反馈通过文明实践平台、市民意见征集系统，收集市民的参与体验与意见建议；其二，过程反馈依托智能算法，实时监测活动效果与目标实现程度；其三，结果反馈通过指标公示、效果评估等方式，推动成果公开透明。反馈运行不仅是监督的前置机制，更是运行机制保持活力的关键动力，确保城市精神文明建设不是“一次性工程”，而是一个不断修正、动态优化、持续改进的过程，从而形成“参与—反馈—改进”的良性循环。

运行机制的核心价值在于，其通过制度、技术和反馈的协同运行，保证了文明建设在目标设定、过程管理与效果反馈中的系统性和连贯性，从而避免文明建设流于形式或出现结构性缺陷。

（三）动员机制——激发多元主体参与内生动力

习近平指出：“市民文明素质决定着城市文明程度。”^{[5]275}要实现“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1]的愿景，必须充分发挥市民在城市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关键在于有效激发并动员广大市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实践过程中，如果城市精神文明建设脱离群众需求、脱离当地实际往往会出现“上热下冷”“干部在干、群众在看”的

“两极分化”局面。因此,动员机制的核心在于构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激励机制与行动框架,使城市精神文明建设从“政府主导”向“全民共建”转变。

1. 激励参与机制

市民不仅是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受益者,更是建设的参与者和推动者。激励参与机制强调通过数字化手段降低市民参与门槛,提升参与活动的便捷性与持续性。例如,新时代文明实践 App、数字文明实践服务平台可以使市民随时随地参与文明活动。通过开发“文明积分”系统,对市民参与新时代文明实践的行为进行量化激励,如参与文明实践服务、文明宣传等活动可获得积分,积分可兑换生活用品、公共服务等,从而增强市民参与的成就感和获得感。同时,利用大数据分析市民参与行为与需求,精准推送符合其兴趣的文明实践活动,提升参与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2. 数字素养提升机制

习近平指出:“要提高全民全社会数字素养和技能,夯实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社会基础”^{[6]539}。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加速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渗透融合,推动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数字素养和技能成为全民全社会必备的基础能力和素质。因此,城市精神文明建设不仅需要依赖外部动员,更源于市民内在素质的现代化。构建数字素养提升机制,是确保动员机制发挥持续效能的底层支撑和关键前提。其一,基础技能普及。通过社区数字学堂、线上培训平台等渠道,开展针对不同年龄层和群体的数字化能力培训,重点帮助老年群体跨越“数字鸿沟”^{[7]232-233}。其二,文明素养融合。将网络伦理、数字道德规范融入培训体系,培养市民辨别网络信息、抵制不良内容的能力,提升数字时代的文明修养。其三,实践场景构建。通过数字创城、网络文明传播等文明实践活动,让市民在真实场景中运用数字技能,实现知行合一。这三重维度的相互支撑,共同推动市民数字素养与文明素质的同步提升,为城市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持续内在动力。

动员机制的意义在于,其通过激励参与机

制与数字素养提升机制的有机融合,使城市精神文明建设实现由“要我参与”向“我要参与”的实质性转变,进而推动市民在数字化环境中从“被动接受”迈向“主动共建”的方向发展。

(四) 监督机制——保障城市精神文明建设规范运行

城市精神文明建设强调价值引领与社会动员,涉及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与广大市民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多元参与必然伴随权责交织,如果缺乏监督机制,就容易出现责任落实不到位、政策执行打折扣、资源分配失衡等现象,从而使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目标流于“为指标而建设”的表面工程。因此,监督机制是协调多元主体关系、保障技术应用规范的基本条件,既保障多元主体参与的活力,又避免了无序参与带来的风险,为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筑牢规范运行的制度屏障。

1. 责任监督机制

责任监督机制的内在逻辑在于借助技术工具,实现对城市精神文明建设项目全流程的透明化监管,确保政策执行不偏离、资源分配更精准。在建设过程中,遵循“谁主管、谁负责;谁参与、谁尽责”的原则,构建起以数据引领、数据融合、多级联动、多元共治、快速落实为特征的责任监督机制。通过技术理性的数据汇聚、实时监测、程序追踪、办理留痕、自动回访与评价可视化,形成反科层治理的优势,推动同频共振、同向发力的城市精神文明建设新格局加速成型。此外,依托大数据比对、区块链存证和在线考核平台,将责任履行过程数字化、可视化。例如,利用“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绩效管理系统”实时记录任务落实情况,构建可追溯的责任链条。责任监督不再局限于纸面记录和事后追责,而是通过数字化平台实现全流程监管与动态问责。

2. 社会监督机制

社会监督机制的核心在于,通过技术工具搭建社会意愿的表达渠道,构筑社会与政府诉求之间的“桥梁”,涵盖媒体监督、社会组织监督和公众监督三大方面。媒体通过新闻报道和舆论引导,对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效进行

公开评价；社会组织则依托第三方评估和调查研究，提供相对独立的监督视角；市民则可通过数字平台反馈意见、举报不文明行为等。借助社会监督机制，能够有效整合多元参与主体的力量，既能够极大提高工作人员的责任感与办事效率，同时也能够实现数字技术对市民思想意识、诉求意愿和意见建议的激活效应，进而提升市民对城市精神文明的主体地位感知，促进市民参与建设的自我意识觉醒。

3. 技术监督机制

技术监督机制，指的是在城市精神文明建设过程中，以数字技术为对象、以防范风险为导向，建立起对数字技术本身的透明化、规范化与问责化监督体系，确保城市精神文明建设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目标。一方面，通过健全数据采集、存储、使用和共享的规范，防止数据过度收集与滥用。例如，明确文明积分、文明实践服务记录等数据的边界与用途，建立“最小必要原则”和数据匿名化处理机制，确保监督在尊重市民隐私与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开展。另一方面，要求对用于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算法模型进行独立审查与社会评估，防止因数据样本失衡或算法设计偏差而导致的歧视性结果。

监督机制的价值在于，它通过责任、社会与技术三重监督的结合，形成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全覆盖体系，从而保证城市精神文明建设方向不偏离、过程不走样、结果能落地。监督机制不仅是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护栏”，更是城市精神文明建设持续深化与优化的重要驱动力。

三、“数字+”视域下城市精神文明建设机制的优化路径

“数字+”不仅意味着技术工具的升级，更代表着思维方式、治理模式与社会互动方式的系统性变革。然而，数字技术在赋能城市精神文明建设机制的过程中，仍存在诸多亟待破解的深层问题。在此背景下，进一步完善城市精神文明建设机制需要从技术应用层面、实践转化层面和伦理规范层面等多个方面协同推进。通过树立正确数字政绩观，破除认知壁垒、发

挥场景情景效应，强化虚拟—现实衔接、健全伦理约束框架，明确技术发展边界，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优势，解决技术赋能带来的多重难题，为推动城市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一) 树立正确数字政绩观，破除认知壁垒

习近平指出：“完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引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8]55}。党政领导干部作为较高层级的治理主体，不仅要切实贯彻和落实各项政策，更需在战略规划、决策制定、资源整合及新领域开拓等关键性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干部惟有深入理解数字理论与技术的发展动态，才能有效地谋划并推动数字技术赋能城市精神文明建设机制的场景化应用，从而精准且高效地将技术转化为满足国家和人民群众实际需求的解决方案。因此，应通过定期举办专题培训班、研讨会等多种形式，引导干部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这一根本要求，以及全面认识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同时，应制定全面、系统的“数字+”城市精神文明建设机制规划，明确各阶段目标和重点任务，充分考虑不同区域、不同群体的需求，合理分配资源，避免盲目投入和重复建设。明确以“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评价导向，建立健全干部数字政绩考核评价体系。从政策源头引导数字技术从“工具性应用”转向“价值性融合”，激发广大干部群体主动提升数字技能并推动城市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内驱力。

(二) 发挥场景情景效应，强化虚拟—现实衔接

2024年5月14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深化智慧城市发展推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鼓励城市开展管理服务手段、管理服务模式、管理服务理念的适数化变革，建立健全相关制度规范，完善规则规范和运行流程体系。”^[9]这一政策导向为强化融合机制提供了重要政策依据。融合机制在城市精神

文明建设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的系统整合与协同增效作用,能够促进文明认知向行为实践的有效转化。因此,为解决虚拟体验与现实实践之间的融合问题,应当依托数字技术增强虚拟实践场景的情感黏性与体验深度。例如,可利用VR/AR、数字孪生、沉浸式叙事等技术,构建高仿真、强互动、多模态的文明实践情境,使市民在虚拟场景中不仅能学习文明知识,更能够体验文明行为带来的积极情感反馈与社会认可,从而促进价值认同的内化。同时,需建立线上发起、线下响应的协同机制,如通过“文明实践云地图”引导市民参与身边的文明实践服务活动,通过“公益任务数字徽章”激励持续性的实地参与,真正实现“融于实、化知为行”的文明实践效能。此外,还应重视动员机制中的制度配套与流程再造。在政策引领下,应推动建立跨场景的身份认证、行为记录与积分互通系统,确保市民在虚拟空间所积累的文明实践贡献可识别、可兑换、可激励,并与现实生活中的公共服务、社会评价相挂钩,从而构建贯通虚拟与现实的一体化文明实践闭环。

(三)健全伦理约束框架,明确技术发展边界

习近平指出:“要加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强化国家关键数据资源保护能力,增强数据安全预警和溯源能力。”^[10]^[179]数字伦理约束框架,不仅关乎技术监督机制运行过程中的价值秩序,更决定着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健全伦理约束框架,明确技术发展边界,必须坚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科技伦理治理的要求,推动立法保障与标准建设,细化数据采集、存储、使用及销毁各环节的规范要求,明确政府部门、平台企业、技术提供商在城市精神文明建设场景中的权责边界,设立专门的数据合规审计与算法伦理审查机制,对诸如行为评分系统、文明积分模型等关键应用进行常态化评估与纠偏,防止技术滥用和“数字歧视”。此外,应构建开放透明的监督机制,建立算法公示和公众质询制度,对涉及市民评价与激励的

核心算法,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提高其可解释性,畅通投诉和救济渠道,使市民能够了解规则、参与监督、维护自身权益。同时,应强化技术治理能力建设,依托隐私计算、区块链等可信技术,实现数据“可用不可见”“可用可追溯”,在保障个人隐私的前提下促进数据有序利用。还应开展面向项目设计者、执行人员和技术团队的科技伦理培训,增强其风险意识和责任伦理,将伦理考量嵌入数字系统从规划到运维的全生命周期。只有在法治、技术和伦理三者协同的框架下,明确技术发展的红线与底线,才能实现“向善而治”,推动“数字+”城市精神文明建设行稳致远。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对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强调 推动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 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力量[N].人民日报,2025-05-24(1).
- [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 [3]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城市工作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
-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
- [5]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 [6]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7]“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8]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9]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关于深化智慧城市发展推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意见[EB/OL].(2024-05-14)[2025-05-25].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405/content_6952353.htm.
- [10]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责任编辑 王遐见)

习近平文化思想中文化育人的逻辑体系及理论贡献^{*}

袁 芳

(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2249)

[摘要] 习近平文化思想中文化育人的新思想新理念揭示了人和文化双向互动的基本原理,明确了文化育人的形成依托于党的文化领导权的根本保证、文化主体性的确立以及“两个结合”的创新方法论,强调通过党的创新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确的舆论导向、文化遗产以及中国故事,实现理论武装、育人育心、成风化人、文化传承和形象展示。文化育人的新思想新理念是践行“第二个结合”的光辉典范,不仅继承发展了中华传统文化中以载道、文以化人的思想智慧,还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促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华传统智慧重新焕发蓬勃生命力。

[关键词] 习近平文化思想; 文化育人; 文化主体性; “第二个结合”

[中图分类号] G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5)06-0025-08

习近平文化思想揭示了人和文化互动的基本原理,明晰文化育人的内涵、目标、机理和路径问题,可以归纳为文化育人的本体论、生成论和实践论这一逻辑体系。文化育人的新思想新理念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和中华传统文化的育人之道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新观点,标志着我们党对文化育人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习近平提出,我们必须“深入领会党的创新理论的道理学理哲理,做到知其言更知其义、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1]。对文化育人的逻辑体系及其理论贡献进行深入探究,不仅有助于深刻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深蕴,还能够丰富和拓展文化育人的基础理论。

一、习近平文化思想揭示了人和文化的双向互动原理

习近平文化思想揭示“文”与“人”的辩证关系,具有“以人化文”和“以文化人”的双重意蕴,开创性地阐释了人和文化双向互动的内在逻辑。一方面,人是文化建设的主体,人的文化主体性的激发,将推动文化的创新与整合;另一方面,文化形塑个体的思想行为,通过传播和弘扬优秀文化,滋养人的心灵,提升人的文化素养,推动人类共同体的发展。

(一) 以人化文

在人与文化的互动关系中,人类实践活动使得文化不再是静态的,而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人通过实践活动形成自觉的文化意识

* [基金项目] 2021年教育部社科司高校思政课教师研究专项一般项目“《民法典》育人元素融入高校思政课研究”(项目编号:21SZK10053001),2024年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专项“提升思想道德与法治课针对性和吸引力的教学方法研究”(项目编号:24VSZ167)。

[收稿日期] 2025-03-11

[作者简介] 袁 芳,女,湖北黄冈人,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和主动的文化创新能力,集中体现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时代风貌和文明程度。习近平指出,“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2]。“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文化创造力。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呼。”^[2]由此,文明升华和文化进步并非偶然形成的,主要依托人类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进步,中华文化形成了和时代齐头并进的发展特点。这深刻揭示了“以人化文”的历史性、实践性特点,彰显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深蕴。

习近平指出“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既不能片面地讲厚古薄今,又不能片面地讲厚今薄古,而是要本着科学的态度,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3]39}。这深刻揭示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目标及其实现条件。历史文化并非都是精神财富,也有一些精神糟粕,先进的文化才具备积极引领作用,从而具备“化人”的可能性。因此,“以文化人”的前提是“以人化文”,需要以科学的态度鉴别和扬弃中华传统文化,实现古今互通,使文化成为一种精神财富。中国共产党人在处理古今关系的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扬弃性地继承历史文化。

习近平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人类文明是由世界各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2]。这深刻揭示了“以人化文”中的“人”包括世界各国各民族人民,具有广阔的世界眼光。习近平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4]258}。这进一步丰富了“以人化文”的理论视野,揭示了文化共创的文明发展规律,彰显文明共生的价值理念。“以人化文”不仅针对民族范围内的本土文化,还包括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借

鉴。由此,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揭示了“以人化文”的重要规律,即文化通过人类的实践活动呈现丰富多彩的发展态势,人类在多元文化的交流互鉴中不仅可以更加准确地理解自身文化的特色,还能充分吸收其他文化的思想精华。

(二) 以文化人

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高度重视文化的战略统领作用、发展支点作用、民生作用以及风险防范功能,继承发展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化人之道。习近平指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文化是重要内容;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文化是重要因素;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文化是重要力量源泉。”^{[3]22}这深刻揭示了“以文化人”的具体样态,主要表现为文化对人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以及文化为人提供精神引领。

文化成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支点,主要表现为文化繁荣助推经济发展、政治文明、社会公平和生态改善。习近平指出,“文化事业是养人心志、育人情操的事业。”“要坚持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兴业,全面繁荣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着力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让人民享有更加充实、更为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涵养全民族昂扬奋发的精神气质。”^{[3]84}在“以文化人”的基础上提出“以文惠民”“以文兴业”,展现了深刻的民生关怀。通过发展文化事业,提升文化领域的治理能力,创造出具有时代感的文化产品,能够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需要。正如习近平指出,“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5]“要加快发展现代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展骨干文化企业和创意文化产业,培育新型文化业态,扩大和引导文化消费,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6]207-208}

文化为人民提供重要的精神力量,主要表

现为“从文化传承中汲取思想智慧”以及“从文化创造中凝聚奋进力量”^{[3]12}。习近平强调，“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2]。先进文化的引领作用，主要源自中华文化对人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习近平指出，“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有地位、有影响，不是靠穷兵黩武，不是靠对外扩张，而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我们的先人早就认识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道理。阐释中华民族禀赋、中华民族特点、中华民族精神，以德服人、以文化人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2]将“以德服人”“以文化人”作为中华民族特色和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之一，深刻揭示了中华文化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涵养作用。此外，文化创造凝聚奋进力量，主要表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与时俱进，不断凝聚思想共识。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参天大树之根本，就是我们党和人民不断奋进的万里长河之泉源”^{[7]66}。“对领导干部来说，马克思主义这个看家本领掌握得越牢靠，政治站位就越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就越强，观察时势、谋划发展、防范化解风险就越主动。”^[8]对于广大人民群众而言，“马克思创建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运行的特殊规律，为人类指明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途径，为人民指明了实现自由和解放的道路”^{[9]8}。通过学习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有助于探寻实现自由和解放的正确道路。

二、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文化育人的形成机理

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文化育人的形成，离不开党的文化领导权的根本保证、文化主体性的确立以及“两个结合”的方法论。

（一）党的文化领导权的根本保证

习近平提出“党的文化领导权”的核心概念，明确“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基

础”^{[3]12}。还提出，“同时，我国社会正处在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时代，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相互叠加、集中呈现，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思想道德领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现象”^{[3]22}。当前世界进入日益加剧的动荡变革期，人类面临文明冲突、文明优越的现实挑战，面对思想观念活跃碰撞的时代特点以及文化安全问题日益复杂的局势，需要坚持党对文化建设方向的引领、多元文化资源的整合以及社会舆论的主导，从而巩固政党在文化发展中的核心作用。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思想，由此掌握了科学真理，这为掌握思想文化领导权提供了前提基础。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成果，有助于提升文化建设的科学性和实效性。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通过守正创新创造出来的先进文化，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文化主体性，每个人都能成为文化的参与者与推动者，因此具有独特的民族特质，彰显以人化文和以文化人的实践智慧。

（二）文化主体性的确立

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了“文化主体性”的创新概念，丰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人的主体性理论，直面数字时代人的主体性失落的焦点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中，主体和客体是相互依存的一对范畴，将“主体”理解为处于对象性实践活动之中的人，强调“人始终是主体”^{[10]130}，主体性“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而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10]167}。由此，文化主体性意味着人将文化作为一种对象性的实践活动，包括人对文化的认同、人对文化的继承、人对文化的创新等。习近平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11]，“文化主体性反映了一个国家和民族对自身文化的自觉意识和进行文化创新创造的主动精神。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3]44-45}。这深刻论述了文化主体性的丰富内涵，将文化主体性归结为

文化的自觉意识和文化创新创造的主动精神，揭示了文化主体性和文化自信的内在关系。文化主体性彰显人在文化意义上的身份建构，意味着人摆脱了精神上的依附性而走上精神上的独立自主。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建设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主体作用的发挥，人民群众在生活中的体验、创造和互动，都是文化发展的动力源泉。广大人民群众在参与文化活动时，通过对文化的理解与再创造，使文化得到活化和提升，从而产生新的文化形态，拓展新的文化内涵。习近平指出，我们的文化主体性“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11]。由此，文化主体性的生成涵盖内在和外在两个维度，内在维度是对自身文化的改造，指向面向自身文化的自由意志；外在维度是对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借鉴吸收。内在维度和外在维度的和谐统一，有助于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新时代文化育人以培育文化主体性为核心内容，有助于进一步夯实社会主义强国建设的文化底蕴和精神根基，促进文化新辉煌和时代新人的文化自信。

（三）“两个结合”的创新方法论

无论是“以人化文”，还是“以文化人”，都要讲究“化”，这就需要通过适当的方式方法，实现文化和人的有机连接。习近平指出，“更重要的是，‘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12]8}。“两个结合”作为又一次思想解放，帮助人们从僵化落后的文化观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为实现文化主体性打开了一扇“创新之窗”，因此能够为文化育人提供科学的方法论，促使文化育人获得更加深厚的文化支撑和更加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

马克思主义高度关注人的发展，提出“两个改造”“两个决裂”等一系列重要观点，提出环境改造和人的改造的辩证统一性、“与旧的

生产关系的决裂”和“与旧的思想观念的决裂”的辩证统一性，为人的思想观念的现代化提供了方向指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文以载道”“文以化人”，体现中华传统文化道德教化、思想启迪、精神传承的高度使命感和责任感。以“两个结合”为指导，文化育人需要进一步将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育人之道相结合，让广大人民群众在潜移默化中接触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国家观、历史观、价值观等，由此巩固人民群众的文化主体性，在心灵深处植入传统文化的种子，同时增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素养。

三、习近平文化思想揭示新时代文化育人的实现路径

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新时代文化育人的具体路径，强调充分运用党的创新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确的舆论导向、文化遗产、中国故事等文化资源，由此实现理论武装、育人育心、成风化人、文化传承和形象展示。

（一）理论武装：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

习近平指出，“注重从人民群众的创造中汲取理论创新智慧，提炼出新的理论成果，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亿万人民心中”^{[3]35}。这一论述不仅揭示了党的理论创新的源泉所在，也强调了理论武装与人民群众之间的互动关系。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党的创新理论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的实践之中。遵循党的创新理论的生成规律，中国共产党始终注重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总结经验、提炼理论。这种理论创新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党与人民群众共同发挥历史主动性的过程。习近平指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各种不确定难预料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加强理论武装，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3]16}。由此，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人民群众，有效增强风险防范能力。只有把党的创新理论传递给广大人民群众，才能转化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动能。

(二) 育人育心: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根铸魂

习近平指出,“核心价值观建设,说到底是人的思想建设、灵魂建设,聚焦的是造就具有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3]53-54}这一论述展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建设的基本导向,将培养价值观和培养人紧密结合起来,牢牢把握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着力点。通过培养具有高尚品德、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新时代人才,促使人们找到个人理想与社会发展的结合点,有助于形成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指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融入社会发展、融入日常生活。”^[5]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融入”重要论断的提出,揭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基本规律,有助于推动社会的和谐稳定和持续发展。习近平指出,“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5]。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文化根基和群众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包括中华古代优秀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文化。当前革命文化的育人价值常常被人忽视,通过赓续革命文化的红色血脉,加强革命传统教育,让红色血脉能够始终赓续,实现对人的精神滋养,能够为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大动能。

习近平指出,“道不可坐论,德不能空谈。于实处用力,从知行合一上下功夫,核心价值观才能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13]。这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知行合一原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养成绝非一日之功,要坚持由易到难、由近及远,区分层次、突出重点。不要顺利的时候,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一遇挫折,就怀疑动摇,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了。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要坚守在中国大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时代大潮中

建功立业,成就自己的宝贵人生。”^{[4]174}这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长期性、系统性和层次性的规律,体现实事求是的方法论。

(三) 成风化人:运用正确的舆论导向广泛凝聚社会共识

舆论斗争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重要法宝,为了掌握信息化条件下舆论主导权,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揭示了舆论导向成风化人的丰富内涵,对舆论和人的关系形成了深刻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提出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是“高举旗帜、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接中外、沟通世界”^{[3]71}。舆论工作旨在塑造良好的社会风气,承担着教育公众的责任。同时强调“引导好人民思想就要引导好社会舆论,使好的舆论真正成为发展的‘推进器’、民意的‘晴雨表’、社会的‘黏合剂’、道德的‘风向标’”^{[3]71},由此引导好社会舆论是引导人的思想的前提条件,这深刻揭示了社会舆论和人的思想之间的密切关系。社会舆论是社会问题的集中反映,是了解集体意识的重要途径。通过社会舆论,人的思想得以传递和展现,因此通过社会舆论的发展方向和具体内容,可以洞察人的内在思想。另一方面,个体的思想受到社会舆论的影响,社会舆论作为一种集体意识,对个体形成舆论压力,直接塑造个体的思想。“推进器”“晴雨表”“黏合剂”“风向标”这四个形象比喻,深刻揭示了正确社会舆论的发展助推作用、民意勘测功能、社会凝聚功能以及道德导向功能。针对互联网和信息化的迅猛发展,习近平将网络称为“越来越复杂的大舆论场”,提出“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营造良好舆论环境,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3]71}。“舆论导向正确,就能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推动事业发展;舆论导向错误,就会动摇人心、瓦解斗志,危害党和人民事业。”^{[3]73}由此,需要处理好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的关系、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关系。

(四) 守护文化根脉:运用文化遗产培育文化传承意识和能力

习近平指出,“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

宝,让人们通过文化遗产承载的历史信息,记得起历史沧桑、看得见岁月留恒、留得住文化根脉”^{[3]88}。“记得起”“看得见”“留得住”充分体现了文化遗产对人的历史启迪作用、集体记忆作用以及文化传承作用,将文化遗产的目的指向了“人的培育”。习近平强调出,“发挥好博物馆的教育功能,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说话,引导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感受文化遗产中蕴含的中国智慧和中国精神。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发挥好革命文物在党史学习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等方面的重要作用”^{[3]92}。习近平指出,“要教育引导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更好认识认同、尊崇热爱中华文明,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代一代传下去”^{[3]94}。中华文化遗产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力见证,蕴藏创造精神、卓越智慧和共同记忆,有助于培育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促进文化认同。立足“两个结合”,依据文化遗产制作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文化作品,有助于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育人优势。此外,世界范围内文化遗产的创造主体是全人类,蕴含人类发展的共通性智慧,可以超越国家和民族的视野,打破认知偏见,推动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因此,通过弘扬和传播世界文化遗产蕴含的人类思想智慧,有助于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拓展文化的育人范围。

(五) 展现中国形象:运用中国故事塑造认知、沟通民意、争取人心

为了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讲好中国故事是时代的战略任务。习近平提出,“世界上各种文化之争,本质上是思想理论、价值观念之争。”^{[3]96}“讲故事就是讲事实、讲形象、讲情感、讲道理,讲事实才能说服人、讲形象才能打动人,讲情感才能感染人,讲道理才能影响人。”“要聚焦塑造认知、沟通民意、争取人心,客观真实向世界讲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讲好我们正在经历的新时代故事、讲好中国人民奋斗圆梦的故事、讲好中国坚持和发展合作共赢的故事,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示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

和精神力量。”^{[3]97}这深刻揭示了中国故事塑造人的认知、沟通民意、争取人心的育人功能。由于文化争端为思想和价值观的争夺,在文化多样化的发展态势下,要解决价值观的冲突,需要秉持开放包容的立场,加强理解和对话,互相借鉴不同文化的思想精华。习近平指出,“要积极开展国际人权斗争,把握战略主动,着力讲好中国人权故事,最大限度凝聚国际人权共识,占据人权道义制高点”^{[3]100}。由于人权经常被西方国家作为干涉他国政治的工具,因此要讲好中国特色的人权故事,在人权话语权的斗争中把握主动。

四、文化育人新思想新理念的理论贡献

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文化育人新思想新理念是践行“第二个结合”的光辉典范,不仅继承发展了中华传统文化中以载道和文以化人的思想智慧,同时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促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华传统智慧重新焕发蓬勃生命力。

(一) 继承发展了中华传统文化中以载道和文以化人的思想智慧

我国历史上的文人墨客通过著书立说成就“立言”的人生追求,以实际行动担负“传道”和“化人”的历史责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主要指一种关于宇宙万物、社会运行和人生发展的根本原则、价值体系和道德规范等,因此“传道”意味着对宇宙自然规律的敬畏、对社会伦理道德的坚守以及对个人精神追求和文化传承使命的践行,从而实现对社会和人民的道德教化。“传道”与“化人”是相互依存的关系,文章如果缺乏“传道”的内容,就难以发挥“化人”的作用,同时,“传道”本身不是目的,“化人”是“传道”的最终旨归。韩愈的门生李汉曾在《昌黎先生文集·序》中提出:“文者,贯道之器也。不深于此道有至焉者,不也。”^{[14]2}由此,“文以载道”的观念开始流行。周敦颐在《通书·文辞》中提出:“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用,徒饰也,况虚车乎?”^{[15]39}由此,周敦颐将“文以载道”比喻为“用车载物”,将文章作为承载大道的工具和手段,认为文章如果不能说明道理、承载传达

思想，就缺乏了真正的价值内核。韩愈提出了“文道合一”的思想，强调以普遍的爱对待他人，同时行为合乎人情事理，可以求取“道”，朱光潜将道比喻为“盐”，体现对“文”与“道”融合发展的创新理解。

习近平提出，“我们要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2]。“要注重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积极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把文艺创造写到民族复兴的历史上、写在人民奋斗的征程中，全方位全景式展现新时代的精神气象，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3]82-83}这不仅继承了中华传统文化中以载道和文以化人的思想，还创造性地阐释了文艺作品“传道”的具体内容以及“化人”的生活导向。文艺作品“传道”不是抽象的道德，而是体现真善美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助于避免文艺的过度娱乐化，强化文艺的思想内涵。习近平提出“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兴业”^{[3]84}，明确“文化产品只有成为广大群众的自觉消费，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文化的宣传教育功能，达到以优秀作品鼓舞人的目的”^{[3]85}。这深刻揭示了文化和人民的内在联系，文化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参与，而人民也需要文化来滋养心灵、提升素养。习近平提出，“要看到，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与产业属性是一致的，占领市场与占领阵地是一致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一致的，文化产品的先进性与实现人民群众的文化利益是一致的”^{[3]81}。这四个“一致”的提出，深刻揭示了文化导向和文化产业、文化市场和文化阵地、文化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文化产品和文化利益的辩证关系。社会主义文化产业是服务于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只有具有正确价值导向的文化建设才能发展为文化产业，满足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由此，文化产品育人功能的发挥离不开文化产业的发展规律，应具有意识形态的阵地意

识，彰显文化的先进性。

(二) 推动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创新性发展

人的全面发展不仅指代人通过实践活动自由自觉地创造生活，充分展现个性特质，还意味着人的社会关系的高度丰富。人自由自觉地展示个性的过程本质上也是人与社会发生对象性关系的过程，因此个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文化育人新思想新理念以人的发展为价值追求，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提出，“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最终目的是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3]24}。“要始终坚持文化建设着眼于人、落脚于人。着眼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提升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能力，增强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16]这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着眼于人的精神文化需求、落脚于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的目标定位，彰显深沉的为民情怀。习近平提出，“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人类不仅追求物质条件、经济指标，还要追求‘幸福指数’；不仅追求自然生态的和谐，还要追求精神生态的和谐；不仅追求效率和公平，还要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精神生活的充实，追求生命的意义”^{[3]24}。这一重要论断从人的自身发展以及人的社会关系的发展两个层面。文化的人、能动的人、全面的人主要从人的内在发展层面揭示人的物质和精神、人的存在和本质的协调发展，“幸福指数”“精神生态和谐”“人际关系和谐”“精神生活充实”深刻揭示了人的社会关系的具体样态，强调人的社会关系的丰富性。这不仅继承了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又拓展了马克思主要集中于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的视角。

习近平提出，“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这是我们的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重要方面”^{[3]24}。中国式现代化注

重协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有助于夯实人的文化性,文化作为人存在的底蕴,能够滋养人的精神家园,为人的全面发展奠定根基。文化育人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历史发展的过程,揭示了不同历史阶段的人的全面发展具有特殊性,彰显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深邃思想。

习近平提出,“育新人,就是要坚持立德树人、以文化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17]312}。“育新人”和“文明素养”的提出,意味着文化育人聚焦从文化内涵层面来考虑人的问题。文化建设的核心是塑造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要对人的素质和人格进行时代新人的新设计,这新时代人的全面发展指明了现实目标。培养时代新人不仅是文化建设的目标,还是文化建设的基础条件和重要保证,因此培养时代新人具有目标和过程的统一性。习近平提出,“我们的教育决不能培养社会主义破坏者和掘墓人,决不能培养一些‘长着中国脸,不是中国心,没有中国情,缺少中国味’的人!”^{[18]170}这表明,文化育人蕴含的“新人”具有不同于其他时代的特性和状态,要求时代新人具有中国脸、中国心、中国情和中国味的协调统一。文化认同是培养时代新人的核心任务,时代新人只能以认同中华民族文化为准则,以弘扬中国精神为基石,离开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来培育人,是无法实现时代新人的培养目标的。“兴文化”是“育新人”的前提基础,“育新人”是“兴文化”的现实目标指向,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鲜明的育人导向,强调人的文化性的发展,重视培养人的文化品格。

[参 考 文 献]

- [1]习近平在参加党的二十大广西代表团讨论时强调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号巨轮乘风破浪扬帆远航[N].人民日报,2022-10-18(1).
- [2]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10-15(1).

- [3]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 [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4.
- [4]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 [5]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1).
- [6]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
- [7]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 [8]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建校九十周年庆祝大会暨二〇二三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坚守党校初心 努力为党育才为党献策[N].人民日报,2023-03-02(1).
- [9]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11]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N].人民日报,2023-06-03(1).
- [12]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13]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N].人民日报,2014-05-05(1).
- [14]韩愈.昌黎先生集·序[M]//四库精要(集部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 [15]周敦颐.周子通书·文辞[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16]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锚定建成文化强国战略目标 不断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N].人民日报,2024-10-29(1).
- [17]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 [18]习近平.论党的青年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责任编辑 陈晓姿)

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美好精神生活的 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径^{*}

邹 慧 邹亚男

(四川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重庆 400031)

[摘要] 美好精神生活是美好生活的重要维度,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精神生活的向往日益呈现极其重要的价值向度。习近平文化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饱含着对人的精神生活的深切关怀,是确保精神生活正确方向、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美好精神生活,就是要将其中蕴含的真理力量和实践力量持续释放于精神生活,强化价值引领,筑牢意识形态防线;强化文化引领,繁荣文化事业;强化人的主体意识,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以此破解价值观偏离、文化认同感缺失和道德滑坡等现实难点。

[关键词] 习近平文化思想; 美好精神生活; 价值意蕴; 实践路径

[中图分类号] D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5)06-0033-08

精神生活是人之为人的特殊维度,它透视着个体的生活样态,彰显着民族的品格与血脉。马克思、恩格斯将精神生活确证为人存在的本体论意义。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2023年在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精神生活与文化繁荣同频共振、与民族复兴同向而行。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宏大的视野、高远的站位、深厚的情怀,着眼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新境界,是新时代引领美好精

神生活的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

一、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美好精神生活 的价值意蕴

精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范畴,对人的精神生活的关注贯穿在习近平文化思想中。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的引领美好精神生活的真理力量和实践力量决定了新时代美好精神生活只能由习近平文化思想来引领。

(一) 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引领美好精神生活的真理力量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指导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相结合而产生。习近平文

* [基金项目] 重庆市社科规划培育项目“算法推荐场域下思想政治教育有效供给研究”(项目编号:2021PY02),重庆市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类研究项目“美好生活视阈下青年消费观的理性建构研究”(项目编号:21SKSZ037),四川外国语大学党建和思想政治教育项目“新时代美好精神生活的引领路径研究”(项目编号:sisu202070)。

[收稿日期] 2025-01-10

[作者简介] 邹慧,女,湖北黄石人,四川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硕士生导师。
邹亚男,男,重庆人,四川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化思想的根本立场、目标指向、系统思维彰显的真理力量引领着美好精神生活的正确方向。

人民立场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根本立场,标识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价值底色。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唯物史观审视中华文明,指出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是由中国人民创造的,中国共产党要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带领人民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习近平文化思想着眼于推动人民精神生活的高质量发展,坚持人民在新时代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明确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美好精神生活就是要摒弃资本逻辑,坚守人民立场,以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创作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精神文化产品,厚植文艺作品的人民情怀,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目标指向,标识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价值追求。马克思主义的崇高理想是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人的全面发展是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协调发展,精神生活与共同富裕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基石。习近平文化思想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目标,将人的美好精神生活纳入社会发展理想中,深刻把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指出有自信自强的精神力量是我国面临的战略机遇和有利优势,精神生产也是生产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需要精神独立性。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美好精神生活就是要充分认识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充分发挥精神生活的能动作用,引导群众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为人的全面发展注入精神动力。

以系统思维谋划文化建设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鲜明品格,标识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哲学智慧。文化从不以孤立的形态存在和发展,习近平文化思想将文化建设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关系长远和根本的重大战略任务,

将文化建设置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统筹思考文化要素与其他要素之间的结构关系与运行机制,强调坚定文化自信具有更基本、更深沉和更持久的力量。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美好精神生活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巩固文化主体性,增强文化认同感,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二) 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引领美好精神生活的实践力量

思想的价值在于指导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不断展开的、开放式的思想体系,必将随着实践深入不断丰富发展。实践性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动力源泉。习近平文化思想既在深化文化建设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文化理论的新观点、新思路、新命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伟大飞跃,又秉持强烈的问题意识,聚焦新时代我国文化发展的现状,深刻回答了开创新时代文化建设新局面的一系列现实问题,进行了实践层面的布局和部署,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

“七个着力”明确了引领美好精神生活的实践要求。2023年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提出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的文化使命七个方面的具体要求,即“七个着力”。“七个着力”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当前和未来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做出的精确部署,也对新时代的美好精神生活提供了明确的实践要求。“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明确了新时代美好精神生活的领导力量,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实现美好精神生活的政治保证;“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新时代美好精神生活的思想保证,加强意识形态工作是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根本要求;“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明确了判断是非善恶的价值标准,有利于最大限度地统一思想、达成共识,引导人民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着力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

信力”为新时代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提供根本遵循,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发挥正确舆论引导人的作用;“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深刻诠释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规定了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的根本指针;“着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精神生活需要的重要任务,要用高质量的文化供给丰富人民的美好精神生活;“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是增强文化自信,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有力措施。

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的开放包容和守正创新的精神特质为引领美好精神生活提供了方法论指导。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精准概括了中华文明五个方面的突出特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植根于丰厚中华文明沃土中的习近平文化思想融汇中外、通达天下,强调西方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霸权思维和“文明冲突论”等论调是与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背道而驰的,主张在文明的交流互鉴中推动文明的和谐共生才是世界文明交往的应然范式。在唯物主义的维度下,以大历史观视野观察和审视文化问题的习近平文化思想贯通古今,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新时代的创新篇,是守正创新的理论成果,强调文化的生命力来自守正创新,主张大力推动文化的创新性发展。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美好精神生活要运用好开放包容、守正创新的方法论,创新精神文化产品的表现形式,从内容、形式、手段等方面提高精神文化产品的精神高度和文化内涵。

二、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美好精神生活的现实难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国人民展现前所未有的昂扬向上、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社会风气持续向上向善,文化自信明显增强,但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依然突出,精神生活领域一定程度地存在着价值观偏

离、文化认同感缺失和道德滑坡等问题。

(一) 价值观偏离威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价值观是人们在实践活动中形成并确立的,对事实、关系、是非等价值问题所表现出的态度与倾向。价值观具有属人的性质,体现出事对人的意义。一旦被认定为有意义,就会产生导向性,导引人们有目的的实践。而这种意义有正向与逆向之分。正向价值观导人向善,逆向价值观引人趋恶。目前在我国价值观领域,正向的主流价值观居于明显的主导地位,绝大多数人具有崇高的理想信念和高尚的精神追求,信仰马克思主义,在重大原则问题和大是大非面前头脑清醒、立场坚定。然而由于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加速转型期,全面深化改革向纵深推进,媒体格局深刻变化,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锋日益频繁,价值观偏离问题也随之产生。

价值虚无主义是虚无主义在价值观领域的表现。尼采认为,“虚无主义意味着什么呢?——最高价值的自行贬黜”^{[1]400}。价值虚无主义就是对最高价值的自行贬黜,它伴随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进程而生,它割断高尚的精神世界之于人的关联,反对人对于美好精神生活的需求,否定人的精神性存在,否定一切最高价值,拒斥崇高,将生命的真正价值与终极意义边缘化,是一种价值观偏离。价值虚无主义“直接关涉到人的生命存在的根基”^[2],一旦在人的思想观念中蔓延,就会动摇人的精神根基,使人从高级趣味中脱离出来,陷入精神空虚、漂浮、低迷、畸变的困境中,游离于主流价值之外,造成个人价值观念的扭曲、社会价值秩序的失衡以及国家价值体系的瓦解。

以价值虚无主义为原点,价值多元主义、价值相对主义弥散开来。价值多元主义认为,因客体对主体而言的意义和作用不同,人的价值观呈现的是多样化的图景,没有一种价值体系可以凌驾于其他价值体系之上;价值相对主义认为,价值只是一种相对的东西,在价值取向上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应放弃价值问题上的道德选择和道德判断。价值多元主义和价值

相对主义在外在表现上不完全等同,但在本质上却有共通之处,二者都强调价值观的差异,彰显的是价值观上的不确定性,轻视价值观的正确性与凝聚价值共识的重要性。对于个人而言,对美好精神生活的新期待必然应与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相一致,而部分人崇尚功利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错误价值观,以自我为中心,将价值追求置于利益的现实层面,崇高理想式微,理想信念薄弱,价值观信仰无归属,严重偏离主流意识形态。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形成、维系和建设共同的核心价值观至关重要,它能调节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明确共同的价值追求,指引人进行正确的价值选择,凝结起团结奋斗的思想共识和精神合力。若缺乏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会魂无定所、行无依归”^{[3]315},在面临西方意识形态入侵时就会不堪一击,思想防线破裂,舆论阵地崩塌,极大威胁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4],没有意识形态安全,整个社会的思想领域就会严重混乱,人民的信仰就会崩塌,国家就会变质,民族的前途和未来无从谈起,人们向往的美好精神生活注定无法实现。

(二) 文化认同感缺失削弱文化自信自强

精神与文化密不可分,文化是精神的土壤,精神是文化的基因。文化是一个民族得以延续的灵魂所在,是一个人精神境界的集中体现。文化认同感是人们对于自己所属文化的确定性、建设和体认性感受。文化认同能够散发持续性的精神力量,为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是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筑牢意识形态根基的关键。缺乏文化认同感的个人一定是精神漂浮和情感疏离的,缺乏文化认同感的民族是极易被瓦解和分裂的。美好精神生活建基于文化的自信和自强,文化自信厚植美好精神生活的土壤,文化自强为美好精神生活提供强大动力。全球化浪潮极大加深了各国相互依赖、相互依存的程度,西方国家利用互联网技术的绝对优势和强大的媒

介权力,“对其艺术作品、电影、音乐、游戏和学术会议等内容进行了数字化包装,并且依托发达的数字平台和数据系统扩散全球”^[4],意图渗透西方的文化价值观,操控我国的文化发展,使我国陷入文化认同危机,削弱人民的文化自信,阻碍国家的文化自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化认同的根基,然而当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激烈博弈之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很难抵挡住西方文化的冲击而处于弱势地位,这种弱势地位不仅源于西方的文化霸权,还源自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认知偏差。文化复古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是对待传统文化典型的认知偏差。文化复古主义者打着“弘扬传统文化”的幌子,以推崇中国古代思想和政治理念为噱头,极力拔高或夸大儒学的作用,倡导无条件地全面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漠视我国近现代文化的发展历程,认为传统文化高于一切,用传统文化反对其他文化。文化虚无主义者彻底否定或拒斥中国传统,将传统文化简单地等同于落后的、保守的、僵化的文化,甚至认定传统文化是现代化和社会化的障碍,实现现代化必须全面摒弃传统文化,走全盘西化的道路。辉煌璀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化自信的源头活水,对传统文化的正确认知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基本前提,而认知的偏差会直接削弱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严重影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割断文化自强的文化根脉。

革命文化形成于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是中国人民优良品质和精神风范的集中体现,是文化认同的重要源头。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指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它汲取了中华文化的精华,是代表和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精神价值体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依靠技术垄断和话语霸权,将文化虚无主义思潮蔓延至我国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借机歪曲我国革命历史,抹黑革命英雄,否定革命领袖;通过推特、脸书等社交媒体,对我国发生的突发性事件、热点问题、最新

政策等指手画脚,发表煽动性、偏执性、极端化话语,推动负面舆论持续发酵;诋毁社会主义制度,大肆宣扬西方“普世价值”,鼓吹资产阶级价值立场,妄图激化我国社会矛盾、颠覆我国政权。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形成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所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解构实质上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解构,就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和执政能力的解构,就是对中国人民社会历史主体地位的解构,归根到底是企图推翻我国文化自信自强的制度根基、执政根基和历史根基,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引向黑暗的深渊。

(三) 道德滑坡消解精神上的独立性

公民道德水平的高低反映一个国家的精神面貌。道德规范具有强大的约束力,能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善恶评判标准,调节人们的的行为实践,达到净化人的思想、调整人际关系、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道德滑坡是精神异化的体现,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人的主观认识不相统一的结果,它会造成理性意识的遮蔽、意义追寻的失落甚至精神结构的失衡,与美好精神生活背道而驰。当资本逻辑裹挟人的精神生活、人以资本增值作为思考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价值评判的标准时,人和物的关系就会被倒置,物会变成异己的力量控制着人的精神走向,消解人的精神独立性。

资本逻辑内生于资本主义制度,它以资本扩张为本质属性,以谋求价值增值、追逐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标,它贯穿于资本运行的全过程,通过一系列经济活动得以具体体现。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了资本在推动人类生产力发展上的巨大作用,更在深层意义上揭开了资本的神秘面纱,发现了隐藏在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背后的秘密,深刻揭示了资本逻辑对人的无情控制以及造成的无产阶级生存危机。资本逐利的秉性是一股隐蔽而强大的力量,无形地牵引着人们的经济行为和交往关系朝着趋向于满足个人物欲的方向发展,引发道德滑坡问题,这与以人民立场为鲜明属性、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本质要求的社会主义道德相

背离。

社会主义道德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作为社会主义的公民,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的最高位置,树立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的崇高理念,不做损人利己、侵害国家利益、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事情。部分人受到利益诱使,丢掉政治立场,丢掉责任和道义,为谋取利益不惜突破底线,发表有辱党和国家形象的言论,甚至从事间谍活动,严重损害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迷失在资本主义的虚假幻象中,丧失马克思主义信仰,忘却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消解理想信念上的独立性。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道德的原则,它强调个人和集体的辩证统一关系,要重视和保障个人的正当利益,而当利益冲突出现时要坚定地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部分人为了满足个人私利,不择手段地践踏国家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散播谣言、扭曲事实、造谣生事,盲目崇尚西方道路,污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诋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为西方历史摇旗呐喊,漫骂中华民族伟大的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成为西方思想的附庸,失去精神生活的主体性,消解政治立场上的独立性。这些道德滑坡现象归根结底是人的精神结构失衡的外化,反映部分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缺乏精神的主动性、能动性和自觉性,缺乏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能力,缺乏积极有为、昂扬向上、敢于担当的精神品质,缺乏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和底气,是精神生活仍处于被动状态的体现。美好精神生活需要精神上的主动意识,加强精神自觉、精神自信和精神自强,筑牢信仰、坚定信念、端正立场,讲述好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提升好中国理论,达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

三、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美好精神生活的现实路径

(一) 强化价值引领,筑牢意识形态防线,确保美好精神生活的正确方向

价值观是驱动和统摄主体生命活动的根本,内蕴着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价值指向,体现着判断是非善恶的价值标准,对精神

生活具有支撑作用。价值观偏离是威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重大问题,而意识形态决定着精神生活的方向,对引领美好精神生活至关重要。没有正确的价值观,就没有意识形态安全,精神生活就无法达至美好的理想状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引下,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思想共识,整合多元价值观念,推动全社会形成共同的价值追求,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是确保精神生活朝着正确方向发展的根本要求。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5]419-420}作为社会意识层面的价值观来源于社会存在,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存在的多样性决定了人的价值观呈现多元化的特点,价值观的多元化凸显的是价值观的差异,而一旦滑落至价值多元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等价值观偏离的深渊就会造成价值混乱、人心涣散、精神异化、社会动荡等不良后果,给意识形态领域带来巨大风险和隐患,美好精神生活将化为泡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多种多样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要把全社会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必须有一套与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相适应、并能形成广泛社会共识的核心价值观。”^{[6]106}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是最适合我国国情、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承载着全体中国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是“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的强大力量”^{[7]4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国家的价值目标、社会的价值取向和个人的价值准则视为一个整体,指明了新时代中国人应该树立的价值思维、确立的价值选择和遵循的价值规范。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多样化的价值观念,在尊重多样性中寻求核心价值观的确定性和一元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评判一切行为是非曲直的价值尺度,引导人的价值理想和价值追求始终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保持一致,是筑牢意识形态领域思想防线的重要举措。

强化价值引领,筑牢意识形态防线,加强意识形态工作是重中之重。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用制度夯实意识形态根基,为实现美好精神生活提供有力且长效的制度保障。要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在严峻的意识形态斗争和复杂的舆论场中,牢牢掌握意识形态主导权,占领舆论引导的主阵地,教育引导人们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信仰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自觉反对和坚决抵制各种不良价值观的侵蚀,让精神生活运行在正确的轨道上。网络空间是人们共有的精神家园,它极大延伸了人的精神生活空间,丰富了人的精神世界,但也是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是价值多元主义、价值虚无主义等不良价值倾向散播的温床。要掌握信息化条件下的舆论主导权,旗帜鲜明地开展舆论斗争,巩固拓展红色地带,积极转化灰色地带,主动进攻黑色地带,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舆论生态,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二) 强化文化引领,繁荣文化事业,增添美好精神生活的文化底色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文化认同问题解决了,对伟大祖国、对中华民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才能巩固。”^{[8]85}文化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具有引领人、塑造人、涵养人的作用。文化认同是精神生活的内在根基,对增强精神力量、激发精神动力、提升精神境界具有重要意义。西方文化的入侵和对本国文化的认知偏差将会削弱我国人民的文化认同感,而文化认同感缺失会使人的精神生活因缺乏归属感而处于游离的无根状态,造成个人对社会和国家的情感撕裂,损毁国家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引下,正确认识本国文化,树立正确的文化观,巩固文化主体性,用高质量文化供给为美好精神生活增添底色,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是增进文化认

同感、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有效途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9]文化主体性彰显出我国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独特性质和价值标识，是提升文化软实力和文化竞争力的基本条件，是文化认同的坚实基础、文化自信的重要来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语境中文化主体性的三重内涵。巩固文化主体性，就是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要弘扬革命文化，焕发革命文化的时代光芒；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增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创造活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8]^[342]，这个文化根脉为中华文明提供丰富滋养，是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根基。“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10]，由中国革命历史锻造出的革命文化承载着红色基因，蕴含着党的伟大革命精神，是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源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塑造着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品格，是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活力。正确认识文化主体性的三重内涵在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中的重要作用，是增进文化认同感的前提。

人民立场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根本立场，要发挥人民在繁荣文化事业中的主体作用，精准研判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精神文化产品，激发人民参与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让精神文化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以数字化赋能文化发展，促进文化和科技的深度融合，打造文化新的表现形态，让中华文化绽放时代光彩。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数字孪生及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扩展现实等最新数字技术创造数字文化产业新形态，不断推陈出新，创作出高品质、有创意、反映时代气息和人民心声的精品力作，让人民群众获得更加丰富的精神食粮。针对人

民对于精神文化生活的参与感和体验感的需求更加强烈的境况，要“不断创新沉浸式演艺、虚拟旅游、云端展览等数字文化消费场景，满足大众实时参与、多维体验的需求，打造线上线下相融合的文化体验场景和文化传播矩阵”^[11]，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可感可知、深入人心，让文化盛宴浸润人的心田，塑造人的精神品格。

（三）强化人的主体意识，摒弃资本逻辑，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

主体意识是人对于自我作为主体的自觉感知和确认，它表现在人对客观现实的反映以及人与物的关系塑造上。作为精神活动的主体，人在对客体的作用过程中理应表现出彰显主体中心位置的精神规定性，应摆脱精神依赖，破除精神束缚，积极能动地、有意识地进行精神认知、精神选择、精神判断，应主动地、自觉地追求精神发展和精神意义。在资本逻辑宰制下，物的全套意义会侵蚀人的头脑，人的精神易发生异化，导致道德滑坡现象。美好精神生活需要在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聚焦人的全面发展，从精神自觉、精神自信和精神自强来强化人的主体意识，摒弃资本逻辑，坚守社会主义道德。

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要提升精神自觉。精神自觉是指“在实践活动中人的精神能够自觉地把握客体的本质、必然与规律，思考主体自身的意义与价值，具有较为明确的预见性、目的性、计划性与创造性”^[12]。提升精神自觉，一要增强理论自觉。习近平文化思想揭示了我国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深刻阐明了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作用，要不断深化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规律性认识，自觉用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美好精神生活。二要增强历史自觉。以大历史观审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将精神财富的丰富、精神力量的增强放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要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视角下考量，将引领人民的美好精神生活视为关系根本、关系全局的长远战略任务。三要增强实践自觉。要有守护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

自觉意识,要提升精神生活方式、精神交往对象、精神信仰树立等方面的选择能力,警惕主体的价值丧失,自觉规避资本逻辑无序扩张下物对人的牵制,提升分析和批判能力,保持主体的清醒和定力,避免精神生活的依附性和同质化,以防将自身裹进精神茧房中,沦为被摆置的虚在物。

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还要坚定精神自信,推动精神自强。精神自信是主体对于本国的精神面貌、精神力量、精神品质等精神要素持有积极、肯定的态度,表现出坚定的精神定力和强烈的阵地意识。只有对国家的指导思想、理想信念、主流意识形态、文化、道德、民族精神等充满自信,才不会被资本主义的“糖衣炮弹”所迷惑,才能够守护好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和底气。精神自强是主体在精神自觉和精神自信的基础上,主动地提升精神生活的境界,主动地追求美好精神生活,主动地传承和弘扬本国的精神文化,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和影响力。精神自强致力于将精神自觉和精神自信转化为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强劲动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和民族复兴伟大事业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坚定精神自信,推动精神自强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持续激活中国人的情感基因,用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美好精神生活,积极推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使人民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大力弘扬中国精神,讲好中国故事,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提高文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魅力与活力”^[13]。

美好精神生活是美好生活的重要维度,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精神生活的向往日益呈现极其重要的价值向度。将习近平文化思想贯穿引领美好精神生活的全过程,将其中蕴含着的真理力量和实践力量持续释放在美好精神生活之上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

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增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的根本要求。

[参 考 文 献]

- [1]尼采.权力意志:上卷[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 [2]贺来.个人责任、社会正义与价值虚无主义的克服[J].哲学动态,2009(8):13-17.
- [3]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摘编[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23.
- [4]孙冲亚.数字帝国主义时代的文化安全风险及其应对[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6):115-123.
-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 [7]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8]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
- [9]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3(17):4-11.
- [10]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1(7):4-17.
- [11]杨斋.数字化助优质文化产品供给[N].经济日报,2022-08-29(10).
- [12]王维国.精神主动的科学立场、基本规定及实践进路[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4):32-45.
- [13]邹慧.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习近平文化思维的逻辑理路[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7(3):148-151.

(责任编辑 光 翟)

教师职业变革的核心背景、关键路径和治理路向^{*}

——以《全球教师报告》为中心的探析

王晋 贾慧莹

(河南大学教育学部, 河南开封 475004)

[摘要] “师资短缺”作为全球教育面临的整体性危机与资源配置失衡的结构性矛盾,与教师职业吸引力式微相互交织、彼此强化,共同构成了推动教师职业深刻变革的紧迫现实与核心阻碍,亟须通过内外并举的系统性策略破解。对内要构建以终身学习为核心的教师职业发展路径,通过持续化专业发展、创新能力提升以及数智赋能,强化教师个体应对变革的内驱力。对外则需要重构治理路向,为教师打造新的社会契约,即通过重塑教师角色、优化资源配置及重构评估体系三重举措,系统改善教师职业生态。这一理念的核心要义在于超越传统的雇佣与指令关系,构建政府、学校、教师及社会多方协同共治的新型伙伴关系,重塑教师的专业权威与公共价值,确保其真正成为教育变革的共建者。

[关键词] 师资短缺; 教师职业吸引力; 终身学习; 新的社会契约; 教师职业变革

[中图分类号] G45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5)06-0041-09

教师职业作为教育系统的核心主体,直接关乎全球教育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实现程度。近年来,“师资短缺”已然成为全球教育事业发展进程中的一项重大挑战,不仅是横在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之间的结构性难题,也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共同面临的系统性危机。2024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教育2030教师国际工作组合作完成的全球首份《全球教师报告》(*Global Report on Teachers*)中文版在沪发布。报告指出,为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4——“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让全民终身享有学习机会”,全球需新增约4 400万名中小学教师。此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2020工作论文《教师福

祉:数据收集与分析框架》中对全球范围内教师短缺日益加剧、人员流动频繁以及教师职业吸引力下降的困境也有所探讨^[1]。与师资短缺相互交织、彼此强化的另一要素——教师职业吸引力式微——也在日益加剧教师职业挑战,构成了推动教师职业开展深刻变革的紧迫现实与核心阻碍。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显示,从2000年至2018年,教师一直是15岁学生的十大理想职业之一。但现在,教师职业的吸引力在全球范围内都呈下降趋势,在奥地利、捷克、丹麦、瑞士等多国,仅有不到2%的受访者希望成为教师。虽然有意从教的年轻人数量未必能完全转化为实际的教师规模,例如部分师范专业毕业生不选择从事教学工作,但公众

* [基金项目] 2021年度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教育学重点学科高质量发展研究与实践”(项目编号:2021SJGLX199Y)。

[收稿日期] 2025-07-12

[作者简介] 王晋,男,山西平定人,河南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
贾慧莹,女,河南汝州人,河南大学教育学部硕士研究生。

(尤其是年轻人)对教师职业普遍低迷的兴趣,理应引发我们对教师职业吸引力的深刻反思。在此背景下,推动深刻的系统性教师职业变革已非单纯的政策选项,而是关乎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必然出路。摆脱困境需要聚焦“内外并举”的综合性策略。对内,要构建以终身学习为主题的教师职业发展路径,激发教师内生动力;对外,则需要保障支持系统,重构治理模式,以现代化治理体系重塑教师角色,以智能化配置机制促进师资均衡发展,以全过程一多主体评估体系保障契约落地,为教师职业提供系统性保障。教师是实现优质教育的主体,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全球教师报告》为核心,深入探析教师职业变革的核心背景、破局关键路径以及保障变革落地的治理路向,为应对师资短缺危机、提高教师职业吸引力及重构教师职业生态提供了本土化思考与理论参照。

一、教师职业变革的核心背景

师资短缺与教师职业吸引力式微两大核心问题,共同构成了推动教师职业深刻变革的紧迫现实与关键阻碍。《全球教师报告》揭示的4 400万名教师缺口,清晰地勾勒出教师职业面临系统性挑战的全球图景。聚焦中国语境,尽管总量需求呈现饱和趋势,但结构性短缺、区域性失衡、质量不均等问题依然突出,尤其在追求“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目标下,挑战更为尖锐。同时,缺乏有吸引力的薪资、持续走低的职业地位、恶劣的工作条件和繁重的工作负担,共同构成了一个“推力系统”,致使众多潜在人才对加入或留任教师队伍望而却步。

(一) 师资短缺:教师职业变革的紧迫现实

《全球教师报告》的数据清晰揭示了全球师资短缺的严峻形势,要在2030年前普及初等和中等教育,全球需新增4 400万名中小学教师,其中,小学教师缺口近1 300万,中学教师的缺口高达3 100万。就当前数据来看,若不立刻采取行动,到2030年,仅有约4成国家能确保招聘足额的教师以普及初等教育,只有不足五分之一的国家能普及中等教育。

除总体数量缺口巨大外,教师职业还面临着多重结构性危机。首先,教师质量存在差异。全球小学阶段教师最低资质标准合格率约86%,中学教师合格率通常低于小学,大部分地区维持在80%—90%。这种质量差异在学生与培训合格教师比值差异上尤为突出。在初等教育阶段,2022年,高收入国家平均的学生与培训合格教师比为15:1,低收入国家则高达52:1(是前者的3倍多)。此外,合格教师在教育系统内部(如学科领域)的分布和调配不够合理,特别是STEM等学科师资短缺,进一步加剧了教师结构性短缺问题。其次,部分学段教师性别比例失衡。从全球看,教师是以女性为主的职业,学前教育阶段女教师占比达94%,小学阶段达68%,中学阶段达55%,为实现教育普及,需新增教师人数最多的国家也是女教师占比最低的国家。这种失衡影响深远,教师职业的性别平等反映课堂和社区多元化程度,对学生自我认知和学业表现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男教师短缺可能会对低年级男生的学习投入以及学习成绩产生消极影响;而女教师或女性校领导缺乏会影响女生的入学率、课程参与度、辍学率及对未来的规划。最后,教师流失进一步加剧了全球师资短缺的危机。教师流失影响着不同背景和收入水平的国家。预测显示,到2030年,全球约58%的教师缺口是由教师流失造成的。在小学阶段,东亚的现有数据显示,教师流失率显著上升,2020—2022年,许多国家的小学教师流失率非常高,达到10%及以上;在中学阶段,虽然教师流失率的长期趋势数据不足,但从东亚和东南亚的数据来看,2019年以来初中教师和高中教师流失率出现了上升趋势。

聚焦中国国情,北京师范大学国家高端智库教育国情调查中心“全国中小学教师队伍需求调研课题组”在系统调研和综合研究的基础上,基于数据模型对我国教师队伍需求情况进行了预测,认为我国未来教师需求总量总体呈现饱和趋势^[2]。但这并不意味着师资挑战不复存在,相反,在全球普遍面临教师总量短缺的背景下,中国的师资结构性短缺、区域

性失衡问题突出，在欠发达地区尤为明显，不仅是音体美等学科教师长期不足，部分地区主科教师甚至有数量缺口，科学教育、信息素养课程教师更面临着大量短缺^[3]。同时，教师质量不均对师资力量构成另一核心挑战。从教师队伍来看，我国城乡中小学教师年龄结构不均衡，城市学校教师平均年龄比乡村学校教师更低，亟须通过宏观调控达到动态平衡；教师学历水平、高学历及高级职称教师比例在各区域和各学段也有明显差异^{[4]103-105}。因此，在我国追求“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的目标下，有效破解结构性、区域性的师资短缺难题是未来需要针对性提高的关键点。无论是全球师资的总量困境，还是中国语境下的结构性失衡与质量不均，都表明推动深刻的教师职业变革已非单纯的政策选择，而是刻不容缓的必然出路。

（二）教师职业吸引力式微：教师职业变革的关键阻碍

《全球教师报告》指出，全球范围内（除少部分地区）教师职业地位和吸引力均呈现下降趋势，这使得教育系统难以吸引并留住既有技能又有积极性的教师。这种困境在现实招聘和教师留任率的数据显示得更为直观：英国新入职的合格教师中仅有约40%在25年后仍坚守教学岗位，在2019年有近一半受训教师结业后未从事教学工作；在立陶宛，2000—2012年间持有教师资格证的毕业生中，仅有约15%真正进入学校任教。这些数据清晰地揭示了教师职业在吸引和保留人才方面面临的严峻挑战。教师职业吸引力低是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其中，尤以薪资待遇缺乏竞争力、职业地位持续走低、工作条件差以及工作负担过重为核心症结。

1. 薪资待遇低

教师薪资相对较低的趋势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低薪酬是导致教师职业吸引力下降的主要外部因素之一。当教师面临其他薪资待遇更高的工作机会时，自然会转行，这导致教师的流失率攀升。此外，各教育水平教师的薪酬与同等学力人员相比都较低，在小学阶

段，全球半数国家的教师薪资低于资质要求相近的其他职业；在欧洲和北美地区，这一比例为十分之七。在大多数国家，教师薪资都比其他行业低得多，许多低收入国家的教师薪资甚至无法满足基本生活需求。除教师工资水平总体偏低外，现有的教师薪酬和奖励措施也不足以吸引和留住高素质的后备教师。

2. 职业地位低

由于教育系统难以吸引并留住既有技能又有积极性的教师，教师的职业地位和吸引力在全球范围（除少数地区）均有所下降。在许多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人口高速增长伴随着普及中小学教育的浪潮，导致教育系统大规模扩张，降低了教师的职业门槛，进一步损害了教师的职业声望和吸引力。尽管教师职业在公众调查中被认为是有声望的职业，但教师自身对其社会地位的看法较为消极。在大多数国家，教师的声望往往与社会工作者相近，即使是教师地位相对较高的亚洲国家，如中国，教师地位的实际情况也不容乐观，2019年《中国教师发展报告》显示，不仅社会人士对教师职业的认可度有限，教师群体也认为自身职业的社会声望中等偏低^{[4]288-289}。

3. 工作条件差

教师工作条件具体包括物质条件（学校设施与资源）以及工作环境的社会和文化元素（学生入学率、学生在学术任务中的表现以及教师是否在学校中受到支持）。工作条件差，例如工作时间长、班级人数多或缺乏支持和认可等，会降低教师职业的吸引力，并令已经入行的人选择转行。在我国，农村地区因工作条件差导致教师缺编问题突出；受制于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教师资源分配在城乡之间也存在较为严重的非均衡现象，农村学校既“招不来”优质教师，也“留不住”现有人才^[5]。虽然仅通过改善工作条件来大幅提高教师的职业吸引力和留任率不太现实，但不可否认，许多任教于农村地区的教师会因工作条件过差流失。

4. 工作负担重

工作量是许多在职教师以及预备教师的关切，工作量大、工作时间较长是中小学教师

普遍面临的严峻问题。在所有经合组织成员国中,日本是教师工作时间最长的国家(每周工作时间达 56 小时)。但结合工作内容来看,各国教师的教学性工作时间基本持平,非教学性工作时间的差异是教师工作时长差异的主要原因^[6]。也就是说,教师在完成教学工作的同时,还需要面对家长施加的压力、学校要求教授自己从未受过专业培训的学科以及行政层面的督导评估等。家长施加的压力让教师难以很好地平衡工作与生活,督导评估则会增加教师的工作量,问责带来的压力还可能减少教师开展创新实验的机会,降低教师工作满意度,甚至使教师选择离职。除此之外,部分教师未能有效利用数字技术来减轻传统负担,该技术甚至增加了教师操作的复杂性,也是其负担感加剧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终身学习:教师职业变革的关键路径

师资短缺与职业吸引力式微相互交织的背景下,教师职业变革需要从个体内驱力与系统性生态两方面破局。终身学习作为个体应对变革的内驱力,为教师职业发展提供了技术路径;构建新的社会契约,则是从制度层面重塑教师职业生态的必要保障。构建让教师实现终身学习的教育生态,是提升其职业内在满足感和成就感,增强其职业吸引力的根基,需要从 3 个方面展开行动。第一,提升教师的专业化水平,确保其在入职前教师教育和专业发展课程的学习中形成终身学习心态;同时,教育系统需要提供结构性支持,以微认证、实践共同体等灵活形式推动教师持续化专业发展。第二,鼓励教师在行动研究中融合理论反思与技术应用,激发创新能力。第三,借助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为教师提供个性化学习资源和精准反馈,构建数智赋能的终身学习生态。

(一) 持续化专业发展

教师专业发展是贯穿其整个职业生涯的持续过程,是指通过反思、学习和行动等提升知识技能,改善教学实践。在教师入职前培训阶段需要帮助后备教师建立终身学习心态,使其具备与职后培训和专业发展机会相适配的学

科知识和教育学知识。职后专业发展阶段的核心在于为教师提供持续的外部支持,一方面实施新手教师支持策略,提升其工作积极性与专业性,防止教师在职业生涯初期流失转行;另一方面,可以引入微证书记录教师持续发展轨迹,替代传统的单一考核模式。微认证包含一系列专业发展课程,教师在学习新技能后获得专业认证,推动其专业发展更符合当下需求。高质量的微认证支持教师根据自身实际需要灵活参与,不仅能有效缓解甚至消除教师因阶段性评价任务所产生的倦怠情绪,显著提升教师的自主感和职业成长体验,而且能激发其专业发展的内在动力,为提高职业吸引力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7]。

推动授课模式由以授课和学分为基础的个人培训转型为以教师为主导的合作学习,为此,教育系统应构建多层级、协作型的教师跨界共同体^[8]。该共同体通过跨校际、跨学段的实践共同体对话,帮助教师突破个体经验局限,让其能与同行共同探索问题解决方案。其中,实践共同体作为正式网络,可通过定期讨论、经验交流等方式,为教师提供支持性的成长空间,有效增强教师的归属感和专业认同感,提升留任意愿。同时,需充分发挥同行合作与技术赋能的作用。教师可以依托共同体和同事网络等不同渠道寻求支持,运用技术手段相互学习、分享最佳的教学方法并共同开展项目。合作范围甚至可以扩展至教师与其所在社区机构,即教师通过合作推动所在社区的发展,也能反哺自身的专业发展。另外,在教师持续化专业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充分发挥教师的合理自主性;设定教师专业发展基本标准时需尊重教师个人的职业发展意愿,从专业发展内容和形式上精心设计,鼓励其主动参与,实现个性化发展。

(二) 提高教师创新能力

教师创新能力与教师专业成长密切相关,也是教师应对职业变革的核心素养之一。全球公认的教育强国——芬兰,连续多年在国际教育机构评价中名列第一的关键就在于有一支“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的教师队伍,创新

作为关键词之一,其重要程度不言而喻^[9]。首先,教师创新能力的培育有赖于批判性反思意识的常态化以及研究意识的自觉化。教师通过批判性反思可以逐步突破固有教学模式的心理定式,识别并摈弃无效的教学策略,从而提升教学质量。教师研究意识的自觉化意味着教师需要在问题驱动下,有意识地将自己的教育教学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适当的方法,在对自身教育教学问题创新解答以及开展行动研究的过程中创生出独特的个人知识,实现教育教学完善的成果呈现^[10]。其次,应为教师提供有利于创新的工作条件,支持教师开展教学创新。为教师提供施展才华抱负、实现教育理想的学习氛围,是吸引富有创造力的优秀人才加入并长期坚守教师岗位的核心吸引力之一^[11]。通过营造民主、合作、开放的学校氛围能够支持教师创新能力的发展以及创新实践的开展。最后,构建制度层面的支持框架即全方位制度保障体系,对支持教师创新能力的持续发展十分有必要。具体而言,可以采取建立教学创新成果认证体系,将创新实践纳入教师评价维度等措施,助力形成制度保障创新的良性循环。

(三)数智赋能教师成长

人机协同时代,人工智能赋能教师专业发展已成为教育变革的重要议题,数智技术不仅能为教师培训提供工具上的支持,还能创造更多教师主动学习的机会。人工智能作为赋能因子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关键在于通过智能技术确定教师所处的发展阶段,消除和减少发展阶段间的各种阻碍因素,达成专业发展进入下一阶段的条件,实现教师专业发展的进阶^[12]。例如,智能系统可通过教育大数据分析,精准诊断教师的教学短板,支持其专业发展。美国的 Edthena 公司基于 AI 的教练工具,就可以通过分析教师的教学视频,提供个性化的反馈和改进建议,帮助教师识别教学短板并提升教学能力^[13]。除教师专业发展外,智能时代教师教学能力的进阶,即教师教学理念更新、智能教育素养提升以及以教师为主的人机生态转型等,同样是数智赋能背景下教师

应对职业变革的重要措施之一^[14]。随着在线教育、混合式教学的普及,跨平台教学能力、数字化课程开发能力等新素养已成为教师必备的基础能力。

数智赋能教师成长不仅体现在教学能力的提升,更体现在教师的人机协同能力和持续进化意识。教育大数据通过深度挖掘,能够将课堂转化为以数据为驱动的精准育人场域:在人工智能辅助下,AI 承担知识传递、学情追踪等一系列基础性工作,教师则能突破知识传授者的传统角色边界,聚焦学生高阶思维的培养与情感价值观的引导,实现人机协同和优势互补。例如,岭南大学教与学中心就采取了将人工智能融入课程和教学的策略,运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帮助教师快速整合教学内容,将教学内容根据学生的学习水平进行定制,生成个性化学习材料,并处理基础和重复性任务^[15]。元宇宙教育场景、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对重复性劳动的替代,能实质性解放教师时间,减轻工作负担,使其能更专注于育人本质,从而提升教师职业的愉悦感和效能感。教师在此过程中能实现从知识传授者到成长型导师的跃升,职业价值从知识传授升华至育人智慧的创造,职业吸引力显著提升。

三、为教师打造新的社会契约:教师职业变革的治理路向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一起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为教育打造新的社会契约》所勾勒的教育图景中提到,教育系统的革新已成为全球共识^{[16]81-86},而教师职业的重构正是这场变革的核心枢纽。教师职业系统性变革的关键在于重新定位教师角色、均衡配置师资及搭建全过程—多主体的评估体系 3 个方面,通过角色重构让教师“能参与”,通过资源保障让教师“愿参与”,通过评估激励和多方协同让教师“持续参与”,最终实现教师从“被动执行者”到“教育变革的共建者”的转型。唯有教师的专业智慧真正融入教育决策与实践,构建起以教师为中心的教育新生态,才能重塑教师职业尊严,从根本上破解师资短缺与吸引力式微相互强化的困境。只有这样,新社会契约才

能超越短期政策效应,成为可持续教育变革的动力之一,真正推动“公平而有质量”的全球教育愿景的实现。

(一) 目标重构:以现代化治理体系重塑教师角色

传统工业时代形成的以科层制为核心的教师角色契约构建了“政府—学校—教师”的单向指令链,教师被“规化”为科学知识与技术的产出者和传播者,“技术化”教学成为主流,教师职业沦落为“谋生的职业”^[17]。为教师打造新的社会契约要重塑教师角色,实现三重转型。首先,要重构教师角色,突破“工业化”教师角色的局限,实现从“执行指令”到“专业决策”的转变,推动教师角色从“被动执行者”向“教育变革的共建者”转型。这一理念的核心在于发挥契约主体——教师——作为“教育变革的共建者”的专业决策权,以及教师作为知识分子的政治作用,彰显其专业权威与公共价值^[18]。这需要以立法确立教师参与教育治理的主体地位,保障教师代表在地方教育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决策机构中的最低比例,赋予教师参与课程改革、教师评价等事务的实质性专业自主权。其次,需重构教师与教育系统的关系,将教师在公共话语中的形象从传统的“雇员”转变为“治理伙伴”,突破工业时代形成的严格规范教师权力结构和责任边界的教育体系,在原本教师角色单向指令链的基础上,构建“政府—学校—教师—社会”这一主体多元、分工明确的治理伙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模式的实质是在学校这一教育场域中,以教师为治理主体,协同政府决策机制,并引入社会力量提供资源与监督(保障教师专业权威),共同实现治理关系的重构。最后,从“标准化教学”转型为“创新驱动教学”,实现教育价值重构。传统教育体系以“规模化培养”为目标,将教学过程拆解为可复制、可量化的标准化环节,忽视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教师教学创新行为也被边缘化。新契约下的教学以培养学生核心素养为目标,从教育目标、教学方法及教学评价等方面推动教师成为引导型教育者。

重塑教师角色还需要以现代化治理体系扭转科层等级制特征下教师职业发展的颓势。学校科层制的等级制为教师职业发展提供了职称等级和岗位等级两种途径,等级制结构形成的梯形特征致使教师职业结构单一化、职业发展机会不足^[19],破解之道在于构建纵向分级与横向拓展相结合的多维度发展阶梯。纵向层面,即职称等级方面,一是构建动态化职称管理机制,试行“达标即上”的原则,优化“初级教师—资深教师—专家级教授”认证,强调每级晋升需完成特定教研项目;二是试行激励性政策,引导优质师资向教育弱势地区流动;三是实行倾斜性政策,统一各区域中小学教师岗位比例、创新评聘标准等,消弭中小学教师职称结构的城乡差距^[20]。横向层面,即岗位等级方面,开放“STEM 教育导师”“跨学科课程设计师”等专项资格认证,要求教师通过跨领域学习与实践积累学分获得认证,并给予专项津贴、优先晋升或学术休假等激励。荷兰曾要求教师晋级必须通过积累特定“专业发展学分”;中国深圳光明区的“学分银行”项目也为教师职业结构改革提供了新思路:基于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识别等信息技术,该项目实现了教师培训效果评估、信息存储、成果转化等环节的智能化管理^[21]。通过构建多维度的职业阶梯,建立以能力进阶为导向的职级体系,打通职前职后学习通道,将教师的专业成长与职级晋升相联结,既能形成“学习—实践—晋升”的现代化教师职业发展良性循环,也有助于吸引优秀人才从事教师职业,激发其长期职业承诺。

(二) 资源重构:以智能配置与薪酬激励促进师资均衡发展

搭建智能化教师管理信息系统,精准调配师资缺口。依托大数据搭建“教师资源配置动态模型”,动态监测各地区师资供需、学科缺口及流失风险,在保持教师资源总量稳定的同时,做好教师资源的精准调配。动态模型能够通过数据分析,追踪教师专业发展,分析其职业轨迹,精准预测教师流失风险并采取干预措施;同时,辅以相应的补充招聘和轮岗机制,

为制定师资配置决策提供数据支撑。智能化的资源配置与技术支持不仅能精准解决师资结构性短缺问题,更能通过实质性地改善教师工作条件、提升教学效能感,增强教师的职业吸引力。

优化教师薪酬结构,建立具有竞争力的薪酬保障与激励体系。首先,保障基础资金支持。在国家预算中优先考虑和划拨教育经费,建立教师薪资持续增长制度,确保教师工资增长率不低于公务员工资增长率,定期调整教师工资至国民经济行业中上等水平。同时,还需要注意提高工资政策的透明度,推进预算公开,确保每一笔投入直接惠及教师群体,增强教师对薪酬体系的信任感。其次,探索多维度薪资激励制度,在薪酬结构上体现教师的差异化角色价值。区别于传统的以课时量或年限为主的单一薪酬模式,在基本薪酬框架外,增设“高阶能力溢价”与“创新贡献津贴”,即对展现出有育人智慧等高阶能力的教师赋予相应薪资层级;对学习、优化教育 AI 算法等创新研究的教师按成果转化效益给予相应的阶梯式奖励。特别针对 STEM 学科教师匮乏、乡村教师缺编等结构性师资短缺问题,实施“差异化补偿+专业发展支持”的综合激励政策,即在物质激励外,为偏远地区教师建立专属晋升通道,以实现师资结构的精准配置和优质资源共享。最后,搭建全球协作保障平台,设立专项基金,重点解决师资匮乏地区的教师薪酬问题。由世界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各国政府联合注资,秉持需求紧迫性原则,针对低收入国家与危机地区,通过定向发放教师薪资补贴和倾斜性支持举措,重点保障冲突地区、极端贫困地区及女性教师比例过低的学校,推动全球教育资源均衡配置。

(三) 评估重构:以全过程—多主体评估体系保障契约落地

构建全过程评估体系,替代传统的行政考核,确保新的社会契约有效落实。传统单一的评价体系具有难以激发教师主动性的弊端,亟须重构评估框架,改进评估过程。首先,建立标准化教师职业评估框架。以国际教师专业

能力标准为蓝本,结合本土教育目标的要求,构建覆盖“职业发展”“终身学习”“改革参与”等多重维度的教师职业发展评估框架,下设包含薪资待遇、工作条件、教师自主权、工作负担强度等关键二级评估指标,以便具体分析教师职业标准的达标程度。其次,构建针对性响应机制,将评估结果切实转化为支持行动。评估反馈必须聚焦当前教师发展过程中的实际问题,力戒空泛。例如,针对当前教师非教学性工作负担过重问题,试点学校实行弹性工作制及培训假制度,允许教师根据个人情况调整工作时间。由教育管理部门牵头,相关教师群体和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在兼顾工作时长与“个体感受”的前提下,制定合理的工作量标准^[22]。学校根据实际情况精简与教学无关的检查、评比、考核等社会性事务,合理安排教师工作,营造专注于教育教学的学校环境^[23]。另外,实施正向激励举措,对监测评估持续达标的学校赋予更大的自主管理权限,建立豁免机制,激发学校发展的内生动力。最后,搭建大数据动态监测系统,推进评估即时反馈。利用智能监测系统实时识别教师工作压力的潜在风险点,第一时间向学校和上级部门预警,并提供针对性的资源或支持,实现反馈的高效处理。

政府—学校—社会三方协同发力,共同监督新契约的有效落实。作为监测评估体系的总舵手,政府要切实负起教师的保障责任,从“指令发布者”转向“制度设计者”。设置指标明确的教师职业发展评估框架(涵盖教学能力、数字素养、跨文化沟通技能等),并通过立法形式予以确定。在构建评估框架的过程中健全教师参与机制,让教师广泛而充分地参与评估考核方案的制订过程,让教师的意见有渠道表达,加强程序上的公平与正义^[24]。学校作为实施教师新契约的关键场所,需要打破行政壁垒,为教师提供实践空间。一方面,改革学校领导层,打破科层化管理模式,试行实施分布式决策制度,赋予教师参与学校治理的权利;另一方面,营造民主、合作、支持性的学校组织文化,提升教师的归属感和自主权,培育

教师的公共精神,对于关涉学校运作和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公开、平等的讨论,努力为教师平等参与学校公共事务提供平台和机会^[25]。社会力量作为监督与反馈者,通过提升透明度与公信力参与监督。具体方式有:定期向公众公示教师发展质量报告,公开教师职业发展进度;持续关注并整合来自学生、教师和家长等不同群体的社会要求及期望,据此向学校提出教师职业发展阶段性评估要求。这种多方协同的监督机制本质上是在构建合作信任的文化,通过持续改进取代传统的行政管控逻辑^[26],实现教师职业发展从静态考核向动态监测的转型,以及教育质量持续改进的生态闭环。

师资短缺的系统性挑战与教师职业吸引力的持续式微深度耦合、相互强化,共同构成了推动教师职业深刻变革的紧迫现实与核心阻碍。面对双重挑战,推动深刻的教师职业变革已非单纯的政策选项,而是关乎教师发展与教育未来的必然出路,破局的关键在于实施“内外并举”的系统性变革策略。对内需以“终身学习”为核心路径激发教师内生动力:通过构建以微认证和实践共同体为支撑的持续化专业发展体系替代传统考核模式;通过强化批判性反思与行动研究,系统性培育教师创新能力;深度融合数智赋能,利用人工智能精准诊断教学短板,实现人机协同,分担重复性工作,实质性解放教师,助力其从知识传授者向成长型导师跃升。对外则必须为教师打造新的社会契约,以重塑职业生态。首先,在目标重构方面,突破科层制束缚,通过立法赋权确立教师作为教育变革共建者的主体地位,并构建纵向分级与横向拓展相结合的多维度职业阶梯,拓宽教师发展空间。其次,在资源重构方面,依托大数据搭建师资动态监测模型,实现精准配置,并建立包含基础保障、能力溢价、创新奖励及特殊岗位补偿的差异化薪酬激励体系。最后,在评估重构上,建立覆盖多维度的全过程、标准化职业发展评估框架,配套精简非教学负担等针对性响应机制,并推动政府主导制度设计、学校落实赋权实践、社会参

与监督反馈的三方协同,形成动态监测与持续改进的合力。唯有通过激发教师终身学习的内驱力,并同步构建起支持性社会契约生态,方能切实保障 STEM 等紧缺学科师资供给,降低高流失率地区的教师离职率,系统性破解师资结构性短缺与职业吸引力持续走低的困境,最终实现 4 400 万教师缺口的填补,实现包容与公平的优质教育目标。

[参 考 文 献]

- [1] VIAC, C, FRASER P. Teachers' well-being: A framework for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J]. OECD Education working papers, 2020 (213):1-81.
- [2] 张志勇,储招杨.新时代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的战略地位、主要任务与实践路径[J].现代教育管理,2025(2):20-31.
- [3] 教育如何应对人口之变? [EB/OL].(2024-03-12) [2024-12-19]. <http://www.inews-week.cn/politics/2024-03-12/21436.shtml>.
- [4] 李广.中国教师发展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20.
- [5] 黄斌,程欢,何沛芸,等.货币收入、工作条件与农村中小学教师换教与退教意愿——基于重庆、宁夏基线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J].教育与经济,2021(5):77-88.
- [6] 陈寒,王凤琴.教师职业吸引力及其影响因素的国际比较研究[J].上海教育科研,2023(7):27-34.
- [7] 牛旭峰,夏海鹰.循证视域下微认证助力教师数字素养提升:价值意蕴、运行机理、发展路径[J].现代远距离教育,2023(4):61-69.
- [8] 李娜,李爱霞.教师拓展性学习:建构教师教学变革新系统[J].教师教育研究,2025(1):27-33.
- [9] 朱永新.切实提高地位待遇增强教师职业吸引力[J].中国教育学刊,2018(4):1-4.
- [10] 李润洲.论教师的研究意识[J].教育科学研究,2021(3):5-10.
- [11] �毋改霞.教师创新能力发展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 2018 年“教与学国际调查”上海数据的分析[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6):137-147.

- [12] 黄涛,黄文娟,张振梅.人工智能何以赋能教师专业发展: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向[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25(1):35-44.
- [13] PETRILLI M J. Next-Gen classroom observations, powered by AI [J]. Education next, 2024(4):47-55.
- [14] 韩锡斌,李梦.智能时代教师教学能力进阶:从技术使用到人机共生[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24(3):31-38.
- [15] 岭大举办大湾区教育创新科技研讨会 探索生成式人工智能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应用潜力[EB/OL].(2025-04-08)[2025-04-11]. <https://www.ln.edu.hk/chs/news/press-releases/20250408/lingnan-university-hosts-inno-gba-seminar-exploring-the-potential-of-generative-ai-in-higher-education>.
- [16]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起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为教育打造新的社会契约[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22.
- [17] 李星龙,金鑫,唐松林.教师角色行为的时代嬗变——兼论人工智能时代的问题与选择[J].湖南社会科学,2021(5):144-152.
- [18] 苟渊,曹芸蕾.我国提高教师地位政策回顾及其政策体系构建的路径与策略[J].教师教育研究,2023(4):28-33.
- [19] 刘录护.科层制学校中教师职业发展的民族志研究——兼对教师专业发展研究的反思与比较[J].学术研究,2017(2):49-58.
- [20] 尹昊,王智超.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结构问题审思[J].中国教育学刊,2023(11):55-60.
- [21] WEI L. Teacher training credit bank management system based on blockchain technology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The example of the regional teacher training “Credit Bank” project [J]. The educational review, 2023(12):1915-1919.
- [22] 侯艳,薛海平.以数据驱动教师减负政策完善:英国中小学教师工作量监测[J].比较教育学报,2024(3):164-176.
- [23] 袁玉芝,白紫薇.我国中学教师主观社会地位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21(2):84-91.
- [24] 宋洪鹏.绩效考核中的教师参与:问题与建议[J].中小学管理,2022(12):31-34.
- [25] 靳玉乐,王潇晨,和学新,等.基础教育强国建设的多维思考(笔谈)[J].现代教育管理,2024(1):1-20.
- [26] 魏丽娜,张炜,林成华.激励学术创新: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交叉学科教师绩效评估体系及其经验启示[J].高教探索,2020(7):54-60.

(责任编辑 刘敏慧)

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下乡村幼儿教师 在地化教育实践困境与纾解^{*}

杜春娟^{1,2} 张新颖²

(1.杭州师范大学经亨颐教育学院,浙江杭州 310000)

(2.呼伦贝尔学院教育学院,内蒙古呼伦贝尔 021008)

[摘要] 基于生态系统理论的分析视角,探讨乡村幼儿教师在地化教育实践的多层困境及其破解路径。以内蒙古三地15名乡镇幼儿园教师为研究对象,通过深度访谈与分析发现:在微观系统层面,教师面临文化认同差异与职业认同危机,表现为语言沟通障碍、角色冲突加剧及内生动力不足;在中观系统层面,教育资源匮乏、社区参与脱嵌及教师工作负担过重显著制约教学创新与本土化实践;在外层与宏观系统层面,专业发展机会稀缺、政策支持缺位及城乡资源失衡进一步削弱教师存留意愿。基于多层系统的交互作用机制,提出“宏观资源配置优化—中观社区支持体系构建—微观教师素养提升”的协同干预框架,为促进乡村学前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

[关键词] 在地化教育; 乡村幼儿教师; 专业发展; 生态系统理论

[中图分类号] G6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5)06-0050-09

振兴乡村学前教育对实现教育公平和推动社会均衡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全球化和城市化的加速推进,乡村教育面临着资源流失、师资匮乏等多重困境,教师在地化发展更是面临严峻挑战。《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2020—2022》显示乡村幼儿园数量占比66.21%,但教师占比仅14.9%,乡村教师资源极度匮乏,存在显著缺口。教师资源短缺,且教师队伍不稳定,乡村教育的“离农”倾向加剧了乡村人才外流。在这样的背景下,乡村幼儿教师能否扎根乡土、实现教育实践与社区文化的深度融合,成为学前教育从“幼有所育”迈向“幼有优育”的关键。鉴于此,本研究

以内蒙古三地乡镇幼儿园为研究对象,通过深度访谈挖掘乡村幼儿教师的在地化困境及其生成逻辑,构建“动机—环境—需求”三维分析模型,揭示其在地化教育中的主体性困境。

在地化教育是近年来我国乡村教育研究的重点之一,已有研究集中于在地化教育的基本内涵^[1]、在地化教育的价值^[2]、在地化教育的实施路径^{[3]78}、“信息化+在地化教育”^[4]以及在地化教育的国际比较方面的研究^[5],研究涉及教师在乡村教育在地化实践方面发挥的作用、乡村教师在地化教育的价值^[6]、乡村教师在地化教育的现状和挑战^[7]以及乡村教师在地化的路径^[8]等。已有研究更多的是理论

* [基金项目] 内蒙古自治区少年儿童发展研究课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视域下儿童哲学的实践探索”(项目编号:NMGSEJDKT202402),呼伦贝尔学院校级课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背景下提升民族地区高校专业课程思政的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022SJB06)。

[收稿日期] 2025-05-27

[作者简介] 杜春娟,女,内蒙古呼和浩特人,杭州师范大学经亨颐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呼伦贝尔学院教育学院副教授。

思辨研究,实证研究不足;探讨的对象更多是中小学乡村教师的在地化研究,而乡村幼儿园教师的在地化研究关注不足,所以,这成为本文研究的切入点。

一、理论视角

生态系统理论由布朗芬布伦纳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是社会工作等领域常用理论之一。该理论把人类生存、成长于其中的社会环境(如家庭、社区、制度等)看作是一种社会性的生态系统,强调生态环境对分析和理解人类行为的重要性^[9]。该理论以微系统、中观系统、外层系统、宏观系统为框架,认为个体发展受多层环境影响。微系统指个体直接接触的环境,如家庭、学校等;中观系统由多个微系统组成,强调微系统间相互影响;外层系统虽不直接参与,但通过影响微系统间接影响个体;宏观系统则为社会文化价值系统,规范其他系统运行。生态系统理论的应用有助于深入理解乡村幼儿教师在地化教育困境,其职业认同、工作动力、专业发展等受多层环境制约,而学校、社区、政策等外部环境对教师在地化发展产生间接影响。生态系统理论聚焦于个体与其生活环境的相互影响和相互联系^[10]。从宏观的社会政策和文化环境,到中观的社区资源和支持体系,再到微观的幼儿园内部环境和个人因素,这些不同的系统层次共同构成了乡

村幼儿教师在地化实践的生态系统。通过这一理论视角,可以更全面地揭示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机制,构建更完整的分析框架。

二、研究设计

(一) 研究对象

以乡村幼儿教师为研究对象,旨在深入了解他们在乡村教育环境中的在地化实践与挑战。选择乡村幼儿教师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在于,他们是乡村教育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他们的在地化实践直接关系到乡村幼儿的成长与发展。通过半结构化深度访谈方法,通过目的性抽样,选取内蒙古东部Z市C镇Z幼儿园,内蒙古西部H市Y镇B幼儿园、内蒙古中部T市M镇Y幼儿园3所乡镇幼儿园作为研究对象,3所幼儿园均为公立幼儿园,旨在确保研究结果的地域代表性和典型性。幼儿园在地理位置上覆盖了内蒙古自治区的东部、中部和西部,能够反映出不同地区乡村幼儿教育的共性与特性问题。此外,通过选择3所幼儿园共计15名具有不同年龄、性别、教龄、学历和职称的教师,覆盖了乡村幼儿教师的不同教育层次,增强了研究结果的全面性和多样性,被试号码编码以“所属学校代码+教师姓氏拼音+性别(M代表男性,F代表女性)+教龄”的形式进行编码(详见表1)。

表1 乡村幼儿园访谈教师基本信息一览表

序号	姓名(代号)	幼儿园	性别	年龄	教龄	学历
1	ZCZWF03	Z市C镇Z幼儿园	女	28	3年	本科
2	ZCZLM07	Z市C镇Z幼儿园	男	34	7年	本科
3	ZCZNF15	Z市C镇Z幼儿园	女	42	15年	本科
4	ZCZHM05	Z市C镇Z幼儿园	男	29	5年	大专
5	ZCZWM02	Z市C镇Z幼儿园	男	25	2年	本科
6	HYBZF05	H市Y镇B幼儿园	女	31	5年	本科
7	HYBLF09	H市Y镇B幼儿园	女	37	9年	大专
8	HYBDM04	H市Y镇B幼儿园	男	32	4年	大专
9	HYBSF15	H市Y镇B幼儿园	女	45	15年	本科
10	HYBQM08	H市Y镇B幼儿园	男	33	8年	本科
11	TMYYF04	T市M镇Y幼儿园	女	27	4年	本科
12	TMYSM10	T市M镇Y幼儿园	男	36	10年	大专
13	TMYFF01	T市M镇Y幼儿园	女	23	1年	大专
14	TMYLM05	T市M镇Y幼儿园	男	30	5年	本科
15	TMYHF11	T市M镇Y幼儿园	女	39	11年	本科

(二) 研究过程

采用半结构化深度访谈的方法,从2024年1月到2024年6月,通过目的性抽样选择内蒙古不同盟市的3所乡镇幼儿园的15位教师作为访谈对象,15位教师在年龄、教龄、职称、学历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异,从而保证了访谈样本的多样性和代表性。首先,明确访谈的主题范围,从文化融合与身份认同、资源配置与专业发展、社区参与与合作、政策支持与激励机制、教育信息化与教学创新、教师教育情怀与职业发展6个方面设计访谈提纲,旨在全方位且深入细致地揭示乡村幼教工作者的工作状况及其需求。其次,在正式访谈之前实施预访谈,通过与3位经验丰富的乡村幼儿教师进行交谈,检验并优化访谈问题的准确性和访谈流程的合理性,确保其有效性和针对性。依据教师的反馈且与相关教师和专家交流后对部分访谈题目进行修改,形成正式的访谈提纲。再次,正式访谈阶段采用个体深度访谈的形式,每场访谈约30到40分钟,在征得被访者的同意后,进行全程录音,在每轮访谈结束后,将语音资料转录为文字资料,累积了大约十万字的访谈文本材料,所有访谈数据均经匿名化处理,受访者的身份与敏感信息被完全隐匿,以确保隐私与数据安全。后续补充信息时,研究团队通过电话、微信语音或视频等方式灵活联系,直至资料收集完毕。

(三) 资料分析

在资料分析方面,选取NVivo 14.0对资料进行编码和分析,在数据分析过程中,访谈数据、已有文献和研究者的经验三者持续进行循环互动^[11]。在分析访谈数据时,首先需系统审阅访谈材料,从中提取关键概念、主题与类型,并进行初步编码,从而构建概念化类属(详见表2);随后,将开放式编码所获得的概念进行对比分析,探索这些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形成更为综合的主轴编码,确立范畴化类属(详见表3);最后,通过选择性编码提炼出核心类属,该阶段作为研究的关键环节,不仅是对原始材料的高度整合,也为构建整体分析框架奠定基础(详见表4),较全面地体现了生态系统理论中的微系统、中观系统和外层系统、宏观系统对乡村幼儿教师的动机、环境、需求的影响,进而制约乡村幼儿教师在地化教育实践的动态过程(详见图1)。

表2 开放式编码(文本举例)一览表

概念化类属编号	概念化类属名称	频次	描述性文本举例
A1	语言障碍	2	语言和文化的障碍让我在与学生家长的沟通中感到格外困难,很多家长讲方言或者民族语言(ZCZNF15)
A2	文化理解不足	3	我发现自己在理解当地习俗方面有些困难,尤其对当地的民族文化了解比较少,使我在教学中难以自然地融入这些元素(HYBLF09)
A3	教师心理压力大	2	我常常感到筋疲力尽,不知道如何平衡这么多角色(HYBZF05)
A4	工作氛围较差	3	我们园工作氛围有些压抑,缺乏活力(TMYLM05)
A5	社区参与缺失	2	我们社区很少参与学校的教学活动,缺少互动(ZCZHM05)
A6	职业倦怠	2	长时间的工作压力让我感到有些倦怠,缺乏动力(TMYHF11)
A7	教学方法落后	2	我们的教学方法还停留在传统的讲授法,很少有机会接触新的教学理念和技术(HYBDM04)
A8	专业发展机会少	3	我感到自己的专业发展机会有限,缺乏进修和培训的机会(ZCZWM02)
A9	晋升需求强烈	1	晋升机会非常有限,让我感到前途渺茫(HYBQM08)

概念化类属编号	概念化类属名称	频次	描述性文本举例
A10	薪资待遇低	2	我们的工资水平相对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工作的积极性(TMYFF01)
A11	职业理想较低	3	我感到自己的职业理想和现实之间存在差距,这让我有些失望(TMYSM10)
A12	学校与社区合作不足	2	我们学校与社区从来没有合作过,对这个没有概念(ZCZNF15)
A13	身份多样化,角色平衡困难	3	既要保证教学的质量,又要进行班级管理,还要应付各种检查,长期超负荷运转让我身心俱疲(TMYLM05)
A14	工作动力不足	2	我感到自己的工作动力不足,缺乏激励(ZCZWF03)
A15	职业认同感低	2	自己对这个职业的认同感比较低,影响了我的教学热情(HYBZF05)
A16	自我认同缺失	1	我对自己的职业身份感到困惑,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够满足乡村教育的需求和期望(TMYHF11)
A17	教育资源匮乏	3	我们的教育资源非常有限,这限制了我们的教学方法和学生的学习体验(ZCZWF03)
A18	教师工作负担重	2	除了教学工作,我还要做很多行政和后勤工作,感觉压力很大(HYBQM08)
A19	教育使命感薄弱	1	我感到自己的教育使命感不够强,这让我在教学中缺乏方向和动力(TMYFF01)
A20	对培训机会的需求	2	我非常希望能有更多培训机会,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和职业素养(HYBZF05)
A21	对政策支持的需求	2	我希望政府能提供更多支持,彻底改善我们的工作条件和待遇(ZCZNF15)
A22	文化适应困难	3	语言和文化的障碍让我在与学生家长的沟通中感到格外困难,很多家长讲方言或者民族语言(ZCZNF15)

表3 范畴化类属与概念化类属的关系一览表

主轴编码编号	主轴编码名称	对应开放式编码(编号)
B1	工作动机的挑战	A1(语言障碍)、A2(文化理解不足)、A11(职业理想较低)、A13(角色平衡困难)、A14(工作动力不足)、A15(职业认同感低)、A16(自我认同缺失)、A19(教育使命感薄弱)、A22(文化适应困难)
B2	心理压力与职业倦怠	A3(教师心理压力大)、A6(职业倦怠)
B3	工作环境的困难	A4(工作氛围较差)、A5(社区参与缺失)、A7(教学方法落后)、A12(学校与社区合作不足)、A17(教育资源匮乏)、A18(教师工作负担重)
B4	内部发展需求	A8(专业发展机会少)、A20(对培训机会的需求)
B5	外部支持需求	A9(晋升需求强烈)、A10(薪资待遇低)、A21(对政策支持的需求)

表 4 概念化类属、范畴化类属和核心类属的关系一览表

核心编码 编号	核心维度	对应主轴 编码(编号)	核心内涵	对应生态系统理论层次
C1	动机维度	B1(工作动机的挑战)、B2(心理压力与职业倦怠)	教师内在动力不足、职业认同缺失、角色冲突与心理压力导致的倦怠	微观系统:个体直接互动的环境(如幼儿园同事、幼儿、家长)对教师心理状态的影响
C2	环境维度	B3(工作环境的困难)	外部环境制约(资源匮乏、社区脱嵌、教学方法落后、工作负担重)	中观系统:微观系统之间的联系与互动(如家园联系、园社关系)以及微观系统本身的环境特征(如幼儿园的物质条件、组织文化)存在问题
C3	需求维度	B4(内部发展需求)、B5(外部支持需求)	教师对专业成长(培训、晋升)和外部支持(薪资、政策)的迫切需求	外层系统和宏观系统:涉及更广泛的社会结构、政策和文化等因素对教师需求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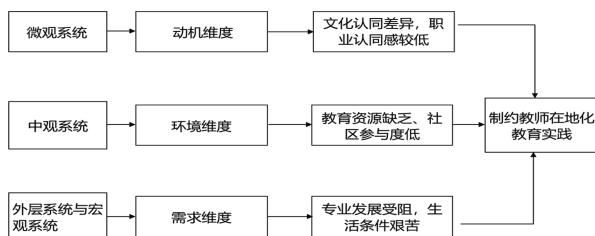


图 1 生态系统理论对乡村幼儿教师在地化教育的动态制约图

(四) 饱和度检验

在对前 13 位教师完成访谈并编码分析后,所有提取的编码均被现有理论框架覆盖,未出现新的概念或范畴,表明理论层面已趋于饱和。为进一步检验该结论,研究团队从调研学校中随机追加访谈 2 位教师,并对新增语料逐字转录、反复比对。结果同样未发现任何新增理论要素。据此可确认,即便引入随机样本,理论边界亦未拓展,饱和度得到进一步佐证,研究结论保持稳健可靠。

(五) 信效度检验

为减少个人主观偏见,本研究引入多主体视角协同分析,邀请熟悉在地化教育和学前教育的研究者 1 名,共同对访谈文本进行双人编码,对比归类一致性;请 1 名教育学专业的学者审核研究设计,检查访谈问题是否全面以及编码框架逻辑是否自洽等,以增强研究的客观性。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乡村幼儿教师在地化教育实践中面临多重困境,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和外层系统、宏观系统等不同层面和维度的困境影响着教师的工作动力、存留意愿和职业发展。

(一) 微观系统层面:文化认同差异,职业认同感较低影响乡村幼儿教师的工作动力

乡村幼儿教师在地化发展不仅受到外部环境的制约,更深受文化认同与职业认同的内在张力影响。文化隔阂与职业价值的贬低共同作用,形成了乡村教师在地化的双重困境。首先,文化认同差异加剧乡村幼儿教师在地化阻力。在民族地区,语言和文化差异成为教师与学生及家长沟通的主要障碍,这不仅增加了教学难度,还影响了教学内容的地方性特色。具体表现为非本地出生的教师对乡村地区的文化传承、社会习惯及生活方式理解不足,存在认知偏差。这种文化认同的差异和文化理解的不足,使得教师在与当地民众、家长及幼儿的沟通中受阻,难以将本土文化融入教育实践中。“语言和文化的障碍让我在与学生家长的沟通中感到格外困难,很多家长讲方言或者民族语言”(ZCZNF15)。此外,“我发现自己的理解当地习俗方面有些困难,尤其对当地的民族文化了解比较少,使我在教学中难以自然

地融入这些元素”(HYBLF09)。这种文化隔阂不仅阻碍了教师融入乡村社群,还增加了在地化教育实施的难度,使得教师在教学实践中感到力不从心,进一步削弱了他们的职业动力。其次,职业认同感低引发乡村幼儿教师角色冲突与心理压力。“我们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都经社会和文化的塑造,是社会建构的结果。”^[12]在此过程中,个体将群体的特征和价值观内化,形成对群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但是乡村幼儿教师普遍面临职业认同感低和自我认同缺失的双重困境。社会对幼儿教师的角色定位偏向“看护者”而非“专业教育者”,这种观念削弱了教师的职业尊严和自我价值感。同时,乡村幼儿教师由于环境和身份的特殊性,往往需要承担多重角色,如教育者、管理者、文化传承者等,如何实现这些角色之间的转换和平衡给教师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和工作负担。社会对教师的期望往往很高,但乡村幼儿教师的实际工作条件和社会地位可能并不理想,这种差距会导致教师感到挫败和不被理解,产生自我认同和职业认同的困惑。加上政策与现实的脱节以及缺少晋升机会进一步加剧了教师的职业迷茫,最终引发身份危机。“我常常感到筋疲力尽,不知道如何平衡这么多角色”(HYBZF05),“既要保证教学的质量,又要进行班级管理,还要应付各种检查和材料,觉得身心疲惫”(TMYLM05),“一些政策看起来很好,但在我们这样的环境中却难以实施或者跑偏”(HYBDM04),“我看不到自己的职业发展前景,这让我感到非常沮丧”(ZC-ZWM02)。再次,文化适应与职业价值贬低的恶性循环对乡村幼儿教师的职业动力产生了负面影响。文化隔阂削弱了乡村幼儿教师对乡村社群的归属感,使得乡村幼儿教师难以真正融入乡村生活,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职业孤立感。与此同时,职业价值不被认可则加剧了乡村幼儿教师的身份迷失,使他们对自身在乡村教育中的角色和意义感到困惑。这种双重困境不仅会直接影响乡村幼儿教师的教学质量,还会加剧教师流失速度。教师在尝试满足不同角色期望时会遇到冲突,对自己的职业身份感到困惑,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够满足乡村教

育的需求和期望。有教师反映:“我感到自己的努力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这让我有时感到不被理解和支持。”这种身份危机进一步削弱了乡村幼儿教师的教学动力,使他们对继续从事乡村教育产生动摇。随着乡村幼儿教师对职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的逐渐丧失,他们更倾向于离开乡村教育岗位,导致乡村幼儿教师流失现象日益严重。这种恶性循环不仅影响了乡村幼儿教育的整体质量,还对乡村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最终导致教学质量下降,影响学生发展。

(二) 中观系统层面:教育资源缺乏,社区参与度低,影响乡村幼儿教师的存留意愿

乡村幼儿教师的在地化发展受教育资源配置与社会支持体系影响。乡村教育发展的资源基础相对薄弱,资源匮乏,城乡之间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分配导致乡村幼儿园在师资队伍建设上存在天然劣势。一方面,教师教学类教育发展核心资源相对欠缺;另一方面,适配性、特色性教育资源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13]。首先,教学方法陈旧与本土化实践受阻,阻碍乡村幼儿教师的在地化发展。由于缺乏适配性资源,比如本土文化教具和社区合作支持,乡村幼儿教师在将乡土文化融入课程设计方面面临困难,教学方法比较单一,进一步削弱了教育创新的潜力,形成了资源不足、方法落后和质量下降的恶性循环。教学方法陈旧不仅限制了乡村幼儿教师的专业发展,也使得教育内容与乡村幼儿的实际生活脱节,难以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其次,硬件设施不足,设备陈旧制约乡村幼儿教师在地化发展。乡村幼儿园常常面临教材陈旧、教具缺乏、技术设备不足等问题,使得教师难以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和创造力,教师需要在有限的条件下尽力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导致教师对自己的职业能力产生怀疑。“我们教室里基本的教学设施设备都好多年了,包括各种玩教具也是,更新比较慢,我感觉有点跟不上当下幼教发展的步伐”(ZCZWF03),“由于缺乏先进的教学设备,我们很难为孩子们展示更广阔的世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孩子们的视野。即使是多功能教室有多媒体,也

不是每天都会被允许使用的,有的老师怕使用坏了,不敢用”(TMYSM10),“我们的教室缺少足够的教具、图书,特别是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室以及先进的信息化手段,这无形中影响了我们的教育质量,感觉和市里的幼儿园都有很大的悬殊,更不用提发达地区的幼儿园了”(TMYFF01)。再次,社区参与度低,园企合作缺失,影响乡村幼儿教师在地化发展。乡村学校与社区之间普遍存在“脱嵌”现象,大多乡村学校从设立、运营、管理、设施、人员、目的到课程、教学种种都与社区无关^[14]。政府未能制定有效的政策来鼓励和促进社区参与幼儿园教育活动,社区成员未能充分认识到参与幼儿教育的重要性,也不会积极投身于学校的发展和教育活动中,导致幼儿园与社区之间缺乏必要的联系和互动。“很多家长和社区工作者拥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知识,但是我们没能够有效地整合这些资源,比如可以邀请消防员、牙科医生、民族工艺传承人等专业人员为幼儿普及基本的知识,和幼儿进行互动等”(TMYSM10)。幼儿园和企业合作的不足限制了社区参与的潜力和效果,影响乡村幼儿教师在地化的社会支持度。缺乏园企合作导致幼儿教育资源单一,社区对学前教育的认同度和参与度降低,进而影响幼儿园教育教学质量和社会支持度。“我们曾尝试与当地一家农业企业合作,希望他们能为孩子们提供实地观察植物生长的机会,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合作并没有实现。如果这样的合作能够成功,不仅能让孩子们学到更多关于自然和农业的知识,同时增强社区对幼儿教育的支持和认同”(HYBQM08)。

(三)外层系统和宏观系统层面:专业发展受阻,生活条件艰苦,影响乡村幼儿教师的职业发展

乡村幼儿教师专业发展机会匮乏、生活条件艰苦以及晋升机制缺位,成为制约乡村幼儿教师在地化的重要因素,这些问题相互交织,形成了复杂的困境网络,使得乡村幼儿教师难以稳定扎根、长期执教。首先,乡村幼儿教师专业发展机会少是影响其在地化的突出诱因。一般来讲,乡村幼儿教师在进修培训、观摩学

习等方面比较欠缺,难以获得与城市幼儿教师同等的专业发展机会,专业成长机会缺乏限制了乡村幼儿教师的专业发展和教学方法的更新;社会认可度较低,影响了乡村幼儿教师的职业自豪感和归属感。“我们很少有机会参与那些能让我们接触最前沿教育理论的研讨会,这让我们感觉自己与教育界的前沿发展是脱节的”(ZCZWM02),“我感到自己的教学方法还停留在几年前,缺乏更新的途径和资源,这让我经常怀疑自己的教学是否还适用于今天的孩子们”(TMYHF11)。专业发展上的匮乏不仅制约着乡村幼儿教师的教学水平以及他们的创造力的发挥,同时,也使得他们难以有效地接纳并实施本地化的教育观念。长此以往,会逐渐丧失对本地化教育事业的热忱和信心。其次,生活环境和薪资待遇成为影响乡村幼儿教师在地化的直接原因。偏远地区生活和工作条件艰苦,交通不便,生活服务设施缺乏,增加了乡村幼儿教师的生活负担。相对而言,乡村工作环境较为艰苦,居住条件较差,这无疑成为乡村幼儿教师无法实现在地化的又一关键因素。与城市相比较,乡村所面临的交通不便、生活设施不够完备、社会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等问题均有可能对乡村幼儿教师的日常工作及生活造成诸多困扰。“尽管我爱我的工作和孩子们,但生活上的闭塞和挑战以及乡村孩子父母观念的落后让我无数次考虑过是否应该继续留在乡村教书”(TMYSM10)。此外,乡村幼儿教师的薪资水平以及职业发展空间往往不及城市幼儿教师,职业期待无望使得众多幼儿教师难以长时间稳定地坚守在乡村执教岗位,严峻的工作环境及其相关的生活困境不仅会对乡村幼儿教师的身心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同时还会加剧乡村幼儿教师的流失问题,进而严重阻碍了在地化教育事业的深入推展。有教师表示,“我担心自己的职业发展受到限制,不仅影响我的工作动力,也让我对自己从事教育的初心和承诺感到迷茫”(ZCZWM02)。再次,晋升机制缺位与机会稀缺,加剧了乡村幼儿教师职业发展困局。乡村幼儿教师普遍面临晋升需求强烈但机会有限的困境。晋升机制不透明,教师对标准和流程

缺乏了解,导致职业发展迷茫,努力得不到认可。同时,乡村幼儿园规模小、岗位少,晋升机会稀缺,教师需等待多年,职业动力被削弱。此外,教师晋升周期长,长期停滞不前,缺乏职业目标和动力。这种晋升困境不仅影响乡村幼儿教师的职业动力,还导致教师职业倦怠,甚至影响职业规划,使其难以设定长期发展目标,对乡村幼儿教育的整体质量产生负面影响。有教师反映,“我们园没有编制,已经3年没有招到新老师了,都是这些老面孔,年轻人没有人愿意来”(TMYYF04),“我感觉自己的职业规划完全被限制住了,不知道未来会怎样”(TMYSM10)。

四、研究建议与反思

为有效破解乡村幼儿教师在地化教育实践中遭遇的困境,本研究从宏观、中观和微观3个层面提出相应的干预策略,以期为乡村幼儿教育的振兴提供全方位的解决方案。

(一) 宏观层面:优化资源配置,确保乡村幼儿教师“下得去”

第一,政策支持和立法保障。制定相关政策和法规,优先保障乡村幼儿教师的权益,确保他们能够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发展机会,这也是提升乡村教育整体水平的基础。第二,提高乡村幼儿教师待遇,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增加乡村幼儿教师的工资和福利,实施特岗计划,以吸引和激励更多优秀教师到乡村任教。改善乡村幼儿教师的居住和交通条件,减轻非教学工作负担,创造更有利于教学的环境。第三,优化乡村幼儿教师职称评定机制和激励反馈机制。确保乡村幼儿教师职称评定过程的公正性和透明性,加大对优秀幼儿教师的表彰和奖励,及时解决教师在教学和生活中遇到的问题。第四,促进城乡教育资源均衡分配。通过政策倾斜确保教材、教具、技术设备等资源在城乡之间公平分配,争取政府和社会的资助和支持,改善乡村教育硬件设施,如更新教材、增加教具、引入多媒体教学设备等。建立城乡学校之间的合作和资源共享机制,通过教师交流、教学资源共享等方式,提升乡村幼儿园的教育资源。第五,开发和利用本地资源,将乡村的自然环境、丰富的社区故事和文化传统融

入教学内容中,鼓励乡村幼儿教师进行创新和探索,开发适合乡村幼儿园的教育教学方法,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创造出有趣且富有教育意义的教学活动。

(二) 中观层面:健全乡村幼儿园支持体系,增强教师的社区归属感,确保乡村教师“留得住”

首先,建立幼儿园与社区紧密合作机制。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加强与当地社区的联系和沟通,通过制定相关政策,鼓励社区参与乡村幼儿园的发展。学校可以通过定期召开社区会议、举办教育论坛,邀请社区成员参与幼儿园教育活动的策划和实施,共同讨论教育议题,收集社区的意见和建议。其次,开展社区教育项目,提高社区对乡村幼儿教育的参与度和支持。可以设立社区教育基金,支持社区成员开展与幼儿园教育相关的项目和活动,如社区故事分享会、文化节庆活动、环境保护项目等。再次,加强幼儿园与社区的互动交流,鼓励乡村幼儿教师深入了解社区的资源和需求。通过组织社区服务活动、实地考察和访谈等,让教师与社区成员进行深入交流,增进相互间的理解。最后,利用社区资源,丰富教学内容和方法。幼儿园应结合当地特色,开发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课程,如农牧业知识、地方历史、民族艺术等,将本土文化融入教学。同时,应联合社区进行实地考察,了解当地的生产生活、民族文化等,使幼儿对本土文化、地域文化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和认同。有教师认为,“社区中有很多宝贵的资源,如历史遗迹、自然景观等,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些资源,让孩子们在实践中学习和成长”(ZCZWM02)。

(三) 微观层面:提升乡村幼儿教师的教育情怀,确保乡村幼儿教师“教得好”

首先,加强乡村幼儿教师与本土文化的融合。加强相关培训,提升教师对本土文化价值的认识和尊重。通过组织文化工作坊、讲座和实地考察等活动,让幼儿教师更深入地了解和体验乡村文化,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如组织教师参加节日庆典、地方艺术工作坊等,以增强他们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建立社会支持系统。通过本地资深教师与新教师结对,

分享经验,加深对本土文化的理解,帮助新教师更快地融入环境。这些措施可以促进乡村幼儿教师与乡村社群的融合,为在地化教育的顺利实施打下坚实的基础。其次,强化乡村幼儿教师的职业理想,提升教育情怀。教育情怀是教师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对学生的关爱以及对教育工作的责任感,更是支持乡村教师留任的内生动力,因此,乡村教师应主动坚定信念,厚植乡村教育情怀,增强职业归属感,使教师认识到自己工作的价值,从而增强对乡村教师职业的高度认同。教师可通过不断学习和自我提升,增强对乡村教育事业的责任感,实现价值追求。“通过乡土礼俗资源挖掘、乡土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乡土教材校本开发等实践路径强化自身对乡村教育的心身投入、对乡村社会的深情眷恋和无私奉献。”^[15]再次,提升乡村幼儿教师的专业素养。乡村幼儿教师应当积极参与各类教学研讨活动,如听课、评课、磨课等,与同行交流心得体会,汲取资深教师的丰富教学智慧,助力专业成长,通过集体备课、虚拟教研室等途径构建学习共同体,提升职业素养,实现知识、能力的全面提升,使教师能够与幼儿在情感上产生共鸣,在价值观上实现共享,在思想上达成共振,共同构建起富有地方特色的教育环境。最后,注重职业发展和个人成长。利用在线教育平台、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手段,为乡村幼儿教师提供丰富的教学资源和学习机会,促进乡村幼儿教师职业发展和个人成长。鼓励乡村幼儿教师用现代化教学观念武装自己,提升个人职业竞争力,为未来的职业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本研究受限于调研样本来源和研究方法,未来将扩大样本容量,扩展研究范围,结合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提高研究质量及研究结果的普适性。只有努力探索乡村幼儿教师在地化教育,为乡村儿童提供更优质的教育,才能促进教育公平,实现教育现代化的目标。

[参考文献]

- [1]王红,邬志辉.国外乡村教育生态转型的在地化实践[J].比较教育研究,2019(9):98-105.
- [2]陈时见,刘雨田.乡村学校在地化教育的价值与路径[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21(5):75-80.
- [3]SOBEL D. Place-based education: Connecting classrooms and communities [M]. Great Barrington, USA: The Orion Society, 2004.
- [4]韦恩远,肖菊梅.“数字化+在地化”:乡村教育发展的出场语境、运行机理与创新路径[J].现代教育科学,2023(2):34-40+46.
- [5]YEMINI M, ENGEL L, BEN SIMON A. Place-based education—a systematic review of literature [J]. Education review, 2025(2):640-660.
- [6]容中逵,阴祖宝.乡村教师在地性的意义澄清与实现图景[J].教师教育研究,2023(3):19-24.
- [7]李伟,邬志辉.国外乡村教师教育变革的在地化实践[J].比较教育研究,2023(3):22-31.
- [8]周晔,徐好好.乡村教师在乡村振兴中的应为与可为[J].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2(1):10-19.
- [9]师海玲,范燕宁.社会生态系统理论阐释下的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2004年查尔斯·扎斯特罗关于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的新探讨[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94-97.
- [10]付立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下的社区矫正与和谐社区建设[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9(4):125-128.
- [11]李琳琳.时不我待:中国大学教师学术工作的时间观研究[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7(1):107-119+190.
- [12]丁学森,邬志辉,夏博书.乡村教育在地化变革的意蕴与路径[J].教育理论与实践,2023(25):22-27.
- [13]周均旭,常亚军.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教育转型衔接的三重向度与现实进路[J].现代教育管理,2024(5):39-49.
- [14]丁学森,邬志辉,薛春燕.论我国乡村教育的潜藏性危机及其消解——基于在地化教育视角[J].教育研究与实验,2019(6):19-23.
- [15]邹太龙.新生代乡村教师的三重身份与因应对策[J].教育科学研究,2023(10):51-56.

(责任编辑 师语)

校长变革型领导对教师工作投入的影响^{*}

张志行¹ 梅文倩²

(1.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商学院,江苏南京 211200;
2.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江苏南京 210023)

[摘要] 校长是各级学校的领导核心,其领导风格对教师的行为有重要影响。根据工作要求—资源理论、生涯建构理论,以变革型校长、教师工作投入为研究对象,以教师生涯适应力为中介变量,对华东地区某市各学段教师进行调查发现:变革型校长与教师生涯适应力、工作投入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教师生涯适应力正向影响其工作投入水平,生涯适应力在变革型校长对教师工作投入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这些发现为理解校长领导风格如何通过影响教师的生涯适应力进而影响其工作投入提供了新的视角,并对教育管理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 变革型领导; 校长; 教师; 工作投入; 生涯适应力

[中图分类号] C9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5)06-0059-07

随着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我国已成为教育大国并向教育强国迈进。在国际PISA测试中,我国学生的表现水平不断提升,这不仅展示了我国教育改革的显著成效,也凸显了中小学教育在人才培养中的核心地位。广大教师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的全情投入和辛勤工作对于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影响。然而,研究显示,近年来教师的工作负担日益加重,这可能对人才培养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关注并解决教师职业倦怠问题,提升他们的工作投入水平,已成为社会和国家关注的焦点。

过去,许多研究从心理资本理论的角度探讨了教师个人因素对其工作投入的影响。而

近年来,学者们开始将研究视角转向外部因素,特别是从变革型领导的角度来分析其对教师工作投入的影响。变革型领导以其独特的领导风格和行为,对教师产生积极的影响。他们通过愿景激励和个性化关怀,关心教师的成长,并以自己的职业发展经验为榜样,为教师描绘出美好的职业发展前景,从而激发教师对职业生涯的好奇心和自信心,进而转化为对工作的积极投入。

生涯适应力作为一种融合了内部和外部特征的能力,在变革型领导对教师的影响以及教师自身的工作过程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关于生涯适应力在变革型领导影响教师工作投入中的作用,目前尚缺乏深入的研究。本研究旨在探讨这一问题,以期为教育领域提

* [基金项目]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差异化变革型领导与员工亲组织不道德行为的研究”
(项目编号:2022SJB0516)。

[收稿日期] 2025-02-15

[作者简介] 张志行,男,江苏南京人,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商学院副教授。

梅文倩,女,江苏南通人,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

供新的视角和启发。

一、理论与假设

(一) 校长变革型领导与教师工作投入

变革型领导风格的概念首先由美国政治社会学家 Burns 提出的,后来美国心理学家 Bass 对其进行改造,提出“变革型领导的概念”,指的是领导者以组织愿景为导向,激发下属对工作意义的认知和内在需要,提升下属的能力和价值,建立组织信任关系,使下属重视组织利益并充分发挥潜能去实现^[1]。李超平、时勘认为,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变革型领导具有愿景激励、领导魅力、德行垂范、个性化关怀的特征^[2]。在学校领域,变革型校长通过创造和宣扬愿景,进行行为表率和关怀下属来优化学校成员互动,从而使教师积极承担责任,对工作更加投入。工作投入最早是 Kahn 提出的,指的是个体在工作角色表现中使用不同程度的自我,包括生理上、认知上和情感上的^[3]。另外,也有学者将工作投入和工作研究领域的其他内容进行关联研究,比如C.Maslach、W.B.Schaufeli、M.P.Leiter 认为工作投入度高的个体能够感知到更强的工作卷入度,反之则会产生倦怠^[4]。Schaufeli 着重于描述和归纳工作投入的特征,他认为工作投入是一种充满活力和成就感、与职业相关的情感状态和认知状态^[5]。我国学者徐艳、焦海涛认为工作投入是个体对当前工作的重视程度以及心理认同性,并有意愿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工作之中^{[6][7]}。李锐和凌文辁提出工作投入具有弥散性和持久性的特点^[8]。在本研究中,教师工作投入是一种与职业倦怠相对的,在心理、生理、情感上对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积极投入。

E.Demerouti 提出的工作要求—资源理论 (Job Demand–Resources Theory)认为工作包含工作要求和工作资源两个特征^[9]。A.B.Bakker、E.Demerouti认为工作要求是工作对员工在生理、心理、工作关系、工作任务等各方面的要求,包括工作负荷、时间压力、人际关系压力、情绪劳动、工作家庭冲突等,引发员工的身心资源消耗^[10]。从学校领域来看,齐亚静等研究得出,中小学教师常见的工作要求分为阻碍

型和挑战型两种^[11]。“工作投入”即是一种“工作要求”,需要教师付出心理、生理、情感上的消耗,应对学校中充满挑战的教育教学任务。A.B.Bakker、E.Demerouti 认为工作资源是特定工作情境为员工提供的在物质、心理、组织和社会等方面的支持,包括工作自主权、领导同事支持、职业发展、工作反馈、组织公平等,促进员工成长发展并实现工作目标^[10]。当工作要求与工作资源之间的关系失衡,势必会削弱教师的职业健康,从而引发教师的消极工作问题。从变革型领导视角来看,变革型校长对于教师的愿景激励、个性化关怀等即是一种“工作资源”。由于变革型校长以其独特的领导风格为教师描绘美好的职业发展愿景,提升教师对职业的价值感和认同感;同时以其丰富的生涯发展经验为教师职业生涯发展提供个性化关怀与指导,因此变革型校长这一工作资源具有认知资源和情感资源的双重特性。根据工作要求—资源理论中的“增益—损耗”双路径假设,特定的工作资源作为一种激励资源,能够提升员工的工作投入以实现企业的目标;且从毛晋平等、杨慧进行的实证研究来看,变革型领导对员工工作投入有正向预测作用^{[12][13]}。基于以上内容,本研究推测变革型校长作为一种特殊的工作资源,能够提升教师的工作投入,假设如下:

H1: 变革型校长正向影响教师工作投入。

(二) 生涯适应力的中介作用

生涯适应力是生涯建构理论的一个主要观点,来源于 Super 早期的生涯发展理论,后来 Super 提出了生涯成熟度,这一概念在后期研究中逐渐变化,被称为生涯适应力。2005 年,Savickas 从生涯控制、生涯关注、生涯好奇、生涯自信 4 个维度出发对生涯适应力进行了进一步的定义,即它是使个体在职业发展过程中顺利解决陌生的、复杂的和模糊的问题的能力与状态^[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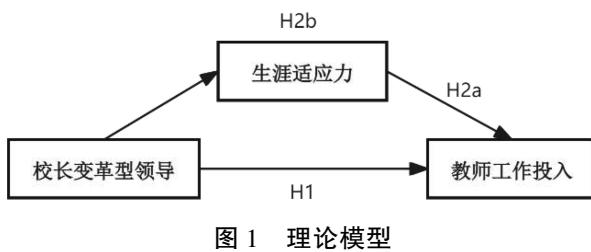
以生涯适应力为中介变量研究在近几年才集中出现。以教师为对象的研究中,朱艳对中小学教师生涯适应力、职业使命感、工作投入、工作倦怠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表明生涯

适应力与工作投入成显著正相关,且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工作投入,生涯适应力在职业使命感和工作投入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15];张玉琴等以幼儿教师为研究对象,研究情感承诺在生涯适应力对工作投入影响中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幼儿园教师生涯适应力既可以直接正向影响工作投入,也可以部分通过情感承诺发挥间接影响^[16];兰玉娟的研究表明,变革型领导对公务员的生涯适应力具有正向影响,生涯适应力对公务员绩效有正向影响,并且生涯适应力在变革型领导对公务员绩效影响的中介效应显著^[17]。因此,本文推测在学校领域,教师的生涯适应力对工作投入有正向影响,且在变革型校长对教师工作投入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2a:生涯适应力正向影响教师工作投入。

H2b:生涯适应力在变革型校长对教师工作投入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本文的假设理论模型如图 1 所示。



二、研究设计

(一)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以华东地区某市各学段教师为研究对象。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400 份,回收问卷 350 份,其中有效问卷 319 份,问卷有效率为 91%。在有效样本中,男女比例均衡,分别占比 45.1%、54.9%;学历上,本科学历教师占比最大,为 68%;教龄上,教龄在 1—10 年和 11—20 年的教师占比较多,分别是 47.6%、33.5%;学段上,小学、初中、高中教师分布较均衡,分别是 29.5%、32.6%、29.8%;岗位上,学科教师和教研岗位教师较多,占比分别是 67.7%、23.8%,管理岗位仅占 8.2%。

(二) 研究工具

变革型领导:本研究采用曹科岩^[18]修订的量表,包含德行垂范、愿景激励、领导魅力、个性化关怀 4 个维度共 18 题;采用李克特 5 点计分法,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依次计 1—5 分。在本研究中,该量表克隆巴赫系数为 0.92。

教师工作投入:本研究采用 Schaufeli 构建、张轶文等学者在国内施测的 UWES 量表(中文版)^[19],包含专注、活力、奉献三个维度共 17 题;采用李克特 5 点计分法,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依次计 1—5 分。在本研究中,该量表克隆巴赫系数为 0.93。

生涯适应力:采用的是 Savickas 编制、Hou Zhijin 等^[20]修订的量表,包含生涯关注、生涯控制、生涯好奇、生涯自信 4 个维度共 24 题;采用李克特 5 点计分法,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依次计 1—5 分。在本研究中,该量表克隆巴赫系数为 0.95。

三、数据分析与结果

(一)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本研究调查所发放的问卷中包含三套量表,共 59 道题,为了检验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而对研究结果产生影响,使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法。结果如表 1 所示,说明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表 1 Harman 单因子检验结果

观察对象	数值
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数量	11
第 1 个因子解释变异量的程度	33.124% (<40%)

(二) 验证性因子分析

为了检验假设模型是否结构良好,使用 AMOS26.0 对变革型校长、教师工作投入、生涯适应力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并比较各模型的拟合结果。如表 2 所示,三因子模型拟合度良好($\chi^2/df < 3$, RMSEA < 0.1),说明本研究所选取的 3 个变量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能够进行下一步研究。

表 2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模型	χ^2	df	χ^2/df	RMSEA	CFI	TLI
三因子模型	4086.880	1649	2.478	0.068	0.770	0.761
二因子模型	5505.891	1651	3.335	0.134	0.636	0.623
单因子模型	6075.818	1652	3.678	0.092	0.582	0.568

表 3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M	SD
性别	1.55	0.498
学历	1.92	0.560
教龄	2.98	1.681
学段	2.84	0.946
学科	4.3	3.635
职称	3.39	1.262
岗位	1.41	0.652
变革型校长	3.53	0.770
工作投入	3.37	0.856
生涯适应力	3.44	0.826

表 4 皮尔逊相关分析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	1									
2		0.172 ** 1								
3			0.059 0.075 1							
4				0.343 ** -0.069 1						
5					-0.045 0.048 0.120 * -0.118 * 1					
6						0.009 0.157 ** 0.719 ** -0.052 0.132 * 1				
7							0.04 -0.003 0.531 ** -0.01 0.046 0.307 ** 1			
8								-0.037 0.018 -0.104 0.046 -0.158 ** -0.039 -0.072 1		
9									0.01 0 -0.016 0.037 -0.091 -0.081 0.038 0.588 ** 1	
10										-0.023 -0.049 -0.035 -0.048 -0.121 * -0.096 0.03 0.665 ** 0.510 ** 1

注:1—10 分别指的是性别、学历、教龄、学段、科目、职称、岗位、变革型校长、工作投入、生涯适应力,* 表示 $p < 0.05$, ** 表示 $p < 0.01$ 。

(四) 假设检验

第一, 主效应检验。为了检验变革型校长、工作投入、生涯适应力这三个变量两两之间是否存在线性关系, 在 SPSS26.0 中进行分层回归分析, 构建了模型 1—8 进行验证, 结果如表 5 所示。模型 4 中, 变革型校长对教师工作投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beta = 0.67, p < 0.001$), 假设 H1 得到验证。模型 6 中, 生涯适

应力对教师工作投入有显著正向影响 ($\beta = 0.523, p < 0.001$), 假设 H2a 得到验证。同时, 由于在模型 7、8 中加入中介变量生涯适应力后, 变革型校长对教师工作投入的影响从 0.67 下降到 0.531, 推测中介变量在变革型校长对工作投入的影响中起的是部分中介效应, 以下将利用 PROCESS 进行进一步检验。

表 5 分层回归分析表

自变量 \ 因变量	生涯适应力				工作投入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性别	-0.048	-0.002	-0.002	0.04	-0.002	0.023	0.023	0.041
学历	0.002	-0.022	0.02	-0.003	0.02	0.019	0.019	0.001
教龄	0.021	0.065	0.032	0.073	0.032	0.021	0.021	0.06
学段	-0.057	-0.066	0.019	0.01	0.019	0.048	0.048	0.023
科目	-0.027 *	-0.004	-0.019	0.002	-0.019	-0.005	-0.005	0.003
职称	-0.085	-0.121 **	-0.089	-0.122 **	-0.089	-0.045	-0.045	-0.099 *
岗位	0.069	0.083	0.065	0.078	0.065	0.029	0.029	0.062
变革型校长		0.726 ***		0.67 ***				0.531 ***
生涯适应力						0.523 ***	0.523 ***	0.191 ***
R ²	0.031	0.472	0.020	0.368	0.020	0.267	0.267	0.386
Δ R ²	0.009	0.458	-0.002	0.352	-0.002	0.248	0.248	0.368
F 值	1.429	34.608	0.899	22.592	0.899	14.103	14.103	21.605

注: * 表示在 $p<0.05$ 水平(双侧)上显著; ** 表示在 $p<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 *** 表示在 $p<0.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

第二,中介效应检验。在 PROCESS 中进行中介效应的分析,把变革型校长作为自变量,工作投入作为因变量,人口统计学变量中的性别、教龄等作为控制变量,生涯适应力作为中介变量,选用 model 4,用 Bootstrap 法抽样 5 000 次,置信区间为 95%,结果如表 6 所示,变革型校长对工作投入的直接效应在 95% 置信区间的上下限分别为 0.5545、0.7533,不包含 0,说明变革型校长对工作投入的直接影响

是显著的,假设 H1 得到进一步验证。同样的,生涯适应力的中介作用在 95% 置信区间的上下限分别为 0.0550、0.2452,不包含 0,说明生涯适应力的中介效应是显著的,假设 H2b 得到验证。同时,由于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在 95% 置信区间的上下限之间都不包含 0,说明生涯适应力在变革型校长对工作投入的影响中起到的是部分中介效应。

表 6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效应值	BootSE	P 值	BootLLCI	BootULCI
总效应	0.6539	0.0505	0.0000	0.5545	0.7533
直接效应	0.4966	0.0664	0.0000	0.3659	0.6273
间接效应	0.1573	0.0538	-	0.0550	0.2452

为了探究中介效应的大小,接着在 AMOS28.0 中进一步检验了中介模型,并计算了各路径系数的大小,结果如图 2 和表 7。变革型校长对工作投入在 0.01 水平上有预测作用,系数为 0.45;变革型校长对生涯适应力在 0.01 水平上有显著预测作用,系数为 0.66;生涯适应力对工作投入在 0.01 水平上有显著预测作用,系数为 0.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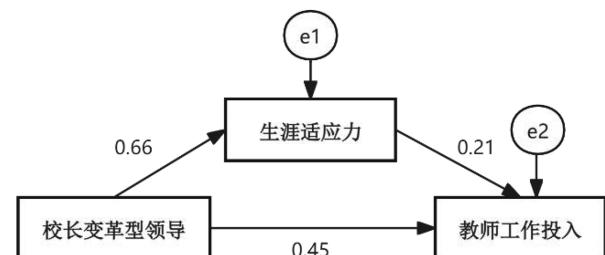


图 2 中介模型各路径标准化系数示意图

根据表 6,生涯适应力的中介作用在 95%

置信区间的上下限不包含 0, 说明生涯适应力的中介作用是显著的。同时,中介效应占总效

应的比值为 0.653, 说明生涯适应力在变革型校长对工作投入中起到的是部分中介作用。

表 7 中介模型校正偏差百分位 Bootstrap 法结果

参数	估计值	上限	下限	P 值
中介效应	0.934	0.754	1.110	0.001
总效应	1.430	1.291	1.560	0.001
比值	0.653	0.557	0.759	0.000

四、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 研究结论

研究从已有的对教师工作投入、生涯适应力的研究出发,创新性地引入了变革型领导的概念,以工作要求—资源理论为主要理论支撑,从外部视角出发去探究变革型校长这一教育类型的领导对教师工作投入的影响,通过对 319 份有效样本的数据分析发现:变革型校长对教师工作投入有显著正向影响,生涯适应力对教师工作投入有显著正向影响,生涯适应力在变革型校长对教师工作投入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二) 研究启示

第一,随着管理学理论的发展,学者在变革型领导的概念上不断提出了新的领导类型概念,但是从本研究的结论来看,在学校领域,变革型校长对变革学校、管理教师、提升工作投入水平依然发挥重要的作用。因而在实践领域,校长要向变革型领导的方向转变,规范自身德行并成为教师的榜样,向教师宣传学校发展理念及教师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在教师的工作、生活上提供个性化关怀措施,以此来增强教师的工作动能。

第二,从描述性统计分析的结果来看,教师工作投入平均得分 ($M = 3.370$) 水平最低,尤其是个人精力的投入水平较低。当今对于教师的要求越来越多,教师的精力还要投入到教育教学之外大量琐碎的工作中,而当前的一些招聘方式不能满足教师个人的工作资源需求。低水平投入是否反映教师在这种背景之下所面临的工作时间、精力被挤占的沉默困境? 若要真正提高教师在学校核心工作即教育教学上的投入水平,势必需要依托工作要求—资源理论,在对教师提出工作投入要求的

同时,向教师提供相应的物质保障和个人发展的资源,避免教师陷入盲目投入精力和时间的陷阱中。

第三,教师职业生涯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根据生涯建构理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生涯适应力的发展,即教师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中整合自身作为教师的个人特质和教师角色的社会特性。在学校领域,变革型校长要认识到教师的生涯适应力作为一种可塑资源,对教育教学工作效能提高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其领导行为和风格对教师生涯适应力实现正向影响。同时,对教师来说,较高生涯适应力水平可以减少或避免诱发低成就感、情绪内耗等不良工作状态,从而有助于促进教师在学校领域对个人发展和实现学校共同目标的工作投入。在深化学校改革的同时,也要不断加强对教师的人力资源管理,重视和培养教师的生涯适应力,引入科学的生涯发展资源,帮助教师提升生涯关注、生涯控制、生涯好奇、生涯自信水平,从而在各个职业发展阶段做出恰当的职业决策。

[参 考 文 献]

- [1] BASS B M. Theory of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redux [J].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1995 (4): 463-478.
- [2] 李超平,时勘. 变革型领导的结构与测量 [J]. 心理学报, 2005 (6): 97-105.
- [3] KAHN William A. Psychological conditions of personal engagement and disengagement at work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0 (4): 692-724.
- [4] MASLACH C, SCHAUFELI W. B, LEIITER MP. Job burnout [J].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2001 (1): 397-422.

- [5] SCHAUFELI W B. The measurement of work engagement with a short questionnaire: A cross – national study [J].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 2006(4) :701–716.
- [6] 徐艳.企业员工工作投入的问卷编制以及现状调查 [D].苏州:苏州大学,2005.
- [7] 焦海涛.企业员工工作投入的相关因素研究 [D].曲阜:曲阜师范大学,2008.
- [8] 李锐,凌文辁.工作投入研究的现状 [J].心理科学进展 , 2007(2) :366–372.
- [9] DEMEROUTI E, BAKKER A B, NACHREINER F, et al. The job demands – resources model of burnout [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 2001 (3) :499–512.
- [10] BAKKER A B, DEMEROUTI E. Job demands – resources theory ;Taking stock and looking forward [J].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Health Psychology , 2017(3) :273–285.
- [11] 齐亚静,伍新春,胡博.教师工作要求的分类——基于对职业倦怠和工作投入的影响研究 [J].教育研究 , 2016(2) :119–126.
- [12] 毛晋平,周卓钊,吴逸飞.变革型领导、真诚型领导与中小学教师工作投入关系的比较研究 [J].教师教育研究 , 2017(2) :48–54.
- [13] 杨慧.变革型领导行为对教师工作投入的影响研究 [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22.
- [14] SAVICKAS M L. Career adaptability: An integrative construct for life – span , life – space theory [J]. The Career Development Quarterly , 1997(3) :247–259.
- [15] Hou Zhijin, LEUNG S. Alvin, LI Xu. Career adaptabilities scale – China form: Construction and initial validation [J].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 2012(3) :686–691.
- [16] 朱艳.中小学教师生涯适应力与职业使命感、工作投入及职业倦怠的关系研究 [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20.
- [17] 张玉琴,成利新.幼儿园教师生涯适应力对工作投入的影响:情感承诺的中介作用 [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5) :55–60.
- [18] 兰玉娟.领导风格对公务员生涯适应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20.
- [19] 曹科岩.变革型领导与初中教师组织承诺关系研究 [D].广州:华南师范大学,2007.
- [20] 张轶文,甘怡群.中文版 Utrecht 工作投入量表 (UWES) 的信效度检验 [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 2005(3) :268–270.

(责任编辑 光 翟)

“思想政治教育元宇宙”三维钩深：内涵、界域及进路^{*}

胡 华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茂名 525000)

[摘要] 元宇宙表征的嵌入能力、关系塑造以及递归生成，体现了人类社会的各类事物无法脱离人的实践活动，意味着唯物主义作为实践的基本原则重在强调具体性、客观性与边界性对人活动的规范性意义。作为高度智能并与现实世界深度耦合的数字空间，元宇宙为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技术支撑与社会场域，使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由虚拟结合走向融创共生。当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掌握运用虚实共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新形态时，要审慎应对元宇宙引发的思想政治教育场景变革以及意识形态、网络成瘾、数据隐私风险，处理好现实生活与虚拟空间、元宇宙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人与元宇宙技术之间的关系，积极利用元宇宙助推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思想政治教育元宇宙；人机协同；主流意识形态；数字化转型

[中图分类号] D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5)06-0066-09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比之前的社会形态更加有效地应用技术人工物，从而使社会自身得到有效进步”^{[1]280}。在数智技术的促动下，虚实贯通的元宇宙成为思想政治教育转型升级的重要载体。作为数智技术聚合而成的新型社会时空结构，元宇宙通过整合虚拟现实、数字孪生、区块链等数字技术而被视为数字化技术发展的崭新样态，深刻影响着人类的交往方式和思维观念。元宇宙作为对传统“虚拟现实”的技术升级，本质上是用数字信息技术复制现实世界得出的镜像与愿景^{[2]32}，它将人类社会的文明信息资源和自然物质要素联结于数字空间，形

塑了知识生产与价值创造协同共进的新型空间，建构了思想政治教育跨界融合的现实进路。元宇宙在高校人才培养、管理服务等领域大有可为，形塑了思想政治教育元宇宙这一思想政治教育新形态，为“打造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特色品牌，不断拓展实践育人和网络育人的空间和阵地”^{[3]233}提供了新契机。思想政治教育元宇宙突出“人的价值”而非“物的关系”。元宇宙技术的介入需要凸显教育主体的在场叙事，思想政治教育元宇宙有赖于教育者与教育对象借助技术具身强化互动化体验，实现教育主体存在方式(生命-情感-行动)的持续增强。基于此，对思想政治教育元宇宙的内涵、

* [基金项目]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数字时代爱国主义凝聚力塑造研究”(项目编号:GD24CXX12)，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党建研究专项)“数字技术赋能高校党外人士爱国主义教育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025JKTZ004)，广东省茂名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百千万工程’战略视域下茂名红色文化价值塑造研究”(项目编号:2025GJ03)，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德育专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广东大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一体化研究”(项目编号:2024JKDY037)。

[收稿日期] 2025-09-20

[作者简介] 胡 华，男，安徽淮北人，广东石油化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博士。

界域、进路等问题展开深度求索,以赋能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对于提升思政引领力、建设教育强国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内涵探究:思想政治教育元宇宙究竟为何物

“元宇宙”的教育应用引发了理论界和学术界的广泛讨论与实践探索。围绕这一“社会事件”,各式提问如雨后春笋般循序登场,有的问题聚焦于科技硬件方面反复提及的新式术语或字母缩写;还有的问题侧重人文反思与人机关系。但开展这些探讨需要一个基本前提,即需要对“元宇宙”的基本概念与主要特征作一番厘定分析。

(一) 元宇宙的基本概念评析

概念是事物共同属性的人脑反映。“元宇宙”(Metaverse)这一概念是“超越”和“宇宙”的合成词。作为一项共享虚拟现实的全真互联网和社会形态的开源平台技术,元宇宙体现了社会主体的数字观念与数智行为的转变。学界有关元宇宙的概念问题还存在不同看法,如社会生态说着眼社会系统维度,将元宇宙看作是现实社会生态系统的实时映射;虚拟时空说从虚实对比的角度,认为元宇宙是一个平行于现实世界并整合3D图形、屏幕以及虚拟现实而成的在线共享空间。虽然上述界说各有侧重,但也有其共同之处。都认为元宇宙不是蛰伏于人类社会之外的虚幻之物,而是同人之社会文明共在、同人之现实生活相连、具有去中心化、深度沉浸特征的实存之物。

本文结合既有研究成果认为,元宇宙是依托扩展现实技术与数字孪生技术、贯通物理空间与虚拟场景的媒介化世界。这一概念包含三方面内容。其一,作为一种新型数字形态,体现了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的交互存在。其二,元宇宙兼具数字技术的要素性和扩展性,体现了机器学习的要素性与技术体系的扩展性。其三,元宇宙的技术治理与教育应用是确保人的主体性地位、达致虚实空间融创共生的发展目标。由这一概念可以看出元宇宙的三方面特征。一是虚实相融。元宇宙借助混合现实技术,将物理空间的万事万物复刻于虚拟

环境,塑造了数字世界“真身”“化身”“具身”“三身合一”的仿真情境,为主体带来深度体验虚实融通的沉浸感,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场景与社会交往方式;二是技术集成。元宇宙以5G网络、脑机接口、机器计算为硬件支撑,以GIS协议、智能合约、3D引擎为软件驱动,以大数据、强算法、高算力为核心要素,以生产领域、生活场景、社交平台、办公场所为应用生态,继而打造了数智技术的体系化集成平台;三是持续创构。元宇宙基于区块链、边缘计算、DPU等技术构建的运行逻辑,营造出即时在线、实时互动、优化迭代的数智世界,允许所有网络用户通过UGC、MGC等驱动形式对数智世界进行信息编译、内容生产、交流分享,创造出人人共创、时时共享、处处交流的创构空间。

(二) 思想政治教育元宇宙的内涵界定

参照伊德的技术现象学进路,元宇宙中“每一种人与技术的关系,都是一种内在关系存在论的模式”^{[4]96},它弱化了人与技术二元对立的状态,呈现出人机协同的合一状态。思想政治教育元宇宙超越传统面对面教育的物理阻隔,创设身体和意识双向反馈的虚拟仿真教育情境,增强教育对象的学习体验,引导教育对象动态交互地获取知识、增长见识、外化智识。目前,学界对“元宇宙”的概念界定虽未达成普遍性共识,但有关“元宇宙”的研究成果已层出不穷,并从多个维度展开了广泛论述。从哲学层面看,元宇宙是被想象或建构出来的某种世界观。它既非对现实世界中既存事实的或充分的经验概括,也非对现存世界的未来形态或网络形态的凭空臆造,而是一种能够超越现实世界的引导性观念。从技术层面看,元宇宙作为超时空、深沉浸的数字空间,实现了大数据、高算力和强算法的系统集成,具有“1+1>2”的系统功效。从社会层面看,元宇宙作为现实社会的虚拟映射版,使身处现实社会的人们在其中摆脱时空限制,以数字化方式获得超现实的沉浸式体验,打造了兼具个性化体验与多样化沉浸的跨时空场景;从运行逻辑看,元宇宙作为低延迟数智空间,协同运用文、

图、声、光、电等叙事要素,为教育对象营造仿真化学习环境,使其在线上线下普遍贯通的自洽网络空间体系中畅享数字化发展图景。

无论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从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的战略高度提出的“推进教育数字化”^{[5]14}改革目标,还是教育部提出的探索建立高校“思政指数”工作任务,都共同指向了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建设。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作为数字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新形态,突出地呈现为借助数字技术整合思想政治教育信息、运用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优化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继而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形态变革与机制创新的创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元宇宙在此过程中应运而生。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建设的高阶层次,思想政治教育元宇宙契合了数字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内涵式发展与数字化转型的现实要求。作为基于机器系统运行、复刻现实运动的开源性数字平台,思想政治教育元宇宙为教育者与教育对象创设了高度仿真、深度沉浸的数字身份,助力其在数字空间拓展交互性的教育场域,获得个性化的沉浸体验。

(三)思想政治教育元宇宙的主要特征

元宇宙不是既定事物“变换门庭”的新鲜措辞,而是“二进制信息或者位元的结构体”^{[6]123}。这一“结构体”体现了人的认识水平和实践能力。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的认识水平和实践能力的产物,总是在人的发展与技术演进的交织过程中不断展开和延伸。就现时代来说,元宇宙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新场域,基于数字技术构建的思想政治教育元宇宙在实践运行中呈现思想政治教育要素的虚实交融、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与机器共存、思想政治教育场域与社会衔接的主要特征。

其一,育人要素虚实贯通。思想政治教育元宇宙既呈现为育人空间的仿真与拓新,也反映了育人要素的衔接与融通。育人资源、育人载体、育人方法等育人要素在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彼此交织的数字空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为教育者和教育对象摆脱现实条件限制提供了应用场域。教育者和教育对象之间借助

计算机终端、智慧课堂等硬件设备创设数字身份,深度模拟视觉、听觉、触觉等多重感官体验,推动教育者和教育对象之间的具身交往。同时,思想政治教育元宇宙的情境构造会留存真实世界的育人环节和步骤,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不再受限于现实世界的教育场所和教学条件,为教育者和教育对象提供了兼具自由度与灵活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形态。在思想政治教育元宇宙中,不同用户之间共建充满活力与创意的虚拟社区,提供各种新式的智能交互体验,教育者和教育对象的互动关系将得到充分显现。

其二,育人主体与技术共在。作为贯通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数字化思想政治教育样态,思想政治教育元宇宙依托智能算法、机器学习、数字孪生等新兴技术,形塑了“教育主体—教育技术—教育对象”彼此贯通的育人结构。在这一结构中,教育主体的育人行为不再是单纯的知识传授者、理论讲解者,而是思维方式的启迪者、创新意识的培养者。这一角色定位转变的典型例证是,教育主体借助脑机接口技术能够将理论知识蕴含的人物故事立体化呈现为数字空间的“共在”场景。教育主体基于“以技辅教”的数字思维以及颇具想象力的创意设计构建学生可接受、可参与、能体验、有收获的具身空间,引导学生“将虚拟体验转化为现实动力”。在此过程中,数字技术的海量资源、精准推荐将得到充分展现。譬如,思想政治教育元宇宙借助大数据分析技术,为学生提供精准的“学习者画像”,教育者可以此为课程教学与实践活动的优化依据,便于后续开展个性化、差异化教学。思想政治教育元宇宙借助知识图谱的资源链接推荐,可以将思想政治教育图谱中的各个知识点拓展为学生发展的具体能力指标及其对应的学习内容,利用路径推荐模型构建知识标签,将具备内容逻辑的主题列表推送给学生,更好契合学生个性化、差异化学习需要。

其三,育人场域衔接社会。虚实贯通的育人场域,推动着育人场域向社会空间延展。基于数字孪生、智能算法的技术支持,思想政治

教育元宇宙不再是局限于学校层面,而是同社会场域有机贯通起来,是富含全域性的新型教育样态,有利于推动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有机结合,构筑线下和线上相协同的育人空间。借助元宇宙提供的海量资源和沉浸体验,思想政治教育者可以对育人内容加以场景化再造。譬如,借助虚拟仿真平台、智慧课堂等智能化载体,引导学生置身虚拟高仿环境获得情境体验,并在深度体验过程中设置具体教学环节,指导学生参与到育人方案修改、育人内容准备、育人过程展开等思想政治教育供应链上游活动的决策评价与建议反馈,使学生获得“身心在场”的参与感和体验感,推动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知识传授、价值引领和能力培养的育人目标。当前,高阶形态的元宇宙技术叙事日趋成熟并在某些高校实验推广,是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重要路径。

二、弄清界域:思想政治教育元宇宙的应用场景

思想政治教育元宇宙的应用场景不仅关乎实践活动发生的物理空间,也是教育者、教育对象、教育环境、教育载体等要素耦合而成的关系网络。作为在虚拟空间生产-消费的具身实践的元宇宙,推动着思想政治教育时空格局由现实空间转向虚拟空间。智能化的泛在式育人场景、沉浸式的体验性育人场景、跨时空的协作式育人场景、虚实融生的生成式育人场景必将深刻改变思想政治教育的在场形式及呈现样态。

(一) 智能化的泛在式育人场景

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7]139},人的思维方式、学习态度、情感变化都与社会环境密不可分,同时又受个体生活经验、学习场景的影响。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讲解过程课堂教学模式相对固定单一,教育者习惯于将主要精力放在知识传授层面,对教育对象的思想动态与情感变化关注偏少。元宇宙通过创设智能化的泛在学习情境,可以引导学生跨越时空限制并获得深度的体验感。“智能化的泛在学习”是指师生可以在思想政治教育元宇宙中开展跨时空的交互性学习,这一学习方式可以解决

课前教学准备不足、课堂互动方式单一、课后自主学习困难等问题。教育者借助思想政治教育元宇宙的空间延展性,为学生创设问题研讨、案例设定、话题互动、议题叙事的交互场域。

场景化叙事以模仿社会活动的客观逻辑来调用技术、优化学习环境来组合技术、创造娱乐氛围来驱动技术,实现对生活世界中寓教于乐、寓情于景的有效拓展,充分满足教育对象对不同场景叙事的体验需求。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是具有鲜明生命的个体,“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8]514},全面了解教育对象的学习需要,创设与之相适应的育人场景,是精准投放育人内容,提升育人成效的关键所在。在此过程中,教育对象依托“以我们自身的形象创造的、具有智能的人工造物”^{[9]288}的元宇宙,摆脱时空限制、思想自由驰骋,学习积极性、意愿性将随之增强。如借鉴“严肃游戏”项目开发及其应用的有效案例,创设沉浸式交互环境下的元宇宙教育教学类严肃议题,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十年成就展”“全球治理倡议国际交流会”等现实议题,以集中探讨和沉浸体验的方式答疑解惑,引导学生在议题设置中明晰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战略部署,强化对主流意识形态体认,形塑正确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

(二) 沉浸式的体验性育人场景

思想政治教育元宇宙在一定意义上重构了教育对象认知习惯和学习方式,拓新了教育对象的身体感知,使其在更广阔的育人情境中呈现自我需求。一方面,创设虚实贯通的育人环境。在思想政治教育元宇宙中,教育者基于数字孪生、虚拟仿真等数字设备,将物理空间的各类事物加以数字化、符号化构造,构筑了虚实贯通的全息化数智空间,打破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时空界限,为育人资源的跨界整合与有机贯通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思想政治教育元宇宙通过综合运用“大数据、移动设备、社交媒体、传感器、定位系统”^{[10]11}等数字技术,塑造处处可学、时时能学的全过程、全方位、全链条思想政治教育新形态,帮助教育者将主流意识形态与理论知识体系以更具智能

化、个性化、立体化的多元方式呈现给教育对象。另一方面,创设多元开放的育人环境。思想政治教育元宇宙借助数字孪生技术与混合现实技术“再造”历史场景,引导教育对象在跨时空的育人场景中体验人物情感、感受事件意义、领会伟大精神进而内化教育内容,激发教育对象的学习潜能和探究意识,使教育者可以集中精力培养教育对象的创新精神、创意思维与创造能力,助力大学生实现转识成智、转智成德。如通过大数据分析技术整合各类实践育人资源,开设“元宇宙大思政课”,引导学生在智慧课堂营造的沉浸体验情境中,深刻感受仁人志士在艰苦卓绝的革命岁月中百折不挠、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以及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矢志不渝的坚定信心,也可以引导学生同历史人物、革命先辈开展“人物对话”,体验历史人物、革命先辈“握手拍肩”“亲切交谈”过程中生成的革命友谊,增强学生对革命先辈的敬仰之情。

(三)跨时空的协作式育人场景

在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存在育人内容的供给需求偏差与育人形式的展现方式单一的问题,前者导致育人内容同质化输入情形,后者导致育人过程呈现为“相对低效与边界模糊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传递状态,学生个性化的学习需要和差异化的学习过程难以全方位清晰展现”^[11]。思想政治教育元宇宙通过优化智能教育环境,延展数字育人场景,形成了常态化、分众化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延展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时空性,增强了教育对象自主探究学习资源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资源主要包括课本教材、配套习题、实践基地等,这些资源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互动性弱、信息反馈滞后、时空受限等问题,很难支持智能时代学生自主探究、深度互动的学习需求。作为融合多种数字媒介于一体的数智技术,元宇宙作为“社会人的生产器官”^{[12][429]},融通整合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创生出智能交互的新型数字化媒介世界。思想政治教育元宇宙为教育对象提供了具身社交、虚拟融合的学习场景。在问题梳理

阶段,思想政治教育元宇宙通过变革“教师问—学生答”的单维问答方式,为师生预设问题研讨的互动情境。在氛围营造阶段,思想政治教育元宇宙通过聚合问题类型,为学生创设兼具良构与非良构的问题链条,为师生营造深化研讨的学习氛围。在方案解决阶段,思想政治教育元宇宙通过数据画像、算法推荐、过程评价、效果反馈等环节,为教师答疑解惑提供解决方案。最后,解决方案的反馈。学生基于大数据分析结果以及算法推荐信息,有效完成解决方案的选择与优化,并为解决方案的评价反馈提供了数据支撑。如借助信息差异分发反向机制,创设以聚类算法为底层架构的内容分发平台,调适数据相关性和个性差异性关系,提升主流价值资源的引领效度和运用信度,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元宇宙接收主流意识形态内容并转换为自身对价值引领和情感认同的针对性和感召力。

(四)虚实融生的生成式育人场景

思想政治教育元宇宙通过提供兼具现实性与虚拟性的具身情境,将传统育人优势与智能技术优势有机结合起来。从育人场景看,感官参与高阶认知活动的必经环节,深度体验是高阶思维形成的必经过程。虚拟现实、算法推荐、机器学习等智能技术的勃兴发展,使教育者对严肃理论的抽象讲授同学生对现实问题的切实关注不再局限于听觉输入接受知识的模式,而是转化为兼顾视觉、听觉、触觉等多感官参与的综合化知识内化过程,学生获取知识的范围更广、吸纳观点的程度更深。虚实融生的生成式育人场景包含四个维度。其一,虚拟学习环境的创构。思想政治教育元宇宙基于虚拟学习环境的扩展、交互功能,实现兼具虚拟性与现实性的学习空间互通。其二,课堂脱节的因应。思想政治教育元宇宙借助数字技术实时挖掘数据、过滤聚类资源、智能再造场景的强大优势,有效回应了因时空限制诱发的课前、课中、课后课堂脱节的问题。基于元宇宙构建的虚拟学习环境,思想政治教育者通过创设具有强交互性、高关联性的育人场景,引导学生沉浸于文化体验与现实问题的分析讨

论之中,推动低阶认知向高阶认知的意向性转化与个性化转向。其三,虚实协作的评价。思想政治教育元宇宙基于高度仿真、实时互动、过程监测等技术优势,动态评价虚实协作的学习环境、学习过程,保障生成式学习的效度和信度。其四,群体知识的生成。思想政治教育元宇宙通过大数据、资源库,汇聚师生在教与学过程中生成的知识集群优化教育教学过程、完善问题解决方案。如借助XR技术创设高度逼真的虚拟现实场景,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与身体感知,引导学生以深度沉浸方式身临其“境”,先将教育教学的系统性知识嵌入智慧课堂,然后针对性调取与精准性应用,借助批判性反思、小组式研讨、项目化合作等方式回应学生在虚拟现实场景学习时遇到的思想困惑和学习难题,从而在“参与—反思—行动”的循序渐进和动态循环中,实现师生之间虚拟实践中的互动、反馈与评价。

三、实践取向:思想政治教育元宇宙的现实进路

“坚持防范风险和促进健康发展并重,把握机遇挑战,让互联网更好造福社会”^{[13][44]}是网络强国建设的原则要求之一。元宇宙技术在网络强国建设背景下的蓬勃发展与教育应用,催生了教育强国思政引领力的新引擎,也带来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传播新风险。因技术的“双刃剑”效应,思想政治教育元宇宙在应用过程中呈现出利弊同在的状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有效治理思想政治教育元宇宙的潜在风险,是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增强教育强国思政引领力的必然选择。

(一)意识形态风险及其治理

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价值体系,表征着行为主体自为选择的价值理性。元宇宙作为多元价值观念的交织场域形塑着网民的“现代性面相”,诱发了分歧和聚合的价值纷争。“当代科技并不是价值中立的,因为它已经变成实施全面控制的意识形态。”^{[14][116]}技术并非价值无涉的抽象物,而是隐匿着技术设计者的意识形态倾向。相较于传统社会中政治暴力性质

的意识形态,基于技术理性的意识形态统治更具潜隐性和渗透性。它看似“人畜无害”却具有极强整合功能。尤尔根·哈贝马斯也持类似观点,在他看来,“技术理性的概念,也许本身就是意识形态”^{[15][39]}。因而技术兼具统治与辩护的双重意识形态功能,前者体现为技术本身及其运用而对自然与人的操控,后者体现为对统治合法化以及现行制度的维护。

意识形态充斥于人们生产生活的各类空间,“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16][580]}。元宇宙作为辅助人们进行数据挖掘、模态转译、强化学习的对象物,必然蕴含特定的意识形态属性。首先,元宇宙在延展个体感官体验、优化育人场域的过程中,自身也构成了一个虚拟空间社会,因而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其次,元宇宙的创构者和运用者也有其价值偏向,其意识形态倾向也内嵌其中。与之相应的,西方国家基于资本逻辑主导的元宇宙,其意识形态也必然代表资本主义国家利益、内嵌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如作者在《雪崩》一书中提及的元宇宙情节,就体现了鲜明的“普世价值”观念与个人主义思潮。可见,“任何一种工具都存在观念上的偏见,都会倾向于将世界构建某种特定形态”^{[17][11]},作为工具的元宇宙也是如此。越是智能化的元宇宙,越需警惕技术异化对育人真谛的僭越,规避思想政治教育元宇宙应用中的意识形态风险,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元宇宙系统的价值纠偏。

元宇宙作为现代技术的典型代表,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在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元宇宙建设的过程中,必须采取有效举措来规避意识形态风险。其一,强化议题设置。智能技术使信息的空间传递性与互动延展性持续增强,为思想政治教育元宇宙议题设置、营造元宇宙舆论生态、规避元宇宙价值异化提供了技术载体。党政机关、主流媒体作为意识形态建设的前沿阵地,应充分运用议题以及议程设置主动权,主动设置内嵌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元宇宙宣讲议题,拓展元宇宙议题传播平台,以“在场化”方式进行故事演绎和情景展现,开

创由比特建构的育人智能化新场景,强化教育对象的价值认同与情感共鸣,发挥主流意识形态在元宇宙运用过程中的价值引领作用。其二,加强教育引导。学工干部、思政课教师、辅导员等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在课堂内外、网上网下,教育引导学生在使用非课程教学的元宇宙时提升鉴别能力。为此,思想政治教育者要通过设置批判错误社会思潮的教育教学议题,积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学生同各类形形色色的错误社会思潮进行辩论交锋,以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彰显其真理力量,使错误社会思潮在元宇宙中无处遁形,及时解答学生疑惑、澄清思想谬误,引导其旗帜鲜明地反对西方国家借助元宇宙向学生传播其意识形态。在思想政治教育元宇宙中,要善于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讲授方式,引导学生深刻理解元宇宙的意识形态属性及西方元宇宙虚幻表象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属性,强化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力,筑牢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奠立应对意识形态风险的价值基础。

(二) 网络成瘾风险及其治理

元宇宙是高阶性的互联网,在互联网中出现的网络成瘾在元宇宙中也有体现。网络成瘾综合征是因长时间不当上网而导致对网络的耐受戒断反应以及行为失控现象。这一现象会对受众的健康成长、心理建设、社会交往带来危害。元宇宙作为“具身互联网”,在海量资源、沉浸场景、高效传播的加持下,可为用户带来高保真的虚拟交往样态并使其获得身心愉悦的逼真体验,这就可能导致部分学生沉湎于元宇宙之中而致网络成瘾即“元宇宙成瘾”。元宇宙营造的虚拟空间是物理空间的形态投射与超现实虚构场景的叠加空间。其蕴含的高度沉浸感、内容多样性以及几可忽略的低延迟性,使学生很易被元宇宙吸引并诱发元宇宙成瘾症,而诱惑力的背后是自控力的弱化,因而元宇宙成瘾难以完全避免,并呈现蔓延之势。

元宇宙成瘾的危害并不止此,情况严重者还会诱发认知疑难风险。元宇宙借助情景再现、现实增强等技术优势,引导受众置身于星

际穿越、环球旅行等虚拟情境之中,使其深度体验时空穿梭、自由摆渡等有别于现实生活的多维场景。当元宇宙借助数据聚类分析、智能算法推荐、机器深度学习嵌入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全网域的海量数据、全场域的资源推荐会诱发教育主体的依赖思维与惰性习惯,使其沉浸于算法程序驱动的数字景观,陶醉于虚拟空间构造的虚幻场景。“要理解人的生活世界,就必须把握构成人的生活世界的这种彼此联结和相互贯通的矛盾关系。”^[18]很多网络游戏借助元宇宙铺设打怪升级的虚拟世界,基于可穿戴设备与数字孪生技术的双重加持,将人的生活世界与虚拟场景彼此联结和相互贯通起来,导致部分用户深陷现实世界与虚拟空间的矛盾关系之中难以自拔。作为人类创设用于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劳动工具,智能算法本应服务于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领域和个体的全面发展,但在数字资本驱使下,似有可能演变为消解人类主体性的对立产物,甚至成为“无形的手”全面操控人类的生产生活以及人的精神世界。

为回应数据至上思维、算法推荐导向等现实难题,思想政治教育者在运用元宇宙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必须审慎面对网络成瘾引发的各类风险。面对元宇宙呈现的数字化图景,思想政治教育者应坚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的实践导向,引导学生审慎看待元宇宙反向驯化的风险挑战,从技术优先的工具思维复归生命成长的价值立场,将技术价值和人的价值、教育价值有机贯通,凸显思想政治教育元宇宙求真求善求美求实“四位一体”的育人真谛并持续助益学生的全面发展。例如,斯坦福大学构建的“Virtual People”课程以虚拟在场的学习情境,引导学生在数字空间开展田园调查、深度交流与课程任务等教学计划内容。这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元宇宙必须关注学生与数字技术的双向反馈,根据过程化的学习行为数据开展个性化教学,在精准性调适中转化为更为契合个体学习需求和认知特点的数智技术,达致唐·伊德所说的“三个身体”(即物质身体、文化身体、技术身体)良性

互动的“上手”状态,形成“人—技”协同的自主学习空间。同时,思想政治教育元宇宙借助大数据、云计算、虚拟仿真等智能技术,摆脱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时空限制,建构了全息化链接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的场域,革新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对教育者和教育对象须同时在场的线性教学规定,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出场方式的多元化以及内容传播的可视化,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教育对象的“具身”体验。如在建党百年之际,上海市中共三大后中央局机关历史纪念馆在建党百年之际,借助VR、XR等智能技术创设了“通关密室”项目,仿真还原了中共三大后中央局机关秘密办公的历史情景,将红色故事转化为通关“密钥”和活动“线索”,这种触感交互、虚实融通的在场体验极大激发了受众的体验感和共情感。

(三) 数据隐私风险及其治理

当前,随着物联网、云计算等智能技术的突飞猛进,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纳米技术等方兴未艾,当今社会逐步迈入互联互通、高度智能的数字时代。这一时代有别于工业文明时代,是基于智能革命而催生的新技术文明阶段。在这一时代中,基于各类新兴技术汇聚而成的元宇宙,更具庞杂性与隐匿性,这也导致其更易逃避法律监管。而技术运用与隐私保护总是相伴而行。相较于网络隐私,元宇宙既是整合多重数字媒介于一体的未来媒介,也是融通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并将之以颠覆性创生而成的新型媒介世界,因而其数据隐私更为复杂和多样。元宇宙借助智能算法对用户网络数据的收集、归类、分析,精准描绘用户体验的兴趣图谱和行为画像,并据此展开个性化推荐,数据由此也具备了社会意义及经济价值。然而,过度收集进而解构个体数据会诱发数据隐私问题,人们不可避免地会担忧隐私被泄露、数据被滥用,也不得不面对像米歇尔·福柯、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等人所说的“生命政治”问题,指向了对人之主体性的弱化和剥夺。

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元宇宙作为互联网勃兴发展的产物也不例外。元宇宙是虚

拟的,但运用元宇宙的主体是现实的,元宇宙主体都应遵纪守法,明确权责,有效规避元宇宙对人之主体性的弱化和剥夺。为此,在坚持依法治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的过程中,对于因元宇宙而引发的数据隐私风险,应在立法层面给予更高的保护标准,尤其在明确元宇宙平台准入门槛,预先嵌入具体的道德算法,确定个体数据隐私的判定标准和适用范围,制定相应的防范个体歧视的逻辑规则等,规范数字技术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行为,防止不利于教育者开展育人活动和教育对象个体发展决策出现的可能。展开来看,其一,提升元宇宙建设的法治化水平,建立健全涉及元宇宙的数据保护、隐私侵权、公共安全等法律制度体系,规范元宇宙运营平台对用户数据的搜集、存储以及使用,明确并严格执行对违规数据搜集存储、恶意使用、网络造谣等用户侵权行为的责任追究,营造法治化、公开化的良好监管氛围。其二,强化元宇宙平台的主体化责任。元宇宙平台要肩负起主体责任,推动行业自律规范行为,破除流量至上观念,坚决遏制网络暴力,打击虚假宣传造势,增强相关平台诚信经营和依法从业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其三,构建合理运用元宇宙的社会共识。要明确用户权利与义务,依法规范并合理引导教育对象的网络行为,增强元宇宙法律意识,树牢共同护佑诚信文明、积极健康元宇宙环境的社会责任。

对思想政治教育元宇宙来说,要优化机器学习的功能,让数字技术在参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不断适应复杂的教育情境,自觉输出与法治教育相关的检验模型,生成必要的法治认知。思政课教师可以在教学过程中设置元宇宙应用议题,引导学生在深度交流中明确认识。如在“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的讲授过程中,帮助学生树牢网络数据隐私安全意识,引导学生在隐私泄露时借助法律武器维护数据隐私安全及权益。《思想道德与法治(2023年版)》教材扩展了法治教育的相关内容。其中的第六章主题是“学习法治思想提升法治素养”,该章聚焦“提升法治素养、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模范”的教学任务。在该章内容教学

中,思政课教师可以做如下课程设计:在课前,在学习通上发布课程预习任务,引导学生查阅相关背景资料,了解数据隐私安全相关内容;在课中,思政课教师提出“元宇宙的应用场景”“元宇宙的隐私保护”等相关人文与伦理问题,然后开展小组讨论并选派每组代表发表看法,再由教师汇总点评并回应不同组别的学生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元宇宙要引导学生坚守主流价值观念,推动价值浸育与技术应用、主流价值观念的普照性与元宇宙技术的辅助性、价值塑造与技术发展的深度融合。将承载主流价值观念的代码程序作为关键节点置于思想政治教育元宇宙的空间结构与算法场域,为教育对象提供潜移默化的主流意识形态引导。在这一语境中,元宇宙的技术应用因承载主流价值观念而真正得到价值校正和意义赋予,使大学生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思想政治教育元宇宙领域蔚然成风。

作为智能社会贯通现实世界和虚拟空间的技术载体,元宇宙是集技术聚合、教育场域、数字媒介于一体的生态协作系统。学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元宇宙的研究成果逐步从技术赋能的内涵挖掘转向技术融合的实践探索。随着虚拟场景构建、沉浸叙事创设的教育应用,思想政治教育元宇宙研究应超越对技术工具性的表层关注,转入深刻把握现实世界与虚拟空间普遍贯通下价值引导的运行规律与实践路径。在进一步的深化研究中,应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元宇宙同伦理规范和法律政策的有机融合,积极应对伦理失范、信息茧房、算法偏见、数字沉迷等潜在风险,着力提升教育者的数字素养,持续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元宇宙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技术赋能与人文关怀的有机统一,以辩证思维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元宇宙的道与术,从而在数字文明新场域中切实肩负起启智铸魂的育人使命。

[参 考 文 献]

- [1] 乔瑞金.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纲要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2] 本书编写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M].北

- 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3.
- [3]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 [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
- [4] 唐·伊德.让事物“说话”:后现象学与技术科学 [M].韩连庆,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 [5]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
- [6] 大卫·查默斯.现实+:每个虚拟世界都是一个新的现实 [M].熊祥,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23.
-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 [9] 乔治·扎卡达基斯.人类的终极命运——从旧石器时代到人工智能的未来 [M].陈朝,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
- [10] 罗伯特·斯考伯,谢尔·伊斯雷尔.即将到来的场景时代 [M].赵乾坤,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
- [11] 胡华.人工智能驱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变革:技术逻辑、价值遵循与目标旨归 [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5):30-37.
- [1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 [13]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 [14] 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 [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 [15] 尤尔根·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 [M].李黎,郭官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 [1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7] 尼尔·波兹曼.技术垄断:文明向技术投降 [M].蔡金栋,梁微,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
- [18] 贺来.“具体普遍性”的实践哲学意蕴 [J].中国社会科学,2025(3):149-166.

(责任编辑 王遐见)

新时代地方师范院校思政工作集成创新的 问题审视与推进理路^{*}

王 艳¹ 李前进²

(1.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党委宣传部, 江苏南京 211200;
2. 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南京 210046)

[摘要] 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是教育强国建设的核心战略,要求地方师范院校紧跟时代步伐,紧密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系统性思维推动思政工作体系全方位升级。但目前,地方师范院校在集成创新方面仍然存在内容体系脱钩、运行体系紊乱、支持体系薄弱等多重问题。对此,应基于《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的目标要求,围绕集成创新提出相应的破解思路与完善举措:一是发挥党委集中统一领导效能,着力推进内容体系层面的集成创新;二是以“大思政课”育人体系构建为契机,着力推进运行体系层面的集成创新;三是按照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要求,着力推进支持体系层面的集成创新。通过实现地方师范院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创新飞跃,以期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 立德树人工程; 集成创新; 地方师范院校; “大思政”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5)06-0075-08

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以下简称“《纲要》”)提出的重大举措,是全面建设教育强国的“一号工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教育强国,必须全面构建固本铸魂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1]。《纲要》提出要“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加快建设具有强大思政引领力、人才竞争力、科技支撑力、民生保障力、社会协同力、国际影响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2]。思政引领力作为“六力”之首予以强

调充分肯定了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突出地位,同时彰显了国家对思政工作的长期谋划。立德树人是高校立身之本,高校要以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为载体,以思政引领力为龙头,进一步用集成创新思维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飞跃与内涵式发展。

一、新时代地方师范院校思政工作集成创新的意义

(一) 集成创新是高校肩负教书育人使命的本质要求

集成创新最早是由经济学家约瑟夫·熊

* [基金项目]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思政工作研究2024年度重点课题“教育家精神引领下的师范生‘大思政课’实践育人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24SZZD02),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政课研究”(项目编号:2020SJZDA144),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重点项目“江苏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机制构建及实施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5ZXZA002)。

[收稿日期] 2025-09-14

[作者简介] 王 艳,女,江苏泰州人,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副教授,党委宣传部副部长。

李前进,男,江苏徐州人,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院院长。

彼特提出的一个范畴。“集成”是指多要素的重组以及再造,以形成系统的创新驱动力与牵引力。他将“创新”界定为新函数构建,当不同要素经创新思维系统整合以后就能促进整个创新系统的升级。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使受教育者知识水平获得提升,还可以助力受教育者能力、品德、素养的提升,关系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实现。这一使命任务决定了教育主体、客体、介体、环体等各要素均要体现创新性意涵,一旦缺乏统筹性考量,则难以发挥其综合育人优势。“集成创新”并非单个要素的叠加,而是依赖于要素间的互补。思想政治教育运用各要素的互补性进行整合,构建完善的育人系统,从而转化为立德树人的合力。《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明确指出,人才培养应居于课程思政评价的第一位,强调教育者参与课程思政情况应作为考核评价、岗位竞聘的重要内容。课程思政建设关系到教书育人综合评价体系创新,高校教育者树立正确课程观以及具备有效的教学能力,是实现思政引领的关键。而师范院校肩负培养“大先生”的重要使命,应在“大思政课”建设中发挥示范作用。过去一段时间由于缺乏一体推进课程思政的机制,课程思政建设存在滞后,因此无法很好地转化为集成创新的优势。加之少数专业教师缺乏系统性育人理念,对课程思政建设的内涵认识不到位,致使思政教育没有真正贯穿于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客观造成思政教育和专业教育“两张皮”问题。以集成性思维推动思政课建设创新为课程思政建设提供软指标,让人才培养过程更具合理性,这不仅解决了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育人的堵点问题,还让教育者具备“乐教”的动力、“会教”的能力、“善教”的本领,做到教书与育人相统一。

(二) 集成创新为思政工作现代化提供长效保障

集成创新是以系统性视角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活动。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各要素的相互作用使事物之间构成普遍联系。思想政治教育将“立德树人”作为一项育人整体

任务,离不开各要素、各环节的相互配合,各子系统的运行状态共同决定了育人实践的整体走向以及现实效度。受教育者对思想道德观点的内化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辩证运动过程,并在此过程中实现思维体系的范式创新。集成创新提倡系统内要素间的沟通,以及内外环节的整合。教育系统本身具有整体性,思想政治教育育人实践应贯穿大中小学各个阶段,通过主流价值引领,激活其他课程中的隐性育人资源,因此思政教育本身应该被视作一个完整体系,但在整体推进中又在不同学段有着特殊的呈现。随着思政教育面临的外部环境以及受教育者思维范式的不断变化,地方师范院校应牢记育人初心,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积极构建集成性的创新模式,立足大的时代环境,研究教育内容与时代需要的匹配性,思考“大思政”格局如何构建、教育资源配置是否合理等问题,把握学生思想动态,助力学生综合素养的提升。这客观上要求地方师范院校的思政工作要将国家意志、时代气质、公众气息、师范情怀融入思政工作之中。同时,思想政治教育育人体系的完整性必然要求从整体上构建育人协同创新机制,以实现育人活动纵向和横向的贯通。如在兄弟院校、社会组织、学生个体间搭建连贯性教育平台,借助政府统筹以及社会资源,使各项要素为师范院校思政教育注入强大育人动能,为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提供长效保障机制。

(三) 集成创新是构建思想政治教育育人机制的关键

马克思系统观认为整体是部分之和,因此要加强各部分、各要素的协同。当事物子系统和其他系统相互配合形成合力,系统将表现出朝着某一目标持续增进的趋势。反过来,如果系统内子系统相互掣肘,就会影响系统整体功能的发挥,甚至对整体功能的实现带来阻力。立德树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目标,其达成离不开教育过程与各主体的协同合作。通过目标导向,思想政治教育育人体系在课程体系中体现为价值传导与知识传授双重效能,在实

践育人中体现为行为规范与理论内化的融合，在个体层面表现为正确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形成。因此，要着力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资源、目标、要素的功能互补，积极引导与育人有关的一切要素都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协同发力。《纲要》对于健全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机制作出了明确说明，但目前三者仍然存在沟通欠缺、资源低效、理念模糊等问题。推进“三全育人”的有效实现应始终抓住协同性这一关键内核，构建资源、目标、责任同频共振的思想政治教育育人机制。构建集成创新的思想政治教育育人机制，体现了人的成长规律与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辩证统一。规律是事物发展中稳定的联系，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应该是教育活动各要素必然、稳定联系的总和，它具体表现为教育主体与客体、思想和行为、过程与结果、内容与形式、原理与方法等多方面的有机关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少年处于人生的“拔节孕穗期”，价值观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只有充分把握学生的认知水平以及思想结构，才能实现价值引领入脑入心。思想政治教育旨在帮助受教育者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使其通过价值引导形成一套完整、自洽的价值体系。思政教育结构的体系化构成说明高校所进行的育人实践无法以某种单一化的方式去推进，而应以各子系统的继承为前提，这样才能确保育人活动走实走深、行之有效。总之，集成创新通过动态性调整，在育人过程中优化其结构范式以实现整体功能的飞跃，从而将分散的教育要素转化为有机育人网络系统，以此实现社会发展要求与个体成长诉求的有效衔接，为破解思想政治教育育人难题提供有效思路，使学生主流价值观的形成朝着系统化、体系化方向演进。

二、新时代地方师范院校思政工作集成创新的问题审视

(一) 内容体系与受教育者思想实际相脱节

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

实践中教育者传递给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观念^{[3]80}。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在组织形式上具有较强的政治性，如果脱离学生的实际生活，便容易削弱学生的生命体验感，进而引发其对课程内容的排斥情绪。哈贝马斯指出，“达到理解是一个在可相互认可的有效性要求的前设基础上导致认同的过程”^{[4]3-4}。受教育者的生活体认多来自感性实践，受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灌输论的影响，受教育者多被动学习知识内容，缺乏主体能动性，因此思政教育容易在内容体系的宏大叙事中逐渐泛化。这主要表现为，随着学校教学体量增大，思想政治教育在内容体系构建中多强调知识传授，而忽视对学生内在道德品质的关注，容易造成育人体系与内容相脱离的“两张皮”问题。

一是内容体系的要素泛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全面者，就是要统筹推进各领域改革，就需要有管总的目标，也要回答推进各领域改革最终是为了什么、要取得什么样的整体结果这个问题”^{[5]26}。育人目标要素的设定以及课程实施方法的创新都需要围绕“立德树人”总体要求，但目前思想政治教育育人仍然存在各子系统间结构功能失衡、认知梗阻等问题，对育人效能的发挥产生了阻力。这表现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建构的不完备、不健全，与其他教育内容和教育活动的边界不清晰，学科意识模糊，知识点混淆，出现了泛化繁复、界限不明、交叉重叠等问题。内容要素缺少精准定位、精准研究和精准施教，缺乏有机融合、有力整合和有效衔接。相应地，在实践中的应用也过于宽泛，把思想政治教育当作“万能钥匙”。这其实是一种教育随性、研究惰性的表现，导致知识理论化和碎片化，方法简单化和单向化，效果表面化和间接化。二是内容体系的属性淡化。意识形态本质属性和政治属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天然属性，这是其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专业定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突出“讲政治”的根本目标，必须用党的创新理论成果引领高校思政课建设，把思政引领力摆

在课程建设的首位，“从教育的政治属性出发,将思想政治工作贯穿融入教育强国建设实践之中”^[6]。大学生思维活跃,如果仅以满足大学生的喜好为目标就会减弱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严谨性。加之工具理性思维的影响,教育者容易追求形式的“好看”,忽视内容本身,这将大大减弱了思政课的思想性和价值性。属性淡化会造成学科性质偏移,无法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对其他学科的引领作用。三是内容体系的功能窄化。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历史活动的一种,其产生、存在与发展都根源于人们的价值实现活动^{[7][32]}。部分思政课教师容易忽视对学生长久人生以及道德品质的培养,逐渐使教育场域过于封闭,思政内容建构方式滞后,信息流通低效,更新速度缓慢,使课堂教学简化为理论阐释和政治宣讲,教学内容局限于教材,较少面向社会生活实际,较少关注现实变化、个体差异,忽视了大学生群体的需求。由于缺乏与外界的信息互动易使教育目标的内容体系跟不上时代发展潮流。一旦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脱节,便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可能发挥的功能被大大缩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紧扣时代发展脉搏,召唤与时代发展相匹配、社会价值相当的教育内容,以满足新时代大学生的活跃思考和热切需求,回应并解决他们面临的现实问题。

(二)结构要素紊乱制衡育人整体效度的实现

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运行体系表现为思想政治教育各主体、要素、子系统之间以一定的机制、规则、方式进行联结和运转,涵盖架构、决策、实施、评估、反馈等规范性流程。思想政治教育运行体系应具有良好的总体结构和系统功能,否则会直接制约体系的顺畅运转。

一是存在运行体系的分散化问题。思想政治教育任务被分散到高校各个职能部门、院系,队伍、内容、方法等教育要素单打独斗,内在关联不足;思想政治教育与学科建设、专业发展背道而驰,协同性不足,协调性不高;思想

政治教育的培养方案与人才培养实践相脱节,理论研究对教育问题的指导性不强,实习实践课程占比过低,落实不到位,等等。这些分散化问题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出现了功能紊乱、效率低下的结构性问题,制约了思想政治教育整体功能的充分发挥。二是存在运行体系的碎片化问题。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日益丰富,其统筹复杂程度不断提升,对体系的整体性要求也越来越高。当运行体系缺乏顶层架构和整合经验,缺少系统性思维指导和集成性举措建设,就会导致内容之间联动性不足,综合化程度不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系统观念,加强对各领域发展的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8]。这给解决运行体系碎片化问题指出了解决方向——集成、整合、合作的模式更有利 于体系性的功能输出。三是存在运行体系的孤岛化问题。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具有连贯性,与社会环境的关联十分密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从全局性、协调性的角度推进,统合各类、各级、各层资源,形成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合力。如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分而化之,内容之间缺乏有机融合,工作方法缺乏综合集成,教育资源缺乏互补协调,且仅仅封闭在校园里面进行教育,与学科前沿、社区生活、社会发展联系不紧密,就会成为信息荒岛、教育孤岛、能力荒岛。而且,目前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尚未全面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思政工作者对新技术的认知和应用不成熟,思政育人方法偏传统化、简单化、单一化,导致思政育人效果呈现表面化、间接化、浅层化。

(三)思想政治教育支持体系与目标体系之间的不适应

支持体系是思想政治教育良好发展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但目前思想政治教育的支持体系与目标体系在实践中存在典型的不适应性。一是管理虚化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的体系运行和功能发挥需要良好的体制建设和到位的制度贯彻。在管理过程中,从决策、部署、实施到评估、反馈、完善,如果管理虚化,貫

通性与贯彻力不够,领导力和执行力欠缺,就无法保障思政育人的效果彰显。如教育者对“立德树人”理解不到位,或因实际工作中投入精力有限,会导致教书育人浮于形式表面,加之跨系统、跨领域专业能力的缺乏,将致使育人管理工作难以连为一个整体。二是保障不力问题。教育保障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良好运行的生命线。作为保障层面的制度、机制、资源等为教育体系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支持。高校资助部门、心理辅导部门、后勤保障部门等组织机构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保障力量,和学生关系密切,一旦资助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出现问题、疏漏、瑕疵,就会影响学生的心性和行为。现实中保障制度不健全、保障措施不完善、保障功能不给力等问题不容忽视,还存在如数字实践管理平台尚未完全建成,校内外实践教学基地尚未充分搭建,社会热点与国家发展有机衔接的资源库仍有待开发,思政保障工作由“参观式”向“参与式”转变的力度不够等问题。三是履责形式化问题。履责是支持体系最后一道屏障。现实工作中往往由于人情面子、经验主义、形式主义走过场等原因,出现领导力弱化、执行力欠缺、约束力匮乏的现象。“课程思政评价体系要么缺失,成为集体无意识;要么不健全,过于宏观;要么片面,有失合理性。”^[9]“05后”大学生是在多元社会思潮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希望获取的教育信息能用以指导解决现实问题,一旦思政工作者履职不到位或无法解决他们心中存在的实际困惑,教育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也会加剧内容供给与学生需要间的张力。这更说明,思政主体责任建设机制落实和制度化执行度仍存在薄弱地带,育人的持久性不够,长此以往便会对思想政治教育公信力造成损害。

三、新时代地方师范院校思政工作集成创新的推进理路

新时代地方师范院校思想政治工作集成创新,要因应党和国家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高度重视与深远考量,放眼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全要

素的组合优化,促进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及思政引领力的整体提升。

(一)发挥党委集中统一领导效能,着力推进内容体系层面的集成创新

校党委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起着理论决策、统筹协调、优化改进的作用。思政工作改革是党委领导下的高校深化三全育人综合改革中的重要一环。2018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指出:“人才培养体系涉及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等,而贯通其中的是思想政治工作体系。”^[10]校党委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加强党管思政改革,守牢学校意识形态主阵地,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凝聚力和引领力,将思想政治工作列为地方师范院校党政工作要点,纳入学校发展总体规划。同时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思想政治工作各条战线上的内容要素具有互补性与相容性,需要通过匹配形成互补,进行创造性融合;内容要素之间又具有竞争性和协作性,需要通过彼此激励,进行协同合作。

一是对象的集成创新,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网覆盖全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不是单纯一条线的工作,而应该是全方位的。”^[11]¹⁹⁹把全校一切和思想政治教育要素有关的人、事、物调动起来,应紧密跟随学生实际需要,确保思政内容讲授与实际热点相结合,引导学生将思想政治观点内化于心、外化于行^[12]。应树立“大思政课”意识,以课程育人为基础,张罗一张网,下好一盘棋,唱响一首歌,建设好“大课堂”。同时,要兼顾学生、教师和行政人员等不同群体,开展针对性、差异化思想政治教育。重视各类思政“产品”,如案例、文创、教材、新媒体、实践活动的管理和创新。根据不同对象的特点和需求,对教育内容进行选择、加工和更新。关注教育对象的新变化、新特点、新需求,发挥其主体性、整体性、创新性,实现教育整体性与对象个体性的有机统一。二是学科的集成创新。思想政治

教育学科自创立之日起,就不仅包括马克思主义相关学科,还包括政治学、伦理学、心理学等学科。根据“05 方案”,与思想政治教育并列的二级学科还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五个学科,它们都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提供了学科支撑、学术支撑,充实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建设。此外,除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内容集成,还可以促进思政课程与专业课程的内容集成,思政教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的集成,等等。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行融合创新,做好内容要素的优化组合、合理匹配,建立立体协同体系。三是活动的集成创新。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放入时代发展、民族振兴的宏大背景中来看,用集成创新的思想打破传统思想政治工作的边界。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重要论述,开展“五育融合”的教育活动。重视创新创业教育活动,引导大学生参与“挑战杯”“互联网+”“三创赛”等创新创业项目,引导其积极参加暑假“三下乡”和青年志愿服务等社会实践活动,深入工矿企业、边远山区、田间地头了解国情民意,深刻理解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现实意义,提升思政引领实践育人的质量。四是技术的集成创新。紧跟时代步伐,充分应用新媒体和数字化技术,创建多元化育人载体,促进思政内容朝着综合化、多向度、动态化方向发展。通过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动态化传播和双向互动,通过微电影、小视频等数字媒介作品,呈现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教育内容,使思想政治教育生动形象,实现文化育人。重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鼓励教师积极参与网络育人,培养网络教育名师,培育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精品项目,通过线上课程、大学生网络文化节、网络优秀思政作品展播等多种方式,提升师生数字素养和网络文化素养。人工智能的发展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新的机遇,也是需要开拓

新的教育阵地。要积极推动新技术在思政教育工作中的应用,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感和吸引力。

(二)以“大思政课”育人体系构建为契机,着力推进运行体系层面集成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讲:“‘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13]集成创新本身就是一种管理方法,通过要素组合优化来优化运行。高校思想政治体系是一个独特的运行系统,需要格外关注运行体系中的堵点和断层,注重运行子系统之间的功能耦合,不同子系统要环环相扣,在横向联系上形成相互学习、支持、互补的关系链条,纵向上形成顶层设计、执行、反馈的关系链条。通过“大思政”体系的建立,形成运行有序、衔接流畅、彼此贯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运行体系,形成稳定输出和高效运转。

一是形成全课程思政体系。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发布的文件《关于调整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的通知》中,就将教育学、心理学纳入思政教育主要相关学科,因此地方师范院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与相关学科做好衔接,充分借鉴相关学科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做到融合共通。要充分挖掘各门学科的思政教育元素,督促思政课教师和专业课教师主动联合,作为公共课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与专业课程协同教育,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显性课程、隐性课程结合,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课程的深度融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需要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的全过程,融入教育教学各环节,构建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的协同育人体系。以多样化的方法体系传输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以方法服务于内容,渗透式、融合式地进入学生的第二课堂、实习实践和日常生活,在教育过程中形成最优化效应。二是形成全过程思政体系。把立德树人内化到办学兴校的各环节,打破思想政治教育子系统之间的壁垒,形成横向协同、纵向沟通的协作机制。贯通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教师队伍建设、教

学内容选择、教学方法综合、教学场域建设,形成良性闭环、教育生态持续向好的长效机制。突出政治引领,推动思政课、日常教育、课程思想政治协同育人同向同行、同力同质;推动理论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相统一,让大学生在亲身实践中提升学习效果;推动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协同联动和有效衔接不同学段思政学科的育人职能,充分发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对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带头作用。通过整体性思维,优化要素配置,达成有效的话语集成,构建全过程、全链条、全方位的优化运行体系,从而最大化提升思想政治工作整体效能。三是形成全主体思政体系。要打破传统的单一主体思维,高校、家庭、社区、企业、社会组织、政府等都可以成为思政工作的主体成员,要构建党政齐抓共管、师生共同参与、校内外人力资源整合、专兼职队伍结合的多元主体格局,形成全员育人氛围。教师自觉提升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课堂教学、专业教育的责任意识,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教育专长,与学生充分互动、交流;辅导员要积极参与学生寒暑假社会实践活动、“挑战杯”红色专项等项目实践;教师与辅导员之间要加强教学过程互动,全力配合,优势互补,共同指向思政育人目标的实现。四是形成全时空思政体系。时间上,思想政治教育应从课堂上延伸到课堂下;空间上,思想政治教育应从校内延伸到校外。将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发展、国际交流、人类进步相联系,建立“大思政课”研究室、“立德树人”实践体系等,形成全时空“大思政”模式。充分领会和把握教育强国思政引领力的方法论,多措并举,有机融合,如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活动、社会实践锻炼、红色文化陶冶、大中小学一体化育人等融合,构建课内课外、校内校外、线上线下一体化体系。建立地方师范院校与实习基地学校、学生活动实践社区之间的社会化合作,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地方思想政治工作体系之间的互动与合作,建立“主体广泛激活、力量有效联结、对象全面覆盖、工作全程贯穿、要素深度融入”^[8]

的思政教育共同体。思想政治教育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高度融合,形成线上线下一体化工作机制。

(三)按照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要求,着力推进支持体系层面的集成创新

思想政治教育集成创新是一项庞大复杂的工作,良好的运行需要动力机制与保障支持。无论是要素内容的完善还是运行功能的调试,都需要各方面提供支持,从学校思政工作顶层设计、大思政体系构建、思政教育理论研究、思政课教学方案编写、思政工作队伍建设,到财政投入、信息网络服务、制度保障措施完善、监督管理水平提高等,步步把关、层层推进,优化各环节输出,实现功能互补,在大系统中实现全方位互动支持。

一是建立集成创新的保障机制。包括领导制度、组织制度、思政课教学制度、师德师风制度、舆情制度、责任奖惩制度等。通过制度建设推动思想政治工作守正创新、落地见效、保障有力。要平衡好职能部门、二级学院的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倾力合作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思政育人服务。要提升学校后勤、医务、保卫、档案、资助、就业、财务等部门的服务质量,建立专业、高效、暖心的服务体系,融入育人元素,发挥育人功能。如学校心理育人工形成育人、育心与育德的集成创新;财务部门要强化经费投入的育人导向,保障思政教学资金、网络思政设备资金、科研项目资金、实践资金、师资培养资金、红色研学资金的及时到位与规范使用;信息技术体系要为思政教育工作提供技术支持,起到技术优化作用,要加大数字化新技术对思想政治工作的支持力度。二是创建集成创新的激励机制。要形成有效激励的长链条,建立学段贯通的思政课制度,理论导师和实践导师双导师制度,课程思政与心理健康、就业创业的互补制度,学校与家庭、社会、地区联动育人制度等。要大力开展师德师风宣传,厚植家国情怀,发挥师德先进人物的示范带头作用,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骨干分子的导向功能。打造具有良好综合

素养和精湛业务能力的思政育人队伍,为集成创新提供人才保障。三是构建集成创新的评价机制。以评价机制改革为导向引发其他机制改革。将质量评价纳入思政育人综合质量提升过程,将标准化、结果化、指标化的评价导向转变为过程性、动态性、综合体验性的评价导向,尊重师生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获得感、体验感、成长感。注重学生评教和教师评学的调控机制完善,推动评学评教双向联动评价机制建设。落实主体要求,加强统筹调度,落实职责分工,明确各个环节的主体责任,层层传导压力,明确思政工作“责任状”。系统联动实践机制、考核机制、反馈机制,并开展重点督察、专项督察,强化整改责任,做到权责明确、奖惩有序、整改到位。探索系统打造高校思政工作新模式,将思想政治工作成果转化为推动地方师范院校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参 考 文 献]

- [1]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朝着建成教育强国战略目标扎实迈进 [N].人民日报,2024-09-11(1).
- [2]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N].人民日报,2025-01-20(1).
- [3]沈壮海.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研究 [M].武

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

- [4]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 [M].张博树,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 [5]习近平.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 [6]杨晓慧.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J].教育研究,2025(3):11-21
- [7]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 [8]习近平.加大改革落实工作力度,让人才创新创造活力充分迸发 [N].人民日报,2016-05-07(1).
- [9]陈始发,张丽.论全面提升高校教师课程思政建设能力 [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5):182-189.
- [10]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N].人民日报,2018-05-03(2).
- [11]习近平.论教育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
- [12]栾云镪,李前进.青年数字社交的审美意象及实践引导 [J].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4):53-60.
- [13]习近平.“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 [N].人民日报,2021-03-07(1).

(责任编辑 陈晓姿)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的现状与反思^{*}

——基于生命教育维度的思考

盛雨潇^{1,2} 张佳琴³

- (1. 中共南通市海门区委党校, 江苏南通 226100;
2. 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南京 211106;
3. 中共南通市海门区委党校, 江苏南通 226100)

[摘要] 思想道德教育归根到底源自生命发展的需要,因此有必要将生命教育理念融入思想道德教育之中,帮助个体理解生命价值,尊重生命存在,提升生命认知。未成年人作为社会中特殊的群体,针对其进行的思想道德教育长期以来存在生命教育的“空场”现象,缺乏对其生命主体的关注、生命观的塑造和生命关怀的给予。新时代,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应扎根“育人为本”教育理念,回归教育的生命化本质,积极探索思想道德教育与生命教育的融合机制,在理论体系和实践路径上实现新的突破。

[关键词] 思想道德教育; 生命教育; 融合机制

[中图分类号] G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5)06-0083-07

党的二十大报告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图景出发,立足现代化的“人本”之需,以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涵养人的文化、精神、道德素质为目标,强调“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提高人民道德水准和文明素养”,将全体公民的思想道德建设视为全面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关键环节,通过“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的核心手段,为社会群体提供科学准确的价值观指引,夯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一直是新时代公民思想道德建设的重点、难点、堵点,2019年出台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要抓好重点群体的

教育引导”^[1]。未成年人作为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更应成为重点群体中的重点关注对象,家庭、社会、学校等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密切相关责任主体应共同助力引导未成年人“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推动形成较为系统的未成年人道德认知、道德养成、道德实践的教育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发表了一系列“蕴含着丰富的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资源”^[2]的重要讲话,为新时代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提供了根本遵循。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涵盖了筑牢信仰之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内容,尤其注重发挥思想道德教育“立德树人”

* [基金项目] 江苏省党校系统调研课题“海门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的现状与反思——基于生命教育维度的思考”(项目编号:XT24068)。

[收稿日期] 2025-01-08

[作者简介] 盛雨潇,女,江苏南通人,中共南通市海门区委党校讲师,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张佳琴,女,江苏南通人,中共南通市海门区委党校助理讲师。

的导引作用,从价值引领、人格培养、文化熏陶、法治教育等方面,为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提供系统化指导。而对教育本质的透析一直是教育领域的热门话题,反映在思想道德教育层面就是回归对教育本体的探讨,关注教育本体的生命旨趣,以期实现自然生命与价值生命的有机统一。可以说,生命教育既是思想道德教育的基础性工程,也是其目的和归宿,理应给予关注与重视。

一、生命教育的理论根基与价值意蕴

思想道德教育归根到底源自生命发展的需要,因此,关注生命的完整性,尊重生命的独特性,探究生命的价值性,从理性的视角来理解生命的本质才能够准确定位思想道德教育的目的和归宿。生命教育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学者杰·唐纳·华特士(J. Donald Walters)于1968年提出。当时的西方社会正处于混乱动荡期,青少年群体多存在严重的心理问题,药物滥用、吸毒、自杀等现象较为普遍。在此背景之下,华特士开始了对生命教育的探讨,希望能够帮助青少年群体找回生命的意义,实现人生价值。华特士在对生命教育的理论体系建构和实践运用中始终坚守两个原则,一是教育系统的去功利化,“这套教育系统可以帮助孩子做好准备,迎接人生的挑战,而不光是训练他们求职或获取知识”;二是教育的终身性,“不只是学生时代,人的一生都在受教育”^{[3]xii}。在坚守原则的前提下,生命教育的目的在于帮助学生在生命体验中既不违背内在的深层需求,又能够适应快乐生活的现实需求,在以踏实乐观的心态迎接人生之路的同时,能够“以怀疑的态度检视那些不曾被质疑过而代代相传、一成不变的知识内容”^{[3]9},这无疑是19至20世纪,西方盛行的理性主义的有力驳斥。之后,生命教育的概念及其实践开始在欧美各国引起极大关注,并将此作为一种新的教育理念被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在众多欧美学者理论研究和实践推广的不懈努力之下,生命教育逐渐具备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延伸出死亡教育、生命主题教育、家庭生活教育、可持续发展教育、品格教育等多个分支^[4]。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生命教育开始在中国形成研究热潮,并被推广至教育实践领域。生命教育的理念之所以可以在中国获得内生动力不仅是因为时代在召唤对生命及生命本体的关注,还在于生命意识和生命教育的理论精华蕴含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传统生命哲学的主体性地位为生命教育在中国的纵深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根基。相较于西方理性主义的生命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命观更偏向于人文关怀。早在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就开始对生命哲学进行探讨,凸显作为万物之灵长的“人”的因素,形成了以儒释道为代表的多种生命哲学观点,其中蕴含了丰富的生命教育思想。儒家的生命教育注重“性”,包含“人性”“本性”“品性”等方面。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仁”学思想为核心,生命教育的内涵在于“克己复礼即为仁”,本旨则在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强调生命价值的实现应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最终达到“内圣外王”的境界。释家的生命教育注重“修”,“修心”“修神”“修净”,以期达到涅槃之境。道家的生命教育注重“悟”,包含“生命之悟”“境界之悟”“道法之悟”。通过悟道这种思维方式,顺应万物所遵循的自然规律,达到“见独”之境界。由此可见,儒释道各派生命教育观各有特点,儒重“内外兼修”,道重“扬内抑外”,释重“尚内弃外”^{[5]145}。如果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生命教育的本土化发展提供了理论根基,那么马克思主义则为生命教育的本土化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虽然马克思在其著述中未曾系统阐释生命理论,但是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从未偏离对主体“人”的考察。马克思主义生命观是从对资本主义剥削压迫的批判和对人类解放的思考中产生,是对人“异化”的生存状况的剖析反思和对未来出路的合理构思,致力于实现个体生命在人、自然、社会三维和谐统一中的整合性存在,体现了“人本”之质。从这一点来讲,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哲学绝非抽象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因为马克思所理解和阐释的“人”并不是抽象意义上的哲学概

念,而是具有主观能动性和社会交往活动的“现实的人”。作为其生命观重要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生命教育理论,其关注的焦点同样 是“现实的人”,它聚焦对生命意义、价值实现和发展规律的思考,涵盖了唯物辩证的生命发展论,即生命发展及其不断变化的样态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和唯物辩证的历史主体论,即“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人生命的个人的存在”^{[6]23},并以实现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和最终实现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最高理想。

对生命教育概念的界定必然围绕着生命和教育两个中心命题展开。对生命问题的教育化思考是关乎生命完整性的哲学命题,人既是“自然生命和价值生命的双重存在”^{[7]1},也是肉体生命与精神生命、个体生命与群体生命的有机统一体。生命得以教育化的前提在于教育应尊重生命的完整性,将生命视为有机统一体加以考察。同时,对教育问题的生命化思考是关乎教育可持续性的实践命题。教育本就是出于对生命的关怀和对生命周期的循环延续而产生的实践活动,而生命的周期“不仅仅是指将自己的生命延伸到下一代”,“它会沿着个体生命行进然后发生回转,让生命以一种新的形式重新经历早期走过的各个阶段”,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H. Erikson)将这种折返称为“朝向死亡的成长”^{[8]233}。如若教育脱离生命主体,刻意铸造教育与生活的壁垒,必然会影响生命周期的折返,必将泯灭生命在教育中呈现的灵动与创造力,也必然不能实现教育的可持续性。由此可见,生命教育从狭义上来讲,是以生命为基点,通过一系列生命活动以及生命实践活动对个体展开关于生命起源、生命价值、生命态度等维度的指导,旨在引导个体“建立起生命活动的时间与空间的图式模式、认知与思维的智慧模式、情感与价值的意义模式、心理与行为的习惯模式等”^[9],让个体更好地理解由生到死的生命历程,感悟生命的丰富与多样,顽强与脆弱,帮助社会群体形成从认识生命、理解生命再到珍惜生命、敬畏生命的科学完整的生命

脉落。而广义的生命教育则是“把生命教育定位为一种教育理念”而不单单是一种规范化的教育模式^{[10]10},摒弃功利主义倾向,唤醒社会群体自觉的生命意识,重铸多元的生命结构,并实现生命境界的大幅度提升。

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生命的“空场”现象及其反思

2024年10月,世界卫生组织官方网站的数据 显示,“在全球范围内,每7名10—19岁的青少年就有一人患有精神障碍,占该年龄组全球疾病负担的15%”,并且“自杀是15—29岁人群死亡的第三大原因”^[11]。可见,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是严峻的全球性公共卫生问题,更是关乎教育领域的一项严肃性课题。因此,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既是关乎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推动个人身心健康发展关键。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亦被视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环节,在学术层面和政策层面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从未停止,旨在形成符合新时代社会发展规律和未成年人身心发展规律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将生命教育融入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全过程,一方面有利于思想道德教育德育功能的发挥,营造积极向上的家庭、学校和社会氛围,帮助未成年人形成珍爱生命、尊重生命的正确生命观,提升未成年人群体整体的科学文化素质和德行修养品格,具有实践意义;另一方面,对生命教育的理论探索赋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命哲学以现代意蕴,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生命哲学的丰富和发展,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但是目前,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存在生命教育的“空场”现象,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生命主体的“空场”——脱离未成年人的主体性

思想道德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应体现人的主体性,生命关怀的思想道德教育应遵循生命的特性,以全面提升人的生命质量为目的,围绕着未成年人的身心需求、智力水平、审美倾向、价值选择等具体方面展开。但是在实践中,未成年人往往被简单视为“受教育者”或者“被改造者”,教育者多采取单向灌输式

的教育方式,忽视了个体的多样性和能动性,造成个体意识的表达受阻,并未充分遵循个体生命特性和发展规律。但事实上,未成年人是社会群体中极为特别的一支,这种特殊性在心理学层面体现在,一方面,他们的人格和心理具有极高的可塑性。埃里克·埃里克森在其提出的人格发展八阶段理论中指出,人在青少年时期会产生“自我同一性”^{[12][24]},即处于这一阶段的个体会在总结过往经历、现实需求以及未来规划的基础上,对自身的情感、价值、行为、目标等人格因素进行思考和探索,以期在时间维度上形成统一的人格框架。而一旦并未实现统一的人格框架,就会陷入“同一性危机”(identity crisis)^{[13][4-5]}。可以认为,对未成年人进行思想道德教育一定程度上就是为推动同一性的确立而作出的努力。另一方面,未成年人的性格和心理存在脆弱性和不确定性。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指出,未成年人可能存在对成年生活准备不足的情况,这种情况的根源在于这一群体未能接受恰当的训练来应对人生问题,长期处于心理动荡期,容易被不良的外在因素和内在情绪影响身心的健康发展。他认为,“大家都公认青春期是一个非常特殊而又奇怪的时期”,“通常,这个人类生长发育的一个自然阶段被赋予了更多的私人含义,被视为一个性格彻底转变的时期”,但是青春期的现象和表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个人在这样的一个阶段中的期望,他赋予这个阶段的含义以及他形成的应对形式”^{[14][153-154]}。由此,该心理学家强调包括家庭和学校在内的外在因素对未成年人人格塑造的影响。而针对未成年人进行的思想道德教育实质上也是立足于这一群体,依托外部因素包括家庭、学校、政府相关部门和机构对这一群体的道德伦理、理想信念、行为举止等进行正向指引,引导其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二) 生命观的“空场”——缺乏正确生命观建构

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就是生与死的交替过程。在海德格尔“向死而存”的生命哲学观

念中,人一生下来就踏上了走向死亡的路途,但人只有真正面对死亡的时候才能够领悟生的真谛,未知死,焉知生。在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中,虽然将人视为虚无的存在,将生命视为无意义的过程,但人的自由属性却决定了个体能够对自我进行重塑,通过“自为”的介入否定“自在”的虚无,并产生实际的价值,“作为自我基础的自为就是否定的涌现”,“它所否定和消灭的,就是自在的存在”^{[15][125]}。正确生命观的建构意义正是在于帮助未成年人理解“何为生”“为何生”以及“生为何”的问题,感悟生命的价值,并由此激发出个体生命的自为性。但在思想道德教育实践中却缺乏对未成年人生命观的建构。生命观的缺乏不仅存在于思想道德教育这一个领域,也是现代教育中普遍面临的现实困境。在现代教育中,生命观在被规训为工具化和同质化的同时,其真正根基——现实生活世界也被动摇。一方面,在信息爆炸的现代社会,虚拟世界和真实生活相互作用且相互混淆,趋利化的价值宣传直接影响社会群体的价值选择,也使一部分未成年人陷入自我中心的泥淖。另一方面,生命观的构建被等同于知识的灌输,让原本灵性自由、富于创造力且充分具有个体独特性的生命观被符号化,变为课本上冰冷刻板的文字。而生命观的“偏轨”和“异化”则会导致未成年人不能科学认识生命存在的意义与价值,轻则虚度光阴,重则漠视生命。

(三) 生命关怀的“空场”——心理问题预防干预机制不完善

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日益严峻,这一群体处于成长的关键阶段,极易因为缺乏正确的引导和足够的关爱导致负面情绪的出现,产生焦虑、自卑、抑郁等心理问题。因此,及时发现未成年人可能出现的心理问题加以预防干预尤为重要。当前,思想道德教育在心理健康维度尚显不足,未能充分体现对未成年人这一群体的人文关怀,在教育实践中也难以实现对其“知恩、感恩、报恩、施恩”全流程的品德培养^[16],致使教育与生命以及生命本体产生疏离。目前针对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教育机制

尚不完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员问题。具备心理咨询专业资格且能够提供专业化心理咨询的人员较少,难以适配数量庞大的未成年人;二是组织问题,能够起到组织牵头作用的心理健康教育机构较为缺乏,各机构力量分散,相互脱节,难以形成合力;三是教育问题。生命关怀的心理健康教育对减少未成年人暴力行为和违纪行为,提升学校和社会适应性,增强自信心和自制力都具有积极的作用。目前,学校和家庭作为心理健康教育的主阵地,起步较晚、水平较低,许多学校的心理健康课程和心理咨询服务缺乏专业人员指导,存在照本宣科的问题。对家庭中的心理健康教育目前也缺乏相应的跟踪监督机制,“唯成绩论”等忽视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的现状仍然存在。生命教育与基础教育融合度不够。虽然学校开设了道德与法治课程,但是鲜少体现生命关怀。在多数教学活动中,施教者通常默认受教育者的身心状态是健康的,并基于这种假设来设计和开展教学,忽视了生命教育的重要性。

三、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与生命教育的融合机制

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教育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想取得卓越且可持续的效果必须促使多种因素协同发力。“生命教育是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17]36},也是思想道德教育得以长效发力的强大支撑,把生命教育理念融入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既是推动思想道德教育的生命化转变,也是在新时代探索思想道德教育创新实践的有力尝试。因此,应探寻两者之间的融合机制,扎根“育人为本”教育理念,回归教育的生命化本质,依托科学理论指导、平台机制推动、生命关怀教育体系建构的协同发力,打造生命化的思想道德教育模式。

(一)溯源生命理论

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生命观对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的指导作用。在“两个结合”根本要求的指引下,一方面要将马克思主义生命观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体现这一理论的中

国特色和实践特色。在马克思主义生命观视域下,作为生命主体的人也是自然、社会和精神的统一体,其可通过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完成对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的改造。由此可见,要想在对马克思主义生命观的学习和研究中真正汲取智慧,“必须注意由以前知识性的学习模式向人文修养的模式转变,向建立积极而健康价值观的方向转变”^{[18]12}。在将马克思主义生命观融入中国具体实际的过程中,除了要规避西方生命哲学的个人主义困境,也要筑牢同本国的政治格局、经济水平、文化底蕴和社情民意相契合的马克思主义生命观的理论基石,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充分呈现个体生命与自然社会、个人意识与历史进程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道德教育体系,并推动思想道德教育从侧重于德育和智育向关注生命教育的转变。另一方面,要将马克思主义生命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命哲学相结合,把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融入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共同指导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实践。两者相结合首先具有历史必然性,既是“破解古今、中西、体用之争”的必由之路,也是推动马克思主义生命观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必然之举,更是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命哲学在新时代焕发生机的必经之程。其次具有理论可行性,马克思主义生命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命哲学具有高度的理论契合性,两者都是立足于对生命主体之人的关怀,体现了高度契合的核心精神——“以人为本”。最后具有现实可能性,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是以中华文化伟大复兴为支撑和表征,而中华民族走向文化自信也必然要求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确立与巩固。在迈向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中华文化主体性地位的巩固与彰显必然会以开放包容的态度汲取生命教育的先进理念,不断丰富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话语体系。

(二)回归生命教育

明确生命教育的实施原则。在生命教育实践活动中,为确保教育方法的科学性、教育内容的规范性、教育过程的公平性以及教育跨

度的长期性,必须遵循一些特定的基本原则。首先,遵循以生命感染生命的教育方法。生命是最为灵动、最为本源的教育资源,生命中的鲜活经历、生命具有的温度抑或生命的独特体验都能作为生命教育的生动教材。通过生命感染的方式,未成年人能够在生命体验中感知、感悟、感恩生命的纷呈和世界的多彩。其次,遵循全人的教育内容。生命有三重维度,自然、精神和社会^{[7]198-201},生命教育的目的是促进个体的全面发展,因此,其内容就是围绕这三重维度展开,包含人的生理性结构、观念的集合以及社会交往关系。其三,遵循教育过程的公平性。一方面,注重未成年人生命教育的独特性。教育的目的就在于使人成为他自己,未成年人的生命教育不能脱离其个性发展,也不能以人的全面发展掩盖个体的独特性,尊重个性也是一种对生命的尊重。另一方面,注重生命教育的普惠性,不能仅关注“关键少数”,而应让更多的未成年人受惠于生命教育。其四,遵循教育跨度的长期性。生命教育不是阶段性的课程,而应贯穿未成年人成长的全过程,在课堂的互动交流,在生活的细枝末节,在阅读的字里行间传递生命的意义,让这一群体获取美好生命的持久张力。

(三) 凸显生命关怀

将生命关怀融入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是推动教育领域向善、向美、向真发展,最终形成“通达生命”至臻教育境界的基础。其一,必须增加情感投注。提升施教者的共情能力,形成施教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思想道德教育不仅仅是将施教者的知识储备教授给受教育者单向的过程,更应该成为两者相互影响、相互鼓励、相互成长的媒介。通过生命关怀,教育双方能够将生命经历、生命感悟、生命认知以一种流畅平等的方式传递给对方,达到以生命感动生命,以生命引领生命的效果。其二,必须减少机械灌输。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虽然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但绝不能仅局限于思想理论的机械灌输,要摒弃“唯成绩论”“唯教材论”“唯制度论”等错误做法,引导施教者回归生命的本真,因材而施

教,帮助受教育者更好理解与感悟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其三,必须紧贴真实生活。人是自为的存在,并进行着自由自觉的活动,因此,对人的教育必须围绕自为的特性和自由自觉的活动展开。将生命关怀融入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的过程亦是将生命这一宏大课题落地于真实生活的过程。思想道德教育关注的不应是空洞缥缈的生命概念,而是每一个个体鲜活生动的生命体验。其四,必须重视死亡教育。美国心理学家罗伯特·利夫顿(Robert Jay Lifton)曾指出,个体面对死亡会产生“死亡焦虑”(death anxiety)^{[19]70},这几乎是所有人都无法避免的问题。如何正确看待死亡,如何避免死亡焦虑以及如何真正做到“向死而生”,在对未成年人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过程中对这些问题的积极回应,是引导受教育者正视死亡,珍爱生命,在有限的时间里不碌碌而为而有所作为,不好高骛远而行稳致远的关键步骤。

(四) 形成教育合力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的生命化发展需要组织和协调好各方力量,通过搭建平台、建强队伍、凝聚合力来不断丰富生命教育理论和实践内涵,优化生命教育的体制机制。一是要积极整合教育资源。思想道德教育是一项系统的工程,学校、家庭和社会蕴含着丰富的教育资源。因此,需要对资源进行高效整合,在充分利用学校教育资源的同时,发掘家庭和社会具有的教育优势。例如,在家庭中,父母与未成年人之间存在着生理上的血缘关系和心理上的亲密关系,一般来说,相较于学校教师,父母对未成年人的身心发展状况的掌握更为精准细致,也更有利于制定个性化的教育方案,并以方案为媒介传递出生命的价值共识。二是要形成生命教育人才梯队。一方面,既要重视培养具有本土情怀的生命教育人才,又要积极引入具备专业教育和心理知识的优秀人才,建立生命教育师资库。另一方面,要依托生命教育师资库,设置生命教育的专业课程,“以专门的时间,专门的教师系统传授生命教育的知识,进行生命教育的实践训练”^{[10]54}。

三是要更加注重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的现代化转型。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信息化时代，思想道德教育同样面临现代化转型，并逐渐呈现规模化、标准化、精细化特征。同时，还可利用大数据、云计算、AI等现代科学技术帮助构建生命化教育模型。因此，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时代，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的现代化转型一方面要紧紧依靠科技创新，让教育的方法与手段、内容与形式与时俱进，另一方面，也要超越传统教育的局限，依托现代科技破除角色和地域壁垒，形成资源共享、风险共担、利益共赢、价值共识的“生命教育共同体”。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 国务院.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EB/OL].(2019-10-27)[2024-07-30].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9/content_5449646.htm.
- [2] 杨业华,符俊.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的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思想探析[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2):161-164.
- [3] 杰·唐纳·华特士.生命教育[M].林莺,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
- [4] 王兵.幼儿生命教育研究:理论之基与实践之途[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21.
- [5] 胡家祥.中国哲学原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 [7] 冯建军.生命与教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
- [8] 埃里克·埃里克森.整合与圆满[M].王大华,刘彩梅,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
- [9] 陈理宣,曹娟.生命教育:价值意蕴与实践策略[J].中国教育科学(中英文),2024(4):24-32.
- [10] 冯建军.生命教育教师手册[M].太原: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教育出版社,2018.
- [11]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Mental health of adolescents[EB/OL].(2024-10-10)[2024-11-06].<https://www.who.int/news-room/fact-sheets/detail/adolescent-mental-health>.
- [12] 埃里克·埃里克森.童年与社会[M].高丹妮,李妮,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8.
- [13] 埃里克·埃里克森.青年路德[M].舒跃育,张继元,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 [14]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自卑与超越[M].王晓真,译.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20.
- [15] 萨特.存在与虚无[M].陈宣良,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 [16] 柳礼泉,张红明,吴红艳.感恩教育: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路径[J].思想教育研究,2009(2):3-6.
- [17] 宋兴川.生命教育[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
- [18] 刘力红.生命观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探微[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 [19] LIFTON Robert Jay. Revolutionary Immortality [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8.

(责任编辑 陈晓姿)

非遗手工艺融入高校美育的路径研究

云彤麟

(内蒙古民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内蒙古鄂尔多斯 017000)

[摘要] 非物质文化遗产手工艺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蕴含着丰富的美学价值、文化内涵和工匠精神。将非遗手工艺融入高校美育, 不仅是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要求, 也是丰富高校美育内容、创新美育形式、提升大学生审美素养和文化自信的重要途径。在分析非遗手工艺融入高校美育价值的基础上, 深入探讨当前两者融合过程中存在的课程体系不完善、师资力量薄弱、实践教学不足、协同机制缺乏等问题, 并从课程体系构建、师资队伍建设、实践平台搭建、校园文化营造、协同机制创新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融合路径, 旨在为推动非遗手工艺与高校美育的深度融合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

[关键词] 非遗手工艺; 高校美育; 融合路径; 文化传承

[中图分类号] J5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5)06-0090-05

一、非遗手工艺融入高校美育的价值

传统高校美育内容多以西方艺术理论、经典艺术作品为主, 对本土传统文化艺术的关注不够。非遗手工艺种类繁多, 涵盖了民间美术、传统技艺等多个领域, 每种手工艺都有其独特的材质、工艺、造型和审美风格。例如, 剪纸艺术以其简洁明快的线条、寓意吉祥的图案, 体现了民间的审美情趣; 刺绣工艺以其精湛的针法、绚丽的色彩, 展现了细腻的艺术追求; 陶瓷工艺则通过造型、釉色和纹饰, 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将这些非遗手工艺融入高校美育, 能够丰富美育的内容体系, 让大学生接触到更多元化的艺术形式和审美观念。通过学习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非遗手工艺, 大学生可以了解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拓宽审美视野, 打破对艺术的单一认知, 培养多元化的审美趣味和审美能力。

非遗手工艺涵盖了剪纸、刺绣、木雕、陶瓷

等多种艺术形式, 每种形式都有其独特的制作工艺和艺术风格。这些丰富多样的手工艺形式为高校美育教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能够让学生接触到更为广泛的艺术形式, 拓宽审美视野。与传统美育教学中以绘画、音乐等为主的教学内容相比, 非遗手工艺的融入使得美育教学更加多元化, 满足了学生对不同艺术形式的探索需求。不同种类的非遗, 既是不同文化传播的方式, 也是关联不同学生的兴趣所在。为此, 不同的非遗也在不同的知识与教育背景中, 得以被传承与发展。有研究者认为: “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高校美育, 可以通过探究、对比、综合等方式, 让学生认识非遗文化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等各学科之间的联系和互动, 提高学生对非遗文化的认知和理解, 培养学生的跨学科思维和综合能力, 促进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1]由此可见, 非遗融入高校不仅丰富了高校的课程内容, 也

[收稿日期] 2025-09-10

[作者简介] 云彤麟, 女, 内蒙古鄂尔多斯人, 内蒙古民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师。

同时让高校师生加强了各个专业之间的交流与互鉴,不仅促进了学科的融合与发展,也给师生们带来了新的启发。尤其是,非遗中往往涵盖了本土文化基因,以及在非遗的传承中有诸多相关的文化元素也容易被激发乃至创新。

在全球化和数字化时代,大学生面临着多元文化的冲击,部分学生对本土文化缺乏了解和认同,文化自信不足。非遗手工艺作为民族文化的瑰宝,为高校美育提供了丰富的本土文化资源。通过非遗手工艺的学习和实践,能够让大学生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提升审美能力,增强文化认同感和自信心。非遗手工艺是民族文化的结晶,承载着特定地域和民族的历史记忆、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通过参与非遗手工艺的学习和实践,学生能够深入了解本民族的文化内涵,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从而增强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的多样性受到冲击,大学生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力量,培养他们的文化认同感对于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有学者认为:“高校是非遗知识传承与学术研究的阵地。高校凭借深厚的学术底蕴与丰富的研究资源,成为非遗研究的前沿阵地。学者们深入挖掘非遗项目的历史脉络、精湛技艺与文化内涵,为非遗保护提供科学指引与理论支撑,推动其在当代社会的创新发展。”^[2]也就是说,高校不仅是教学场地,更是学术研究的阵地,非遗不仅是传统文化的一个部分,也是高校学术研究的一个部分。高校的学术研究理应援用最先进的方法对传统文化中的非遗进行系统的探索与研究,使其继续焕发生命力,为现代社会发展提供有益的帮助。非遗手工艺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的文化成果,承载着民族的历史记忆、价值观念和精神追求。每一项非遗手工艺都与特定的地域文化、民俗风情紧密相连,是民族身份的重要标识。例如,京剧脸谱手工艺蕴含着中国传统的戏曲文化和道德观念;傣族织锦则体现了傣族人民的生活智慧和民族精神。虽然,有的非遗手工艺可以被机器化所取代,这不仅是现代化发展的趋势,也是非遗与现代

工业化发展相结合的必然现象,不能因此就认为非遗丧失其生命力,或者非遗变质了等不良情况。

在高校美育中融入非遗手工艺,能够让大学生深入了解非遗手工艺背后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渊源,感受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创造力。通过亲手制作非遗手工艺品,大学生能够与传统文化进行深度对话,增强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高校群体是多元的,也是庞大的,非遗或许是小众,但培养学生对非遗的研究兴趣,尤其是手工艺更能激发其动手能力中感知非遗文化的魅力。在全球化背景下,这种文化自信和民族认同是培养具有民族情怀和全球视野的人才的重要基础。

非遗手工艺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其传承和发展离不开具体的制作过程。在高校美育中融入非遗手工艺,能够为大学生提供更多动手实践的机会,让他们在亲身体验中掌握手工艺的制作技巧和方法。通过裁剪、缝制、雕刻、烧制等一系列实践操作,大学生的手眼协调能力、精细动作能力和空间想象能力得到锻炼,实践能力得到提升。有研究者认为:“利用高校科研优势,开展大中小一体化美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对美育课程教材、教育教学、教师成长等方面展开一体化研究,构建大中小共建、共生、共育的美育理论与实践体系。基于高校美育理论与科研优势,加强美育一体化顶层设计。围绕新时代新文科对美育提出的新要求,以大美育的交叉融合、协同共享、创新发展为主要内涵,将其融入大中小学美育的各方面、各环节、全过程,并开展学术科研课题研究。”^[3]很显然,非遗不能突然降临于高校,成为美育的内容之一。非遗既是传统文化之一,也是本土文化发展中的一种现象,那其所在的地方中小学美育教学中就应将其纳入教学课程体系之中,这样或许非遗成为部分同学的兴趣所在,甚至成为其独特的童子功,也为高校美育中的非遗课程提供了基础。

同时,非遗手工艺的传承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不断创新中发展。高校美育可以引导大学生在学习传统手工艺的基础上,结合现代

审美观念、科技手段和生活需求进行创新实践。例如,将传统剪纸图案应用于现代包装设计,将刺绣工艺与现代服饰设计相结合,将陶瓷工艺与现代家居用品设计相融合等。这种创新实践能够激发大学生的创新思维,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和能力,使非遗手工艺在当代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二、非遗手工艺融入高校美育的现状及问题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非遗保护和美育工作的重视,部分高校开始尝试将非遗手工艺融入美育教学中,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课程设置有所突破。一些高校开设了非遗手工艺相关的选修课或通识课程,如“中国传统手工艺鉴赏与实践”“民间剪纸艺术”“陶瓷工艺基础”等,让学生有机会接触和学习非遗手工艺知识和技能。二是实践活动逐渐开展。部分高校通过举办非遗手工艺工作坊、讲座、展览等活动,邀请非遗传承人进校园进行现场演示和教学,为学生提供了实践和交流的平台。例如,有的高校定期举办“非遗文化周”活动,展示各类非遗手工艺品,并组织学生参与制作体验。三是校地合作初步探索。一些高校与地方政府、非遗保护机构、非遗传承人建立了合作关系,开展非遗调研、传承基地建设等项目。如高校组织学生深入非遗产地进行实地考察,与传承人合作开展手工艺创作等。尽管非遗手工艺融入高校美育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从整体来看,两者的融合还处于初级阶段,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有研究者指出:“全国范围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工作的开展,都陷入了相同的困境中,即非遗技艺被简单视为历史遗留而束之高阁。”^[4]这种情况确实比较普遍,甚至国家承认其非遗,只是给予尊重,并非就是非遗的最佳发展前景。

目前,虽然部分高校已经开始尝试将非遗手工艺融入美育课程,但课程体系还不够完善。一方面,课程设置缺乏系统性,往往只是开设一些零散的讲座或短期的工作坊,没有形成完整的课程体系。学生难以深入学习非遗

手工艺的知识和技能,无法全面理解其文化内涵。另一方面,课程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不足,一些课程只是简单介绍非遗手工艺的表面形式,缺乏对制作工艺、历史文化背景等方面的深入讲解,无法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

实践教学是非遗手工艺融入高校美育的重要环节,但在实际教学中,实践教学往往缺乏深度。部分高校的实践教学仅仅停留在让学生简单模仿制作非遗手工艺品的层面,没有引导学生深入探究制作工艺背后的原理和文化内涵。此外,实践教学的资源有限,缺乏专业的工作室、设备以及足够的实践材料,限制了学生实践能力的提升。同时,实践教学与市场需求脱节,学生制作的手工艺品往往缺乏市场竞争力,无法实现从实践到应用的转化。有研究者指出:“当今非遗工艺面临着多方面的困境,仅凭手工艺人出于责任感传承传统,不足以让非遗工艺在喧嚣的当代社会立足。传统工艺势必要在保留核心特征和精神的基础上适应新时代的发展潮流,不断创新和演变。”^[5]这是高校研究非遗的主要任务,也是非遗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任何知识与技能如果不能适应当下的发展与需要,同样会面临淘汰的可能。这其实也是非遗在发展过程中能否具有应用与转化的能力的问题。

对于非遗手工艺而言,是否具有应用转化的能力,是否具有市场竞争力,既是非遗手工艺自身生命力因素,也是高校教学中应该引起重视的环节。学以致用,是衡量高校教育质量的主要标准之一,也是高等教育专业设置的主要价值标准。教与学,其实是关联两个方面,教的质量是与师资队伍素质存在主要关联的,学则是与学生的学习能力、学习态度、学习兴趣等因素密切相关。当然,学生学习的主要动力还与所学专业的实用性、市场认可度,以及就业等问题相关联。或许有些人会认为高校教育太功利了,其实,高等教育承担为社会培养有用人才的职责,试想高校培养的学生不能适应社会工作需要,也没有适合就业的机会,这不仅是专业设置的不合理,也是高等教育的失误。因此,高等教育不仅是专业设置的问

题,也是师资队伍配备的问题。

师资是教学质量的关键,但在非遗手工艺融入高校美育的过程中,师资队伍建设相对薄弱。一方面,高校中专业的非遗手工艺教师数量较少,大多数教师缺乏系统的非遗手工艺知识和技能培训,难以胜任相关课程的教学工作。另一方面,邀请校外非遗传承人进行教学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时间安排不灵活、教学方式难以适应高校教学环境等。此外,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缺乏对非遗手工艺教学方法的创新和研究,影响了教学效果。也有人持这样的观点:“非遗的表现形式多根植于传统文化土壤,传统性强,内涵丰富。它的表现形式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和互动元素,这对于生长在现代文化环境中的观众来说,尤其是年轻一代。观众在欣赏非遗手工艺时,大多处于一种难以深入参与的被动观赏状态,进而对蕴藏在非遗背后、制作工艺复杂的深厚文化底蕴难以深刻理解。”^[6]这些思考具有一定深度,也是非遗所存在的比较客观的情况。为此,急需探讨非遗手工艺在融入高校美育课程体系中的路径问题。

三、非遗手工艺融入高校美育的路径

高校应根据自身的办学特色和学生需求,构建完善的非遗手工艺美育课程体系。首先,在课程设置上,应包括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理论课程可以涵盖非遗手工艺的历史文化、艺术特点、传承发展等方面的知识,帮助学生全面了解非遗手工艺。实践课程则应根据不同的非遗手工艺类型,如剪纸、刺绣、木雕等,设置相应的制作课程,让学生在实践中掌握技艺。其次,课程内容应注重深度和广度,不仅要介绍非遗手工艺的基本制作方法,还要深入讲解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审美价值以及与现代设计的结合应用。此外,课程体系应具有层次性,从基础课程到进阶课程,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例如,对于没有基础的学生,可以先开设基础的非遗手工艺鉴赏课程,激发学生的兴趣;对于有一定基础的学生,则可以开设进阶的制作课程和创新设计课程,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研究者陈洁认为:“中国传统工艺的创新关键在于形式的创新,要从设计、产品的角度出发,使非遗工艺融入我们的生活场景中,让传统工艺焕发出新的生机,使非遗的当代表达和当代表现越走越宽、越走越好。”^[7]中国传统工艺的创新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非遗能够继续发展的需要,尤其是形式创新,只有形式创新才能符合现代人的审美与生活需要。在高校的实践教学中,对于非遗手工艺的形式创新必然成为核心课程,也是非遗作为课题研究的价值体现。

实践教学是提升学生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环节。高校应加强非遗手工艺的实践教学,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首先,要加大对实践教学资源的投入,建设专业的非遗手工艺工作室,配备齐全的设备和丰富的实践材料,为学生的实践创作提供良好的条件。其次,在实践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引导学生深入探究非遗手工艺的制作工艺,不仅要让学生学会制作,还要让学生理解制作工艺的原理和技巧,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同时,鼓励学生在实践中进行创新,结合现代审美和科技手段,对传统非遗手工艺进行改良和创新。此外,加强实践教学与市场需求的对接,通过与企业合作、参加各类设计比赛等方式,让学生了解市场需求,提高学生作品的市场竞争力。例如,学校可以与当地的非遗企业合作,建立实习基地,让学生参与企业的实际项目,将所学知识应用到实际生产中。

师资队伍建设是推动非遗手工艺融入高校美育的重要保障。高校应采取多种措施,强化师资队伍建设。首先,加强对校内教师的培训,定期组织教师参加非遗手工艺的培训课程和学术研讨会,提升教师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水平。同时,鼓励教师开展非遗手工艺教学方法的研究和创新,提高教学质量。其次,积极引进校外专业人才,邀请非遗传承人、民间艺术家等担任兼职教师,为学生传授原汁原味的非遗手工艺技艺和文化。此外,建立校内教师与校外专家的合作机制,共同开展教学和科研工作,促进校内外师资的交流与合作。例如,学

校可以设立非遗手工艺大师工作室,邀请非遗传承人入驻,与校内教师共同指导学生的实践创作。

校园文化活动是非遗手工艺融入高校美育的重要载体。高校应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营造浓厚的非遗文化氛围。首先,可以举办非遗手工艺展览,展示学生的优秀作品以及各类非遗手工艺品,让学生在欣赏中感受非遗手工艺的魅力。其次,组织非遗手工艺比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新热情,为学生提供展示才华的平台。此外,还可以开展非遗手工艺讲座、工作坊等活动,邀请专家学者和非遗传承人进行现场讲解和指导,让学生近距离接触非遗手工艺。例如,学校可以定期举办非遗文化节,集中展示和推广非遗手工艺,吸引更多的学生参与到非遗传承与创新中来。有研究者指出:“民间美术作为活态文化,其传承需要‘保护—创新—传播’的完整链条。数字化整合有利于实现文化基因的保护,浸润式课程可促进文化创新与价值内化,校社协同构建文化传播的生态网络。三者共同作用,使民间美术在数字时代实现创造性转化,最终达成美育浸润的文化育人目标。”^[8]很显然,这些论述是比较合理的,也是当下高校美育可以有效实行的举措。其实,学校主要是教学研究的主要阵地,对于市场与社会传播还得需要企业与地方政府的支持与合作。

校地合作能够整合高校和地方的资源,为非遗手工艺融入高校美育提供更广阔的空间。高校应加强与地方政府、文化机构、企业等的合作,共同推动非遗手工艺的传承与发展。首先,与地方政府合作,开展非遗项目的调研和保护工作,为地方非遗传承提供智力支持。同时,争取地方政府的政策和资金支持,推动非遗手工艺在高校的普及和发展。其次,与文化

机构合作,共同举办非遗文化活动,如非遗文化展览、演出等,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此外,与企业合作,开展产学研合作项目,将高校的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产品,推动非遗手工艺的产业化发展。例如,高校可以与当地的文化企业合作,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非遗文创产品,实现文化与经济的双赢。

[参 考 文 献]

- [1] 苏莉.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高校美育的路径探索[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1):148-151.
- [2] 吕欣欣,刘圳科.高校非遗工艺传承机制与创新路径探讨——以掐丝珐琅为例[J].文化月刊,2025(7):35-37.
- [3] 胡泊,梁靖悦.构筑新美育空间赋能大美育实践——“G-M-S-U”美育共同体生态育人模式[J].天津美术学院学报,2025(2):17-20.
- [4] 董瑞子.基于绘本美育功能的非遗传播方式——以安徽芜湖铁画技艺为例[J].长春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57-63.
- [5] 陈赟冰,史清源.定格动画在非遗工艺社会美育中的应用与实践研究[J].装饰,2025(3):110-116.
- [6] 魏佳.美育视域下人工智能会展赋能非遗传播的策略研究[J].中国会展(中国会议),2024(12):50-52.
- [7] 陈洁.传统工艺与材料研究文旅部重点实验室举办非遗遇上定格动画工作坊[J].装饰,2024(9):4-6.
- [8] 郭萌.数字化时代民间美术的美育浸润路径与创新策略研究[J].新美域,2025(6):54-56.

(责任编辑 南山)

屈大均赋作中的遗民心态与处世哲学

陈为兵 安宁娅

(贵州财经大学文学院, 贵州贵阳 550000)

[摘要] 屈大均的赋作通过对诗教传统的溯源与演绎表露出隐逸思想, 又通过微观物象描写与身体政治隐喻, 折射出易代之际士人的处世哲学与遗民心态。通过经典重构、物象隐喻与身体叙事的方式, 屈大均的赋作以较隐性的方式表现出明清之际遗民士人的时代困境、价值选择与生存智慧。

[关键词] 赋; 遗民心态; 生存智慧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5)06-0095-06

屈大均(1630—1696), 字翁山, 广东番禺人, 与陈恭尹、梁佩兰并称“岭南三大家”。其一生跨越明清两朝, 经历了鼎革之乱、家国破碎的剧痛, 曾弃儒归佛, 又弃佛归儒, 这种特殊的人生际遇使其文学创作呈现出复杂的精神维度。赋作为其文学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 既延续了汉魏赋体体物写志的传统, 又融入了鲜明的时代特征与个人生命体验。屈大均的赋作存于《翁山文外集》中, 有《诵诗赋》《陋巷赋》《寄居羸赋》《四一画像赋》《藏发赋》五篇。如果说屈大均的诗歌以岭南的雄直诗风表现出其忠君报国、保持道统的遗民之志, 那么其赋作则以较隐性、迂回的方式, 于更深的层面体现以屈大均为代表的遗民在政治暴力中的民族气节与生存智慧, 以及在文化认同上的分裂与重构。张惠言在《七十家赋钞序》中强调“赋者, 诗之讽谏……以情为表, 以礼为职。”^[1]于此而言, 屈大均的赋作便可以为大夫。目前学界对于屈大均的关注主要在于其生平交游考与诗文研究, 对于他的赋尚未有人展开。鉴于此, 从儒家文化传承、生命哲思建

构与时代政治隐喻等角度对屈大均的赋作展开论述, 揭示其赋作中的文化认同、人生哲思与易代悲情, 窥探其中的儒家文化坚守, 可为其相关研究提供新的素材, 亦可丰富明清岭南赋的研究。

一、经典溯源中的隐逸思想

明末清初的“天崩地解”不仅是政治秩序的坍塌, 更是文化道统的危机。顾炎武云“亡国与亡天下”^[2]⁵²⁷, 其时, 清廷以剃发易服的政治规定摧毁汉族衣冠制度, 规训广大士人并消解其文化主体性。在道统危机的焦虑中, 诸多士人往往选择从传统经典中寻找精神依托。《诗经》作为儒家诗教的源头, 其温柔敦厚的诗学精神与“邦有道则仕, 邦无道则隐”^[3]¹²⁰的处世智慧, 成为屈大均重构遗民伦理的核心资源。通过对经典的创造性转化, 屈大均在圣学榛芜的乱世中建构起兼具抵抗性与超越性的精神世界。

屈大均在《诵诗赋》中开篇即言“翳毛诗之三百, 多招隐之篇章”^[4]²⁵², 以《毛诗》为创作渊源的同时, 又将招隐主题纳入儒家诗教体

[收稿日期] 2025-09-05

[作者简介] 陈为兵, 男, 山东五莲人, 贵州财经大学文学院教授。

安宁娅, 女, 贵州遵义人, 贵州财经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

系。“硕人宽其未央”“乐衣巾之綦缟”^{[4]252}等诗句通过对《诗经》的化用,重申了儒家穷则独善其身的价值取向。另外,赋中还化用了《诗经》意象,如“菑女桑十亩,时闲而执筐”^{[4]252}就化用了《幽风·七月》的田园图景。又如“与子逝兮勿返,冒零露兮微行”^{[4]252}化用《诗经·郑风·野有蔓草》,以招隐为核心,将《诗经》中的田园意象转化为遗民士人拒绝清廷征召的精神符号。这种对经典的援引并非简单的文本复制,而是对招隐主题进行重新阐释,赋予其明清易代的现实内涵。在明末清初的乱世中,屈大均借“招隐”表达其对高洁人格的坚守,将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哲学转化为对遗民精神的守护,使经典文本在新的历史语境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屈大均的隐世心态在其诗文中早已显现,在《七子之堂记》中更是有“宁为辟世,勿为辟人”^{[4]32}的立场。屈大均欲以避世的态度宣示其不仕新朝的立场,实现其全身存道之志。但他的隐逸并非单纯的避世,而是交织着儒家淑世理想与遗民气节的复杂姿态。如“岂君子而素食,负四体之方刚”^{[4]252}一句,以反诘语气揭示隐逸者内心既不愿屈从新朝,又不甘虚度此生的矛盾。

这种避世矛盾在《陋巷赋》中进一步显现。《陋巷赋》以“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3]85}的典故为心意象,借孔颜精神重申安贫乐道的价值取向,强调在困厄中坚守道德自律的重要性,实现了儒家伦理精神的个体化诠释。赋中通过“客”与“予”的对话,将陋巷与华山的险峻路径并置:“上穿阴井,下踏飞桥,横度则厓磨吾鼻,直度则石束吾腰”^{[4]255}的华山之险,象征着乱世中的生存困境;而“两壁相夹,中裁容人”^{[4]256}的陋巷,则成为其精神淬炼之所。赋中以二尺许的狭窄陋巷象征明清之际遗民的生存困境,又以“太华之门户”“深渊薄水之矜持”^{[4]256}为喻,将陋巷升华为自我道德修炼之地。于此,屈大均便将颜回的隐逸精神从抽象的文化符号转化为具体的生存实践,提出“欲学孔子,先学颜子;欲学颜子,从陋巷始”^{[4]256},通过回溯颜回安贫乐道的经

典形象,将隐逸转化为一种以儒家伦理为内核的精神抵抗,实现了个体生存策略与儒家价值体系的辩证统一。

《寄居嬴赋》虽未直接描写屈大均的隐逸思想,但其对寄居嬴追逐名利的批判,以及对自守与不贪的肯定,均与隐逸思想的精神内核相契合。此赋以寄居嬴为载体,通过“大者信信,小者宿宿”^{[4]257}“与尔相触,如彼井蛙”^{[4]257}等描写,将生物特性与人类社会的功利追逐相类比,暗含着对争名逐利世风的批判,与隐逸思想中超脱世俗的价值取向一致。“与鹬相持,或遭一啄”^{[4]257}一句化用《战国策》“鹬蚌相争”的典故,申明应坚守儒家的安命之道,暗含对贰臣投机行为的批判。又如“闭户自防,亦如魁蛙”^{[4]257}的自保倾向,闭户自防既是对寄居蟹生理习性的描写,也可映射士人在乱世中独善其身的心理。隐逸思想常包含不慕权贵、退守自守的特质,如陶渊明桃花源式的避世,此处自防的生存策略便与其相似。

此外,《四一画像赋》中对四位妻子的身份排序(先娶王氏,继娶黎氏,再纳两位侧室),亦暗含《春秋》嫡庶有别的等级秩序。赋中“一即四,四即一”^{[4]258}的核心命题,化用《周易·系辞》“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5]243-244}的宇宙观。表面是解释四位妻子合为一像的艺术构思,实则隐喻屈大均对当时华夷之辨的辩证思考:明朝虽亡(四之离散),但儒家文明(一之本体)却从未消亡,反而通过遗民的坚守实现一以贯之的延续。这种分而不离的思维,既回应了清初满汉一体的政治宣传,又以经典话语构建起形散神不散的文化认同逻辑,为遗民在分裂的现实中提供着统一的精神慰藉。《藏发赋》中“毁伤之辜,孰不可哀”^{[4]253}的叩问,直接援引了《孝经》“不敢毁伤,孝之始也”^{[6]5}的训诫,将剃发行为定性为对孝道的背叛。赋中写藏发于自然,以草木沐浴,与自然草木为伍,暗合庄子万物一体的隐逸哲学,通过将头发嵌入自然空间,完成了对政治场域的物理逃离与精神疏离。

不论是《诵诗赋》与《陋巷赋》中对儒家精神的直接化用,还是《寄居嬴赋》《四一画像

赋》中借用经典意象的隐秘表达,这种对经典的创造性诠释,既延续了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又赋予其明末清初特定历史语境下的隐逸内涵。这种赋学书写策略,既延续了屈赋香草美人的比兴传统,又展现了遗民士人在政治威权下的文化坚守与精神突围。屈大均认为天、道一体,道统高于治统,道统可离治统而存,道统存,则疆土虽失而天下不亡,只要华夏道统学统不断,治统即可失而复得。^{[7]295-312}因此,屈大均这种以赋解经的书写策略,本质是遗民士人在道统与政统断裂之际的自救,不是被动注释经典,而是主动以生命经验演绎经典,让儒家文化思想在乱世中获得新的阐释维度,最终实现其以道统存天下之志。

二、微观物象中的处世哲学

明清易代的政治及文化高压,迫使广大士人在“大叙事”崩塌后转向“小物”书写。屈大均的赋作亦拒绝宏大空洞的政治抒情,转而聚焦于头发、寄居蟹、陋巷、画作等微观物象,将日常微观物象转化为承载个体命运与时代精神的书写载体。这种书写策略既源于《诗经》比兴传统的美学影响,亦与晚明心学“满街都是圣人”^{[8]373}的平民哲学深度契合。翁山的道统观和他对道统传承谱系的丰富既有对过去传统观点的继承,也有自己基于时代背景对这一问题的新的思考。同样的时代背景和时代问题也深刻影响了他对佛教、明代心学和阳明后学的理解和态度。^[9]在清廷文化高压下,士人无法直接言说政治立场,遂以体物为言志之具,在小的维度中开辟思想的广大天地,通过微观物象符号构建了一个“小物体—大世道—深哲思”的叙事体系,展开关于生命与政治的哲学思考。另外,屈大均借体物而写的志渗透着易代之际的文化剧痛,早已超过了传统赋作中多为个人仕途感慨或儒家治世理想的志,其超越了个体命运,升华为对文明存续的关怀,契合着刘勰“情以物兴,物以情观”^{[10]136}(《文心雕龙·诠赋》)的辩证关系,且因时代悲剧更具苍凉厚重之感。

在《寄居羸赋》中,屈大均对寄居羸及其生存环境进行细致描摹,既展现了寄居羸世界

的生存细节,又映射出乱世中知识分子对生命状态、处世哲学的深刻思考。赋中细致描绘寄居蟹“托彼空羸,以为伸缩。戴之而行,毋使颠覆”^{[4]267-257}的生存状态,表面写物,实则喻人。“弃朴取华,一往不复”^{[4]257}一句亦在批判世人对物质名利的盲目追逐,“鹦鹉之羸,脱殼出暴求食,须臾丧其残殼”^{[4]257}一句则以其悲剧警示贪欲之害。与此同时,作者对寄居蟹与海镜“生死不离,同室于谷”^{[4]257}的共生关系的赞美,既暗含了对超越功利、坚守本真的理想人际关系的向往,又有个体命运无法逃脱社会大背景的无奈感慨。赋作以海洋生物的“纷葩水澳”^{[4]257}映射人间世相,将寄居这一微小行为提升至世道人心的高度。如“盗止皮毛,已莫能赎。宁知不贪,金乃桎梏”^{[4]257},从贝类因“壳”招祸,推及世人因名利伤身,体现屈大均以小见大的批判意识。屈大均借微观生物的生存逻辑,解构个体于宏大历史进程中的价值迷失,重构以节义为核心的精神秩序。

这种将微观物象上升至哲学层面的书写,暗示着屈大均的艰难生存现实之外,亦体现了他对生命本质与处世之道的深刻思考:寄居蟹无壳需托壳,看似被动,却通过“戴壳而行”实现移动与防御,体现依附中的生存主动性。这一矛盾映射出遗民的处世策略:在改朝换代的高压下,部分士人选择隐于朝或隐于市,表面依附新政权,实则以“壳”为屏障守护精神独立。赋中“壳”既是生存必需的庇护所,也是束缚自由的枷锁。“寄居”也成为遗民身份困境的具象化表达——既需依附新政权生存,又面临“失壳”(失节)的道德危机。遗民借壳(如科举、仕宦)维持生计,却需警惕沦为壳的奴隶,在“依附”与“自主”间寻找微妙平衡。此外,赋中描写贝类“与月长亏,魄难缩肭”^{[4]257}“闻雷口开,互焉勿复”^{[4]257},其生命随自然节律起伏,暗示在广阔宇宙中个体生命的脆弱性。这与明末清初动荡时局中士人人生如寄的感慨相呼应,皆体现对生命短暂的敏感,蕴含对短暂与永恒的生命思考。

《藏发赋》以头发为切口,以友人藏发这个具体行为为切入点,展开深刻的生命隐喻与

政治批判。赋中“发兮发兮，吾为子悲。子何不幸，以至于斯”^{[4]253}的慨叹，将头发这样一个不太起眼的身体组成物转化为抵制文化规训的符号。作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6]12}的儒家伦理载体，头发在清初“剃发令”的推行下成为民族认同与文化尊严的象征。屈大均以细腻笔触描绘剃发之痛：“刀硎新发，犀利为期……濡缕血出，丹溅燕脂。连心之痛，惨不可治。小若针刺，大则创痍”^{[4]253}，通过身体创伤的书写，隐喻清廷对异族文化的暴力改造。而“子独爱惜，为蒙嵌巘。有生所积，半白半黧。自少至壮，一缕不遗”^{[4]254}的藏发行为，则以身体物质留存，构建起对抗文化同化的精神堡垒，体现出遗民士人形骸可屈，精神不屈的生命哲学。赋作以“铢黍”“毫厘”等极微量词形容头发，却在叙事中不断赋予其“巨”的意义。“毁伤之辜”^{[4]253}关联孝道伦理；“完耏鬓”牵涉法律尊严；“索头有国，实逞淫威”^{[4]254}将个人剃发行为上升为民族文化的高度。屈大均便以这种“以小见大”的书写策略从发丝之微上升到了到伦理之巨，政治之巨，甚至哲学之巨。在此，通过微观物象照见宇宙真理的思想，佛教对屈大均思想的影响亦得以印证。《藏发赋》的辩证性本质上是遗民文人在文化断裂期的精神突围：通过解构头发的物质性与象征性、抵抗性与妥协性、恒定性与流动性，构建起一个充满张力的意义空间。这种思维将屈大均的内心坚守完美彰显，既以“藏发”仪式锚定文化根脉，又以“剃发”书写叩问文明韧性，最终在“痛”与“尊”“守”与“变”的撕扯中，完成对清初政治暴力与文化认同危机的超越。

《诵诗赋》在招隐的出世情怀中隐含着对君子不素食的人世期待；《陋巷赋》将陋巷的逼仄与太肆的险峻对比，得出“祸患尝生于所忽，而戒慎必始于至微”^{[4]256}的生存智慧；《寄居羸赋》通过“奇者寄生”与“贪者招祸”的对照，揭示了“安室利处”与“忘其非肉”的矛盾困境。而在《四一画像赋》中，屈大均更是以“神无二则，形亦无二”^{[4]258}“一即四兮非虚，四即一兮非实”^{[4]258}的哲学表述，将个体生命

升华为家族精神的集体象征，暗合着多民族一体的传统宇宙观。这种以家喻国的叙事策略，使私人化的悼亡赋具有了公共文化抗争的意义。当清廷试图通过“剃发易服”瓦解汉族宗法制度、规训社会时，屈大均却以个体与家族记忆的重构，在文化废墟上重建士人的精神世界。这种辩证书写不仅是屈大均的个人心路写照，更折射出明清易代之际士人阶层的集体精神困境与智性突围。

三、身体叙事中的政治隐喻

“夷夏之防”与“君臣之义”的冲突，构成明末清初士人无法回避的伦理困境。屈大均既身负反清复明的政治使命，又面临“食明禄而守明节”的文化责任。其赋作中出现的“剃发之痛”“陋巷之窘”“画像之思”，本质上是文化认同危机的文学投射，而如何在此危机中重构文化体系与完成身份建构便成了遗民士人的精神困境。福柯认为身体是权力的表现形式，社会通过对身体的规训和控制实现对个体的管理^[11]，屈大均的《藏发赋》与《四一画像赋》便以个人身体叙事与私密情感抒发为切入点，结合明朝覆灭与清初遗民的历史语境，揭示了士人如何在清廷的文化规训中通过文学创作完成文化认同的重构与身份的主体建构。

顺治元年（1644），摄政王多尔衮在给故明内外官民的谕旨中下令：“凡投诚官吏军民皆着剃发”，强制汉人剃发，强行改变民族习俗。顺治二年（1645）六月十五日，清廷在消灭了南明政权之后严令“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借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12]。“剃发令”这一政策不仅是对身体发肤的物理改造，更是对汉族衣冠制度、礼仪文化的内在规训。“束发戴冠”作为儒家礼仪之邦的核心符号，突然变为落后与抗拒的标志，土人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文化认同危机。顺从则代表背叛儒家文化传统，抵抗则意味着面临生命威胁。在这一背景下，屈大均的《藏发赋》以友人藏发这一私人事件为切入点，将个体身体实践升华为集体文化抗争的象征。当官方将毛发定义为政治服从度的

测量标准时,士人以“半剃半藏”的策略,在留发与留头的二元选择中成功开辟出第三条道路,既避免了直接冲突,又留存了文化基因。赋中以“形如马鬣,树以龟碑”^{[4]254-255}类比墓葬仪式,将头发的保存转化为对儒家文化的衣冠冢式的纪念行为,暗合着顾炎武“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2]的理念。通过身体残骸的物理留存“自少至壮,一缕不遗”^{[4]254},实现对清廷去历史化统治的潜在抵制。正如赋中所言:“誓将腐肉,以饱狐狸。惟留爪发,用镇月氏”^{[4]255},头发在此成为超越身体的文化符号。即便肉身消亡,精神性的文化符号仍可镇住异族的文化霸权。当清朝强制推行“金钱鼠尾”式剃发时,头发便成为士人们文化认同的虚拟战场。“无发则雄,有发则雌”^{[4]254}的性别倒置隐喻,揭示出剃发令不仅是对身体的改造,更是对儒家伦理秩序的颠覆。赋中详写士人被迫“薙发”的锥心之痛:“阳未癥病,顷刻生荑。弃者已矣,存者忸怩”^{[4]255},以及对头发的墓葬仪式:“终晨三省,抚之涕洟。惧终澌灭,不可久稽。亦欲大葬,以告孙支”^{[4]255},既是对清廷文化暴力的血泪控诉,也是遗民士人在“形骸俱毁”困境中,以身体为最后的战场、以仪式为武器的抵抗宣言。

这种以身体记忆对抗政治遗忘的策略,与顾炎武“保风俗、保文化”的思想形成呼应。因为不得不藏,所以这种抵抗是被迫的,但是士人以藏为抗,所以也是主动的。于其中,士人在文化认同危机中的复杂心态又体现出来。既无法以武力恢复旧朝,便转而在身体层面进行隐秘对抗。然而,这种抵抗也暗含困境,当“藏发”成为无奈的生存策略,其仪式性难免带有悲情色彩。但恰恰是这种困境中的坚持,凸显了遗民士人文化精神的强大。正如赋中所体现的发可藏,心不可亡,身体仪式的最终指向义,在于证明在坚韧的文化认同下,政治强权的威慑显得多么短暂。作为明朝遗民,屈大均的赋作中始终萦绕着黍离之悲与身份焦虑。《诵诗赋》中“恐薄寒之相中,欲遗子兮衣襡”^{[4]252}的忧思,《陋巷赋》中“如深渊薄水之矜持”^{[4]256}的戒慎,本质上是遗民在新朝政治

高压下的生存警觉。《寄居羸赋》中“海人执之,泥淤三沐。易殽以金,俾之塌蹴”^{[4]257}的描写,暗喻遗民在时代洪流中的被动处境,其对寄生状态的复杂书写,实则是对自身“非肉非壳”的边缘身份的无奈自嘲。而在《四一画像赋》中,屈大均以情抗理,以私代公,通过对四位亡妻的深情书写,以家庭记忆抵抗历史暴力,以情感解构政治,将政治认同与社会道德危机转化为个人伦理情感的追问。

在《四一画像赋》中,四位亡妻的形象被赋予超越个体情感的文化象征意义。她们的早逝“何赋命皆不长兮”^{[4]258}暗合明王朝覆灭的集体创伤,而“王与黎其皆丙戌”“梁以是冬而出其门”^{[4]258}等时间叙事,实则是将家族史嵌入明末清初的动荡史观。妻妾作为传统家庭伦理的核心载体,被升华为以家庭伦理维系文化道统的抵抗策略,在家国同构的传统语境中,守护家族记忆即守护文化根脉。画像中“眉长短以皆连蜷兮,湛流波而咸美”^{[4]259}的容貌描绘,表面是对女性的描述,实则隐含对传统审美的追忆。如对“芙蓉肥而不伤于肉”^{[4]259}的丰腴观与“琅玕瘦而不见其骨”^{[4]259}的清瘦观的坚守。在儒家事死如事生的观念下,画像不仅是情感寄托的载体,更是维系家族文化认同的物质载体。在明清易代的语境下,当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发生剧烈冲突时,对亡妻的追念便成为屈大均逃离现实压迫的心理通道与抒发政治悲痛的渠道。赋中“时懽情以交接兮,非探汤之战栗”^{[4]258}的描写,打破人神相隔的传统认知,构建起生者与亡灵的超验对话。这种对话具有双重政治隐喻,一是对清廷的隐性抵抗:当现实中士人无法公开表达对故明的忠诚,便转向幽冥世界寻求精神共鸣。“似尔我之无分兮,生与死而皆胶漆”^{[4]258}的深情告白,既是对亡妻的眷恋,更是对故明生死不渝的政治誓言。二是对遗民伦理的重构:“受孤儿之属累兮,免寒饥而无术”^{[4]258}的困境书写,将私人领域的丧偶之痛与公共领域的遗民之责交织。

明清鼎革对于儒家“大一统”观确实带来了冲击,也出现了短暂的断裂^[13]。面对文化

断层与价值崩塌的危机,屈大均在赋作中通过对经典的重新诠释,自然意象的哲学思考与身体符号的政治书写展开文化认同的重构实践。《诵诗赋》以《毛诗》为精神原乡,《陋巷赋》以孔颜之道为价值坐标,《寄居羸赋》以海洋生物为哲学载体,均体现了其在乱世中守护文化根脉、建构精神家园的努力。《藏发赋》以身体书写直接控诉清廷的政治文化暴力,呈现士人宁为玉碎的激烈抵抗心态。《四一画像赋》则通过对个人私密情感叙事的迂回表达,借对家族伦理文化的认同与对亡妻的思念表达对儒家传统文化的坚守与对旧朝的缅怀,体现出士人的民族气节与生存智慧。在历史道运碾压个体道统的背景下,屈大均通过以小见大的书写策略在明清易代的宏大叙事中融入士人个体的心灵史,这种在危机中建构意义、在乱世中坚守信仰的文人姿态,不仅奠定了屈大均赋作的精神高度,更是彰显了中国士人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文化韧性。

屈大均的赋作深刻展现了明末清初士人心态的复杂性,“仲雍断髮,逃于蛮倭。尔岂让国,文身是师”^{[4]253}(《藏发赋》)以仲雍典故提出隐逸的道德正当性,折射出遗民对不仕二朝伦理的坚守与对社会责任感的纠结,映射出其时士人的仕隐之困。“存则吾与朝夕,没则以之殉葬焉。”^{[4]258}(《四一画像赋》)表现出他们于天崩地裂时代的生死之思。屈大均的赋以经典溯源为文化根基,以微观物象为辩证载体,以时代困境为现实观照,构建起一个融儒家诗教、隐逸精神、生命哲思与文化认同于一体的复杂叙事空间。此种“有层次可分的赋”^{[14]701}于层层递进中形成了“体物—写志—喻世”的三重叙事维度。其赋作不仅是个人生命体验的文学表达,更是明清易代之际士人精神世界的缩影。在儒家传统与时代变局的张力中,屈大均既坚守着穷则独善的隐逸精神,在内疚于现实责任的同时又试图通过文学创作实现文化认同的重构与生命价值的超越。其作品中的自然书写与生命感悟构成了明清之际知识分子精神史的重要切片,从另一种文

本回答其“逃禅”之不得已,也通过文化追溯与政治隐喻重现出易代背景下的士人遭遇与心态。他通过赋体物写志的特性,将个体的精神挣扎升华为对民族文化命运的深刻思考,为明末清初士人精神史提供了鲜活的文学注脚。其作品中“以赋存史”“以赋言志”的创作取向亦彰显着中国古典赋学在乱世语境中的创新路径。

[参 考 文 献]

- [1] 张惠言辑.七十家赋钞[M].天津图书馆藏.
清光绪四年(1878)宏达堂刻本.
- [2] 顾炎武.日知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 [3] 论语[M].北京:中华书局,2006.
- [4] 屈大均撰.欧初,王贵忱主编.屈大均全集:第3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 [5] 王弼撰.周易注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12.
- [6] 邢昺疏.李隆基注.金良年校点.孝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 [7] 王富鹏.屈大均与明末清初岭南诗派[M].北京:中华书局,2023.
- [8] 王阳明撰.于自力,孔薇,杨骅骁注译.传习录[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
- [9] 王富鹏.略论屈大均的道统观及其对于明代心学的态度[J].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1):13-17+92.
- [10]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 [11] 蓝江.身体的祛魅与生命政治的诞生——解读福柯的三次里约热内卢州立大学讲座[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5):39-49.
- [12] 蒋良骥.东华录(卷五)[M].清抄本.
- [13] 冯贤亮.“大一统”:明末清初的王朝鼎革与地方控制[J].社会科学文摘,2025(2):45-47.
- [14] 孙福轩,韩泉欣.历代赋论汇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责任编辑 南山)

论《儒林外史》中的“财利破家”

李 鹏 王 仁 静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北京 102206)

[摘要] 在《儒林外史》的家庭书写中,财货利益常常驱动家庭成员主动毁坏家庭关系。这种财利破家现象揭示了婚姻论财风气、治生压力及妻权外寄等社会经济因素对于家庭的冲击。财利破家在文本叙述中的艺术功能也不容忽略。小说前三十回中,经济利益伏于儒家礼仪之下,对破家产生了实际的驱动作用;但在四十八回王玉辉的故事中,经济利益又成为破家的表面借口,遮盖了儒家礼仪的自我瓦解。

[关键词] 《儒林外史》； 财利破家； 社会经济； 叙述反讽

[中图分类号] I207.4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5)06-0101-09

儒生的交游和人物的外部社会关系是《儒林外史》重点表现的内容,但书中许多人物的家庭关系与夫妻关系也描写得十分精彩,以之为据可对小说人物的形象与儒林社会的内在肌理作更深的抉发。关于《儒林外史》的家庭研究已经十分丰富,这些研究多以文史互证的方法探讨儒林家庭与明清社会经济的联系,对展现小说家庭的文本形式讨论较少^①。与其他世情小说一样,《儒林外史》的现实婚姻摹写与才子佳人式的浪漫爱情书写大不相同——婚姻不幸、伦常扭曲以及家庭关系破裂的情节频繁出现,使得“破家”成为一个值得讨论的小说母题。关于明清小说的“破家”研究前人已有涉及,如项裕荣曾针对《聊斋志异》和《金瓶梅》中的破家现象展开讨论,但他

对于“破家”的定义浮游不定,只是趋于关注夫妻婚姻中的重大矛盾^②。

现代汉语大词典中,“破家”有三种内涵:耗尽家产、毁坏家庭和败落残余的家底。^{[1]2560}其中第一种含义较常见,俗语中所谓“败家”与之类似,如《韩非子·显学》云:“儒者破家而葬,服丧三年,大毁扶杖,世主以为孝而礼之。”^{[2]1129}但从字词本义理解,“破家”的“耗尽家产”内涵可能是“毁坏家庭”的引申义,因为经济条件对于家庭的维系和毁坏起着根本作用。我们所谓的“破家”就是指“毁坏家庭”,指人物毁坏小家庭的行为;从静态的角度理解,“破家”也即“家破”,表示小家庭破裂的趋向或者状态。广义的破家书写不必确保所写家庭的完全破裂,凡是难以解决的重大家庭矛

[收稿日期] 2025-07-11

[作者简介] 李 鹏,男,江西于都人,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教授。

王仁静,男,山西高平人,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

^① 例如顾鸣塘将小说中反映的儒生婚姻礼俗、家庭关系、士绅治生收入、物价支出等内容与清代历史史实进行了详实的对比。参看顾鸣塘:《〈儒林外史〉与江南士绅生活》,商务印书馆,2005年。

^② 参见项裕荣:《清代文言小说“破家”母题研究——由〈聊斋志异〉管窥清初文人对婚姻制度的反思与突围》.学术论坛,2012年第1期;项裕荣.《〈金瓶梅〉“财货”叙事与“破家”母题解读——试论明代世情小说中经济因素对婚姻伦理的解构与冲击》.北方论丛,2016年第3期。

盾皆可视为对于“破家”的描写。

《儒林外史》中的“破家”虽往往与经济利益有关,但是真正因经济崩溃而家庭毁灭的例子并不多。书中的“破家”往往被描述成财利诱惑下的主动选择,而不是人物于家庭破产后的被动接受,笔者将这种破家现象总结为“财利破家”。对书中“财利破家”现象予以必要考察,既可对明清时期夫妻之伦所受的财利冲击有更深理解,也可由之展开对《儒林外史》叙述艺术的探赜。

一、《儒林外史》中的“财利破家”情节

如前所述,作为一种动原引发的行为,“财利破家”当定义为家庭成员于财利诱惑下对家庭关系的毁坏。若要厘清小说中“财利破家”的具体形态,我们不妨先以“破家”行为的主体类型作讨论。在书中,“破家”行为往往由家庭中的一方发起,我们可称之为“破家者”;而另一方则可视作家庭原有秩序的维护者。接下来我们将分别展开讨论。

(一) 财利诱夫

破家的形态之一是“夫”对原家庭的叛出,具体可表现为男子逃家、重婚与骗婚。古代婚姻制度并不是简单的一夫多妻制,而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家庭中只能有一位正妻。当已有正妻的男性不能纳妾时,就可能采取隐瞒欺骗的手段进行骗婚,原家庭则因丈夫的重婚分崩离析。《儒林外史》中季苇萧本与王典史之女成婚,却又在扬州招亲于尤家,此即一例。季苇萧追求的是美色风流,而女子的丰厚资财也往往招引已婚男性的追求。《金瓶梅》中西门庆对孟玉楼和李瓶儿两位寡妇的迎娶也起于他对二人丰厚家财的贪涎。《儒林外史》中,丈夫受财利诱使而转娶新人者,并未能如西门庆般保全原家庭,更多是对于以《包公案》中陈世美为代表的书生重婚情节的因袭。

吴敬梓在匡超人与牛浦郎的身上都设置了这一桥段。匡超人在潘三的介绍下与郑老爹女儿成婚,结婚购房花去了他替考得来的二百两银子。他受召入京后又背着妻子与老师李给谏的外甥女辛小姐成婚。与第一次成婚的庞大开支不同,这次婚姻中他不仅得到辛小

姐的“数百金装奁”,成婚的费用还都由妻舅李给谏承担。牛浦的重婚也与此类似,祖父死后,牛浦典当了香蜡店和住所,带着剩下的“四两银子”与贾氏住进了卜家腾出的一间房,后续牛贾夫妇一直由卜家供养。而在与黄氏结亲后,牛浦的岳丈是安东县的戏子行头经纪,黄家“把门面一带三四间屋都与他住”^{[3]299}。不同的婚姻导致人物经济状况产生巨大损益,吴敬梓对于这些细节的呈现映射出财利金钱对于人物破家行为的影响。

牛浦于重婚之前就逃离了原家庭,而丈夫逃家的情节也发生在陈思阮身上。岳丈骂陈思阮:“每日在外测字,也还寻得几十文钱,只买了猪头肉、飘汤烧饼,自己捣嗓子,一个钱也不拿了来家。”^{[3]653}陈思阮最终入庙出家。他并不是已看破红尘,而是欲解除自己对家庭的经济责任,以治生得利全然供养自己。

(二) 财利供妻

封建时代的家庭分工下,古代女性很少能抛头露面供养家庭,婚姻对家庭经济能力的要求通常转化为女方对男方经济情况的要求。而当男方无法达成这种要求,矛盾和争吵自然接踵而来。破家者是一个具有道德批判意义的角色类型,上述情况中破家者于夫妻双方转换的关窍在于,妻子的经济要求是否是为了她奢侈的个人享受。吴敬梓在书中描写的鲍廷玺与胡氏,即是妻子的高奢消费导致男方无法达到赡养其人的要求,使得家庭摇摇欲坠的典型例子。胡氏从小生活在官宦人家,从小就养成奢靡的生活习惯。在她成为寡妇后,又卷走了王三胖的一匣子金珠首饰,这些钱支撑她每日奢靡享乐,不事生产,直至嫁给鲍廷玺害了病,每剂药都要五钱银子。两年后家财耗尽,鲍廷玺只能不断奔波,寻找谋生的本钱。

另一对情人,陈木南和娼妓聘娘也算一例。此二人的故事是对才子佳人传统模式的戏仿,他们虽未组成家庭,却都怀揣对于爱情的向往,有着组建家庭的欲望。正是现实的经济原因打破了这一幻想,组建家庭的失败也是破家的表现。聘娘的生活十分精致,从卧房的家具布置到生病所用的药材,都豪奢非常。文

中写她来到来宾楼，“自此孤老就走破了门槛”^{[3]637}，以至于面对丁言志的二十个铜钱，她完全不屑一顾。她的情人陈木南虽是宦官纨绔，但他借的四百两银子，于半年内已经全部耗费在她身上，二人的爱情却依然没有结果。陈木南首次进入来宾楼，进见礼就花去了近二百两，而给聘娘赎身也需数百两白银。聘娘始终没有自由身，来宾楼剥夺了她的经济所得，也助长了她的消费欲望。

(三) 财诱姻亲

从小家庭的组成到与大家族的分家，宗亲始终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鲍胡夫妻成婚源于鲍老太和归姑爷的撮合，后来胡氏患了病成为家庭的经济负累，鲍胡夫妻又被二人赶出了大家族。财利诱使宗亲协力转变小家庭形态。

丈夫死后，寡妇守节，转而为家族抚养嗣子，小家庭就以新的形态存续下来。如《清稗类钞》“巢节母抚两代孤”条记载，寡妇巢氏甘愿守节，为家族两代人抚养子嗣^{[4]3071}。类似的记载不胜枚举。然而，小家庭成员的死亡意味着大家族的财产产权关系的继承和转移，这也牵涉到其他宗亲的利益。譬如《金瓶梅》第七回写孟玉楼携财再醮，亡夫舅舅张四就有破亲之意，其后竟当街坊的面拦亲。张四抚养着孟玉楼亡夫的亲弟弟杨宗保，却只分得几间房屋，还继承了外甥三四百两银子的负债，而孟玉楼“手里现银子也有上千两”^{[5]117}，遗产之争致亲人反目。但值得说明的是，古代社会如孟玉楼这般成功转移小家庭财产到新家庭的寡妇是少数。在财利诱惑下，反而是寡妇的经济权益易受到宗亲的觊觎和侵夺。《儒林外史》第六回中，严监生和儿子相继去世，赵氏成为严家财产的所有者。大伯严贡生为侵夺这份财产，不断攻讦赵氏只是妾室，不承认她已经扶正。严贡生从县、府，一路告到京师，逼得赵氏只分得三股家产“私过日子”^{[3]234}。另外，小说第十九回提到，乡里人施美卿想把守节的弟媳卖给黄祥甫，弟媳不愿，施美卿便要硬来。虽然亡夫的直系亲属拥有寡妇再醮的主婚权，但像此类为牟取聘财将亲人当作商品的行为确已脱出法理之外。

不光是宗亲，外亲也对小家庭的命运有很大影响。牛浦和卜家兄弟的决裂是他逃家的起始，陈思阮也是在与岳父的争吵中决定出家。小说中对范进岳丈胡屠户的塑造更为典型。胡屠户对待中举前的范进百般羞辱，后人多解为悭吝势利。书中的胡屠户指责范进：“（我女儿）自从进了你家门，这十几年，不知猪油可曾吃过两三回哩。”^{[3]37} 小说对范进妻子的描摹之语更是可怜：“鞋也没有一双，夏天靸着个蒲窝子。”^{[3]51} 胡屠户指责辱骂的底气在于，家庭的穷困处境被轻松地解释成范进的失责，而胡屠户可以成功地充当着女儿权益的维护者和家庭责任的监督者。在胡屠户的前倨后恭的描写中，财利对健康家庭人伦的损伤也展露出来。再说回严监生，妻子王氏重病将死时，严监生欲扶正赵氏，却怕族人多话，便用大把银两将妻子的兄弟王仁、王德笼络一番。王仁、王德竟主动提出要在亲妹妹重病时大办赵氏扶正的婚礼。王氏最终孤独地死在亲戚环簇的典礼上。

如上所述，《儒林外史》全方位地展现了财货钱利对于破家的重大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一些破家虽与经济利益有关，但仍不属于我们所说的“财利破家”。如第四十回所叙沈琼枝的逃婚也是一处破家书写，此虽与宋为富的财势有关，但并不可简单归入财利破家。第二十五回的倪霜峰卖子属于家庭破产导致的破家。第四十八回王三姑娘殉节破家虽牵涉家庭治生，但也不属此类。对于这些破家，笔者在后文中会加以讨论。

二、财利破家与社会经济

(一) 成家条件：婚姻论财

婚姻论财是从古至今的风气。陈鹏在《中国婚姻史稿》中分析了古代的婚姻形态，指出“财婚”是平民百姓婚姻之常态。所谓财婚，即“以资财为婚姻成立之要件也”^{[6]129}。古代六礼之一纳采礼便是婚姻论财的滥觞。财婚风气兴起于汉末，宋代商品经济发达，财婚发展到高峰。元代以后，此风已然过滥。《元典章》记载元代将聘财征税，列入杂课，与买卖等同。^{[7]903} 明清时期虽然官方意识形态对财

婚多有禁止,但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资本主义的萌芽,在吴敬梓生活的江南地区,婚姻论财的风气反而愈发普遍。如《杭州府志》记载:“杭俗婚娶论财,女多愆期不归。”^{[8]6236}又云新城县细民“婚媾论财”,“因嫁破产甚至甘于溺女”^{[8]4313}。《宁国府志》亦记载:“宁俗冠礼不行,婚姻競聘物嫁资。”^{[9]907}

因财成家,也会因财而破家。财婚首先导致了择偶标准的混乱。顾鸣塘对《儒林外史》中的财婚现象多有论述,他指出小说第四十四回所叙五河县外来富商方家与本地士绅余、虞二姓结亲,表现了财婚对于门第婚的冲击。而鲍老太太为鲍廷玺续妻时,即使知道胡氏不贤,依旧坚持娶她,看中的就是她的上千两陪嫁。^{[10]30}从“古人重嘉耦”到“今人重财婚”^{[11]836},在择偶的考量条件中,儒家道德的位置被经济条件所挤占,在家庭组建后的维系过程中,“夫义妇顺”传统伦理道德的影响也会大大变弱。小说专门描写了胡氏嫁入鲍家后对南京新媳妇下厨风俗的敷衍,实际上点出了财婚对于婚俗家礼及其维系的传统家庭形态的摇动。同样,传统门第的婚姻限制也受到财利的冲击,二者抵牾亦会致使破家。门第是一个复杂的概念。隋唐以降,“高门”逐渐由世家变为诗书传家的科举家族。至王阳明提出“四民异业而同道”的新四民论,商贾和财利不仅在社会中,更在儒家士大夫心中提高了地位。陈鹏指出清代江南士大夫婚嫁仍重门第,“此所谓门第云者,仍不外官宦世族……即士庶贫富之别也”^{[6]68}。然则明清时期,从事举业的人口大增,以“士”自居的贫儒寒生大量涌现,科举官僚和白身穷儒的分野愈发明晰,所谓“士庶贫富”,实则是两个标准。《儒林外史》中就有诸多穷儒人物,在门第的考量下,穷儒家庭居于一个十分尴尬的位置。小说中,审理沈琼枝案的江都知县都不免惊呼:“沈大年既是常州贡生,也是衣冠中人物,怎么肯把女儿与人做妾?”^{[3]502}宋为富自称“一年至少也要七八个妾”^{[3]501},骗娶贡生女做妾竟似理所应当,正显现出当时财婚泛滥成灾。而沈琼枝的逃婚行为也是出于她对旧的科举门第荣誉的守护。

财婚的另一影响是使得贫家因婚娶费用而难以结婚。书中的牛浦与贾氏的成婚也明显受到财婚之风的影响。书中第二十一回,牛老爹道出了不给孙子娶亲的原因:“我这小生意,日用还糊不过来,哪得这一项银子做这一件事?”^{[3]265}可以说,牛贾夫妻的成婚的起源就是卜老承诺这门亲事“一个钱也不消费得”^{[3]265}。财婚盛行下,平头百姓们娶妻的花费越来越贵。书中虞博士成婚(除去房费)也花费了三十两左右。根据王跃生对刑科题本档案的统计,全国 14 例初婚财礼中耗费最多的位于浙江金华县,高达 40 两。福建、江西个别地区财礼的实际资费甚至更高^[12]。山西地区受晋商行贾影响,《稷山县志》记载,明朝时当地“世俗论财,婚姻失时”^{[13]545}。又《杭州府志》记载:“杭民多半商贾,耳目奢声色之好,口腹恣刍豢之味……冠婚丧祭,宴饮酬酢无不踵事增华,虽素封之家,不出数年立见萧索。”^{[8]4298}乾隆朝重臣陈宏谋在任江苏巡抚期间发布《陈文恭公风俗条约》,首条即云:

一嫁娶惟应及时,奢侈徒耗物力……迎娶之彩亭鎔轿,会亲之酒宴赏犒,富贵争胜,贫民尤效,揭债变产,止图一时美观,不顾八口家计……贫家聘奁各随其力,所重婚娶成礼,何在炫耀美观?富者为子女惜福,贫者亦免债负。只闻因嫁娶多费而家道消乏者,鲜见因嫁娶美观而从此发达者,何其愚也。^{[14]146}

财礼、奁金以及婚礼的耗费越大,就越会形成恶性循环的怪圈。本就在温饱线上挣扎的贫家,不得不为延续家族而变卖资产、负债结婚,反而导致了家庭经济受创,家庭破裂在即。小说中写牛贾结亲,即使婚礼已经十分寒酸,还是累得牛老爹卖了家中囤积的几石粮食,之后仅几个月的时间,香蜡店的本钱就折损七成。匡超人入赘郑家数月,具体写明的花费有十二两聘礼钱、一身新衣钱、四十两典房钱、轿子钱、二百钱的开门钱、宴请邻里之钱、两石米钱和若干桌椅家伙钱。加上未写明的钱,竟然统共耗尽了二百两银子。这巨大的婚姻耗费和婚后家庭经济的紧张,也为匡超人的

重婚埋下伏笔。

(二) 家庭维系：治生压力

自周进始，《儒林外史》就着重描摹穷儒们的经济困境。至小说第二十五回写道，老秀才倪霜峰靠修补乐器治生，因缺衣少食不得不卖掉自己的四个孩子。这是小说中为数不多的被动破家，对穷儒经济困境的书写也达到了最惨烈的程度。本文讨论的财利破家中，人物看似都有选择的余地，但这种余地究竟留有几何？潜伏在人物选择下的经济压力究竟多大？我们首先对穷儒的治生情况略做讨论。以虞博士为例，小说第三十六回写道：

(虞育德)又做了两年，积攒了二三十两银子的馆金，在祁家旁边寻了四间屋，搬进去住，只雇了一个小小廝……娘子生儿育女，身子又多病，馆钱不能买医药，每日只吃三顿白粥，后来身子也渐渐好起来。^{[3]444}

第四十六回，虞博士与杜少卿分别时道：

我本赤贫之士，在南里来做了六七年博士，每年积几两俸金，只挣了三十担米的一块田。我此番去……再积些俸银，添得二十担米，每年养着我夫妻两个不得饿死，就罢了。^{[3]563}

根据顾鸣塘的考证，虞博士所云保证夫妻每年不得饿死的五十担米，约合 41.67 石，折合成银子是 54.17 两^{[10]140}。以虞博士年轻时期的花费来看，每年三十两银子足够让夫妻二人和小孩吃饱，还能豢养一个小廝，但此费用已经紧张至“不能买医药”。据学者方行的估计，清代江南浙西地区农户一般的耕地规模大概是 10 亩左右，五口的农民家庭一年的收入约为 39960 文，包含 21 石粮食收入和 20 斤织丝收入^[15]。而一年的消费包含 18 石口粮及相关杂项，共计约 32.6 两^[16]。由上可见，像虞博士这样的学官每年也只得五十两左右的俸禄，而这些钱仅堪供养小家温饱，与普通农家相差不多。至于坐馆教书这样的治生手段，书中如周进这样的老童生，每年馆金只得 12 两银子，只勉强供得自己一人生存，还远不如农家。

贫儒们辛苦一生，也不过是在温饱线上挣扎，家庭的困境也由此展开。以匡超人为例，出身贫寒的他用尽了各种治生手段谋利：柴行记账、拆字、养猪杀猪、磨豆腐卖、操选政、伪造朱签、替考。在匡超人婚后，替考得利耗尽，他只得通过操选政维持家庭，实际上这是十分紧张的。书中写他在六日里连夜工作，得利 2 两。这个速度不能一直保持。倘按文翰楼所计划的半月为期，且每月都有文章选，匡超人勤奋一年也不过 48 两银子。但是如马二先生到杭州去就发现“没有甚么文章选”^{[3]185}，并不总是能有文章供选家批。可以想见匡超人婚后的经济压力，同时也伏下他之后的重婚选择。潘三事发后，匡超人吓得即刻要入京，此刻积累的经济困境摆在眼前：他此行没有路费，再者家庭没有储蓄，郑老爹那边“也是艰难日子”^{[3]251}，妻子和女儿难以生活。匡超人就此做出了最经济的选择：典当房产得四十两银子，拿走“几两”作路费，剩下添到匡大酒店里，强令妻女去东西低贱的乡下老家生活，日用支取匡大账上的钱。此后匡超人入京重婚，“享了几个月的天福”^{[3]253}，回乡却发现郑氏已死。

郑氏之死或是书中最大的疑案。但如果从经济的角度切入或能提供一种解释。此处于两项关键数字叙述者语焉不详。一是四十两银子里郑氏最终支取了多少钱？二是匡超人究竟离乡几月？假如匡超人口中作路费的“几两银子”不超 10 两，那剩下的 30 两银子也足够郑氏和女儿生活一年以上。虽然匡大对弟媳死因的叙述中无一字提到钱，但根据他的交代可以明确：一是城里人郑氏做不了乡下的劳动，匡大账上的钱只出不进；二是郑氏着急病死，她的后事处理因“家里一个钱也没有”而动用了匡母的棺材本。这桩阴云笼罩的公案充满了叙述者的诡计，但第二条信息实际上表明，至郑氏死亡，匡大账上可供母女日用的钱已经耗尽。依照以上细节推断，钱财空耗甚至耗尽、乡村中治生手段的匮乏以及匡二的杳无音信使得郑氏面临严峻的生计问题，恐怕这才是她心里着急的根本原因。

细读匡超人的破家历程，家庭的经济困境始终作为暗线深伏其下。儒生的治生手段和家庭的经济压力相关联，同时为人物的破家选择创造了动机。

(三)关系失衡：妻权外寄

古代女子要遵守三从：未嫁从父，已嫁从夫，夫死从子。在传统伦理影响下，妻权的实现很大程度上要受到男性的保障。具体而言，在家庭内部，妻权的实现需要依靠娘家的保障。例如，小说从未对夫妻人物作正面的争吵描写，即使是在对鲍廷玺夫人胡氏的悍妇描写下，胡氏也从未与鲍廷玺爆发正面的冲突。在传统伦理下，夫妻间的矛盾常常转化为丈夫与岳丈、舅爷等之间的冲突。当家庭对丈夫的经济要求没能得到满足时，妻子对丈夫的直接督促明显违背了“妇顺”的要求，只有借助娘家男性力量的参与，才能最终实现对夫妻关系的劝进和规范。范进与胡屠户、牛浦郎与卜家兄弟、陈思阮与岳父之间的矛盾都可划入此类。而在妻权对娘家亲属的依赖下，如妻子的兄弟或父亲又很容易将妻权的行使权滥用以谋财利，反而埋没了妻子的真正的声音。王仁、王德便是例证。

在小家庭外部，妻权的获取又需要依靠夫权和子权。赵氏儿子死后，她想找大房的第五个儿子承嗣。立嗣过继在明清时期亦是惯例，清律规定，“无子者，许令同宗昭穆相当之侄承继，先尽同父周亲。”^{[17]179}而妾是“没有取得所谓宗族观念秩序之家中地位的女性”^{[18]444}，并无宗族的承嗣权。严贡生将赵氏降格为妾，就是要将立嗣权从赵氏身上夺回。下人们称严贡生“到底是个正经主子”^{[3]86}，显然赵氏在失去儿子和丈夫后，大伯严贡生介入，家中权力便从她流向另一位男性。历代法律都对寡妇继产的权利有所保障。《元典章》中有“寡妇无子承夫分”一条^{[7]682}。《大明令》中记载，“凡妇人亡夫无子，守志者，合成老分”^{[19]239}。清律规定，“妇人夫亡无子守志者，合承夫分”^{[17]179}。随着严贡生的攻讦，赵氏对亡夫财产的合法继承权也被夺走。此外，清律规定：“其孀妇自愿守志，而母家、夫家抢夺强嫁者，

各按服制照律加三等治罪。”^{[17]207}期亲私受聘礼、买卖寡妇的行为是违法的。小说中施美卿强嫁弟媳的故事素材源于冯梦龙《警世通言》卷五《吕大郎还金完骨肉》^{[20]39}，其事在明清时期并不少见，《盛京通志》中亦记载一例：

王福妻臧氏，广宁人，夫卒，臧氏守节，自誓事姑高氏，以孝闻居数载。邑人闻其贤，欲娶之，知氏不可夺，乃谋氏兄，私纳其聘。臧氏向姑泣曰：妾以姑缺养，未忍与夫同死。今不得侍姑矣。遂自缢。^{[21]1400}

可见，在封建制度下，妻表面上符合与夫齐体的地位，但无论在家庭内部还是外部，妻权都不得不向外寄托，从而为财利诱惑下的姻亲破家提供可乘之机。

三、财利破家与叙述反讽

李桂奎指出，“从经济生活的视角切入文学研究既有着充分的学理依据，也有着广阔的学术前景”，但此类研究应该避免“以小说证史”的风气^[22]。因此要避免这一风气，还应回归小说文本，考察财利破家的艺术功能。

(一)财利破家与小说结构

在《儒林外史》的结构研究中，小说第三十回所叙莫愁湖大会和第三十七回的泰伯祠祭礼是两个重要的节点。书中的财利破家书写按出现在书中的位置显现出某种规律性：沈琼枝、陈思阮、聘娘三个例子出现在泰伯祠祭礼之后，此外前所举出的所有例子都出现在前三十回。这种规律与《儒林外史》全书的结构不乏暗合之处。

倘若以整体的眼光关照小说的家庭书写，不难发现在前三十回中，作者让家庭伦理经受了两次冲击。第一次冲击直接来自财利之风的影响。从赵氏扶正、鲍廷玺续妻的婚礼和赵氏分家的家庭诉讼中可以看出，儒家礼法实际的运作法则已然沦为金钱交易。但是反过来，人物追逐利益的诸多活动都依靠儒家家礼展开，即使败絮其中，家礼仍然不断在表面、口头上运作着。

第二次冲击则来自儒生功业所附加的尊卑秩序。所谓功业的附加秩序，就是儒生们做

举业或做名士中所携的身份政治等级。这种政治性的等级秩序总是由人物的私欲操使利用,充当了破家者与原家庭割裂的表面理由。譬如匡超人羞于将差役家庭出身的原妻透露给李给谏,后来又用《琵琶记》中“蔡状元招赘牛相府”一节为自己的重婚开脱。季苇萧同样以“才子佳人”一说为自己的重婚开脱。又如牛浦在与董孝廉会面时嘲讽卜信“不知体礼”,礼在这里不是指家礼而是指尊卑秩序。这种尊卑秩序与家庭秩序的对撞下,财利破家以更加隐幽的方式发生了。因为儒生操持尊卑之礼切割原家庭,其真实的目的包含了对财利的追求。

商伟在《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中认为,小说头三十回描摹了儒家“二元礼”的疯狂和失序。所谓“二元礼”,就是指儒家礼仪具有“道德”和“功利”的二元属性:“在坚持儒家伦理道德准则的名义下,文人没完没了地搬演着儒家家礼以及其它仪式,但这最终不过是为了确保他们在权力和财富的争夺中稳操胜券。”^{[23]17}正如商伟所说,在二元礼的反讽语境下,无论是利用家礼来直接揽财还是利用尊卑之礼来倾轧家庭之礼,都揭示出儒家家庭伦理的废弛和失败。

第三十一回至第三十七回,财利破家以及病态家庭关系在小说中消失了,杜少卿、庄征君、虞育德的和谐家庭依次出场,儒家夫妻之伦仿佛重振。有趣的是,杜少卿是以“败家”的大老官形象出场的,他无节制地解囊助人,致使家财散尽。杜少卿又十分孝顺,他疏财的对象多是同父亲有旧交的故人:“但凡说是见过他家太老爷的,就是一条狗也是敬重的。”^{[3]381}《儒林外史》中,“拥有道德和叙述权威的传统叙述者退场了,听凭小说人物篡夺了传统叙述者在呈现和评估他们时所使用的儒家语言”^{[23]95}。历经前文中娄氏兄弟的反讽叙述,受叙者们不免对杜少卿的仗义和孝顺产生怀疑,他就算不是虚伪邀名,是否也可称之为愚蠢?同时一个悖论也就此形成:为了行孝而散尽家财,这究竟是不是败家?在精神上维护“孝”的家庭伦理而在现实中抛舍祖上基业,

这本身就营造了一个反讽的语境。而前三十回的铺垫足以令隐含读者形成牢固的期待视野——家庭伦理在财利熏染下脆若纸糊。种种迹象都表明这又是另一场财利破家的前奏,由奢入俭后的杜少卿将会面临妻子的争吵和小家庭的不幸,小说将顺从前三十回的叙事布置将这场反讽进行到底。但是在三十三回中,小说的走向偏离了读者的期待。杜少卿与夫人相濡以沫,携手同游清凉山,败产后家庭关系依然和谐。杜少卿的故事摆脱了财利破家的书写框架,财利与破家的紧密联系被切断,儒家伦理重新获得了独立性和纯洁性。第三十五回,庄征君夫妇在元武湖同赏诗文,琴瑟和鸣,又同杜少卿夫妇相对照。与杜少卿一样,庄征君也表现出对财利的拒斥。庄征君拒绝征辟后路经扬州,盐商们欲赠他六百两银子,但他早已坐船离去,“银子拿了回去”^{[3]438}。

直至三十七回后,破家书写重新出现,且并不是对前三十回的累赘重复。前三十回,匡超人、牛浦的破家是为了重婚,是为了新的家庭和新的利益;而沈琼枝、陈思阮和聘娘的破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家的不复重建。沈琼枝逃婚后独自生活,陈思阮和聘娘最终出家,茕然独身与出世离俗的结局昭示了儒林家庭叙述的萧索落幕。人物最终摆脱了财利的侵扰,但竟然更进一步把家庭也视作了负累。至此,流动的经济利益最终也失去了撬动人物行为的支点,无法引出新的家庭和新的欲望。全书的家庭叙事也就走向尾声,只待云散风流的结局。

(二)特殊的破家书写

泰伯祠祭礼后,儒林人物的家庭何以趋向破败衰亡?杜少卿夫妇和庄征君夫妇所践行的家庭伦理是如何失去它的效力的?

在小说第四十八回,发生了一场特殊的家庭书写。老秀才王玉辉鼓励丧夫的女儿殉节,他认为这是青史留名的壮举,外人不懂。女儿绝食而死,他竟仰天大笑。四方来祭之时,通学朋友赞扬他生了个好女儿,“为纪伦生色”^{[3]589},王玉辉却顿觉伤心。迟来的伤心与祭礼的隆重、朋友的赞扬形成巨大的张力,将

王玉辉所持神圣的儒家殉道精神指向了矫情做作的怀疑当中。

女儿殉节，就连老妻也因此病倒，王玉辉马上就要坠落为破家者。如前文所述，破家是家庭毁坏的行为，破家者是一个具有道德批判意义的角色。但具体言之，本文讨论的破家很难以现代的道德观去认定。譬如杜少卿的豪举散财好像是破家书写的前奏，但是吴敬梓却偏偏让杜少卿家庭和谐。换句话说，由于破家的一切迹象都掌握在作者手中，我们所谓的破家只能是隐含作者心中的破家，破家者所触犯的只能是隐含作者的伦理观。小说尚未建立起权威的叙述者，就连杜少卿的出场也不能避免反讽困境，但读者尚可从反讽的走向推断作者的态度。在之后的文本中，王玉辉的“伤心”一直伴随他走向心中的圣地南京，等待他的却是人去楼空的尴尬与遗憾。虽然保留了悲凉的同情，隐含作者对王玉辉的反讽态度并无转折，这种叙述暗示了他所持伦理观的失败。

需要指出的是，这场家庭书写与前所列举的破家书写大不相同。殉节作为儒家礼仪符合古代律法，甚至值得赞扬表旌。且我们不能把殉节同杜、庄家庭所代表的纯洁的儒家伦理分割开来，早在第三十六回，虞育德就曾转托杜少卿做烈女碑文，这亦是一种提示：烈女殉节本就是儒家礼仪的一部分。前三十回的破家是因为儒家伦理受到了冲击，礼虽然被扭曲、被当作遮羞布，但是二元礼那神圣道德的一元，即家礼本身的纯洁并没有遭到怀疑。难道在王玉辉的故事中，殉节之礼又遭到挪用和扭曲了？

针对王玉辉的解读是如此困难，就连批评家们也对其评判不一。卧闲草堂评王玉辉为“临大节而不可夺”^{[3]593}，用语暗褒。黄富民则激烈反对这种看法，称卧评“大谬”“未会作者本意”^{[3]593}，又怒斥王玉辉“有心博节烈之名”^{[3]594}。卧评和黄评的冲突并非偶然，卧评出现半个世纪后黄评才出现，历史的变化带来了思想的变化，同时也可能导致批评语境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卧闲草堂批评的错讹是不

可避免的，就算他能读出隐含作者对王玉辉的暗贬态度，他也无法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将批评的矛头指向殉节的儒家礼制。就连黄评也免不了避重就轻，黄富民认为：“夫节烈，美名也，然必迫于事势无可如何，不得已而出此。”^{[3]594}他对于王玉辉的指责重在他为博名有意引导女儿殉节，使得节烈在一种不合适的情境下进行。那究竟什么情境才适合女子殉节？若是妇人无翁无姑就适合殉节？据统计，明朝殉节之妇有八千六百余，清朝亦有近三千人。^{[24]246}这些殉节者又有谁能够做到不受外在影响、不矫情呢？在祭礼上，王玉辉马上要得到女儿殉节所带来的道德荣誉时，他却伤心离场，这说明他对女儿的劝导并不出于博名的私欲，反而更像是出于对儒礼的“虔诚”。王玉辉因完成家礼而破家，儒家礼仪的失败不再是因为行礼者的心怀鬼胎。无论王玉辉是否引导了女儿的殉节，都无法掩盖殉节本身对家庭的巨大伤害。作者只是用王玉辉的虔诚态度为殉节之礼设置了一个脱出传统故事框架的反讽语境，笔锋所指已是儒礼本身的纯洁性。而与其说王玉辉的故事标示着隐含作者的伦理观与儒家伦理的分裂，不如说这是一场激烈的自我质疑。

财利在这场故事中的作用尤为特别。王玉辉平生志向是要纂三部书嘉惠来学，为此他终日手不停披，没工夫坐馆。余二先生曾提到，“一向知道吾兄（王玉辉）清贫”^{[3]585}，后来还送了他禄米一担和俸银一两。王三姑娘在禀明志向时说道：“父亲在上，我一个大姐姐死了丈夫，在家累着父亲养活，而今我又死了丈夫，难道又要父亲养活不成？父亲是寒士，也养活不来这许多女儿！”^{[3]587}王三姑娘借用父亲的经济困境为殉节创造了“无可奈何的事势”。这当然是一个靠不住的理由，遮掩了人物本身的选择。经济情况与儒生的治生相联系，从而同儒生的功业志向息息相关。父亲要著书，就没工夫坐馆，只得做寒士，女儿就只能殉节。在这个逻辑链条下，殉节的目的不仅是对殉节之礼本身的追求，还是为了保障父亲纂书之业的完成。而前三十回中作为真正破

家原因的经济利益,竟然在此充当了破家的言述借口。这与前文所述的二元礼下的反讽机制完全相反。从以礼索财到以财求礼,吴敬梓颠倒了反讽的情境,达成了更深刻的效果。

总的来看,《儒林外史》中的“财利破家”,既包含了明清社会经济的历史信息,也是儒家伦理危机的一个重要提喻。小说将财利对破家的作用分三个层次进行书写:一是将儒家礼仪与经济利益直接并置,将儒礼受到财利的歪曲展现出来;二是将财利欲求和经济困境隐伏于尊卑秩序之下,对破家者的言行不一做了批判;三是通过对反讽装置的倒转,将儒家伦理和礼仪的内在矛盾遮掩在经济借口之下。吴敬梓对儒家伦理的批判视角与今人不同。儒家伦理并没有作为“他者”经受外部指摘,而是在“污浊—纯洁—萧索”的复杂叙事中受到了“自我”怀疑,足见吴敬梓所秉公心之深远。

[参考文献]

- [1] 阮智富,郭忠新.现代汉语大词典(套装上下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
- [2] 韩非,陈奇猷校注.韩非子新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3] 吴敬梓,李汉秋.儒林外史汇校汇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4] 徐珂.清稗类钞第7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0.
- [5] 兰陵笑笑生.金瓶梅: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上册)[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
- [6] 陈鹏.中国婚姻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90.
- [7] 陈高华点校.元典章:二[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2011.
- [8] 郑云修,邵晋涵.杭州府志:110卷[M].刻本,1784(清乾隆四十九年).
- [9] 洪亮吉.宁国府志 [M].合肥:黄山书社,2007.
- [10] 顾鸣塘.《儒林外史》与江南士绅生活 [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 [11] 张应昌.清诗铎 [M].北京:中华书局,1960.
- [12] 王跃生.18世纪中国婚姻论财中的买卖性质及其对婚姻的作用[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1):62-81.
- [13] 茅丕熙,杨汉章.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62,光绪河津县志同治稷山县志[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
- [14] 李铭皖,冯桂芬.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7,同治苏州府志(一)[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
- [15] 方行.清代农民经济扩大再生产的形式[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1):32-35.
- [16] 方行.清代江南农民的消费[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3):91-93.
- [17] 田涛,郑秦点校.中华传世法典:大清律例[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 [18] 滋贺秀三.中国家庭法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 [19] 怀效锋.大明律(附大明令,问刑案例)[M].沈阳:辽沈书社,1990.
- [20] 朱一玄,刘毓忱.儒林外史资料汇编[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
- [21] 阿桂等.盛京通志百三十卷本下[M].沈阳:辽海出版社,1997.
- [22] 李桂奎.“物欲”叙事: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新视角[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106-114.
- [23] 商伟.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 [24] 董家遵.中国古代婚姻史研究[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 南山)

长向花荫课女工^{*}

——论《红楼梦》中的女工书写

麻飘飘

(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 山东曲阜 273100)

[摘要] 与明清才子佳人小说对女工书写的轻视与淡化相比, 明清家庭生活类世情小说的女工书写较多, 尤以《红楼梦》的女工书写最为成功, 在明清家庭生活类世情小说中极具代表性。女工是一种身体实践, 有着特定的道德象征意义, 结合女教书对女工的描述, 可知《红楼梦》对主要人物的女工书写具有象征女德——本分、勤俭、贞静的作用。同时, 《红楼梦》的女工书写在营造女性世界氛围, 构建网状结构, 展开人物容貌描写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女工视角的切入, 可进一步加深人们对于《红楼梦》小说史地位的认识。

[关键词] 女德; 女教书; 女性世界; 网状结构; 容貌

[中图分类号] I207.4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5)06-0110-12

一、《红楼梦》女工书写的特点与研究现状

《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解释“女工”: 旧时指女子所做的纺织、缝纫、刺绣和这些工作的成品, 其引申义还包括拼布、贴绣、裁剪、浆染工作, 女工的别名有女红、女功。因为女工产品可以归入道具一类, 而学界对《红楼梦》道具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 因此本文以女工行为为研究重点。在明清才子佳人小说中, 女性的诗才被放在重要地位, 女工技能成为陪衬, 如《两交婚》中才女甘梦每日与哥哥读诗谈文而“感触心情, 以为风雅。遂看得女红一道, 不足尽女子之能”^{[1][2]}。据张俊《清代小说史》统计, 明清有 17 部长篇家庭生活类世情小说, 如《玉闺红》《双姻缘》《醒世姻缘传》《林兰香》《惊梦啼》《炎凉岸》《姑妄言》《疗妒羹》

《金石缘》《红楼梦》《歧路灯》《幻中游》《痴人福》《清风闸》《雅观楼》《昙花偶见传》《花柳深情传》^{[2][44, 138, 277, 410]}等, 《红楼梦》是明清 17 部长篇家庭生活类世情小说中对女工书写次数最多, 描写最详细, 内涵最深刻和丰富的小说。

以关键词“针线、生活、活计、女工、针黹、缝、织、纺绩”来检索并辨别可以发现, 《红楼梦》共有 64 次提到女工行为, 《金瓶梅》有 27 处, 《歧路灯》有 18 处, 《醒世姻缘传》有 16 处, 《林兰香》有 10 处, 《红楼梦》是女工书写次数最多的家庭生活类世情小说。小说对林黛玉裁剪衣料, 宝钗对于打络子配色的看法, 晴雯修补孔雀裘, 具有刺绣画性质的慧纹进行了详细的描写, 有女工指南和才学小说的意味, 在细致的女工书写中实现了作者对女性的赞美。宝钗代绣鸳鸯, 建议金线络玉, 为宝玉

*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化交融背景下宋元话本小说研究范式的嬗变(1901—2016)”(项目编号:17BZW104), 2023 年曲阜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科研创新资助基金项目“明清才子佳人小说空间叙事研究”(项目编号:LWCXS202307)。

[收稿日期] 2025-04-17

[作者简介] 麻飘飘, 女, 山东临沂人, 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做鞋,这些女工行为极具丰富的暗示性含义,是其他家庭生活类世情小说所缺乏的。对以上两个方面学者均有充分的研究,而《红楼梦》以女工象征女德的内涵是最深刻的,其他家庭生活类世情小说也有这种写作倾向,如《歧路灯》中孔慧娘的女工行为,但是运用的笔墨相对少,刻画得不够深刻。

目前学界对《红楼梦》女工书写的研集集中在以下几点:女工书写的特色^[3];女工与女教观的关系^[4];女工在推动情节、塑造人物形象的作用上^[5]。女工书写是家庭生活类世情小说的标志,具有丰富小说内涵与生发叙事的作用。笔者从学者所忽略的《红楼梦》女工书写在象征女德,营造女性氛围,构建网状结构,展开人物容貌描写方面的作用做出补充性探究。

二、文化内涵上:女工象征女德

《红楼梦》对主要女性人物的女工书写集中在宝钗、黛玉、李纨、巧姐上,关于宝钗的女工书写有11次,关于黛玉的女工书写有6次,关于李纨的女工书写有4次,关于巧姐的女工书写有2次,

《红楼梦》在对女子管家之才、诗才大力渲染的同时,时刻不忘提醒读者,这些才女们对女工极为精通,《红楼梦》多处提到女工行为,大有以女工标示女德的意味。以女工标示女德是很多家庭类世情小说的人物塑造手法,但书写零散,笔墨稀少,而《红楼梦》把女工象征的女德内涵深刻而全面地表达出来。

古代女教书把女工与女德的培养紧紧结合在一起,如“女四书”——《女诫》《内训》《女论语》《女范捷录》。很多明清小说尤其是明清家庭生活类世情小说沿袭了这一文化传统,在小说中,女工是家庭对女性从小实施的必备教育科目,是否专注于女工,女工的技术水准与女性的德行息息相关。《红楼梦》沿袭了这一传统写法,以女工来赞美女性的传统美德:本分,勤俭,贞静。

(一) 女工:本分的象征

《红楼梦》中有三个女性明显地体现出女工所象征的本分美德:宝钗,李纨,巧姐。她们自觉接受了传统的家庭教育,把女工当作分内

的事情,努力做好身为女性应掌握的女工技巧。

宝钗忠实地实践着以女工为代表的本分的女教美德,父亲早逝,她见哥哥不能体贴母亲,便只留心针黹家计,不以文才为正事。第三十七回宝钗劝湘云:“究竟这也算不得什么,还是纺绩针黹是你我的本等,一时闲了,倒是于你我有益的书看几章是正经。”^{[6]500}第四十二回宝钗劝黛玉不要看杂书:“你我只该做些针黹纺绩的事才是,偏又认得了字。既认得了字,不过拣那正经的看也罢了,最怕见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6]566}第六十四回宝钗对黛玉、宝玉说:“自古道,‘女子无才便是德’,总以贞静为主,女工还是第二件。其余诗词,不过是闺中游戏,原可以会不可以不会。咱们这样人家的姑娘倒不要这些才华的名誉。”^{[6]891}对于诗才与女工之间的选择,宝钗坚定地认为女工远远重于诗才女子应该坚守女工本分,诗才可有可无,反对炫才自赏。清代吕近溪《女小儿语》说:“邪书休看,邪话休听,邪人休见,邪地休行。”^[7]宝钗认同这种女教,宝钗的本分既体现在她对女工的强调上,也体现在她对杂书的排斥上,既体现在她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上,也体现在她对别人的教导上。宝钗的本分有时候到了稍嫌迂腐的地步,第五十一回宝琴做了十首怀古诗,宝钗认为诗中有涉《西厢记》《牡丹亭》之嫌,要求宝琴另作,结果招来了林黛玉、探春、李纨的明确反对。

第三十六回宝钗来找宝玉闲聊,宝钗看到鸳鸯肚兜先是赞叹“好鲜亮活计”,袭人暂时离开休息,宝钗见肚兜“实在可爱”,不由得拿起针来,替袭人代刺。宝钗是女工高手,宝钗赞美袭人的女工,说明了袭人女工技艺的高超,体现了二人间的互相欣赏,暗示着二人在女工所代表的传统女性价值观上的共鸣。这也说明宝钗代刺是出于日常女工的习惯,作者在前文对宝钗的女工行为多次提点使得这一情节不显突兀。由于第三十二回有宝钗帮助袭人替宝玉做鞋的情节,使这次刺绣活动别有隐喻的含义,因为丈夫做鞋是妻子的本分。这一回王夫人已经让凤姐每月从自己分例上拨给袭人二两银子,以后的待遇同赵姨娘、周

姨娘一样。接着就是袭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绣鸳鸯，宝钗在忘我的情况下代绣鸳鸯。袭人的姨娘梦暂时实现，宝钗的正妻梦如同只绣了两三个花瓣那样短暂，宝玉的梦语让她震撼，宝钗的心事最终与袭人一样落了空，二人的本分美德在宝玉那里没有了着落。

宝钗的生日为正月二十一，这一天是穿天节，这一节日源于女娲补天的典故。这一天，女子以红线系煎饼放在屋顶，寓意补天穿，这一节日涉及两个重要的民俗意象——补天与求石^[8]。宝钗对女工的执着似乎有着神话般的使命感，她总是试图教导宝玉，让这块补天石发挥应有的功效，这正是宝钗在尽妻子义务子劝导丈夫的本分体现。第四十八回宝玉赞叹香菱学诗成功时，宝钗说：“你能够像他这样苦心就好了，学什么有个不成的。”^{[6]650}宝钗含蓄地劝宝玉从事自己的本分——科举，女工所代表的“修补”策略是拯救家族的方法，而修补的一个途径是劝男子从事科举以重振家门。宝钗的力求修补与宝玉的逃避补天(出家)形成了强烈的对照，暗含着作者对于自己一事无成的追悔。

李守中对李纨的教育观念是：“便不十分令其读书，只不过将些《女四书》《列女传》《贤媛集》等三四种书，使他认得几个字，记得前朝这几个贤女罢了，却只以纺绩并臼为要。”^{[6]55-56}“纨、宫裁”寄寓了父亲对女儿女性角色的期待，这种期待有它存在的功利性，因为女子的学问再好也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用女教书教女是让女儿在思想上接受女德教育，在女德思想的熏陶中，在女工的身体实践中来规范女儿的言行。李守中的教育观念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李纨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侍亲养子与陪侍小姑针黹诵读上。李守中为国子监祭酒，国子监祭酒是主管最高学府教育的官职，他的教育观念代表了当时男精英们在教女观念上的保守倾向。虽然明末清初以来江南盛行着才女文化，但是坚持这种保守思想的文人不在少数。

李纨外号“大菩萨”，尚德不尚才。李纨负责带领贾府的姑娘们念书学规矩针线，可见她的女工技术应该说的过去。女工所代表的

本分美德表现在她对贾兰的教导上，宝玉曾见贾兰拿着小箭追赶小鹿，宝玉说他：“把牙栽了，那时才不演呢。”^{[6]354}第九回宝玉、秦钟、金荣等闹学堂，贾菌要报复暗助金荣而把自己桌子弄脏的同学，同桌贾兰劝贾菌：“好兄弟，不与咱们相干。”^{[6]137}这正是李纨尽到教子本分的体现，本分美德还体现在李纨的穿着上。《红楼梦》第四十九回众人齐聚芦雪庵，主子们大多穿着大红雪衣，而李纨穿着一件青哆罗尼对襟褂子。郭沫若说：“衣服是文化的表征，衣服是思想的形象。”清代的服饰礼仪有以下特点：“妇女下裳应穿裙，以红色为贵，寡妇不得穿红裙子，一般只能穿黑裙。”^{[9]38}李纨的着装符合寡妇的身份和心如槁木的心态，年轻女子们的大红雪衣标志着未嫁女子的尊贵身份和她们对生活的热爱。丰儿曾对尤二姐说：“我们家的规矩又大，寡妇奶奶们不管事，只宜清净守节。”^{[6]55-56}贵族家规对寡妇实行了隔离，李纨自觉认同这种隔离，她做到了“不受尘埃半点侵”，梅花正是她甘守寡妇本分苦寒生活的象征。

明清女教书有重德不重才的倾向，明代吕新吾《闺范·序》：“女子六岁，始习女工之小者。七岁诵《孝经》《论语》，九岁讲解《孝经》《论语》及《女诫》之类，略晓大义。今人或教女子以作歌诗，执俗乐，殊非所宜也。”^{[10]61}在清代迷津渡者《移绣谱》中，逢年的妻子田氏是个才女，题诗、写字、刺绣女工无所不能。但逢年与田氏认为女子识了字难免伤春悲秋，自寻烦恼，所以不让两个女儿识字，只以描绣技艺教之。古人反对女子从事文学创作的背后原因是他们担心文学使得女子心思敏感，易生烦恼，损害健康。《黄帝内经》认为：“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悲伤肺，忧思伤脾，恐伤肾，皆志意为病。”^[11]这一担忧与宋代以来纺织业中女性统治地位的丧失有关，宋代以后的女性以其生育价值、忠贞的品德、善主内而著称。即只有勤俭持家、对丈夫忠贞、认真管教子女、情思单纯的女子才被大众所欣赏，而李纨符合这样的标准。

虽然《红楼梦》中关于巧姐的笔墨不多，但巧姐的传统女性特质较为突出。第九十二

回巧姐向宝玉请教《女孝经》《列女传》中的人物，巧姐与李纨是一类人，符合大部分男精英对理想女性形象的期许。巧姐的“慕贤良”与香菱的“慕雅女”代表了不同的价值取向，一个是以女工为代表的本分女德，一个是打破男女界限以诗才为代表的文人气质。宝钗不愿意教香菱学诗，而黛玉、湘云则乐此不疲。第三回贾母曾对黛玉说：“读的什么书，不过是认得两个字，不是睁眼的瞎子罢了。”^{[6]47}贾母对女工的重视超过对读书的重视，第九十二回贾母对巧姐说：“女孩儿家认得字呢也好，只是女工针指倒是要紧的。”^{[6]1276}听到巧姐跟刘妈妈学扎花和拉锁子时又说：“咱们这样人家固然不仗着自己做，但只到底知道些，日后才不受人家的拿捏。”^{[11]1276}这是因为虽然贵族小姐的女工训练主要出于培养女德的需要，但熟悉女工是管家的必备，是女子在婆家立得住脚的保证。宝钗、贾母的传统女性观浓厚，黛玉、湘云的传统女性观相对淡薄。

贾家有绣匠，有善于针线的丫鬟，基本能满足生活所需。巧姐的女工是非必要的，但贾家败落后女工成为她养家的资本，第五回关于巧姐的图谶与女工相关，成为农村妇女后巧姐坚守本分，以纺织谋生。《红楼梦》在母女关系书写上的一个特点是母女性格有对立性，如赵姨娘与探春，林之孝家的和小红，王熙凤和巧姐。与女儿不同的是，凤姐多有不守本分的行为，她性格刚强，嫉妒成性，利用贾府势力向外自谋私利，她的行为不符合班昭《女诫》“卑弱”条所标榜的“以弱为美”。王熙凤打着“贤良”的旗号逼死了尤二姐，而巧姐则是真正的“慕贤良”。小说对凤姐的女工书写只有一处，一笔带过。凤姐从小被假充男儿教养，女工的身体实践较为有限，她不识字，应该也没有受过女教书的教导，因此在本分的女德上比女儿落后了很多。

自古以来女工被认为是女子的本分，班昭《女诫》云：“专心纺绩，不好戏笑，结齐衣食，以供宾客，是谓妇功。”^{[12]13}唐代流传的《武王家教》认为：“男教学问，以待明君；女教针缝，不犯七出。”敦煌写本《太公家教》对女子的要求是：“行则缓步，言必细语，勤事女工，莫学

歌舞。”这些女教书都把女工当作女子的本分，女工是婚姻中的重要砝码，由于家庭对女工实用功能的需求，对于中下层女性来说女工技能是必备的嫁人资本。对上层女性来说，精美的刺绣产品是与男精英“文”的气质相匹配的优点，刺绣越精美，越能彰显女方的家庭教育是多么的成功。《水浒传》第三十回张都监假意将使女玉兰送给武松为妻时说：“此女颇有些聪明伶俐，善知音律，极能针指。”^{[13]346}《金瓶梅》第七回薛媒婆向西门庆说娶孟玉楼：“百伶百俐，当家立纪、针指女工、双陆棋子不消说。”^{[14]47-48}以上是中下层对女子针指技能的重视。《歧路灯》第四回薛家媳妇向谭孝移的妻子王氏介绍巫家的女儿给谭孝移的儿子时说：“这闺女描鸾刺绣，出的好样儿……他家还有些旧牌，坏了一张儿，这闺女就用纸壳子照样描了一张，你说伶俐不伶俐？”^{[15]25}这是上层人家对女子刺绣技能的重视。同样，在1925年凌书华所作小说《绣枕》中，大小姐如此煞费苦心地在自己的嫁妆——靠枕上刺绣，目的是通过自己高超的女工技巧来向夫家展现自己良好的家庭教养。由于近代的社会变迁，女工在婚恋中的作用被大大减弱，所以大小姐没能嫁入高官之家。

明清商业的进一步发展模糊了上下、尊卑、男女、城乡的传统界限，男性弃耕，女性弃织。社会竞争加大，生存状态的不确定性让男精英们感受到社会秩序趋于混乱所带来的不安与焦虑。他们认为女性偏离本职是不正常的，于是加强对女工女德含义的强调来提升女工的地位，以巩固岌岌可危的公共良俗。清代蓝鼎元在《女学自序》中说：“天下之治在风俗，风俗之正在齐家，齐家之道当自妇人始，妇人以德为主。”^[16]他在《女学》中对纺机技巧尤其重视，除了小说、戏曲领域，明清流行的百科全书、农书都把纺纱织布描写为受尊重女性的日常工作。可见，传统文化的惯性之大。

（二）女工：勤俭的象征

宝钗最能体现出女工所代表的勤俭美德，第四十五回写宝钗“因见天气凉爽，夜复渐长，遂至母亲房中商议打点些针线来。日间至贾母王夫人处省候两次，不免又承色陪坐闲话

半时，园中姊妹也要度时闲话一回，故日间不大得闲。每夜灯下女工必至三更方寝”^{[6]605}。第五十五回宝钗受王夫人所托，与探春、李纨等管家，宝钗勤于职守的同时，不忘女工：“一日在上房监察，至王夫人回方散。每于夜间针线暇时，临寝之先，坐了小轿带领园中上夜人等各处巡察一次。”^{[6]750}不仅如此，她还劝邢岫烟节俭，第五十七回她见邢岫烟带着探春给的玉佩时说：“如今一时比不得一时了，所以我都自己该省的就省了，将来你这一到了我们家，这些没用的东西只怕还有一箱子，咱们如今比不得他们了，只要一色从时守分为主。”^{[6]790}

宝钗勤俭行为的背后是她对家族发展到没落地步的清醒认识，因此她居安思危，自我节制。贾府的大多数人由奢返俭难，宝钗以强大的自制力做到了由奢返俭。薛蟠得到了大西瓜、粗鲜藕、长鲟鱼、暹猪，让宝钗吃，宝钗不吃让薛蟠请人，可见宝钗对口腹之欲的克制之强。凤姐派人送玩器给宝钗摆着，宝钗全部退回，她不爱戴花和涂抹脂粉，雪洞似的屋子诠释着宝钗生活的从俭，她是大观园中少有的清醒女子。她以勤俭为“补天”的方法，这和男性的奢侈浪荡形成了鲜明对比。第六十二回宝玉对香菱说薛姨妈嘴碎：“我还听见常说你们不会过日子，只会糟蹋东西，不知惜福呢。”^{[6]861}由此可见，宝钗的勤俭是受到母亲教导的结果，所以薛姨妈曾对周瑞家的骄傲地说道：“宝丫头古怪着呢，她从来不爱这些花儿粉儿的。”^{[6]105}而薛蟠无所事事，漫手撒钱，一年就送给金荣七八十两银子。贾珍为秦可卿大办丧事，父丧期间聚赌，宰猪割羊，屠鹅戮鸭。贾赦800两银子买个女子为妾，贾府入不敷出，依旧吃着昂贵的茄鲞。宝玉得过且过，不关心家计。这是人性中由奢返俭难的体现，女工所代表的“修补”功能是拯救家族的方法，而修补的一个方法就是勤俭持家。

在《红楼梦》中，浪费不符合女工所象征的“勤俭”美德。第六十回不能针黹和不惯使用的芳官向夏蝉儿示威，把柳家送的糕一块块掰了打雀玩，夏蝉儿冷笑说：“雷公老爷也有眼睛，怎不打这作孽的！”^{[6]825}结果芳官被撵。第六十一回司棋怒砸小厨房，柳家的让婆子送

鸡蛋羹给司棋，司棋当面泼在地上。第三十一回晴雯向宝玉撒娇，把宝玉的扇子撕了，宝玉把麝月的扇子拿来，又让晴雯撕了，麝月的评价是“造孽”。结果晴雯、芳官被撵走，而麝月一直留到最后。麝月能留到最后还有“勤”的原因。第六十四回贾敬去世，宝玉吊丧回来，天气炎热，袭人拿灰色绦子做扇套子，对宝玉说：“若叫老太太回来看见，又该说我们躲懒，连你的穿带之物都不经心了。”^{[6]887}麝月深得袭人勤奋的真传，第二十回宝玉屋里的丫鬟都出去玩了，只有麝月在灯下抹骨牌，照应着屋子。

以女工象征女子勤俭的美德在其它小说中亦有体现。在《林兰香》第四十四回中，春畹在怀孕后给康夫人做衣服：“正是六月中旬，晚间若作女工，转眼就是三四更天气。及至上床尚未睡足，北窗间日色早已发红。”^{[17]237}康夫人、任香儿不让春畹太过劳累，春畹的女工出自燕梦卿的教授，她的勤奋与她的主子燕梦卿“无日不拈针弄线”的言传身教有关。《歧路灯》第五回写谭孝移拜访孔耘轩，恰巧看到孔耘轩的十一岁女儿与丫鬟厨娘在一起织布，谭孝移回家向妻子王氏赞美孔家虽然富裕但以勤俭教女，并批判骄奢懒惰使家业败尽的不良妇人。《镜花缘》第六十三回插入礼部尚书卞滨的发迹故事，卞滨的曾祖卞华，妻子奢氏，二人因奢华度日而死。儿子卞俭是个读书人，妻子勤氏。两人的衣食完全依靠勤氏一人，勤俭度日，后来渐渐富了起来。儿子卞继秉承父母遗风，卞继的儿子卞演终于考中进士做了官。女性的勤俭对家族的兴衰影响很大，即使是富贵之家也以勤俭教导女儿。女工是古代文学作品中常见的表现女子勤俭的手段，女子以勤俭为家庭的生存做着不懈的努力。

古代朝廷长期以粮食和纺织品作为赋税实物，勤俭是臣民遵守与国家间契约的保证。女工与勤俭关系密切，女工所象征的勤俭女德内涵突出。清末丁佩《绣谱》认为刺绣有“戒慵懒”的功效^{[18]1}。刺绣活动需要高度的专注力，刺绣成品过程缓慢，很能锻炼女子的勤奋与毅力。在勤劳的女工行为中，女性学会尊重

下层人民劳动成果而在生活中做到节俭。乐羊子妻断机教夫，孟母断机教子，无不以女工传达勤奋和毅力的重要性。

贵族家庭对女儿施以女工训练，主要是出于女德培养的需要，以持久的女工活动控制身体的活动，在女工的身体实践中，勤俭的教育理念被不断地温习与巩固。如《牡丹亭》“训女”一出，杜宝听说杜丽娘白昼闲眠而指责妻子失教：“你才说长向花阴课女工，却纵容女孩儿闲眠，是何家教？”^{[19]8}勤俭美德是被女教书所强调的，与女工密切联系。唐代宋若昭《女论语》“营家”篇云：“营家之女，惟俭惟勤。勤则家起，懒则家倾。”^{[12]104}明代徐皇后《内训》有“勤励篇”：“是故农勤于耕，士勤于学，女勤于工。农惰则五谷不获，士惰则学问不成，女懒则机杼空乏。”^{[12]39}又有“节俭章”：“若夫一缕之帛出工女之勤，一粒之食出农夫之劳。致之不易，而用之不节。暴殄天物，无所顾惜，上率下承，靡然一轨，孰胜其敝哉？”^{[12]43}明代王氏《女范捷录》有“勤俭篇”：“勤者女之职，俭者富之基。勤而不俭，枉劳其身；俭而不勤，甘受其苦。”^{[12]160}这些女教书的价值观与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有关，因为消费总是与女性密切相关，勤俭持家的理念更适合女性角色。

(三) 女工：贞静的象征

古人对女性的贞静美德看得很重，汉代班昭《女诫》“妇行篇”云：“幽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已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12]12}明徐皇后《内训》“德性篇”云：“贞静悠闲，端庄诚一，女子之德性也。”^{[12]27}女工行为是最好的培养贞静美德的途径。清末丁佩《绣谱》中说：“工居四德之末，而绣又特女工之一技耳，古人未有谱之者，以其无重轻也。然而闺阁之间，藉以陶淑性情者，莫善于此。以其能使好动者静，好言者默。”^{[18]1}深闺内室是古代男性对女性实施的空间隔离，目的是控制女性的欲望以维护夫为妻纲的性别秩序。正如《女论语》“守节篇”所规定的那样：“有女在室，莫出闺庭。有客在户，莫露声音。”^{[12]112}明清上层人家中，离正门最远的房屋是被称为闺阁的地方，是女性的内室居所，这种房屋没有向街道

敞开的窗户^{[20]157}。隔离工作做得越好，说明被隔离女子的贞操越有保障。而把女性局限在深闺内室的最好理由是女工，女工活动控制着女性身体的流动，长期室内的细小的身体活动幅度塑造了一个由于克制内心情欲而沉静贞洁、悠闲从容的理想女性形象。

十二金钗中，《红楼梦》小说对未嫁之女宝钗、黛玉、史湘云、探春、巧姐的女工书写较多，对元春、秦可卿没有女工书写，因妙玉出家所以也没有女工书写，对凤姐只有一处提到她的女工活动，第十三回贾琏去扬州送黛玉奔丧，凤姐与平儿晚间倦绣。小说对李纨的女工书写着眼于她对年轻女孩的教授作用，也就是说排除职责因素，作者对已婚女子的女工书写远不如对未婚女子女工书写的重视，突出了未嫁之女具有由女工所代表的隔离所造成的贞静品德，是作者对人物纯洁化处理的结果。

作者对宝钗的女工书写次数最多，共 11 次。在漫长的女工活动中，宝钗的情欲“热毒”被抚平和消解，呈现出贞洁安静的美德，女工所代表的贞静美德在宝钗身上多有体现。

白色是宝钗生命的底色，是纯洁的象征。她的皮肤是雪白的，住处像雪洞一样，她吃的冷香丸是由各种白色花朵制成的，第三十七回宝钗的《咏白海棠》被评价为最好的诗。白色象征着宝钗对清净纯洁的追求，就像她的诗歌所表白的那样：欲偿白帝凭清洁，不语婷婷日已昏。第二十四回宝钗劝黛玉不要看杂书移了性情，其实是因为看杂书容易引起内心情欲的涌动而损害贞静的心态。第六十四回宝钗劝宝玉不要把闺中诗词往外传诵，强调女子当以贞静为主。贞静就是遵守男女大防，就是自觉进行自我隔离。《周礼》是古代女教书的源头，《礼记》要求“男女不杂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栉，不亲授。嫂叔不通问，诸母不漱裳。外言不入于内，内言不出于外。女子许嫁，缨，非有大故，不入其门”^{[21]卷一}。宝钗、黛玉担心诗词外传是因为这种行为不符合女德——贞静的要求，黛玉收到宝玉送来的旧帕子而感到“可惧”也是这个原因。薛蟠虽为“呆霸王”但在关键时刻坚决拥护妹妹的贞静操守，第二十五回凤姐和宝玉被马道婆镇魇，众人一片混

乱,而薛蟠“更比诸人忙到十分去,又恐薛姨妈被人挤倒,又恐薛宝钗被人瞧见,又恐香菱被人臊皮,知道贾珍等是在女人身上做功夫的”^{[6]344}。《女孝经》“广要道”云:“动必有方,贞顺勤劳,勉其荒怠。然后慎言语,省嗜欲。出门必掩蔽其面,夜行以烛,无烛则止。”^[22]宝钗寡言罕语,安分随时,装愚守拙,忠实地践行着贞静的美德。宝钗的言行举止无不体现出一种贞静的风格,凤姐说她“不干己事不张口,一问摇头三不知”^{[6]759},黛玉多次当面讽刺宝钗,宝钗装聋作哑,宝玉当面给宝钗下不来台,宝钗过后仍是照旧。宝钗极少言行失态,袭人、湘云、贾母对她赞不绝口,第九十九回宝钗婚后丫头们“素仰宝钗贞静和平,各人心服,无不安静”^{[6]1360},这是众人对宝钗贞静的认同。

关于黛玉的女工书写共有6次,作为和宝钗同等重要的角色,作者虽然强调了黛玉诗才之高,但也捕捉了她的几次女工行为,以强调她的女德。第十八回黛玉误以为宝玉把她做的香囊送了别人而剪了尚未完工的香囊,文中说:“虽尚未完,却十分精巧,费了许多工夫。”^{[6]233}第二十八回黛玉因吃了晴雯的闭门羹而与宝玉生了嫌隙,宝玉来看黛玉,见黛玉拿着剪刀裁剪,一个丫头在吹熨斗,两个丫头打粉线,专业的操作让宝钗都夸赞“越发能干了”。黛玉高超的女工是女教的显著成果,象征着黛玉的贞静美德。黛玉的贞静体现在她自觉与宝玉之外的其他男性保持距离上。第十六回宝玉把北静王送的鹡鸰香串送给黛玉,黛玉说:“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他。”^{[6]204}于是掷而不取。《礼记·内则》云:“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21]卷八}黛玉对宝玉以外的男子严守“男女授受不亲”的礼仪规范,自觉远离陌生男子的物品,是一种贞静的体现。与贞静标准相差甚远的是尤二姐、尤三姐,尤三姐最为突出。尤三姐有乱伦之嫌,她戏弄贾珍、贾琏,穿着大胆,举止轻佻“一对金莲或翘或并,没半刻斯文,两个坠子却似打秋千一般”^{[6]909}。这与《内训》“德行篇”所要求的“贞静幽闲,端庄诚一,女子之德性也……玉以节动,礼以制心,道以制欲”^{[12]27-29}完全背

离。古代女子戴头饰的部分原因是为了规范女性的身体活动,使她们的行为符合礼教的标准,尤三姐不符合这种标准所以被柳湘莲退婚,尤二姐被凤姐抓住“在家做女孩儿时就不干净”的理由而任意践踏,原因是二人于贞静有亏而失去被人尊重的机会。李纨作为姑娘们的女工教师,她的举止完全符合贞静的标准。李纨不戴宫花,周瑞家的送宫花路过李纨的住处,从窗外看到李纨在炕上歪着睡午觉,与后文贾琏戏熙凤形成鲜明对比。一个是冷冷清清,一个是激情似火,李纨贞洁静默的寡居情状跃然纸上。

以女工象征贞静的写法在其他小说中也被采用。在《锦绣衣》“换嫁衣”故事中,花玉人出远门,他的妻子文姿把房窗紧闭,每日在家素面朝天,埋头女工。《金瓶梅》第五十五回,西门庆去京城后,吴月娘与其他妾室各自在房中做针指不出来闲耍,只有潘金莲想着与陈敬济私通而“每日只在花园雪洞内踅来踅去,指望一时凑巧”^{[14]397}。一贞一淫,对比鲜明。总之,在作家看来,贞静是理想女性最基本的美德,而沉迷于女工活动是女性贞静的显著体现。

《红楼梦》作者紧随时代思潮,大力弘扬女才,以诗词唱和、诗词比赛、元春面试考才的方式凸显女子的文才卓著。作者一方面赞美女子超凡的识鉴能力、人生智慧、叛逆精神,但另一方面作者却仍对以女工所代表的传统女性魅力念念不忘,赞美她们的本分、勤俭、贞静的美德,显示出《红楼梦》革新与保守的双重思想倾向。这是我国超稳定社会系统的产物,古代社会思潮的革新只是宗法一体化社会结构中处理创新因子的一种震荡机制而已,目的是维持这一社会系统的稳定性。

三、在叙事上:女工是生活化视角的切入

女工与宴饮、节庆、红白事一样,是以生活化的视角来展示世情的一种手段,生活化视角对于连缀众多线索,形成小说的网状结构有着重要作用。女工营造了女性世界,与男性世界形成了鲜明对比,不同的女工活动可以展示女性生存的不同状态。《红楼梦》把女工的叙事

作用发挥得非常全面，在世情小说中具有集大成的地位。

(一) 女工参与网状结构的编织

《红楼梦》线索繁多，可分为人物线索、物品线索、事件线索，又可分为主线、辅线、暗线、明线。不同线索之间交错成一个巨大的经纬网，叙事容量巨大。网状结构的形成既需要线索，又需要结点把不同的线索连接起来。女工产品是不同线索交织在一起的结点。

亲戚间的人情往来常常以互赠女工产品“针线”以表达心意，这种行为也起着建构网状结构的作用。第六十二回宝玉生日，王子腾那边送的生日礼中就有“一套衣服，一双鞋袜”^{[6]844}。薛蟠打死人，贾雨村为讨好王子腾、贾政而放走薛蟠。王子腾早死，四大家族失去一个重要的靠山。薛蟠第二次杀人，四大家族竟不能替薛蟠彻底开脱，直到皇帝大赦天下薛蟠才被放出。元春在第二回出场，死于第九十五回，王子腾在第三回出场，死于第九十六回，二人几乎同时登场和退场。王子腾和元春一样对于四大家族的兴衰有重要的影响，针线的往来是四大家族间相互联络的补充说明，作者笔墨简省地点出四大家族间的联系。第四十六回凤姐对邢夫人提到舅母（王子腾妻子）送来两笼子鹌鹑，凤姐让人炸了做晚饭，鹌鹑和“针线”都是联系两大家族的结点。王子腾这个人物从未正面出场，可以说是暗线，与元春这个明线相辅。由此可见，贾家、王家女工产品的往来同鹌鹑一样起到了沟通明线和暗线的作用。同一宗族内部的交往也是以针线的往来进行的，第五十三回贾府过春节，尤氏与贾蓉的妻子打点针线送给贾母，宁国府、荣国府的密切关系通过针线沟通而体现出来。贵族未嫁女子也以针线来进行人情往来，第二十二回宝钗要过生日，湘云把以前做的针线活计取来送给宝钗，湘云曾经在第二十回赞美过宝钗，针线送礼暗示着湘云对宝钗的好感，针线将二人联系得更加紧密。后来湘云跟着宝钗住，宝钗送螃蟹帮她做东道，阻止袭人让湘云做鞋而自己替宝玉做鞋，薛、史两家的线索因为针线往来而有了更多的结点。第五十七回薛姨妈生日，黛玉早早准备了两色针线送过

去，在这一回宝玉因紫鹃说黛玉要走而大病了一场，薛家因此放弃了对金玉良缘的执着，黛玉认薛姨妈为干妈，薛姨妈痛快地答应了，通过针线往来，薛、林家族的线索交织起来。联系第四十二回宝钗教导黛玉不要看杂书，从此二人再无嫌隙来看，黛玉送薛姨妈针线是宝钗、黛玉关系质的飞跃的标志性事件，两条人物线索有了更多的结点。针线往来是家族线索、人物线索交织的重要结点，参与了网状结构的构建。

绣春囊是众多人物线索、事件线索交织在一起的重要结点为网状结构的编织起着重要作用。第七十四回绣春囊事件把很多人卷进来，上至夫人小姐下至丫鬟婆子，人物间的各种矛盾交织在绣春囊这个点上。邢夫人把傻大姐捡到的绣春囊送给王夫人，这是对王夫人治家不严的无声指责，也是对贾母偏心老二并拒绝嫁鸳鸯给贾赦的几次愤怒的爆发。婆子们告倒了晴雯，是对自己长期失宠乃至被遗忘的报复，是年轻奴才与年老奴才长期矛盾积攒的结果。惜春坚决地清退了入画，并与哥嫂划清界限，这是惜春对哥嫂生活作风不满的体现。司棋与潘又安之间往来的香袋、袜子、缎鞋被发现。王夫人为查出的禁物而大惊，来到怡红院亲自撵走了四儿、芳官、晴雯，这是王夫人与年轻女奴们的矛盾外显。探春怒打王善保家的，为家族的丑事而悲痛，体现了探春管理理念与贾府掌权者的不合。众多人物线索、事件线索交错在这个结点上，具有很强的叙事张力。

鞋子也有结点的作用，探春为宝玉做鞋，赵姨娘说风凉话，探春听说后怒斥赵姨娘的见识“阴微卑贱”。这一结点把探春和赵姨娘、贾环的矛盾，甚至是宝玉与赵姨娘母子的矛盾展示出来。联系前文赵姨娘在马道婆面前对于没有好鞋面的叹息，而宝玉有湘云和宝钗替他做鞋，可见赵姨娘母子与王夫人母子间矛盾之深。结点把多个人物线索拧在一起，作为结点的女工产品便于对人物矛盾予以呈现，概括性强。

女工产品把不同的人物线索、事件线索连接起来，参与到网状结构的建构，造成前后情

节呼应而达到“密针线”的效果。一些女工书写看似闲笔(如针线往来),其实起着补充说明的作用。《金瓶梅》中的女工产品也起着构建网状结构的作用,第二十八回一只红绣鞋形成众多人物线索交织在一起的结点,把潘金莲与宋惠莲、潘金莲与陈敬济、潘金莲与西门庆、西门庆与小铁棍的纠葛纳入结点之中,叙事张力十足,内涵丰富。

(二) 女工参与女性世界的营造: 美与爱的乐园

女工是女性的日常活动,作者用这一生活化视角可以展示浓厚的女性生活气息,这种写法在以多个女性为主角的世情小说中是常用的,如《金瓶梅》《林兰香》,女工在营造美与爱的女性世界中起着重要作用。

第一,女工代表女性日常生活之美。针黹是贵族女性主动从事的消遣活动,大观园是十二钗在人间的乐园,女儿国式的生活空间充满着女性生活的气息,女工是最显著的女性世界标志。第四回写宝钗来贾府后每天与黛玉、迎春姊妹等在一起“或看书下棋,或做针黹,倒也十分乐业”^{[6]66},第二十三回宝玉搬进大观园,每天与姊妹们读书写字,弹琴下棋,作画吟诗,描鸾绣凤,斗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十分快乐。这时宝玉已经十二三岁,按照惯例,清代贵族男子一般在六岁入学准备科举,宝玉在大观园中摆脱了上学之苦。宝玉的《四时即事诗》有“倦绣佳人幽梦长,金笼鸚鹉唤茶汤”之句,他在远离科举的女性世界中感到无忧无虑的生活之美而流连忘返。对宝玉来说,女工所参与营造的女性世界与男性世界形成鲜明的对比,女性世界远离科举,没有男性世界的科考压力,女性世界是个隔绝出来的空间,没有世俗价值观(等级观念,繁缛的礼节,仕途经济观)的侵染,这让宝玉感到愉悦轻松。对宝玉来说,无关科举的女工成为女性世界的显著标志。第五十回宝玉梦到甄宝玉,只见榻上有一个人卧着,旁边有几个女儿做针线,也有嬉笑玩耍的。梦境中的女工是现实中宝玉渴望亲近的女性世界的标志性符号。

第二,女工代表的女性青春之美。第八回宝玉来梨香院探望生病的宝钗,见薛姨妈正在

打点针黹与丫鬟们,进来见宝钗坐在炕上做针线。宝玉细细观察宝钗的穿着与面容,在女工背景下感受到女性的青春之美。第五十二回宝玉见黛玉、宝钗、宝琴、岫烟围坐在熏笼上诉说家常,紫鹃倒坐在暖阁里做针线,宝玉赞美真是一幅“冬闺集艳图”,这是对群体女性青春美的赞美。年轻女性的女工行为与化妆打扮是年轻女性青春之美的标志,所以宝玉爱吃胭脂,用花瓣做胭脂膏子。他帮麝月篦头,帮平儿理妆而喜出望外,凡是与年轻女性密切相关的活动宝玉都有着天然的亲近欲望。

第三,女工体现的女性心灵手巧之美。第二十七回花朝节这一天,大观园女子饯别花神,她们用花瓣、柳枝条编成轿马,用绫锦纱罗叠成干旄旌幢,用彩线系在树枝上。女工技艺与花木交相辉映,女儿们具有心灵手巧的女性特质。第三十五回莺儿的主子宝钗更是对络子的配色有着高超的见解,宝玉听了,喜之不尽,立刻让袭人准备金线。第五十二回宝玉的孔雀裘烧了个洞,婆子们拿给织补匠工都不认识不敢揽活,怡红院只有晴雯会界线,她强忍病痛补好了孔雀裘。第五十九回,莺儿编织了一个花篮,黛玉赞美“手巧”。第五十三回对刺绣画“慧纹”的书写堪称是一个女工人物的小传记,学者认为慧纹的原型就是松江的顾绣^[23]。《醒世姻缘传》也多次提到顾绣衣服的质量之好,可见,女子在女工方面的成就已经达到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了。小说对高级女工产品的介绍客观上体现了对女性心灵手巧的赞美,也体现着女工所代表的女性独立的存在价值。

第四,女工代表来自女性世界的关爱体贴。第七十八回在《芙蓉女儿诔》中宝玉对晴雯的思念是与女工相关的:“楼空鳩鵲,徒悬七夕之针;带断鸳鸯,谁续五丝之缕……抛残绣线,银笺彩缕谁裁?褶断冰丝,金斗御香未熨。”^{[6]1111}他对晴雯做女工的场景记忆尤深,因为女工最能体现晴雯的心灵手巧,也最能体现晴雯对自己的忠心与关爱,所以他在晴雯死后极度悲伤。宝玉的针线不让匠人去做,因为他渴望得到身边年轻女孩儿们对自己的体贴与关爱,所以他让袭人、晴雯、黛玉甚至是莺儿

给自己做针线。黛玉、宝钗、湘云、探春都曾经给宝玉做过女工，宝玉把黛玉做的香囊贴身戴在红袄里头，足见宝玉对黛玉体贴之情的珍重。探春做的鞋质量不好，宝玉仍然穿着，连贾政都看不下去，这是宝玉对女孩儿关爱之情珍视的体现。宝玉从自己的穿戴上感受到女儿们对自己的关爱，他珍视这种关爱，这和他渴望得到所有女孩儿的眼泪是一样的道理。

在男性世界中，宝玉感受到的是科举带来的紧张感，结合贾代儒对贾瑞的严厉惩罚可以看出贵族男子的科举压力之大，所以他看到“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对联而心生反感，对科场人物贾雨村的造访而不胜其烦。充满美与爱的女性世界让宝玉感到轻松愉快，在女工所参与营造的女性气息中，宝玉沉迷其中，与世俗的男性世界做着短暂而消极的抵抗。

（三）女工展示女性生存状态

《红楼梦》通过对贾府室内装饰和主子们穿的女工产品营造出一派富贵之相，还通过女工活动展示女性不同的生存状态。

主动的女工行为多体现出女性生活所处的顺境状态，《红楼梦》中贵族女性的女工多是主动性的，女工产品的审美价值高，像慧娘的慧纹，黛玉为宝玉绣的香袋。主动的女工行为次数的变动可以展现人物的身体状况，黛玉曾在第十九回、第二十五回、第二十八回、第二十九回送给宝玉自己做的荷包、香袋、玉上穿的穗子，并裁剪衣服。之后小说再没有写黛玉从事女工活动，而宝钗、探春、袭人、紫鹃、晴雯的女工活动在第二十九回之后依旧不断。第三十二回袭人对湘云数落黛玉：“他可不做呢。饶这么着，老太太还怕他劳碌着了。大夫又说好生静养才好，谁还烦他做？旧年好一年的工夫，做了个香袋儿；今年半年，还没拿针线呢。”^{[6]431}侧面写出了黛玉身体之弱，在门外偷听的黛玉自思“况近日每觉神思恍惚，病已渐成，医者更云气弱血亏，恐致劳怯之症”^{[6]433}，与袭人之语相合。第四十五回黛玉对宝钗说自己的病感觉比往年加重了似的，第四十九回宝玉说黛玉比往年越发瘦了，第五十七回宝玉中午看望黛玉不敢打扰黛玉午休，与第十九回

中午找黛玉聊天形成对比，女工行为与黛玉的身体状况密切相关，女工活动的停滞说明黛玉的生命力减弱，病情加重。

被动的女工行为体现出女性被压迫或身处穷困的逆境状态，被动的女工行为往往与女性的生存困境相联系。湘云每晚要做女工到三更天，替别人做一点家里太太奶奶们就不高兴，这与湘云“襁褓中，父母叹双亡，纵居那绮罗丛，谁知娇养”^{[6]83}的悲苦身世相映照，是湘云在家庭生活中被严格管束的体现。《红楼梦》开篇写甄士隐在巨大的生活打击下顿悟出家，妻子封氏失去依靠而在娘家与两个丫头日夜做针线卖钱谋生，仍然免不了封肃“日日抱怨”，女工书写体现了已婚贫穷女子重回娘家被嫌弃的囧态。《红楼梦》中贵族小姐的女工多为刺绣，制作的多是香袋、荷包、扇套子等装饰品。刺绣工作需要光滑的手指以防划线，需要明亮的能放绣棚的一间房屋，需要多彩的上好丝线，需要充足的闲暇时间。在凌叔华《绣枕》中，仆人的女儿小姐要看看大小姐的绣枕，大小姐嫌小姐流着汗且衣服脏不同意，这是女工阶级性的体现。刺绣几乎是贵族女性的专属，而贫困家庭的女性很难有从事刺绣的条件，粗糙的针线活与纺绩成为她们被迫的女工选择和谋生手段。从第十五回关于巧姐的图谶可知，贾府败落后，巧姐成为农村妇女，从事的女工就是纺绩。

以女工行为展示女性生存状况的手法在其他小说中也有体现。《金云翘传》第十四回王翠翘成为束守的妾，二人瞒着束守的妻子宦氏。宦氏知道后趁束守上京参加科举，派宦鹰、宦犬抓走王翠翘送到自己的娘家，王翠翫被打30大板，被取名花奴。宦氏的母亲派她刺绣浇花，让她换上针绣队里的衣服穿。这种被动的女工行为印证着女性被压迫被侮辱的生存状态。《金瓶梅》第二十三回宋惠莲向西门庆索要鞋面，在西门庆的资助下，宋惠莲立即做了一双和潘金莲极其相似的鞋子，表现出宋惠莲与西门庆私通后宋惠莲经济状况的好转。《再生缘》第二十回刘燕玉逃婚藏在尼姑庵，带的银子被香公张七偷走。刘燕玉只得为尼姑庵做衣裳维持生计“做一件来又一件，众

尼姑尚然嫌慢速催完。华容憔悴非先日，穿的是墨布裙儿蓝布衫”^[24]。被动的女工活动是女性被压迫和被侮辱的体现，从事被动女工活动的女性身心遭受着巨大的压力与创伤。

（四）在女工中观照女子容貌

生活化视角的切入有利于开展场景描写，女工这一生活化视角为作者对女性展开白描性、写实性、个性化的场景式容貌描写提供了便利，与程式化的人物赞语极为不同。这种写法可能源于《金瓶梅》。《水浒传》对潘金莲容貌的描写只有第二十四回武松第一次见潘金莲时的赞语，呈现出程式化特点。而《金瓶梅》对潘金莲的容貌则有多处白描式书写，其中潘金莲与西门庆第二次在王婆家见面的容貌描写是在女工场景中展开的：“西门庆睁眼看着那妇人，云鬟叠翠，粉面生春，上穿白布衫儿，桃红裙子，蓝比甲，正在房里做衣服，见西门庆过来，便把头低了。这西门庆连忙向前屈身唱喏，那妇人随即放下生活还了万福。”^{[14][29]}这里的外貌描写篇幅还较为简短，而“深得金瓶壹奥”的《红楼梦》对这种写法更加重视，篇幅更长，次数更多。

第一次是第七回周瑞家的来梨香院寻找王夫人，见宝钗“穿着家常衣服，头上只散挽着鬟儿，坐在炕里边，伏在小炕桌上同丫鬟莺儿正描花样子呢”^{[6][103]}。第八回宝玉来探望生病的宝钗，宝玉“先就看见薛宝钗坐在炕上作针线，头上挽著黑漆油光的鬟儿，蜜合色的棉袄，玫瑰紫二色金银线的比肩褂，葱黄绫子棉裙，一色儿半新不旧，看去不见奢华。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脸若银盆，眼如水杏。惟觉雅淡。罕言寡语，人谓装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6][119]}人物的发型、穿着甚至是性格在女工场景中得到了全面的表现，这也是对第五回概括式的介绍“品格端方，容貌丰美，人多谓黛玉所不及”^{[6][68]}的补充说明，宝钗对宝玉穿戴的关注引出对金玉的观看和讨论，一箭双雕，女工书写的张力尽显，可以说这一回把借鉴《金瓶梅》以女工写容貌的技巧运用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高度。第四十六回邢夫人来劝说鸳鸯嫁给贾赦，在卧室见鸳鸯坐在那里做针线，邢夫人“一面说，一面便接他手内的针

线瞧了一瞧，只管赞好。放下针线，又浑身打量。只见他穿着半新的藕合色的绫袄，青缎掐牙背心，下面水绿裙子。蜂腰削背，鸭蛋脸面，乌油头发，高高的鼻子，两边腮上微微的几点雀斑”^{[6][615]}。前文对鸳鸯的外貌没有任何描写，这一回随事补充。在女工这一充分展现女性气质的场景下对女性容貌予以观照，显得细致、亲切、真实。

四、《红楼梦》女工书写在小说史上的地位

女工是古代大多女性从事的家庭副业，小说对女工行为的较多关注开始于宋元话本，宋元话本因对世俗生活进行书写而出现了以女工人物为主角的篇目，如《碾玉观音》。明清小说对女工的书写越来越多，尤以家庭生活类世情小说为多。明清才子佳人小说、文言小说对女工的书写多点到为止，其作用大多是点缀女性的完美形象。如《玉娇梨》对红玉的介绍：“到八九岁便学得女工针黹，件件过人。”^{[25][2]}有些才子佳人小说因强调女子的诗才而对女工只字未提，如《平山冷燕》《飞花令》。《聊斋志异》有很多篇目的名字带有女工色彩，如《纫针》《织成》《巧娘》《阿绣》《白秋练》，《鸦头》《青梅》一笔带过地提到女子出卖刺绣产品支持书生的科举事业。而家庭生活类世情小说从《金瓶梅》《三言二拍》到《醒世姻缘传》《林兰香》《歧路灯》《红楼梦》等对女工的书写越来越重视，尤其以《红楼梦》的女工书写次数最多，女德含义最深刻，叙事作用发掘最全面。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可知，《金瓶梅》的女工书写在小说史上具有奠基作用，《红楼梦》对女工象征的女德内涵进行了深入挖掘，对女工所体现的女性美予以全面展示，对女工过程给予细致的描写，对女工行为施加丰富的暗示性含义，使女工书写充分、典雅、含蓄。可以说，《红楼梦》的女工书写在明清小说中处于巅峰的地位，具有集大成的性质。

〔参考文献〕

- [1] 天花藏主人著，王多闻点校.两交婚[M].洛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5.
- [2] 张俊.清代小说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

- 社,1997.
- [3]张晓红,顾妍.《红楼梦》中的“女红”书写[J].红楼梦学刊,2022(1):179-197.
- [4]张晓红,张克锋.女红与读书:《红楼梦》中的女教及女教观[J].红楼梦学刊,2016(4):250-263.
- [5]许中荣.《红楼梦》中女红书写的文学传统及其修辞功能[J].红楼梦学刊,2020(6):227-246.
- [6]曹雪芹著,无名氏续.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 [7]陈弘谋.教女遗规[M].乾隆四年到八年培远堂刻汇印本,卷中.
- [8]赵云芳.宝钗生日“穿天节”小考[J].红楼梦学刊,2012(1):57-69.
- [9]双林.清代服饰[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
- [10]班昭,吕坤著.黄冠文,宋捷译注.女诫、闺范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
- [11]吴昆.黄帝内经素问吴注[M].万历三十七年刻本,第四卷.
- [12]沈朱坤.新注女四书白话注解[M].北京:万国道德总会印刷部,1944.
- [13]施耐庵,罗贯中[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9.
- [14]兰陵笑笑生著,文人宝校.金瓶梅[M].香港:香江出版社,2017.
- [15]李绿园著,柰星校注.歧路灯[M].郑州:中原古籍出版社,1998.
- [16]蓝鼎元.鹿洲初集[M].四库全书本,卷五.
- [17]随缘下士编辑,于植元校点.林兰香[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
- [18]丁佩著,戚嘉富编.绣谱[M].合肥:黄山书社,2015.
- [19]高彦颐.塾闺师[M].李志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 [20]汤显祖.牡丹亭[M].北京:知识出版社,2015.
- [21]郑玄注,陆德明音义.礼记[M].相台岳氏家塾本.
- [22]陈郑氏撰,黄治徵注.新镌图像郑氏女孝经句解[M].明万历18年刊本.
- [23]许军杰.胭脂鲜艳何相类——慧纹与顾绣原型关系考辨[J].民艺,2021(6):132-137.
- [24]陈端生.再生缘全传[M].清道光二年宝宁堂刻本,卷七.
- [25]冀秋散人编,韩锡铎校点.玉娇梨[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

(责任编辑 南山)

如何治理教育风险？

——评倪娟研究员《教育风险治理通论》

袁振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200062)

[中图分类号] G4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5)06-0122-02

教育的安全与稳定,是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也是关系国家安全的大事。如何将总体国家安全观系统性地贯彻到教育领域,构建起一套科学、有效的风险防范与治理体系,已成为教育治理发展的重要课题。然而,当前该领域的专题研究仍显不足,既有成果也较为零散。

在此背景下,欣闻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的倪娟所长,历经多年攻坚克难,推出了《教育风险治理通论》这部力作。通览全书,我深感振奋。这不仅是一部学术专著,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时代责任。它以敏锐的政治自觉、宏观的战略眼光和扎实的实践探索,提供了教育风险治理的框架,具有开创性意义。

一、将“总体国家安全观”转化为教育治理的行动要义

一部优秀的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其价值首先体现在它对时代脉搏的精准把握和对国家战略的深刻洞察上。《教育风险治理通论》的贡献,首先在于其鲜明的政治站位与战略格局。它并非就教育论教育,而是将教育事业主动融入国家安全大局,将“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宏大战略思想,创造性地转化为教育领域可感知、可分析、可应对的治理框架。

书中提出的将教育风险划分为“危及国家安全、影响社会稳定、威胁公共安全以及综合影响”四大类型,就是这一转化工作的集中体现。这种分类方法,对接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涵盖政治安全、社会安全、公共安全等多元维度的核心要义,使得对教育风险的研判不再是模糊的、零散的,而是有了清晰的战略坐标和政治标尺。这充分说明,该项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是围绕“国之大者”,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江苏作为教育强省,始终承担着为国家教育改革探路先行、提供示范的重任。倪娟同志作为江苏本土成长起来的优秀学者,被遴选为省“333工程”高层次人才培养对象、省首席科学家,她所领导的这项研究,正是江苏服务国家战略、贡献智慧力量的生动写照。其研究成果从国家教育安全的宏观视角出发,系统填补了教育学理论在这一领域的空白,这不仅是对教育学科建设的重要推进,也是为全国教育系统构筑安全“防火墙”提供了重要参考。

二、构建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实践”的治理体系

战略思想的落地,关键在于构建一套行之

[收稿日期] 2025-10-21

[作者简介] 袁振国,男,江苏泰州人,华东师范大学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有效的治理体系。《教育风险治理通论》的另一大突出贡献，在于其理论的系统性与实践的可操作性。该书并未停留在风险的宏观描述，而是深入肌理，系统构建了一套涵盖“风险识别—机理分析—治理模式—机制建设—策略选择”的全链条治理方案。

书中建立的“教育风险”“教育脆弱性”“教育韧性”等一系列关键概念，为我们科学研判风险提供了“通用语言”。其揭示的“系统内原发、系统外诱发、系统内外关联”三大生成机理，以及凝练的“嫁接、靶向、溯源、融合”四种治理模式，更是为我们从根源上化解风险提供了路径。尤为可贵的是，书中构建的决策、预警、应对、恢复四大治理机制，形成了一个从顶层决策到末端处置的完整工作闭环，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实践。倪娟所长及其团队的研究工作，充分体现了“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求是精神。书中对“双减”这一重大民生政策实施过程中的风险研究，就是一个极佳的例证。他们深入一线，组织了覆盖数十万人的大规模调研，获取了大量宝贵的一手数据。这使得他们对政策执行中可能出现的“不减反增”、新的不公等风险点的判断具有重要的警醒意义。

这种扎根实践的研究，也使其成果具备了很高的决策参考价值。据了解，该团队形成的二十余项决策建议获得国家级和省级领导的批示采纳，这在社科研究领域是十分难得的。这正是我们所倡导的新型智库建设追求的目标。

三、以“人民为中心”守护教育发展的安全底线

总体国家安全观，本质上是“人民安全观”。教育领域的风险治理，最终目的就是要维护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保障每一个孩子都能安全、健康、快乐地成长。《教育风险治理通论》通篇贯穿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彰显了深厚的人民情怀。

无论是对“校闹”等社会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的深刻剖析，还是对“双减”背景下教师负担、家庭焦虑等民生痛点的密切关切，研究始终将师生、家长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放在首位。书中提出的许多对策建议，如优化课后服务、为教师减负、规范民办教育发展等，都直面群众急难愁盼，力求在改革发展中守住教育公平和质量的底线，防止风险转嫁给普通家庭和一线教师。

研究成果的影响力，也充分体现了其广泛的社会效益。倪娟受教育部综合改革司邀请介绍研究成果，也受邀在全国多地为校长、局长干部举办培训讲座，将专业的治理理论转化为基层教育工作者听得懂、用得上的实践智慧。其研究成果通过“学习强国”、新华社客户端等主流媒体的广泛传播，获得了数百万乃至上千万的关注，积极引导了社会舆论，为重大教育政策的平稳实施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这种顶天立地的学风，充分展现了一位优秀社科工作者的时代风貌。

(责任编辑 陈晓姿)

On Socialist Spiritu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YUE Kui

(School of Marxism,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Institute of New Era Civilization Practices, Wuhan, Hubei, 430079, China)

Abstract: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s the one that coordinates material and spiritual civilization, which necessitates a systematic clarification of such questions as “why to build socialist spiritual civilization”, “what to build”, and “how to build 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ductive logic, the construction of spiritual civilization is an imperative requirement for achieving its coordination with material civilization, an inevitable choice for realizing the free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and a crucial guarantee for cementing the independent spiritual strength in modern times as well. From the angle of historical evolution, the CPC ha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spiritual civilization while leading people in advancing and expanding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realizing a stepwise leap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spiritual civilization from initial exploration, innovative improvement to in-depth advancement. Facing the new era and new journey, it is essential to take the strategic overall situation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to consideration based on a relatively abundant material civilization, focus on strengthening the unity and casting the soul, lay emphasis on educating and cultivating talents through culture, adhere to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deepen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and make unremitting efforts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spiritual civilization, so as to build up the Chinese spirit, Chinese values, and Chinese strength for advancing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socialist spiritu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Chinese spirit

Paths to Rural Spiritu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from the Supply-Side Perspective

HU Jun

(School of Marxism,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Institute of New Era Civilization Practices, Hefei, Anhui, 230601, China)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spiritual civilization is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promoting rural modernization. Deepening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of rural spiritual civilization and improving the match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will help better meet the people's spiritual and cultural needs. On the new journey of the new era and in the face of the new changes in farmers' spiritual and cultural demands, the supply in rural spiritu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faces series of risks, including blurred providers, formalized content, downgraded methods, and fragmented mechanisms. To prevent and resolve the above supply risks,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main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Party committees and engage the whole society participation based on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adhere to the demand-oriented supply to enrich farmers' spiritual life, promote the adaptation of supply methods to maintain full vitality, and effectively integrate the innovative mechanisms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supply quality, thus promoting the long-term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spiritu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Key words: rural spiritu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supply side; effective paths

Logical System and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of Cultural Education Theory in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YUAN Fang

(School of Marxism,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2249, China)

Abstract: The theory of cultural education in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reveals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the two-way interaction between humans and culture, and clarifies that the formation of cultural education relies on the fundamental guarantee of the Party's cultural leadership, the establishment of cultural subjectivity, and the innovative methodology of the “two combinations”. The theory also proposes that the Party's innovative theories, the core socialist values, correct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cultural heritages and Chinese stories should be fully used to achieve theoretical armament, talents training, moral cultivation,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image display. The theory of cultural education exemplifies the “second combination”, which not only inherits and develops the ideological wisdo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literature conveys truth and moral principles”, but also innovates and develops the Marxist theory of all-round human development, thus promoting the revitalization of Marxist theory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wisdom.

Key words: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cultural subjectivity; the “second combination”

Core Background, Key Paths, and Governance Directions for Professional Transformation of Teachers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Global Report on Teachers”

WANG Jin JIA Huiying

(Faculty of Education,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4, China)

Abstract: The “shortage of teachers”, as an overall crisis faced by global education and a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 of unbalanced resource allocation, is intertwined and mutually reinforcing with the decline of the attractiveness of the teaching profession, both constituting the urgent reality and core obstacle to promoting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teaching profession, which needs to be resolved through a systematic strategy that combines internal and external measures. Internally,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a teacher career development path centered on lifelong learning. Through continuou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mprovement of innovative capabilities, and digital intelligence empowerment, the internal driving force of individual teachers to cope with change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Externally, it is essential to reconstruct the governance directions and create a new social contract for teachers. That is, through the following three measures—reshaping the role of teachers, optimizing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updating the evaluation system, the professional ecology of teachers should be systematically improved. The core essence of this concept lies in transcending the traditional relationship of employment and instruction, setting up a new-type partnership for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mong the government, schools, teachers and society, and reshaping the professional authority and public value of teachers, in order to ensure that they truly become co-builders of the educational reform.

Key words: the shortage of teachers; attractiveness of the teaching profession; lifelong learning; a new social contract; professional transformation of teachers

Three-Dimensional Exploration of the “Metavers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nnotations, Boundaries, and Approaches

HU Hua

(College of Marxism,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Petrochemical Technology, Maoming, Guangdong, 525000, China)

Abstract: The embedding capacity, relationship shaping, and recursive generation represented by the metaverse reflect that all kinds of things in human society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human practical activities, which means that materialism, as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practice, emphasizes the normative significance of concreteness, objectivity, and boundaries for human activities. As a highly intelligent digital space deeply coupled with the real world, the metaverse provides technical support and social fields for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nabling its form to evolve from virtual integration to innovative symbiosis. The new 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at connects the virtual and the real world lies in the hands of the main provider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prudently respond to the changes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cenarios triggered by the metaverse and the risks of ideology, Internet addiction, and data privacy, handl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real life and virtual space, metaverse technology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humans and metaverse technology, and actively utilize the metaverse to promot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Key words: the metavers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mainstream ideology; digital transformation